

**TIME
LIFE**

LOST CIVILIZATIONS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失落的文明

SOUTHEAST ASIA:
A PAST REGAINED

东南亚

重新找回的历史

主编：戴尔·布朗

翻译：王同宽



华夏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LOST CIVILIZATIONS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失 落 的 文 明

东南亚 重新找回的历史

SCUTHEAST ASIA: A PAST REGAINED

主编：戴尔·布朗

翻译：王同宽

华夏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南亚：重新找回的历史 / (美) 布朗主编；王同宽译. —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1
(失落的文明)

ISBN 7-219-04449-6

I. 东… II. ①布… ②王… III. 东南亚—古代史 IV.K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4593号

“Copyright © 2002 by Time-Life Inc. Published under agreement with Time Life Books B.V.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 2000 Hua Xia Publishing House and 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devices or system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that brief passages may be quoted for review.

Time Life is a trademark of Time Warner Inc.”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1-0147

项目策划 王 进 彭庆国
版权代理 段长城 周 莉
美术编辑 李筱茜
文字编辑 胡晓波
装帧设计 李筱茜
封面设计 晓霞工作室
责任印制 郭宝恩
责任校对 李带男

华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编：530028)
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16开本 13印张 100千字 2插页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9-04449-6/K·914

定价：6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华夏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本书所有文字和图片均由美国时代生活公司独家授权，翻印必究。

《失落的文明》中译本序

李学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

不久以前，电视系列片《失落的文明》曾成为广大观众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仍在不少人口边时时称道。这样一部介绍外国考古文化的片子，能在我们这里博得公众的欢迎，说明大家对人类遥远的过去普遍怀有特殊的好奇心理。

其实同样的情愫在世界各地人们的心底都存在。记得日本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俳句：“在盛唐的时候，漫步于夜晚的长安市。”已消逝的古代文明，尽管是异国的，仍然能吸引后世的怀念与憧憬。

戴尔·布朗(Dale M. Brown)主编的这套《失落的文明》丛书，与同标题的电视系列片有密切关系。丛书英文标题为 Lost Civilizations，共有24卷，系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出版。由于这套丛书真正做到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在英语世界非常流行。相信以同样的理由，中译本也会为我国读者所喜爱。

《失落的文明》英文版每卷扉页上都有一段话，标明书的性质是“探索过去的世界，以考古学家与其他科学家的发现，把古代人及其文化生动地重现出来”。

考古学发现和研究的巨大成果，是这套丛书的主要基础。然而在这里，考古学不再是报告、简报的堆积和一般人读不懂的论文，而是丰富深刻又不枯燥烦琐，贴近人们的真实生活，适合大多数读者的需要。作为科学普及读物，应当说是十分成功的。

就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来说，这套丛书不只有益于非专业的读者们。现在国内还没有外国考古文物的博物馆，大学中外国考古的课程也较薄弱。《失落的文明》所包含的知识和材料，一些考古、历史、文博工作者也是不容易接触到的。试加浏览，一定有所收获。

最近我在一篇小稿里，讨论过我们为什么有必要了解外国考古学的问题。有一种看法以为，中国历史悠久，遗存丰富，已经研究不完，中国人做中国考古就够了。窃以为这是不妥当的。中国的古代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是将中国文明放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背景去考察，对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也很难真正有深入透彻的理解（《外国考古文化名著译丛》总序）。只有扩大我们的视野，才能认识中国文明的固有价值，才能阐述我们先民对整个人类的巨大贡献。

对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探索，是极为重要的科学研究课题。大家知道，人类是分别在世界若干不同的地区，先后跨进文明的门槛的，而构成文明的种种因素，其萌现要更早得多。这些因素逐渐产生、聚合，推动文明的形成，究竟有着哪些条件，走了怎样道路，其间人类同其环境如何互动等等，都是饶有兴趣的争论中心。《失落的文明》各卷所展示的，正是文明肇端及其早期嬗变的轨迹，是后世人们久已淡忘了的，读



起来就像成人重看儿童时期的老照片一样，每幅图景都会唤起一丝渺茫的追忆。

文明发展的进程，绝不是简单直线的。历史上没有一种古代文明，不曾经历多次曲折，甚至倒退。有的文明，最后竟归于中断和湮没。相当多的文明创造，在时间的长流中又消失了，等到不少世代以后，才重新出现。人们称考古学是在寻找失落的文明，即是出于这样的缘故，在考古学家的锄头、手铲下，不知有多少次意外惊喜。传统上被认为只属于近世的好多事物，其实有着古远的源头。这自然不是《圣经》上讲的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只是证明古代人的才能、力量不可低估，文明的历史比我们想像的更加复杂。

如果从艺术的角度去观察，古代文明的光彩就益为辉煌。翻阅《失落的文明》各卷，很容易看到各种古代文明均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令人惊异的大量珍品。许多杰作具有永恒魅力，后来者无法企及。在这里，考古学同艺术史会合起来，密不可分。

这套丛书可以作为艺术图集来欣赏，同时也可供前往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参考，了解那里不可错过的古迹名胜。书的各卷皆有地图和年表，与论介、考古遗址、文物相配合，还介绍了自然景观与一般人文风光。在有越来越多机会踏出国门的今天，更多地知道异国有哪些珍贵的古代文明财富，无疑会大为提高人们的游览兴致。

《失落的文明》这套丛书的整体设计较好，古代世界的各种文明，包括新旧大陆，基本都已覆盖。各卷呼应配合，但均有独立性，便于单独阅读。卷的编排灵活，比如庞贝就自成一卷，使重点突出了。多数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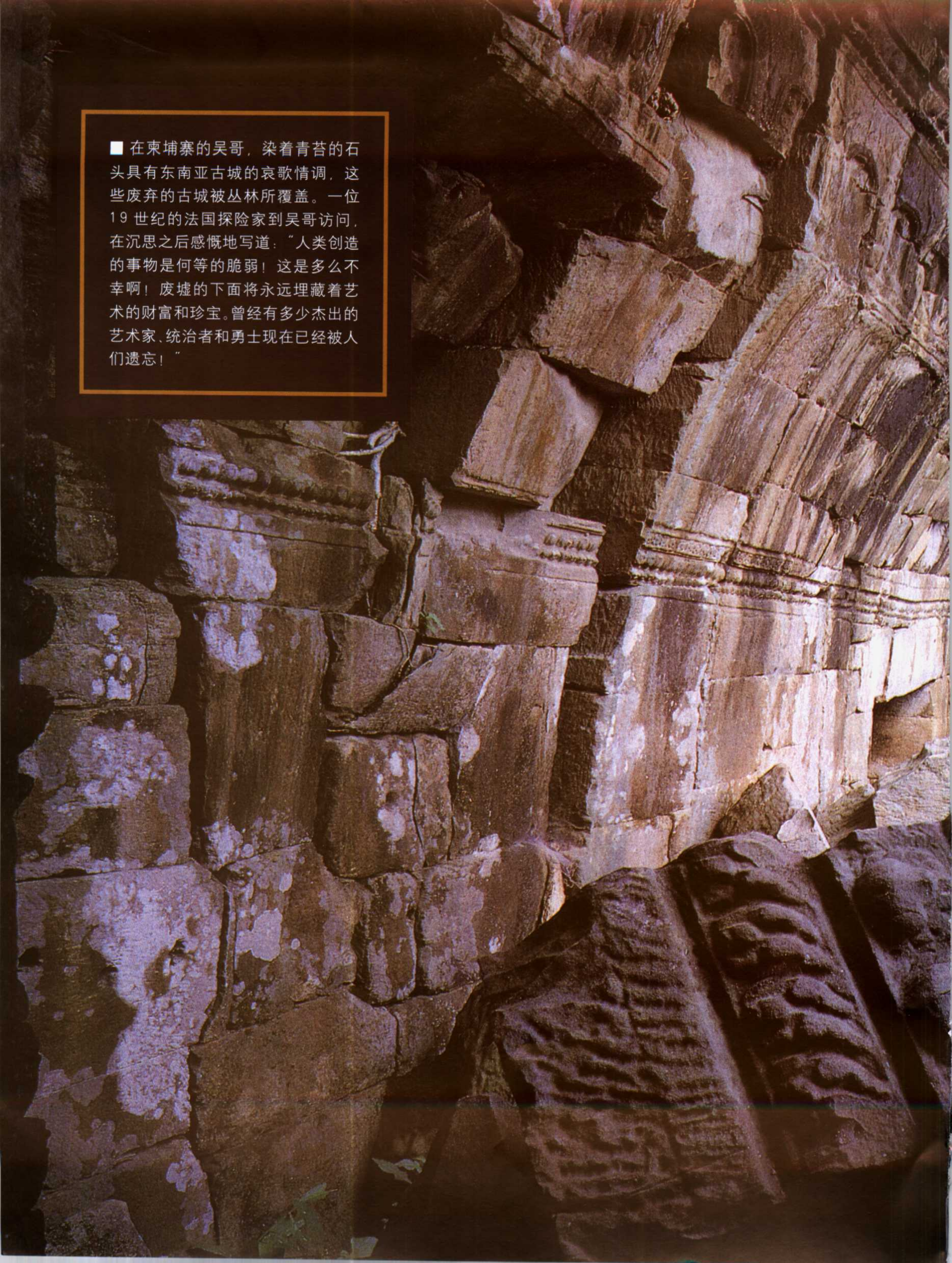
的选材、论述是适当的。难免的是,《古代中国——尘封的王朝》一卷在中国学者看来,尚有不足之处。这反映中外学术界仍有必要进一步交流沟通。

美国时代生活公司的《失落的文明》丛书是普及性读物,但其内容终究有其专业性,尤其是翻译成中文,殊非易事,复制书内这么多的图片也有难度。华夏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费尽心力,在不长的时间里组织推出了这套中译本,实在值得赞赏和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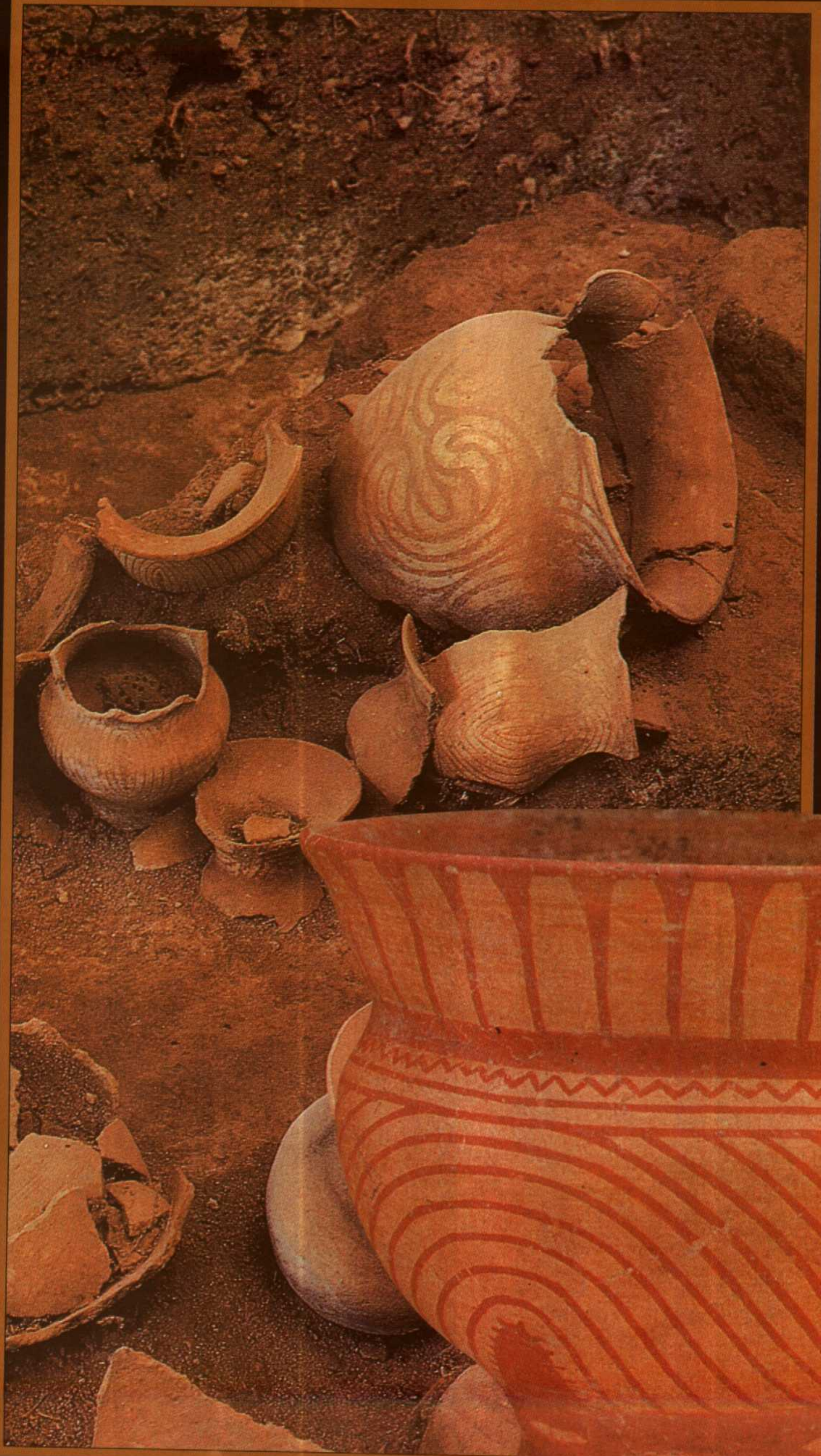
2001年12月1日



■ 在柬埔寨的吴哥，染着青苔的石头具有东南亚古城的哀歌情调，这些废弃的古城被丛林所覆盖。一位 19 世纪的法国探险家到吴哥访问，在沉思之后感慨地写道：“人类创造的事物是何等的脆弱！这是多么不幸啊！废墟的下面将永远埋藏着艺术的财富和珍宝。曾经有多少杰出的艺术家、统治者和勇士现在已经被人们遗忘！”







本书顾问：

乔伊斯·C·怀特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研究专家，是泰国班奇昂考古计划的策划人、史密森研究院关于班奇昂古代文物巡回展览的特邀馆长。他致力于东南亚历史的考古研究工作，并撰写过多篇论文和学术文章。

约翰·N·米克西 曾在印度尼西亚的两所大学担任考古学教学工作，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及东南亚研究计划高级讲师。他组织在东爪哇的年度发掘工作，并撰写了三部著作，其中包括《古代爪哇的黄金与婆罗浮屠：佛教的黄金时代》。

罗伯特·L·布朗 加利福尼亚大学印度及东南亚艺术史系副教授，帕萨迪纳市亚洲及太平洋博物馆东南亚艺术馆的助理馆长。他尤感兴趣的领域是印度的影响与东南亚早期艺术、文化和宗教的关系。

《失落的文明》丛书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林建初 张华斌

副主任 江 淳 王 进

委 员 区向明 彭 匈 王 进

温六零 段长城 彭庆国

李筱茜 郭宝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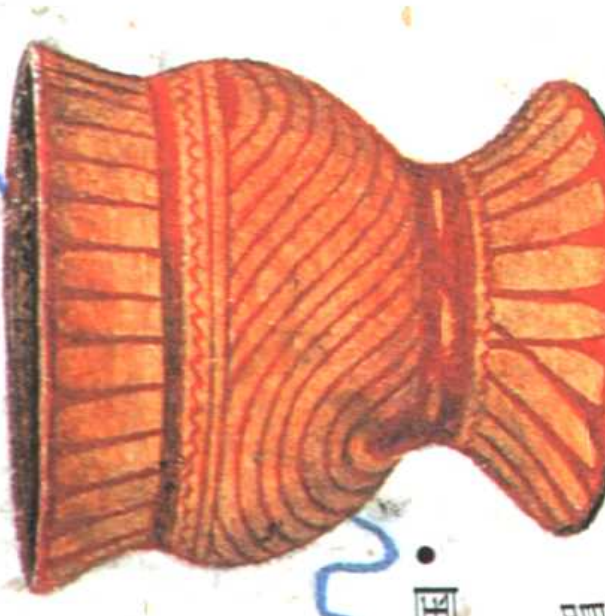
吴哥阿难陀塔

孟加拉湾

北



阇耶跋摩七世



班奇昂出土的陶罐

中国

长江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印度 缅甸 泰国 老挝 越南 柬埔寨 中国 文莱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加里曼丹岛 太平洋 印度洋

滇国 湄公河 萨尔温江 伊洛瓦底江 蒲甘 贝克拉塔诺 室利差旦罗 直通 仰光 考帕农迪 吴哥 金边 奥佑 洞里萨湖 班奇昂 普隆 农诺塔 素可泰 翁巴赫岩洞 斯皮里特岩洞 兰特朗岩洞 斯皮里特岩洞 和平 古螺 河内 东山 米山 东洋

加里曼丹岛

苏门答腊岛

印度洋

爪哇岛 婆罗浮屠 巴兰班南

爪哇金面具

巴厘岛

新几内亚

太平洋

印度洋

太平洋

目 录

第一章 丛林中的惊奇发现 /1

SURPRISES HIDDEN IN THE JUNGLE

解读一则古老的故事 /34

READING AN ANCIENT STORY

第二章 神秘的铜鼓遗产 /45

THE HAUNTING LEGACY OF BURIED DRUMS

揭开吴哥的历史面纱 /73

LIFTING ANGKOR' S VEIL

第三章 王宫和神庙古建筑 /87

ARCHITECTURE IN SERVICE OF KINGS AND GODS

文化融合产生的艺术瑰宝 /130

DAWNING OF A NEW BEAUTY

第四章 艰难的文物保护之路 /147

LESSONS IN CONSERVATION LEARNED THE HARD WAY

婆罗浮屠的新生 /184

THE REBIRTH OF BOROBUDUR

年表：繁荣的东南亚历史文明 /194

THE FLOWERING OF SOUTHEAST ASIA

第一章

丛林中的惊奇发现

SURPRISES HIDDEN
IN THE JUNGLE

1966年，史蒂芬·扬在班奇昂漫步走过，这是泰国东北部的一个村庄，这时候，他被一棵木棉树的树根绊倒，头朝前倒在地上。20世纪的重要考古发现便从此开始了。扬是一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美国驻泰国前任大使的儿子。此时，他正在这个地区从事社会学研究。在被树根绊倒的瞬间，他发现，地上露出一个陶环。经过仔细察看，原来这是半埋在地下的一只黏土陶罐的圆口。附近还有大量这样的陶器，一件一件的。因长期埋在地下，大多已经破裂成了碎片。它们在侵蚀的作用下，从地下慢慢暴露出来。陶器碎片的底色为暗黄色，深红色的粗线条彩绘图案引人注目。扬注意到陶器碎片没涂釉彩，因此，他断定这些陶器碎片非常古老。

他把一些陶器碎片装进口袋，返回曼谷，交给一些专家察看。伊丽莎白·莱昂斯是其中一位。当时，她担任美国国务院顾问。她还记得，六年前曾见到过一些相似的陶器碎片，而且可能来自同一个村庄。她回忆说，那时候，“泰国人对史前时期的历史，或者佛教之前时期的历史没有什么兴趣，他们对发掘史前历史的特殊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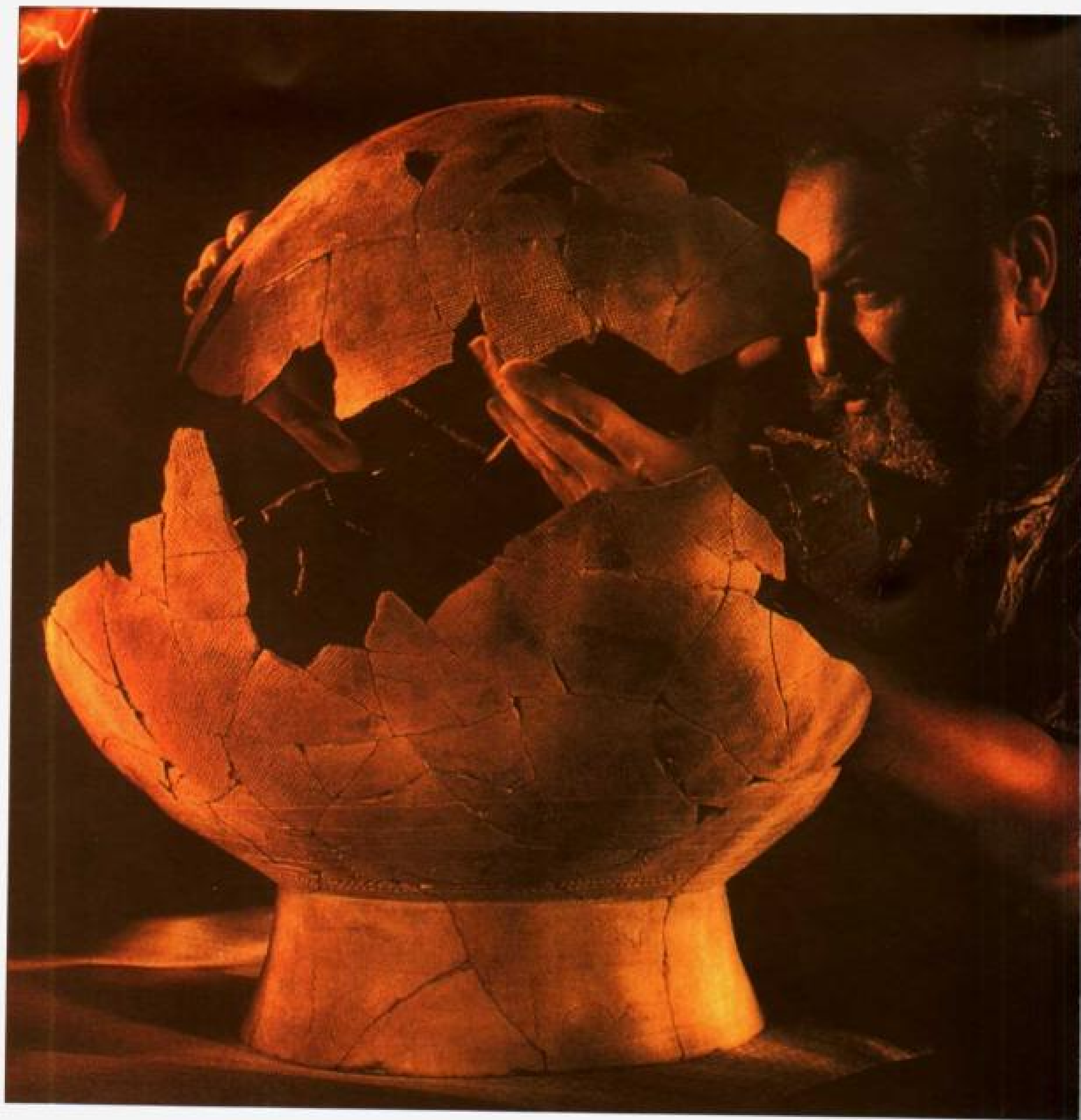
■ 这件陶罐在泰国班奇昂出土，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上面装饰有独具特色的波纹线条。20世纪70年代，这里的发掘工作似乎显示出一个史前东南亚文化的存在（后面背景图）。这个文化的发达程度超出一般人的预想。



求更是一片经验也没有”。

然而，到1967年，一切情况都变了。泰国政府美术部知道在班奇昂发现了不一般的陶器，他们在这个村子进行了发掘探查。除陶器外，发掘人员找到了石器工具，还有小件的青铜制品，这令人十分感兴趣。莱昂斯回忆说：“我们知道，这大概是最重要的。”陶器检测样品被送往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及人类学博物馆考古应用科学中心。一项用来测定黏土烧陶年代的新技术实验在那里刚刚完成。实验人员将陶器放在高温条件下，黏土成分中的放射性能量发出微弱的光辉，通过测量可以获得烧制的年代，这就是热微光测定法。因为放射性能量似乎以某种固定速度积聚，而原来的陶器在烧制时已释放出所有能量，其“原子钟”被重新恢复到零，所以，热微光测定法看来有可能准确测量出一件陶器的烧制年代。经过实验显示，班奇昂的陶器有些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这是引人入胜的事情。

“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佛罗利赫·雷尼回忆说。他是当时的大学博物馆馆长。东南亚或其他地方没



■ 美国考古学家威廉·G. 索尔海姆二世将农诺塔出土的黏土罐碎片仔细地拼接在一起。索尔海姆是一位具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他开创了对泰国史前遗址的系统发掘工作。

发现过如此古老的青铜时代遗址，或者也没被人怀疑过存在这样古老的遗址。确实是这样，古典的青铜时代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在美索不达米亚萌现。东欧和更广大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独有的几个发现，其年代属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时期，人们认为这几个发现表明，是那里的金属加工工匠最先发现了青铜，由锡与红铜熔合，形成一种更坚硬且更耐用的金属。

1969年，热微光测定年代的消息传到泰国，引发了狂热的私人挖掘、买卖和收藏，并于1972年达到最高潮。村民靠古代陶器大发其财，收藏家亦大肆抢购。收藏者中，以附近乌隆空军基地的美军人员居多。1972年7月，泰国政府禁止私人买卖班奇昂的出土文物，并要求登记已经移动的文物。8000个陶罐被登记在案。没人知道，未做记录的会有多少。

泰国考古学家发现，班奇昂村的下面是一个古代墓地，含墓穴数千个。文物众多，包括石器、青铜和铁器，其中有工具和装饰品，还有至少4种类型独特的陶器。鉴于文物数量众多，泰国方面和美国的大学博物馆结成伙伴关系，并掀起了东南亚考古史上最重要的发掘，这对理解文明发展的历程具有深远的意义。

东南亚被视为历史落后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一直是这样看的，从印度、中国甚至东欧较先进的文化那里，进步的漩涡偶然流转至此。然而，自此以后，随着最新考古技术以及最佳考古方法应用于新的发现，如史蒂芬·扬被绊倒时的发现，世界上对这个地区不得不改变其思想认识。威廉·G. 索尔海姆二世是此观念革新的早期领导者，现已从夏威夷大学退休。索尔海姆说，在东南亚进行野外考察，会突然获得丰富的发现，“现在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关于其古代历史和史前历史，将有惊人的发现”。

索尔海姆和其他人一道，最终发现了证据，他们能够证明，世



界上最早的农业生产曾在更广大的东南亚地区有所发现，这里曾掌握较早的金属工艺，曾刺激过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居，即属南岛语系的民族发生的移居。这些能吃苦耐劳的航海者，按共同的语族，分布在马达加斯加岛和复活节岛之间，跨越半个地球。这些新发现将对历史思想产生深刻影响。“在世界文化演变中，西方人的立场及其地位甚至会发生极大的变化，”索尔海姆在文章中写道，“因为清楚而且有力的迹象正在出现，它们显示出，东南亚地区迈出了走向文明的最早步伐。”

东南亚曾属类次大陆岛屿，由中国向澳大利亚方向伸出，比印度所在的南亚次大陆更向南突出。大约1万年前，当冰川时期结束时，上升的海水渗透到这个地区。其中央低地成为中国南海的浅海底，而其南部高耸的山岬和山脉成为海岛，即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群岛。从苏门答腊岛向东，经过爪哇岛和巴厘岛，这部分岛弧是地球上最激烈的活火山区之一。东南亚的大陆部分则由今天的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和属于马来西亚的马来半岛构成。

大陆地势由南部热带海平面向北部亚热带山地逐渐升高。环绕东南亚北部边缘的山脉，即喜马拉雅山脉东侧的山岳丘陵，大河由此向南奔流，从青藏高原直抵中国南海。其中包括萨尔温江、湄公河和长江。两条南北走向的山脉把这个地区分开：一条是安南山系，使湄公河谷自中国南海向东延伸；另一条是湄公河以西的一系列山脉，向南延伸直至最后形成马来半岛的主干。

东南亚大陆的文明被山脉隔开，然而，为交通、运输和贸易提供大动脉的大江大河，却定义并联系着这里的各种文明。湄公河发源于中国西南部，流出中国以后，形成当代老挝和泰国的大部分边界，又流经柬埔寨东部，并在越南的南端冲积形成广阔的三角洲。湄公河再加上泰国的昭披耶河、缅甸的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以及越南的红河，经过年复一年的季节性泛滥，数层淤泥

沉积下来，为这个地区提供了最肥沃的农业土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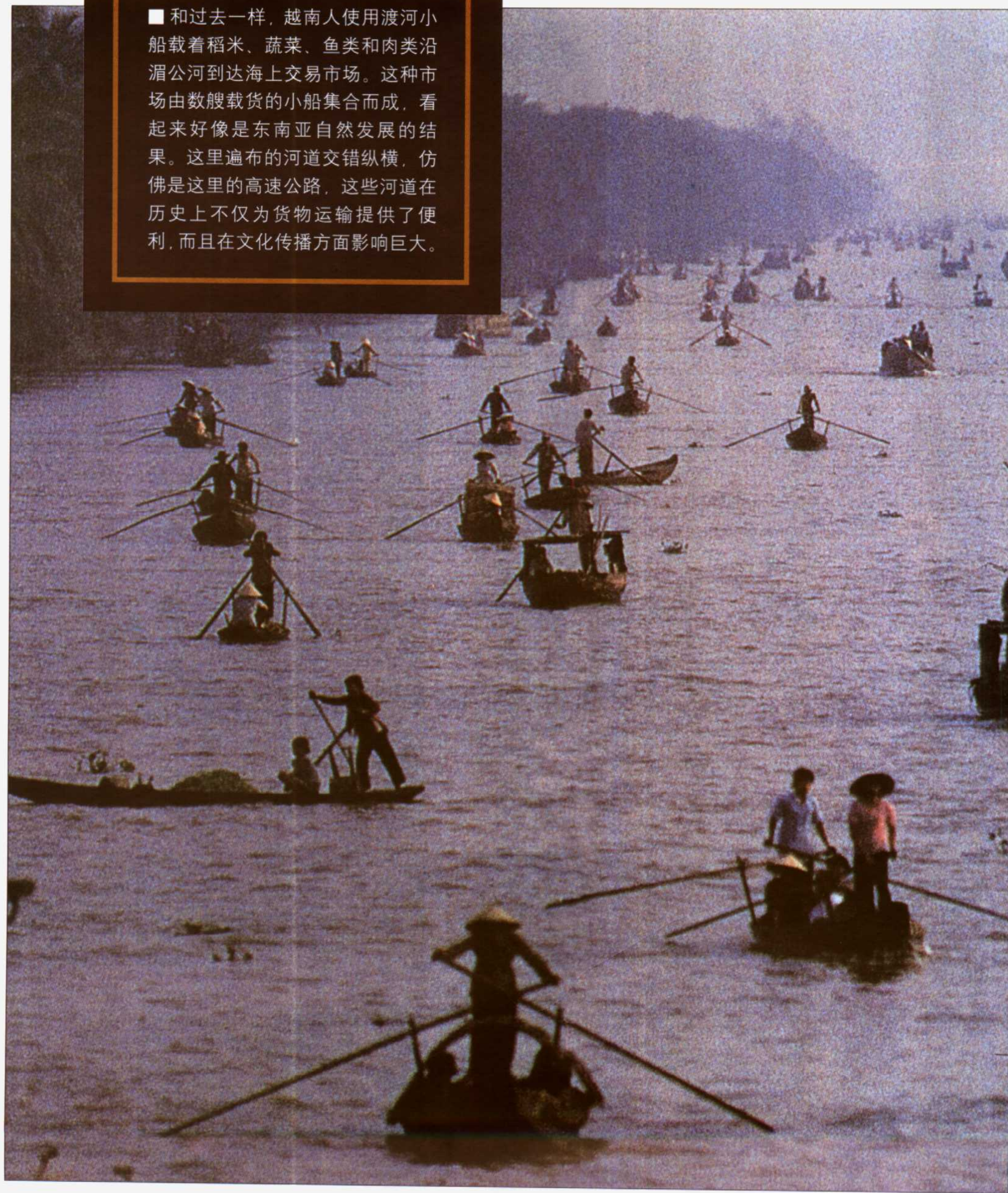
东南亚诸岛受周围水域限制以及相邻陆地的影响，加上邻近岛屿之间的影响，岛屿气候类型多属赤道气候，长年降雨丰沛。而东南亚大陆则多属亚热带气候，有半年的干燥季节。每年从5月到9月，西南季风给大部分大陆地区带来足量的降雨，使河水上涨泛滥，柬埔寨的洞里萨湖，或称“大湖”，其周围地区的水量猛增，比平时多达4倍。作为湄公河下游支流之一的洞里萨河，因流量太大，无法排泄洪水，而使河水倒灌流回洞里萨湖。

16世纪，欧洲人逐渐涉足东南亚地区。在寻找香料的过程中，他们开始在东印度群岛建立商站。葡萄牙人率先侵入。他们以香料贸易赚取巨额利润，肉豆蔻、丁香和肉豆蔻衣等调味品无所不包。葡萄牙实际上垄断了香料贸易，直到17世纪初时，英国和荷兰使用优势海军力量将葡萄牙人从其多数商站赶走。

随着贸易扩张，贸易商品也从香料发展到橡胶、茶叶和锡等其他原材料，而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几个国家相继使用武力，把贸易源头变成殖民地。当英国把注意力集中在印度以及后来的缅甸时，法国和荷兰挺进到东南亚地区。荷兰稳固地控制了爪哇岛、苏门答腊岛以及所谓的香料群岛，直到进入20世纪，他们一直控制着香料贸易。法国进军到东南亚大陆，在19世纪后半叶，他们在今天的越南南部地区(时称交趾支那)建立霸权。此后，他们又占领了越南北部的安南和东京两省，然后又占领了柬埔寨和老挝。法国人把这些地区合成一块殖民地，称之为印度支那。因为根据他们的判断，在地理和文化上，这个地区不过是其两大陆疆邻国的附属地，印度支那的含义就是这样。在整个殖民统治时期，这个地区只有一块地方保持独立，就是暹罗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称暹罗，亦即今天的泰国。

欧洲人在这数个世纪期间来到这里，他们对原住民的历史或文化并无特殊兴趣。法国使者西蒙·德拉·卢贝尔例外。1687年，

■ 和过去一样，越南人使用渡河小船载着稻米、蔬菜、鱼类和肉类沿湄公河到达海上交易市场。这种市场由数艘载货的小船集合而成，看起来好像是东南亚自然发展的结果。这里遍布的河道交错纵横，仿佛是这里的高速公路，这些河道在历史上不仅为货物运输提供了便利，而且在文化传播方面影响巨大。







他和暹罗国王谈成一项商务条约。和多数殖民者不同，德拉·卢贝尔记录下他所遇到的人，这些人使他感到困惑不解。他在笔记中写道，“很难判断”暹罗人“是不是一个单独的民族，从定居暹罗国的首位居民直接传下来，抑或时间进程中，除第一批定居者外，其他别国未曾定居于此”。这是个令人好奇的问题。然而，数世纪以来，却没有哪位学者解答它。

1858年，随着法国在这个地区开始扩大影响，学者亨利·莫霍特肩负起科学调查旅行工作。这是欧洲人首次对东南亚大陆进行科学调查。在他死后，其旅行日记于1864年发表，位于柬埔寨洞里萨湖北部的吴哥古建筑等有珍贵考古价值的历史遗产引起人们的关注。在遗忘数世纪后，丛林高长，神庙古建筑群纵横错落，其精心的装饰，以及引人入胜的雕像和铭文，布满神庙，这昭示着一个富有而先进的文明。然而，欧洲人以前却未曾怀疑到这种文明的存在。莫霍特没费力气去说明他所见到的，而只是简单地勾画和描写了一番，便继续前行。他在日记中提到吴哥的铭文，“只有博学的考古家献身于这个课题的研究”，否则，“口耳相传的只能是有矛盾的猜想罢了”。

用了40年，法国人对这些古建筑遗迹的兴趣才上升到有组织的行动。然而，1898年，法国殖民当局设立了远东研究院。这个由税收支持的东南亚研究学会建立了图书馆和博物馆，并成立了常设考古使团。常设考古使团可进入印度支那地区所有已知的遗址。当然，在掌握进入权的同时，他们对探测和研究这些遗址的建议有决定权。结果，多年来，印度支那古代文明的调查工作一直由法国学者进行。

法国的远东研究院开始用文献来证明和解释早期的外国文化渗透，即公元第一个千年期间印度文化在这个地区的传播。这种情况和法国自身的情况有些相似。就像19世纪的法国，大约两千年以前，印度商人来到这里，并在沿海地区建立商站。很明显，当

地居民为印度商人带来的文化所吸引，而印度的经济和宗教影响在这个地区逐渐扩大。印度人在这里找到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也发现了传播其印度教和佛教的良好机会。

随着考古探险的增多，而且规模逐渐扩大，探险者更多地了解了吴哥，确认吴哥为公元第一个千年晚期强大的高棉帝国的都城，不仅如此，在柬埔寨的丛林里，他们还发现高棉的其他重要城市遗迹。而且，他们还找到了占族人文明的证据，这个文明和吴哥文明类似，但单独存在。两个文明存在的时间基本相同，占族人文明存在于越南中部和南部沿海地区。铭文使用了两种语言，即古印度语言梵语和当地语(依地区而定，或为高棉语或为占语)。铭文最终成为历史和经济记录，据此可描绘出这两个帝国的历史概貌，并可追溯到法国人所猜想的两大帝国突然出现在东南亚的时代。

法国学者从考古证据稍可获悉印度人到达这里时所遇到的原住民情况：他们生活在村庄里，有时生活在城镇里，城镇建有围墙，城里有用茅草和竹竿搭建的房屋，房屋下面有桩柱。很明显，其房屋形状、万物有灵的信仰、丧葬习俗以及农业生产，在东南亚大陆的印度支那、苏门答腊岛、婆罗洲、新几内亚岛以及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和波利尼西亚群岛，都在一定时期存在过。学者们同样意识到，高棉文化和占族人文化的某些要素明显不属于印度文化。例如，强调安抚乡民和亡者的灵魂，以及某些仪式用品如铜鼓和石器等的重要地位。然而，法国人对古代的本地文化的兴趣不大，一点也不比当时的本地人的兴趣多。

乔治斯·科蒂斯是远东研究院的一位主任，他是一位卓越的研究员。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他翻译和解释了当时在印度支那古建筑上发现的所有梵语铭文。除确定修造这些古建筑的王朝历史基本轮廓外，科蒂斯和其他人还试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对其进行研究。科蒂斯和同时代的多数学者一样，相信文明



是由美索不达米亚向外辐射传播的，首先是埃及，其次是雅典，然后是罗马。印度和中国的伟大古建筑以及帝王都城，它们的年代说明它们更居罗马之后。他认为，文明的浪潮最后才终于涌到东南亚地区。

在科蒂斯看来，其发生肯定就像他所熟悉的殖民地开拓过程一样：先进的民族将文明作为礼物赠送给无知和心怀感激的土著居民。他把此整个地区称作“父亲般的印度”，印度人作为赠送者，他们在东南亚地区找到了受纳者。科蒂斯于1966年写道，这些受纳者“看起来缺少创造的天赋，在没有外界刺激的条件下，他们显示不出创造进步的聪明”。

英国史学家格拉厄姆·克拉克1971年时还称，东南亚的史前人类未曾由石器时代发展到金属时代，而其他文化已由黄铜时代经过青铜时代发展到了铁器时代。克拉克写道，举例而言，不像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石器工具普遍使用，一直持续到基督纪元开始以后”。1879年记录了东南亚发现的第一个史前遗址，在大堆的陶器碎片和贝壳中还有一些青铜工具。尽管如此，克拉克和其他人均以这种证据为非正常情况而拒绝加以思考。他在文章中写道，或许来自其他文化的一些青铜器和铁器以某种途径运到越南北部，然后又被存放在“较富裕的安南人的墓穴里”。

要肯定的事情是，并非法国整个考古学界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伟大文明的遗迹上，也非所有研究人员都忽视了史前记录中越来越多的非正常情况。例如，20世纪20年代，马德林·科兰尼开始研究那些显示石器时代居住证据的沿海遗址。

科兰尼的工作获得了印度支那联盟地质服务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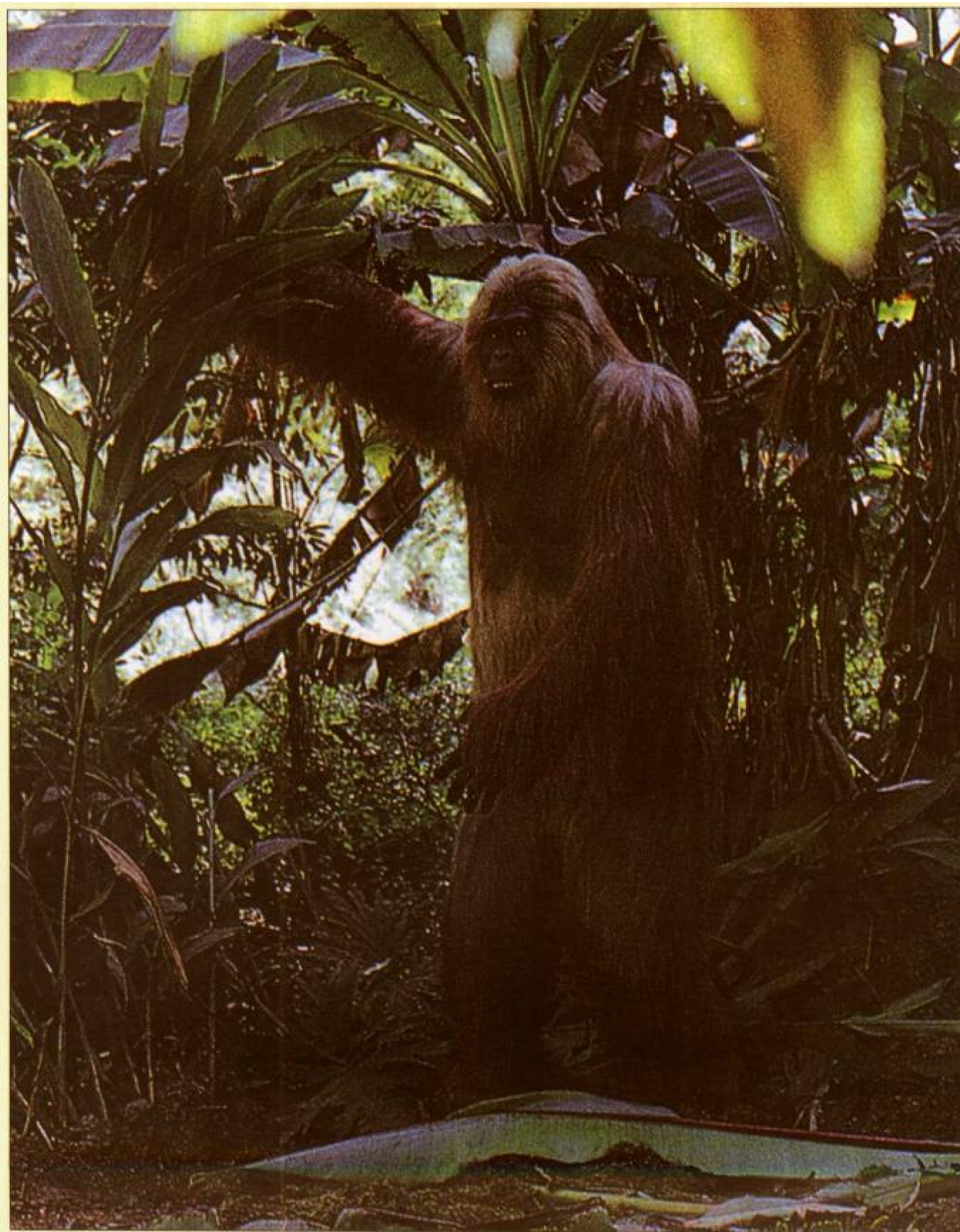
在越南探访巨猿

PURSuing A GIANT APE IN VIETNAM

通过研究化石记录发现，当人类的祖先类人猿大约在100万年以前从非洲迁移到东南亚的时候，这里曾是一片繁茂的竹林和草地，各种肉食动物和灵长类动物在这里栖息生活。它们当中最高大的是巨猿，有10英尺那么高。

1989年，美国人类学家罗素·西奥川和考古学家约翰·奥尔森怀着了解巨猿以及它们和人类的联系的兴趣来到越南。他们到越南来探访是有理由的。在中国南方已经发现了著名的巨猿化石。考古学家和药物学家到那里寻找化石以用来制作古老的药剂，他们已经走遍了中国南方的部分土地。而越南同样发现了巨猿的遗迹，却相对来说是一块处女地。对于美国人而言，这里是一块禁区。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美国和越南甚至不能通电话，直航河内的班机更是稀少。所以西奥川不得不使用秘密的方法。在泰国工作期间，他通过美国驻泰国的大使馆和越南驻泰国大使馆取得联系。不久，西奥川和奥尔森就参加了第一个由美国人组成的小组，和越南的科学家一起联合

■ 面貌凶狠的巨猿(这是根据所发现的一块下颚骨遗迹而制作的一幅复原图)以吃竹子为主, 和类人猿对这种食物的争夺可能导致了这种巨猿的灭绝。



开展野外探访工作。

这支队伍在郎特朗岩洞挖掘了两个星期。初期的考察结果显示，这里具有丰富的化石。虽然西奥川和奥尔森没有发现新的巨猿遗骨，但是他们却找到了上百件遗物，可以帮助他们重新认

识当时的环境。在那种环境下，巨猿和类人猿共同生存了50万年的时间。他们和越南方面也建立了持久的关系。1990年，两位越南科学家到美国访问，使这种关系逐渐发展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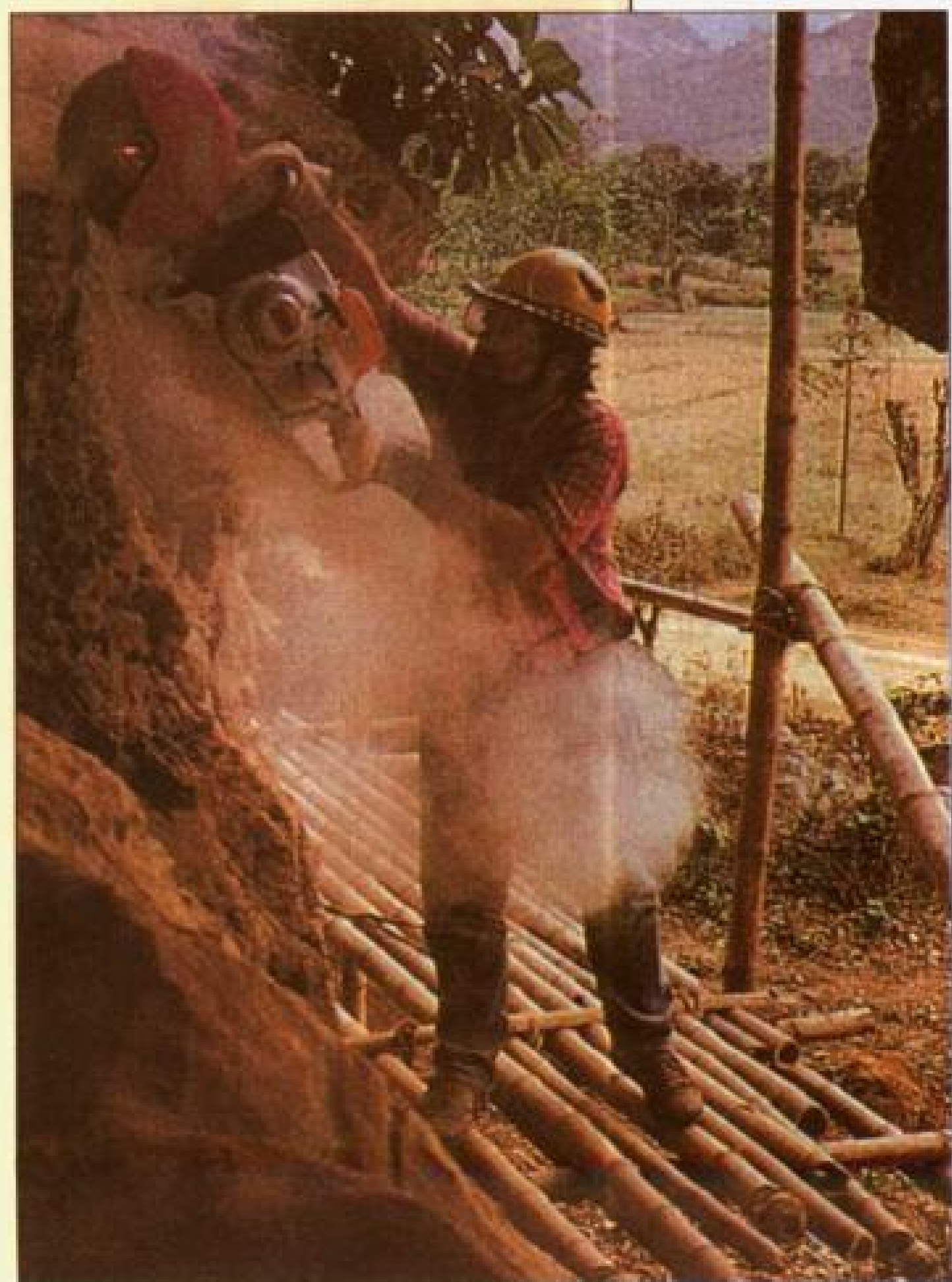
■ 约翰·奥尔森(左)和努彦·冯·平正在检查一块在第四个岩洞底部发现的化石。这里埋藏的是可以辨认出来的青铜时代的一个火炉。因为长期使用火的结果，土层呈黑色而且坚硬。他们还发现了猪、牛、箭猪和鹿的牙齿，也许这是古代用餐后所留下的遗迹。



的支持，而法国远东研究院并未支持她。科兰尼最初是植物学家，后来成了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越南的和平省由河内横跨红河三角洲，科兰尼就在那里开展研究工作。在那里，她研究从石棚和岩洞中发现的古代动物遗骨，多数遗骨是由打猎和采集为生的人留下来的食物剩迹，它们在棚顶下面得以保存。

科兰尼确认这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她称之为和平文化。人们以打猎采集为生。在如毛象、地獭和巨齿猫等大型动物群灭绝后，即冰川时期结束时，和平文化发展起来。后来，从中国南部到马来半岛再向西到缅甸，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均发现有证据表明和平人是使用石器工具的人类。从其地理分布情况，学者们得出结论：和平人所留下的痕迹并非属于单独某个民族，而是广泛使用石器工具技术的痕迹。

■ 西奥川使用德国制造的最新的岩石切割锯，将在越南郎特朗岩洞发现的带有化石的巨大岩石取下来。结果，他率领的考古队发现了代表36种不同哺乳动物的1000多块化石。



科兰尼的发现最初看似证实了传统的观点，即把土著民族视为比世界其他地方落后。和平文化独特的石器工具是圆鹅卵石，后称之为苏门答腊石，鹅卵石有一面打刃。很明显，这种刃痕粗糙未经打磨的石器工具非常原始，人们以此为据认定其制作者比同时代人落后，甚至比以前的欧洲人还要落后。在欧洲那里，人们早已制作出经过打磨的石器工具。然而，科兰尼以及在她以后继续研究和平文化的人又在后来的随葬品中发现了陶器，年代属8000年以前，远远早于人们猜想的东南亚人学会制作陶器的时间，这使他们感到困惑不解。



还有更令人困惑的事情。最近，在越南北部的东山，大型的装饰性铜鼓被接连不断地发现(见 52-54 页)，都表明此地有高度发达的史前金属冶炼工艺。这又需要更复杂的解释。这些不速之物是如何从遥远的地方被当做礼物而带给土著人的，这又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1932 年，奥地利人类学家罗伯特·海因-格尔登提出一种解释方案。这种解释方案后来成了说明东南亚史前历史所有非正常情况的范例。在数个遗址上均发现有先进的长方形石斧，它们与较原始和常见的鹅卵石不可同日而语，海因-格尔登面对这种情况，认为这里经历了“一次次文化浪潮”，文化的潮水随着民族的移居相继涌到东南亚，将先进的技术带到这里。他提出带来石斧的民族肯定来自位于北方的中国。而说明在东山发现的青铜金属工艺时，海因-格尔登则简单地猜想了另一次文化浪潮。这次是来自东欧的先进民族，于公元前 1000 年前后向东南方向迁移，并于 500 年后抵达东南亚地区。

此猜想缺少考古证据支持，但因同时加入了来自印度的影响，所以还是被广泛地接受了。然而不久之后便发现了反驳的证据。20 世纪 30 年代，荷兰学者 F.D.K. 博希反复察看印度尼西亚古建筑上的铭文，发现铭文中从未提及印度人侵入或征服之类的情况。况且，有语言学以及其他迹象表明，印



度对东南亚的内陆王国影响更大于对沿海地区的影响，而沿海地区则是印度人最早到达而且长期接触的地方。从殖民开拓和文化适应的进程通常的表现来看，上述两种情形都与之不符。这些证据表明传统的解释有某种错误，它们尚未暗示出一个正确的解释。

几乎与此同时，荷兰年轻的历史学家雅各布·科尼利斯·范·勒尔提出一种解释，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印度文化或许并未胜过和取代当地民众的崇奉和信仰；或许刚好相反，在这个地区已确立地位的统治者和祭司，接受了印度的语言、宗教仪式和政治组织中吸引他们的方面。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像吴哥寺这样的伟大成就，则应视印度的影响为某种附加的东西，用范·勒尔的话说，“是一层薄而又薄的釉彩”，附着在原住民业已存在的生机勃勃的文化之上。

对于东南亚史前历史的传统解释，在考古学和人类学领域之外，还有其他的反驳意见。研究农作物起源的植物学家早就猜测，世界上的多种主要粮食作物，包括水稻、山药、芋头、甘蔗和香蕉，都可能起源于东南亚地区，或许比以前所猜想的更早。确实是这样。1952年，美国地理学家卡尔·索尔引用东南亚地区温和的气候类型和多种的植被类型，暗示东南亚地区可能产生了人类农业的开端。然而现在尚无考古证据，东南亚地区的早期农业的痕迹尚未确定其年代，多数专家拒绝考虑这种暗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年，基本上没有考古学家再继续寻找有文字可考的文明以前东南亚原生史前文化的坚实证据。原因之一是，人们猜想东南亚土著民族的物质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机的，而且可能在潮

■ 史前以打猎和采集为生的人制造了这些三面带刃的石器工具。在越南的和平首先发现这种制作风格的石器工具，所以这种石器工具被称为和平人的石器。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考古学家切斯特·戈尔曼在位于泰国西北部的斯皮里特岩洞发现了这种人工制造的石器工具（也许用途相当广泛）。



湿的热带气候里已经分解了；原因之二是，人们猜想即使有这样的民族，其存在对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在总体上亦无甚重要性，对考古学也是如此。尽管在早期遗址中发现有一些青铜器和铁器，人们仍然有可能维持后一种猜想，因为在出土这些文物的时候，遗址的地层没有受到必要的严格的重视，而且也没有求助于可靠的年代测定技术。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考古程序获得完善，更好的技术可以备用，而最欠缺的只是考古发掘的兴趣。当著名而充满争议的人物出现在东南亚的时候，他们为考古发掘填补了兴趣上的不足。

20世纪50年代，索尔海姆毕业于亚利桑纳大学考古系，在求学期间，他对东南亚的史前历史就非常着迷。在索尔海姆的帮助下，远东史前历史学会美国分会成立。远东史前历史学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现名印度—太平洋国际史前历史学会。该组织的期刊《亚洲观察》(第一期于1957年出版。由索尔海姆在图森机场办公室里利用油印机印刷完成的。当时，他正在值夜班)的第一任主编就是索尔海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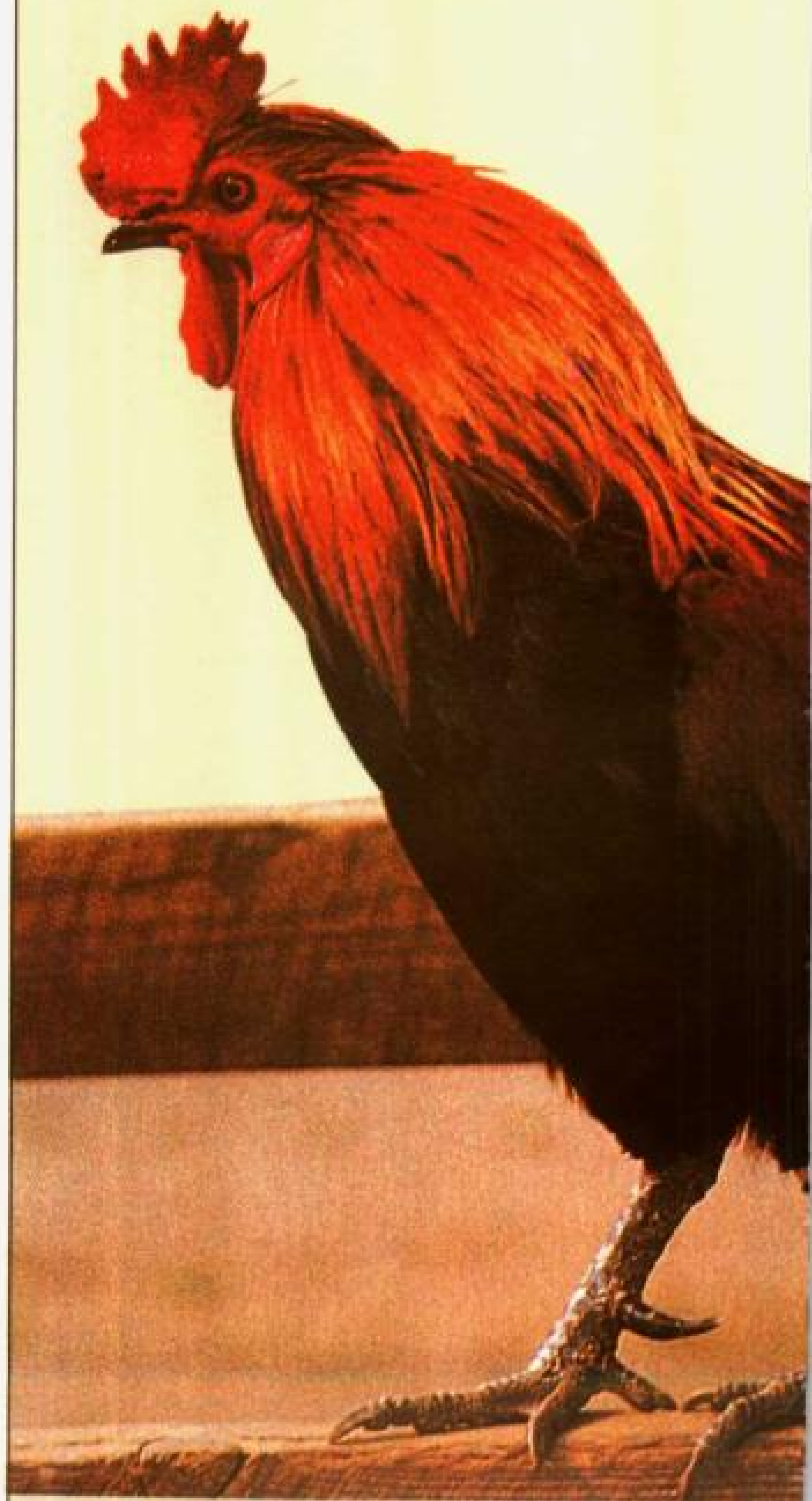
索尔海姆在夏威夷大学担任教授的时候，他的样子就像是一位典型的考古学家，而到晚年的时候，他的身材和胡子让人一见就容易想起那位圣诞老人。然而他可不是典型的考古学家。他对关于东南亚史前史已具备的一些神秘的线索非常感兴趣。他崇尚那些不落俗套的理论。不久，他利用那些在同事们看来不足为据且缺少学术价值的线索，宣布东南亚地区是一个重要的早期人类文明的摇篮。这是一个大胆的观点，与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截然不同。

鸡的原产地

THE MOTHER OF ALL CHICKE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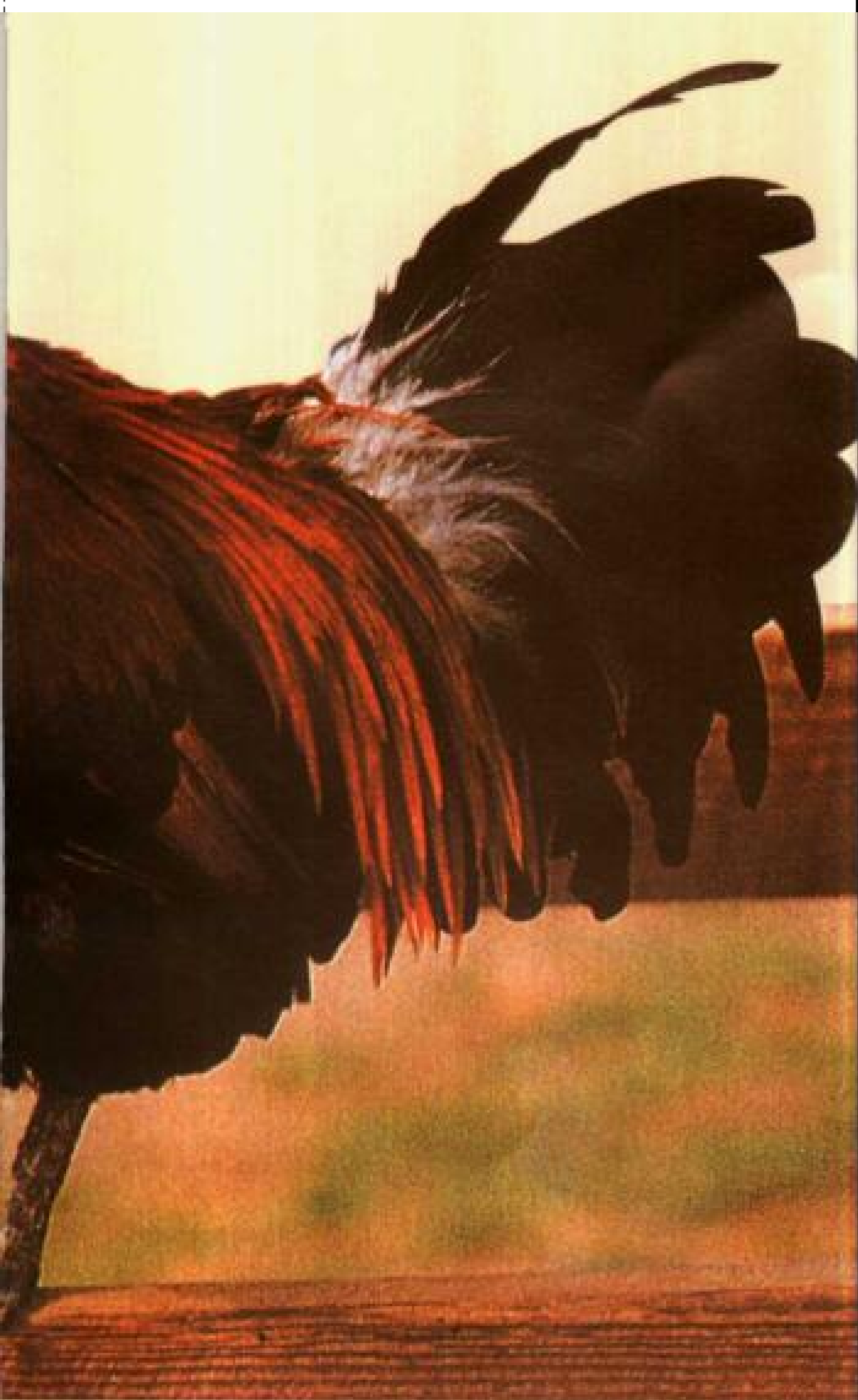
这种色彩红艳的禽类生长在泰国的丛林高草之间。然而在1994年，美国和日本的研究人员共同组成的考古队发现，这种禽类的一个亚种早在8000多年以前已经成为东南亚的家鸡，而且是西方和亚洲所有各种家鸡的母系祖先。

研究人员对数种家鸡进行



DNA 取样分析之后得出这个惊人的结论。在此以前，科学家们认为西方的家鸡从几种不同的亚洲禽类演变而来，他们认为中国的东北部是这种鸡的原产地。新的发现和最近的其他证据都证明，东南亚可能是农业创新的一个核心。

早在6000年以前，东南亚已经开始种植椰子、山芋、香蕉、黑胡椒和肉豆蔻等作物。他们大概是最先栽培和种植这些作物的民族。但人们认为水稻最先在中国的长江流域得到栽培。



索尔海姆来到东南亚的丛林和稻田里，寻找有关史前农民的证据。他的大胆的观点和搜寻证据的狂热吸引了和他一样见解不俗的学生们。切斯特·戈尔曼便是其中一位。1961年，戈尔曼为索尔海姆在夏威夷大学的课程所吸引。戈尔曼的朋友在回忆他时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戈尔曼攻读考古学位的同时，用业余时间挖坟掘墓。1963年，戈尔曼加入到索尔海姆的队伍中，前往泰国东北部，对那里的史前遗址做最后的考察。因为湄公河支流系统将修建一系列水坝，这些史前遗址将被河水淹没。

1965年，戈尔曼重新回到泰国北部，在泰国和缅甸交界的附近地区，搜寻可能支持卡尔·索尔理论的石器时代农业的痕迹。戈尔曼与一名助手徒步穿越这个地区，这个过程最终使他成为能够流畅使用复杂的泰语的少数西方考古学家之一。他在每个村庄都逗留几天，向人们打听他们所知道的任何岩洞或古代文物。1966年4月，在迈桑南附近，当地猎人带他到了一个石灰石岩洞。此岩洞有三个洞室，可由此俯瞰湄公河河谷。此岩洞称斯皮里特岩洞。

此岩洞明显有古代人使用过。戈尔曼发现其三个洞室不大，但内部相通，而且高低不同。中间洞室长35英尺，宽25英尺，洞顶由前向后成一个斜面，前端长12英尺，后端长约3英尺，此洞室埋藏有珍贵的东西。“斯皮里特岩洞中的东西非常有价值。”戈尔曼在1970年提交的报告中写道，其讲究学术的口吻并不能掩盖住他激动的心情，“进到洞里一眼就能看到，巨大的石英岩岩心、薄片以及带有绳索痕迹的陶器碎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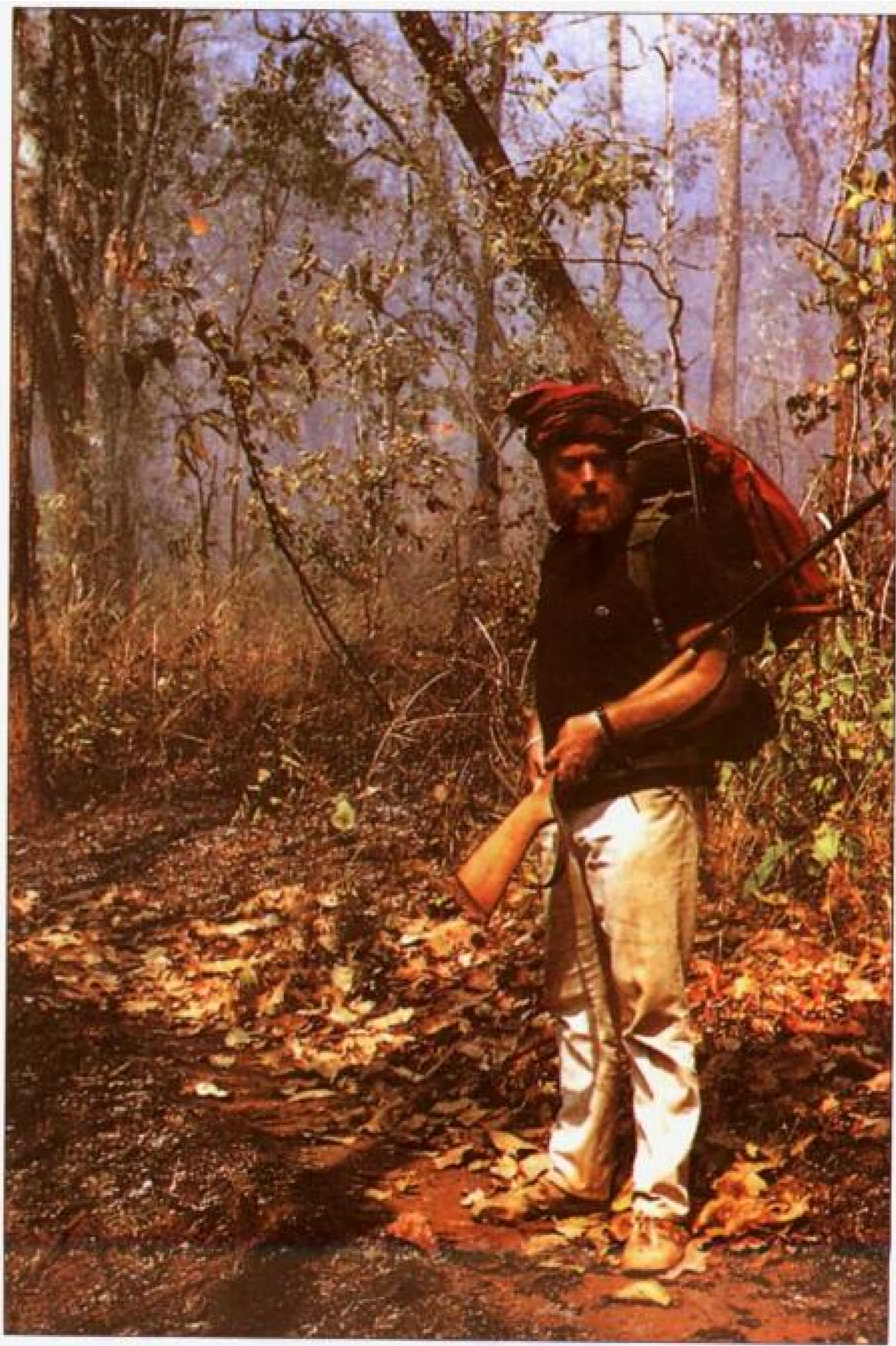
然而，发掘这个文物丰富的遗址却非易事。从最近

的交通站到斯皮里特岩洞要走三天的路程(从最近的大村庄到达这里徒步需要走一天的时间),尔后还要沿陡峭的石灰岩壁向上攀爬600英尺。因为不可能在岩洞里宿营,所以每天都要爬上去。日用的供应物品需要背上岩壁。他们的食物是他们能够从村里携带去的大米,以及他们雇用的猎人在附近丛林里所打到的猎物。有位同事回忆说:“有的时候,晚餐就是煮米饭,再加一两只青蛙或蜗牛,这是常有的事。”

尽管粮食供给不咋样,但在发掘过程中,戈尔曼却将严格的技术和现代的方法应用于地层控制,他们小心翼翼地挖掘、筛滤和拾取岩洞中找到的任何一点遗迹,包括人类和动植物的所有遗迹。其技术和方法首次用于发掘属于和平文化时期的遗址。野外工作得到夏威夷的后方支援。实验室的任务是利用放射性碳测定年代、古生物研究以及石器工具分析。

土壤和碎石分为不同的五层。这表明斯皮里特岩洞有人使用的时间约为5000年,最初使用的时间大概在公元前1万年。最先来到斯皮里特岩洞的人在岩洞地面上生过火,生火用的圆木搭成辐条状,明显是过游牧生活

■ 20世纪70年代早期,切斯特·戈尔曼在寻找更多的和平人岩洞遗址的过程中,在泰国西北部暂时停下来。他手中的枪是用来打猎和自我保护的。图为戈尔曼在以鸦片和海洛因走私而闻名的金三角地区(位于泰国、老挝和缅甸的交界处)进行考察。



的猎人把岩洞当做偶然的宿处。

筛选的过程出现了引人入胜的证据。在火炉周围发现的动物骸骨已被砍碎，但无任何烧焦的痕迹，表明骨头未经烧烤，而可能是炖制的。暗示出更多意义的是各种大量的植物残迹，如豆形果实、中国的水生栗子、瓶形葫芦以及一种与黄瓜有关的植物。经过用放射性碳对周围物质的分析，可以判断这些遗迹的年代，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岩洞有人居住的时候，最晚的一直到有人居住的最后阶段。植物遗迹的某些特征，如有些种子个头之大，表明它们可能处于最初栽培阶段。

如果是这样，那么种植这些植物的人就是世界上最早期的农民。不过戈尔曼很小心，没有太过张扬，他只是说这种证据表明“植物的利用已经不再限于简单采集的阶段”。

此外，戈尔曼认为对圆石工具亦可有不同解释。起初，人们认为圆石工具的形式比欧洲使用的更为原始。戈尔曼暗示这只是一个资源的问题：和平人缺少结晶细密而又容易打磨成刀刃的硬石，他们在质地较差的石英岩圆石上，只好采用一种相对简单的制作技术。

斯皮里特岩洞的8000年那层，戈尔曼发现有表明人们已经开始制作和使用精致陶器的证据。陶器经过抛光，有雕刻图案作装饰，并有编绳压入陶器表面的痕迹。这种变化的重要意义超过陶器本身。考古学家通常认为陶器的发展和农业是联系着的。

和陶器残片一起，戈尔曼和发掘小组还发现了许多石器工具，其中有用石片制作的刀具以及长方形的器具，其质量优于普通的鹅卵石。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一把石斧，表面经过打磨，比中国华北地区所发现的同样先进的工具要早数千年。而早就有人推测，中国将打磨和抛光的石器工具介绍到东南亚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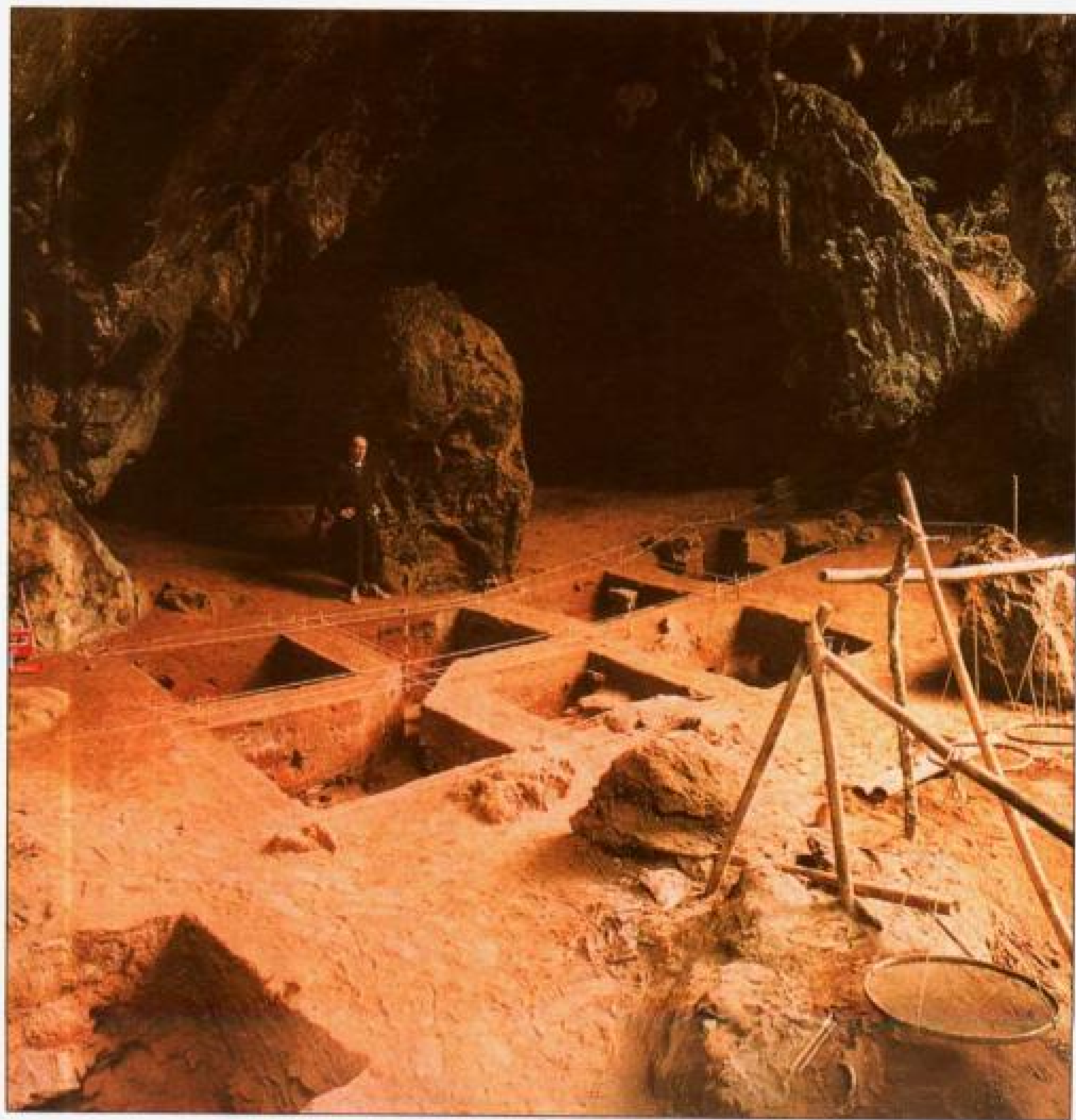
戈尔曼用三年时间分析斯皮里特岩洞的发掘成果，并撰写了

有关文章。1972年，他重新回到泰国，对其他的遗址进行考察，以获得有关聚落形态的总体情况。位于斯皮里特岩洞附近的班延河谷岩洞和斯蒂普克里夫岩洞，经过发掘以后，证实斯皮里特岩洞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这表明在公元前1万年到公元1000年之间，和平文化地区的经济出现了大面积的繁荣景象。斯皮里特岩洞的发现是值得注意的，尽管如此，这些发现同样只是暗示，索尔海姆以及其他人所坚持的观点，即史前的东南亚人已经实践过早期农业，在这里或许可以发现一些东西。然而，暗示毕竟只是暗示而已。

更加坚实的证据很快就出现了。戈尔曼在湄公河大坝施工地区调查期间，又发现了一个史前墓地。这个墓地后来被称作农诺塔。1966年，索尔海姆的另一个学生唐·贝亚德开始在此进行发掘。农诺塔是一座并不高大的土堆，占地约3英亩，比周围稻田仅高出5英尺。尽管贝亚德才向下挖掘了约4英尺，却发现了17个截然不同的用途分层。

农诺塔的年代最先测定的结果一出来，索尔海姆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我们开始认识到，农诺塔真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

■ 在1972年到1973年期间，切斯特·戈尔曼对泰国班延谷岩洞进行挖掘，这是洞口挖掘出的方坑。在这里找到了许多和平人的文化遗迹，包括小型的动物遗骨和植物遗迹。他们将挖掘出的土层通过圆形的筛子进行过滤（见图右下方），从而发现了更多细微的东西。



遗址。在1英寸见方的一块陶片上，我们发现了稻米外壳的印迹。”发现这块陶片的上面的那个地层，经过放射性碳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500年。这个时间在当时，“比中国或印度所测定的水稻年代早一千年，而据有些考古学家称，这两个国家是水稻最先获得栽培的地方”。

农诺塔墓地所发掘出的文物，包括人类的骸骨和随葬品，其中陶器800多件，按墓穴的顺序，经过仔细挖掘、测定和分析之后，贝亚德建立了农诺塔有人居住的三个大体阶段时间表。最早的一个阶段，从公元前3500年到约公元前2000年，此时正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的肥沃的土地上最早的城市和帝国出现的时间。在最早的这个阶段期间，贝亚德只发现了惟一的一件神秘的工具，用红铜合金制作，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金属器具证据。这件工具放在一中年男子的肋骨笼上，此中年男子为最早阶段末期时埋葬，这件工具有安装把柄的插孔，但其用途尚不清楚；也许是一种挖掘杆的金属尖头。不管其用途何在，其存在则表明东南亚人拥有金属工具，而其时间则比任何人所猜测的都要早上很多年。

第二个阶段延续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在这个阶段里发现了青铜工具。贝亚德发掘出青铜手镯和青铜斧头，还有明显是浇铸时溅出的小块青铜，以及浇铸带插孔的斧头所用的砂石铸模。然而，在整个此阶段里，未发现铁器工具，这与青铜器和冶铁制作技术约于公元前500年同时传入东南亚地区的理论不相符。然而在最晚有人居住的那个阶段里，即公元第一个千年期间，此时的墓穴里存在铁器工具，这表明到此时耐用的铁器已获得广泛使用。

农诺塔最早期的金属器件，既不原始，也非偶然。这些器件经过大量分析，显示出大多青铜制品其锡含量基本都在10%—15%，这种配比使铜锡合金具备最佳的实用性质。比如一把有将近4000年历史的斧头，其分子结构表明，它是由熔化的合金在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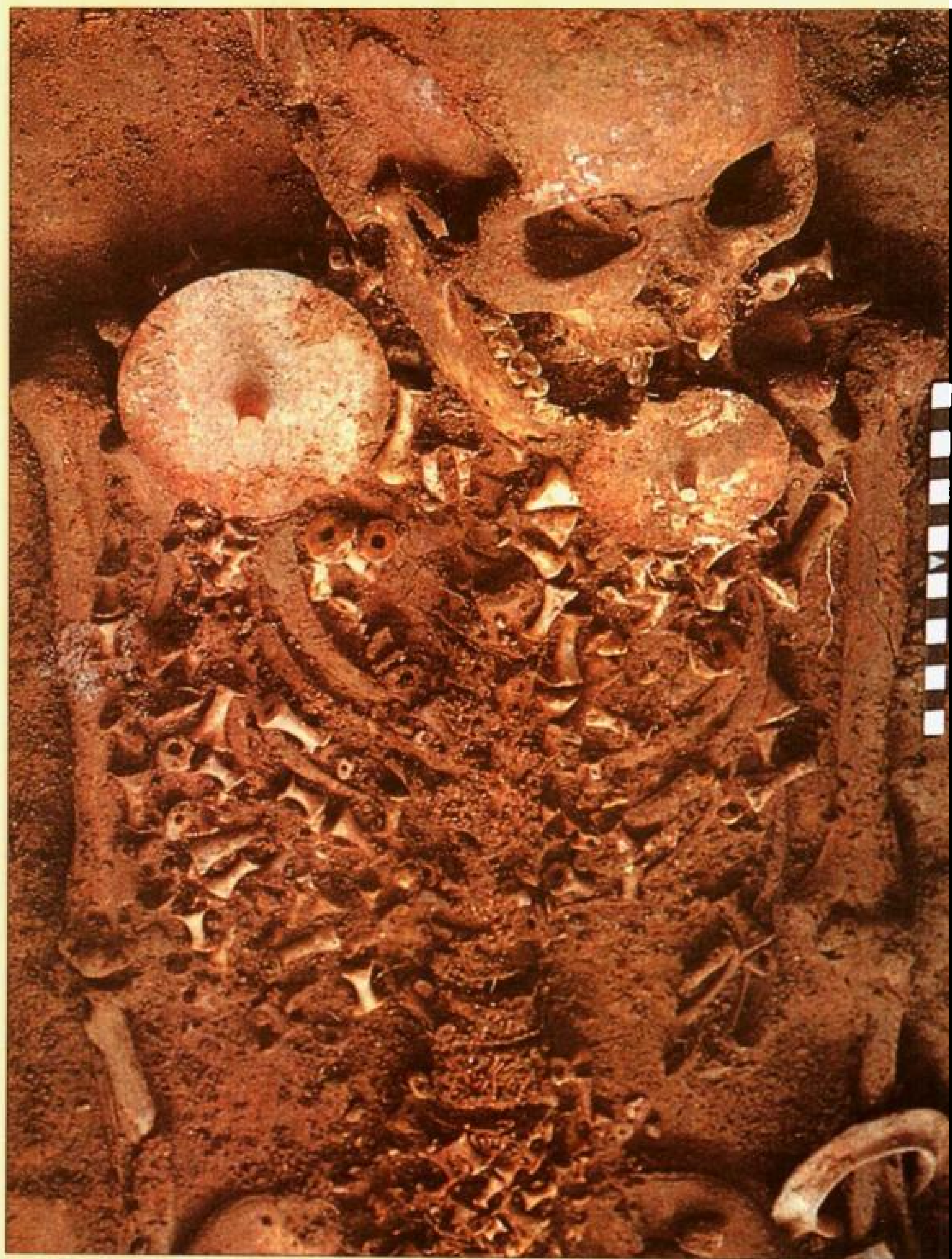
实验室里讲述的村落故事

A VILLAGE TALE TOLD IN THE LAB

新西兰和泰国的考古学家查尔斯·海厄姆和拉臣·托萨雷特于1985年对位于泰国湾附近的科帕农迪史前村落进行挖掘，他们花费了7个月的时间，发掘出大量的墓穴、陶器碎片、水稻残迹、甲壳类动物遗骨以及其他的遗迹，然而除此之外，他们对村落的了解仍然不多。为了获得更多的情况，他们必须在实验室里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分析家们发现在村落 500 年的历史（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500年）中期前后，村民的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男性村民的遗骨为此提供了明显的证据。骨骼的形态结构表明早期的人类活动积极而且身体强壮。然而在后来人们变得虚弱并习惯于久坐。出土的各种物品也发生了变化。例如，用骨头制作的鱼钩和用黏土制作的网缀开始的时候数量很多，而后来便从这里消失了。

有趣的是海厄姆于1991年研究甲壳类动物遗骨的时候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他发现人们所食用的甲壳类动物在种类上存在一个变化，原



来多见海边和河口生活的甲壳类动物，而后来则变化成为淡水类的甲壳动物。这暗示出环境发生了变化。现在，海厄姆可以开始重新确定科帕农迪的历史了。按照他的理论，这个村落被建在通往泰国湾的河口处，村民们栽培水稻，并在早期的时候由男子使用鱼钩和鱼网从附近的河流和海洋中捕获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食物。由于泥沙逐渐淤积，下海捕捞变得越来越困难。然后在河水的泛滥之下，形成新的遥远的水道。捕鱼的工作开始在内陆进行，他们可能使用竹子做成的笼子进行捕捞。村民们为了生存，开始从事陶器贸易，而妇女成为制作陶器的工人，并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挖掘人员发现并命名了一位公主，她是制作陶器的大师。她强壮的左手腕遗骨表明了她所从事的职业，墓穴中的随葬品包括制作陶器的工具和精美的陶器。她所佩戴的12万颗珍珠贝也显示着她的社会地位非常突出(如左图)。

模里浇铸成形的。冷却之后，再捶打出斧刃，最后进行退火，即加热到足够高的温度，以降低因冷却后捶击而导致的脆性，然后是迅速进行冷却。

证实东南亚地区拥有早期的金属加工技术，给已确立的科学界的论断带来严峻挑战。贝亚德把已为人接受的解释范例称作“知识丰富的旅行者”假设，这种假设把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归因于别处来的赠予者。农诺塔提供了有力的反驳证据，贝亚德称赞东南亚人是“具有创造力的原住民”，很明显，他们主要依靠自己而掌握了金属冶炼加工技术，或者至少他们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具有地区特色的金属冶炼加工技术。

对农诺塔所做出的断言也遭到了挑战，这不奇怪。农诺塔的新发现毕竟还是这个断言的最初的野外证据，而这种断言所提出的假设将要推翻的是由来已久的而且顽固坚持的观点。经技术分析所获得的年代，有些还是矛盾的，这是常有的事情，而从仅有4英尺深的地层中，将压缩在里面的跨越4000年的历史，按精确的年代顺序整理出来，绝非轻而易举。提出其他异议的理由还有，在农诺塔遗址周围方圆60英里以内，找不到任何铜矿的证据，无法解释工匠们能够从何处或怎样获取铜矿，或者他们在何处或怎样进行冶炼。具有创造力的原住民这个说法要让人正式接受，尚需予以确证(见28页)。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史蒂芬·扬偶然发现了班奇昂的陶器。当然，班奇昂的村民对村里随处可见的陶器碎片相当熟悉，但是在此之前，村民没有过多地思考过那些陶器碎片，直到1957年，有人在村里发现一



只完整的陶罐。它是如此的精美而古老，刺激了人们对陶器的欣赏、评论和占有更多陶器的欲望。

1970年，利用热微光初步测定陶器年代的消息一经公开，人们广传着所有陶罐都是有6000年的古董，学术界开始了对陶器的热烈讨论，村民们开始了对陶器的疯狂挖掘。到对班奇昂地下宝藏准备好进行大型科学调查的时候，已很难找到一块未被挖过的地方以开始工作，贪心的村民早已挖出陶罐把它们卖掉了。事实上，这种有组织的掠夺已经成了村里的一个大型工业。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佛罗里赫·雷尼于1973年访问班奇昂。雷尼回忆说，他见到“数十个村民在其夯有柱桩的房屋下面挖掘，自己动手进行考古发掘。我们挨家从梯子爬上阳台，在等茶水的时候，察看我们的主人最近收集的还没卖掉的藏品，其中有陶器、青铜器、铁器、石器和骨头等物件。多数缺少装饰的陶罐都被留在房下，当做给鸡盛水和谷物的家伙，这些陶罐现在每件都值数千美元”。在村庄里找到两处未被挖掘的地方，用了不少的时间和力气，一个在村子的道路边上，另一个在一位村民的院子里。

1974年最终开始实际发掘(见35-36页)。相比之下，斯皮里特岩洞和农诺塔的发掘工程是小规模的，

■ 这件带有插孔的青铜矛头约制作于4000年前。在作为班奇昂一个年轻人的随葬品被埋藏之前，矛头已被故意弄弯，显示出相当高的工艺技术水平。由金属工匠使用两块铸模浇铸而成，在两块铸模中间嵌入另一块模型以形成插孔，然后对边缘进行捶打和退火使之牢固。



而班奇昂村的发掘则是一个大工程，由美国和泰国两国的学者共同承担。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和泰国政府美术部联合赞助。切斯特·戈尔曼和泰国考古学家皮西特·查罗恩旺猜共同担任指挥，而考古发掘队伍包括来自美、泰双方上级主管部门的高级官员以及学者，还包括冶金、生物学、古动物学和物理人类学各学科的多位专家。

另外，除在发掘现场进行专项研究以外，考古发掘队还有更远大的目标：他们要对东南亚本地的考古学家在最新科学方法方面进行综合培训。所有这一切都给管理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一个庞大而且在不断增长的组织，”查罗恩旺猜悔恨地说，“最后只能导致其组织者的解体。”

从最上面的地层发掘出土的第一件文物是一只20世纪的便盆，尽管如此，挖掘人员很快就看清了，班奇昂原来是比较任何人所预料的都更有价值的一个遗址。“红彩陶成了众人议论的焦点。”美国考古学家乔伊斯·怀特后来写道：“这件陶器不过就是冰山一角而已。”还有“其他数个地层以及各种类型的独特的陶器”。几千年来，人们交替生活在这里，并将死者埋在这里，每个新聚落的建造者，其居所的柱桩正好从前人的墓穴上夯下去。

早期金属冶炼的证据比起丰富的陶器，更让人兴奋。在发现著名的红彩陶的地层下面，发现了青铜制品。但随着挖掘的加深，青铜器的数量却越来越少。1974年，到第一个挖掘季度末，失望的研究人员一件青铜器也找不到了。次年，在另一个地方，他们发现了完全不同的墓葬。里面的尸体由几层陶器碎片覆盖着。乔伊斯·怀特写道，有些墓穴中“出人意料地存在不寻常的双金属器物，其中有两只矛头，矛刃为铁制，而矛柄为青铜制，另外还有一只青铜手镯，上面有铁环。一个五岁大的孩子戴着数只铁制手镯”。

同样，在向更深处挖掘的时候，金属器物也是越来越少。当



然,没有人知道其确切的年代。进行综合分析和测定年代之前,不会有人知道。最后,在季度末,深深的挖掘坑有塌陷的危险(旁边的房子也有倒塌的危险),就在此时,戈尔曼发现在方坑最底层有一件青铜别针模样的东西。他在笔记中写道,要把这件东西取出来,“就得听天由命”,因为方坑的墙壁就要倒塌了,而其狭窄的空间“无处可逃”。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戈尔曼极小心地把它移动出来的时候,他发现那可不是一只简单的别针,而是一只带插孔的矛头,矛头的尖被特意折弯。很明显,折弯矛头是葬礼仪式的一部分。后来的分析表明,这只矛头经过浇铸、冷却后捶打和退火。与农诺塔的斧头所使用的工序相同。“我们最后的也是最危险的”发掘,戈尔曼兴奋地说,发现了“我们希望在最底层找到的东西”。

班奇昂的第二个发掘季度期间,他们还发现了浇铸证据。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前后所对应的地层中,挖掘人员发现了陶土坩埚的遗迹,以及大量被烧过的黏土。坩埚所使用的陶土用稻壳调和过,坩埚里面有渣滓余迹,渣滓是从熔化的金属中分离出来的杂质。研究人员推测,坩埚里面装满铜锭和锡锭以及燃料,然后放入陶土砌成的窑里,点燃燃料,再用风箱使温度升高达到铜的熔点华氏1980度。风箱大概是东南亚传统的活塞式风箱。然后,将青铜熔液倒入砂岩或去蜡铸模里。此种铸模在几个地方均已找到了证据。

总计发掘墓穴达120余个。经过两个季度的发掘,出土文物用费城集装箱运至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以进行分析和测定年代。集装箱总重量达18吨,陶器、金属、石器、土壤和木炭装满了整个集装箱。人类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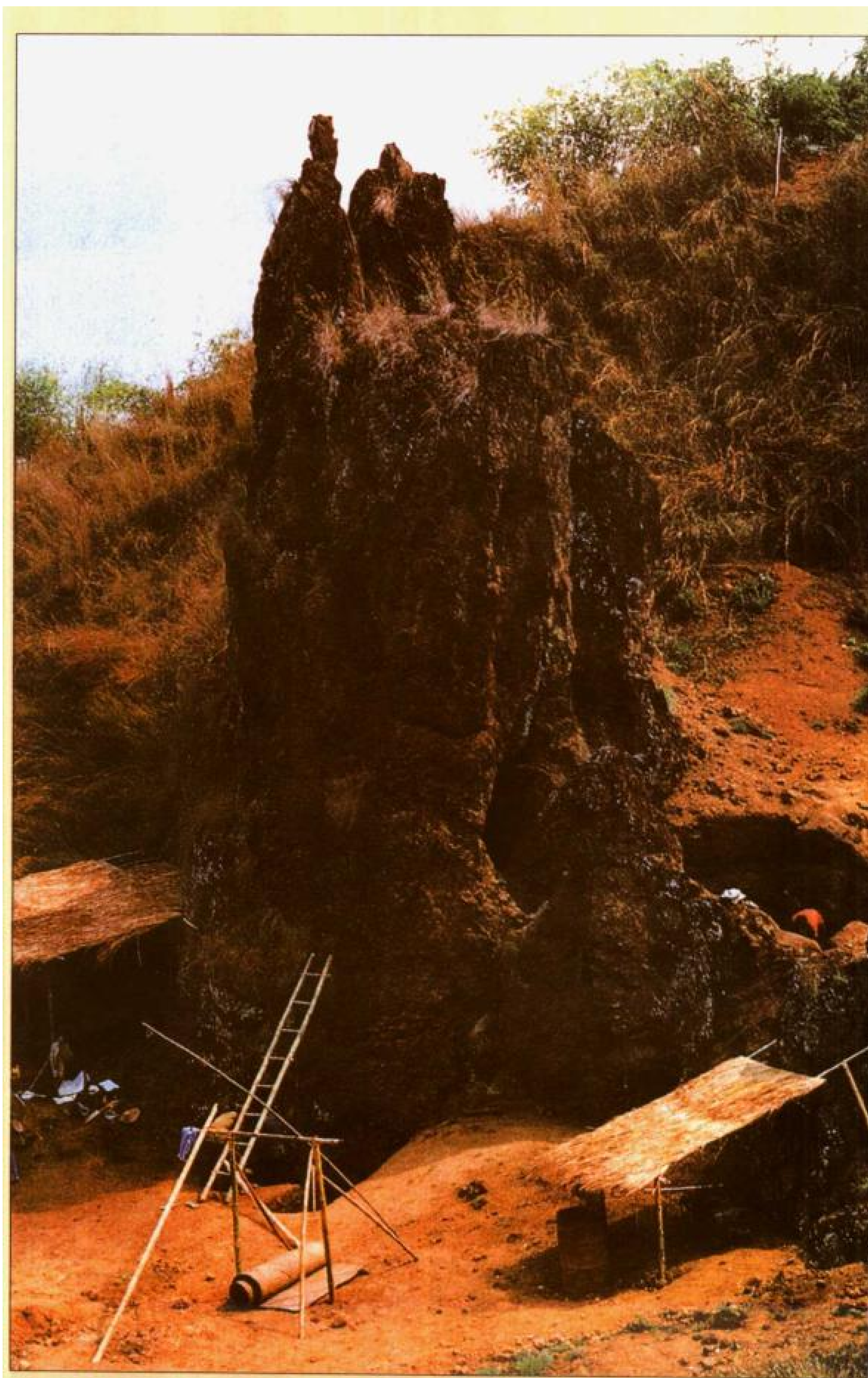
■ 这件白色陶罐制作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400年间,简单而精巧的线条显示出班奇昂的制陶工艺水平。它和公元前200年到公元300年间制作的暗黄底色加红彩波纹的陶器工艺不同。今天,需要将许多碎片拼合在一起才能重现这种陶器以及类似的陶器的原貌,因为按照当时独特的葬礼仪式,这些陶器均被打碎然后再散布在墓穴中。

揭开青铜器制作之谜

SOLVING THE MYSTERY OF BRONZE PRODUCTION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随着青铜器在泰国史前遗址的墓穴中被发掘出土，考古学家们开始思考东南亚发展红铜和青铜制作技术的可能性。考古学家认为这里的青铜器制作技术不是从其他地方引进的。而以前人们并不这么认为。然而作为青铜的原料，古代的红铜和锡从何而来，冶炼工作又在何处进行呢？为了寻找答案，泰国的金属冶炼考古计划开始了他们的研究工作。1984年，美国和泰国的考古学家文森特·皮格特和素拉普尔·纳塔宾图在泰国东北部对矿藏进行考察。他们在乌隆确认出属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一块红铜矿场遗址（见右图）。1985年进行的勘探显示，矿工将绿色的孔雀石即含有红铜的碳酸盐矿石挖掘出来并进行冶炼。矿工们使用石器将岩石砸开，在石英岩中提取孔雀石。发掘人员发现了大量用来冶炼红铜的木炭。这里还找到了两个铸模的残片以及70多个陶土坩埚碎片，这表明浇铸工作也在这里进行。

最近在曼谷平原上进行了



更多的研究之后，考古学家能够将所有的史前金属加工重要程序都记录下来。这证明古代的东南亚确实发展了独具特色的青铜器制作技术。

骨运至夏威夷大学，动物骸骨运至新西兰的奥塔哥大学。在最后运回泰国以前，这些文物要经过测量、称重、绘略图、归类、分析和年代测定，然后把所有数据，包括每件文物的最初出土地点，都输入计算机数据库。

科学家们第一次能够确定东南亚地区史前5000年的村民定居生活严格的时间表。而有十足讽刺意味的是，最初测定的红彩陶的年代经过分析表明存在误差，而正是这个错误的结果引发了收藏家和考古学家的狂热。热微光技术在当时尚处试验阶段，而用这种技术测定的陶器未经证实。陶器远没有6000年那么古老，而是和班奇昂史前文化最近期的历史有联系，即公元前300年到公元200年。然而这并未打消人们对班奇昂遗址的兴趣，因为分析显示，制作红彩陶的民族早在2000-3000年前已经在这里兴旺发达。在整个那段岁月里，他们已制做出了非常精美的陶器。

在泰国东北部的呵叻高原上，又发现了与班奇昂属同一时代的村落。很明显，这些村落和班奇昂一样，它们都是以农耕和打猎为生的安静的社区。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期间，有人迁移至此，并建立了这些社区。他们到底起源于哪里现在仍是个谜。但是有人认为他们来自湄公河分水岭的上游更远地区。呵叻高原属亚热带气候类型，每年有6个月的雨季，高原上动植物种类繁多，定居在班奇昂的民族可充分利用这种自然条件。然而，在他们到达高原以前，业已取得农业的进步，不再局限于从事简单的采集和打猎。最早定居在这里的民族所做的事情，以采集和打猎为主的游牧民族根本做不到。他们生活在村庄里，村里的房屋用茅

■ 这座75英尺高的小山尖是泰国乌隆古代矿场的遗迹，周围有挖掘使用的设备和茅草屋。挖掘人员借助梯子登上去并进入矿藏挖掘以后所留下的坑道。小山尖的表面仍然可以看到经过氧化的红铜矿藏的遗迹。

草盖顶，房屋底下夯桩。他们制作沉重而易碎的陶器。他们有家畜，养猪喂鸡(见16-17页)。另外，他们还有狗。狗的存在是其从别的地方迁移而来的明显证据。因为狗由狼进化来，而泰国却没有土生的狼。村民从开始于此定居时，大概就开始了栽培水稻(他们最古老的陶器里留有稻壳)，尽管村民们最初还没有使用水牛给他们拉犁。

班奇昂早期的农业是显而易见的，而其开始金属冶炼加工的年代更让人吃惊。研究表明，约于公元前2000年，村里有了当地较高水平的青铜冶炼技术。和中国开始普遍制作青铜器大概在同一时间。班奇昂遗址上发现的最古老的青铜器显示出相当高的制作水平，后来出现的含锡量较高的青铜器以及装饰更加华丽的工艺品又显示出金属冶炼加工方面高度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此外，除了青铜时代，班奇昂还经历了铁器时代。班奇昂发现的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前半叶的铁制手镯和铁制矛头，根据乔伊斯·怀特的说法，可能是“东亚地区最古老的铁制器物”。这些铁制器物暗示出不同于青铜器物的铸造技术。铁的熔点高于华氏800度，比红铜的熔点高。但铁矿能够冶炼，即加热到足够的温度，其杂质就能够分离出去，铸造或打造温度大致和红铜熔化所需要的温度相同。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铁器，其使用的金属从陨石中提取，“冶炼”过程是陨星穿过大气层发生燃烧而完成的。然而经过分析显示，班奇昂的铁是从专用矿石中冶炼出来的。

班奇昂存在金属冶炼加工技术，已令人吃惊，而



■ 这是1974年和1975年在班奇昂发掘发现的史前铁器，上面留有稻壳的锈迹。在这里出土的陶器上面也有相似的痕迹。稻壳的形状表明遗址上的古代居民所种植的水稻属于一种过渡类型，既非野生稻，也非完全的栽培稻。



其冶金技术的某些文化层面同样令人吃惊。班奇昂与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有所不同。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军事需要仿佛是冶金技术获得发展的推动力，冶金工艺以兵器或其他战斗工具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班奇昂的冶金技术几乎完全用于制造日常实用器具和装饰品。数千年以来，冶金技术在班奇昂村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没有剧烈的变化。其金属加工技术的演变和金属器具种类的日渐丰富，多见于新近阶段的墓葬。此外，更重要的是，金属器物明显并非为富人专有。小孩的手臂和大腿上常可发现精美的金属装饰器物。于是乎，研究人员面对着更不正常的情况，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并非由争斗或政权集权所推动，其进步之取得相对而言是和平方式的，由进化而得，而并非由革命所成。

■ 1981年，班奇昂自学成才的博物学者李·西昂纳塔准备好又一个生物标本，他将标本夹在报纸中间。美国的考古学家乔伊斯·怀特记录下每一个标本的特征。然后他们将标本用竹架捆扎起来，晒干后送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这种对今天生长在古代遗址附近地区的植物进行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方法，可以帮助研究人员重新认识史前村落的农业生活、植物用途以及当时的环境。

确实如此。在班奇昂，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存在这



样一些因素，即普遍承认的创新和人类进步所必需的刺激因素。这里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由气候所带来的压力或灾难，抑或靠近自然资源储备的特殊优势，这种自然资源无论是珍贵还是实用的，这样一些因素都不存在。然而，迄今为止，在泰国发掘的任何其他遗址，其出土文物的数量、质量及其时间跨度，均与班奇昂无法相比。乔伊斯·怀特写道，班奇昂看起来是“一种地区性的中心，然而又是什么样的中心呢”？

关于值得关注的班奇昂史前民族，尚有许多疑问。他们是怎样知道金属冶炼加工的，金属又从哪里获得，而他们对东南亚地区其他地方的技术进步影响有多大。这些问题还有待研究。然而，他们在东南亚地区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已经确立。关于扩大研究东南亚地区史前历史的意义，乔伊斯·怀特强调指出，“人们再也不能否认，从史前时期开始的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关于金属冶炼加工技术，其传播方式尚待发现确切的证据。然而，有一个方面是清楚的，无数南太平洋岛屿上的定居生活，其事件的影响发端于东南亚，这看来是清楚的。语言学通过文献研究证明，有6000余年历史的南岛语系语言由东南亚地区向外传播，其语汇中有涉及水稻栽培和使用金属工具的单词。南岛语系语言分布地区广泛，东到复活节岛，西到马达加斯加岛，跨越半个地球。一种足够先进的文化会越海向外扩散，可从南岛语系的传播中找到最早的证据。

班奇昂遗址被发现之后的30年来，视东南亚为人类进步的发源地的观点仍未完全确立。班奇昂遗址所出土的大量文物，以及后来其他遗址所发现的各种文物，经过分析、检验和交叉考证，这些浩瀚而不朽的工作，对确立此观点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令人伤感的是，正当人们为切斯特·戈尔曼在斯皮里特岩洞和班奇昂的发现倍感振奋的时候，切斯特·戈尔曼于1981年谢世，年仅43



岁。乔伊斯·怀特接替领导美国考古队在班奇昂的工作。她参加此项考古计划的时候正在从事学业研究。戈尔曼未竟的事业后继有人。一个正在成长壮大的国际考古团继承了戈尔曼的事业。这些考古学家分别来自美国、新西兰、泰国、澳大利亚、欧洲和其他地区。戈尔曼曾经高兴地称他们是“东南亚民族沙文主义者”。国际考古团将继续戈尔曼留给他们的工作，证实东南亚地区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抑或是历史落后的一块地方。

解读一则古老的故事

READING AN ANCIENT STORY

20世纪70年代早期，考古学家和非法的挖掘者展开竞赛，以保护在泰国班奇昂村庄下面埋藏的史前时期的文物。竞争的对手们只看到要攫取的利润，而考古学家所想的事情则是“这里埋藏着一部巨大的历史书籍，正等待着他们去解读”。1974年，泰国政府美术部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组成庞大的联合探险队，开赴这个位于泰国东北部的村庄，他们希望能够读懂这则古代的历史故事。

美术部曾经策划过早期的发掘行动，然而这次联合行动按照泰国和美国双方的两位负责人皮西特·查罗恩旺猜和切斯特·戈尔曼的话说，是一次“多学科的跨国行动”。从世界各国前来的专家将他们的专业知识带到班奇昂。他们分别在野外工作的不同阶段赶到这里，又在不同的时间回到自己的国家去进行实验室分析。

班奇昂成为进行现场培训的一个教学样板，迫切希望学习最新的考古技术的年轻的学生和专业人员从班奇昂的发掘中学到知识。雇用来做帮助工作的村民也获得了相应的教育，其中一些人还成了考古队的重要成员(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建在遗址上的茅棚底下从事着发掘工作。如右图)。这篇随笔以班奇昂发掘过程中所拍下的照片记录为基础，不但记录了许多研究东南亚史前历史的重要发掘踪迹，还展示出考古学家们从事野外考古的实际生活情景。





地下的筛选工作

EXACTING WORK DEEP IN THE GROUND

班奇昂的发掘者在一天比一天炎热的条件下进行着他们的工作。在季风吹拂的季节里，暴雨冲刷着茅屋的屋顶，为了避免遗址被暴雨淹没，必须在遗址周围建造小型的泥坝。

考古学家和学生们以及来援助的村民每星期工作六天，他们在白天里进行挖掘、记录、清理并分类，而在夜晚则对发现的文物进行分析和归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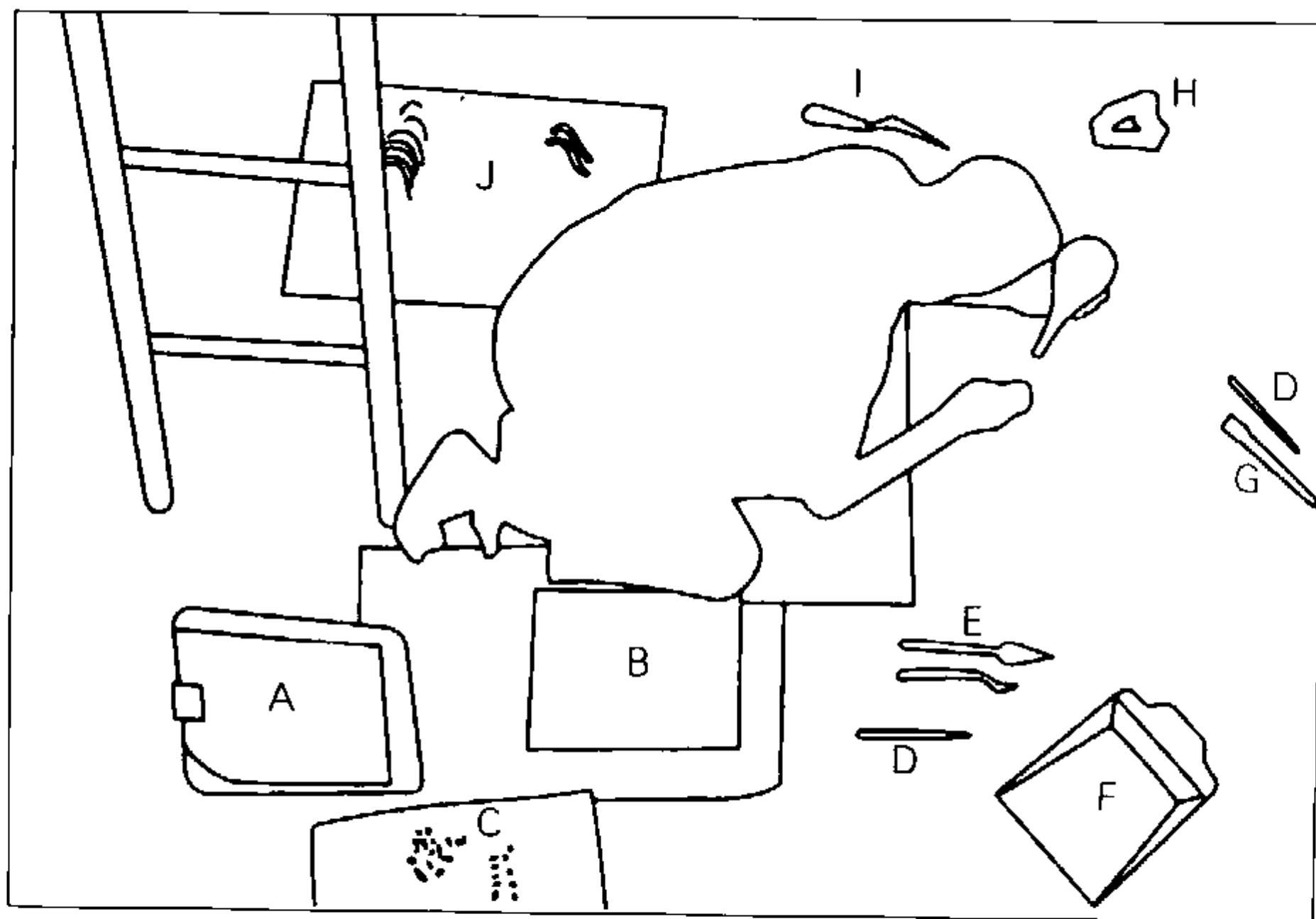
文物之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威廉·斯考弗勒尔说：“每当铲子挖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些东西。”要把文物取出来，通常需要使用毛刷和牙拨等工具才行。

每发现一件东西，都会把所有的人吸引到发现的地点来。所以，班奇昂吸引来好奇的人，其中有的游客在观看考古学家出土属于遥远的历史的文物的时候，还提出许多问题。在20年以后，当斯考弗勒尔回忆这段发掘东南亚历史的时候，他说：“在那里度过的岁月真是令人兴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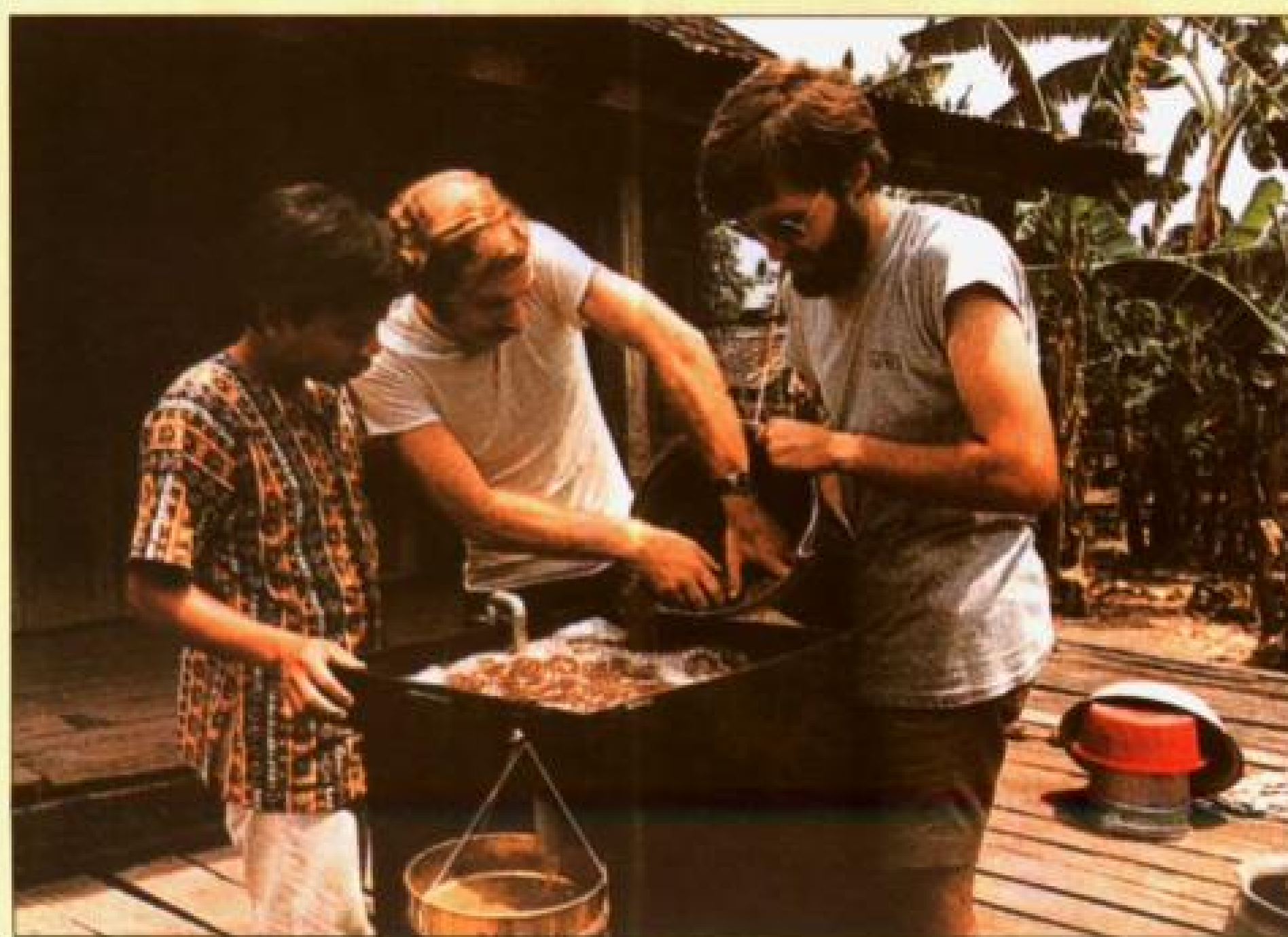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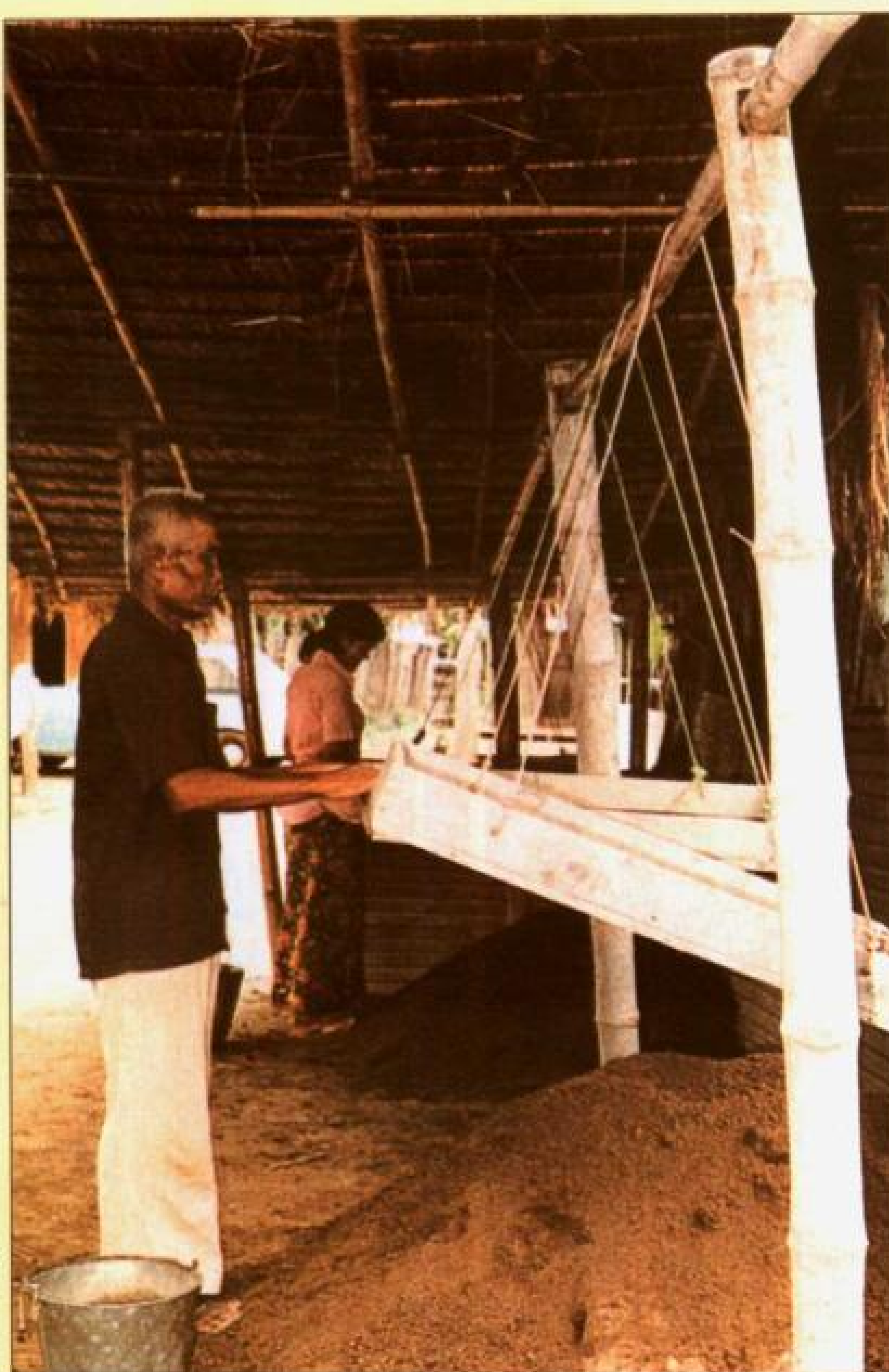


■ 1975年6月10日，接受考古培训的菲律宾人李昂内尔·奇永深入D7号发掘方坑，他使用牙拨（右手）和吹子发现了一具婴儿头盖骨和一些肋骨。简图中标出了照片中的各种物品：骨骼用红色标记（A）；袋子中装着所发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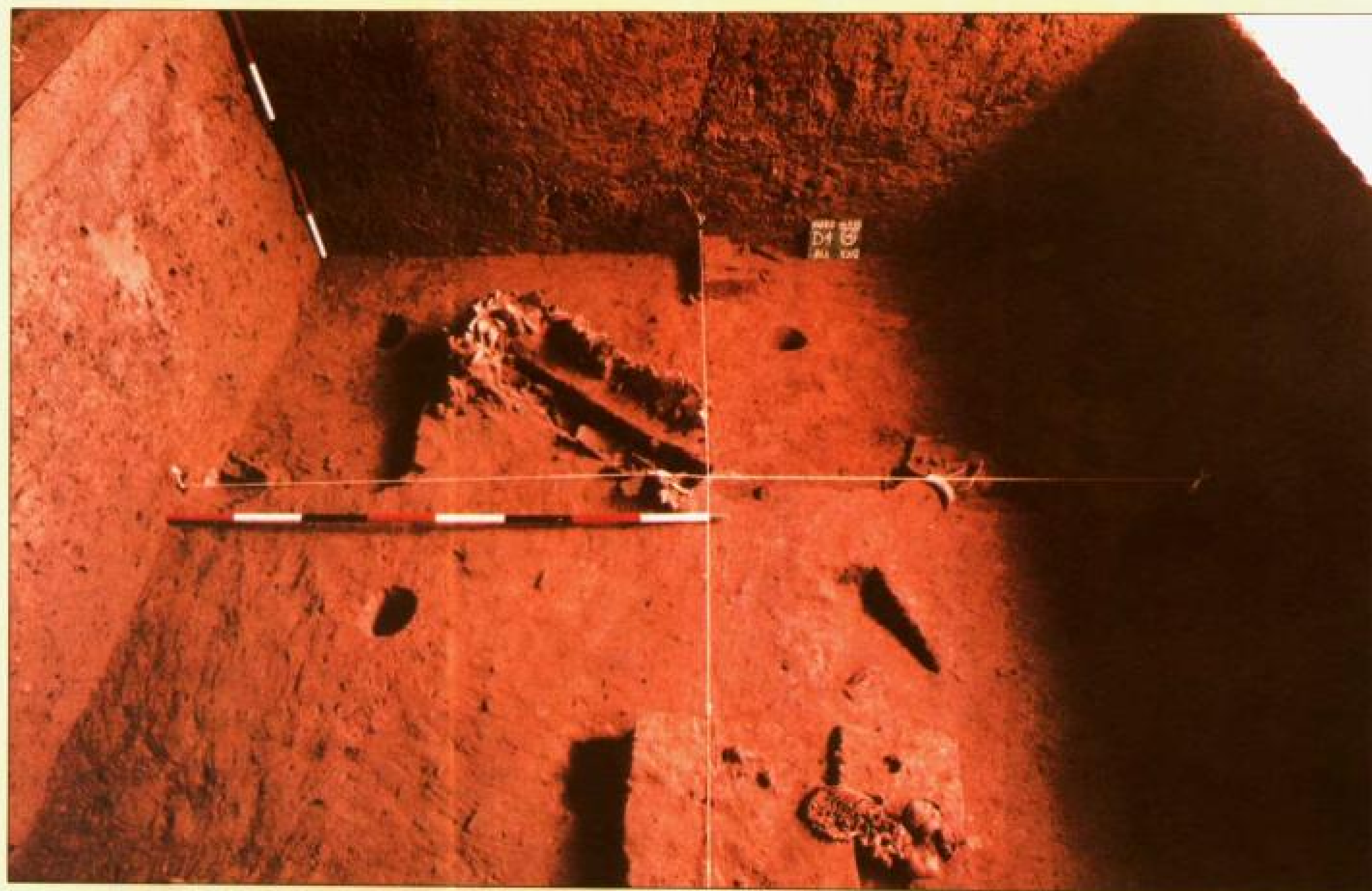
东西，分别用号码和日期标记着发现的方坑、层次和埋藏地点（B）；脊骨和其他骨骼碎片（C）；牙拨（D）；尖铲（E）；簸箕（F）；毛刷（G）；金属薄片上供放射性碳进行年代测定的木炭标本（H）；常用铲（I）；肋骨（J）。



■ 为拣出骨骼碎块、陶器碎片以及其他小型的物品，班奇昂的村民用筛子过滤所有的泥土。筛子的网眼有一厘米，被固定在一个木框上，并由一根竹竿做成的支架悬挂起来（如图）。经过两个季节的筛选，所有挖掘出来的土壤都被过滤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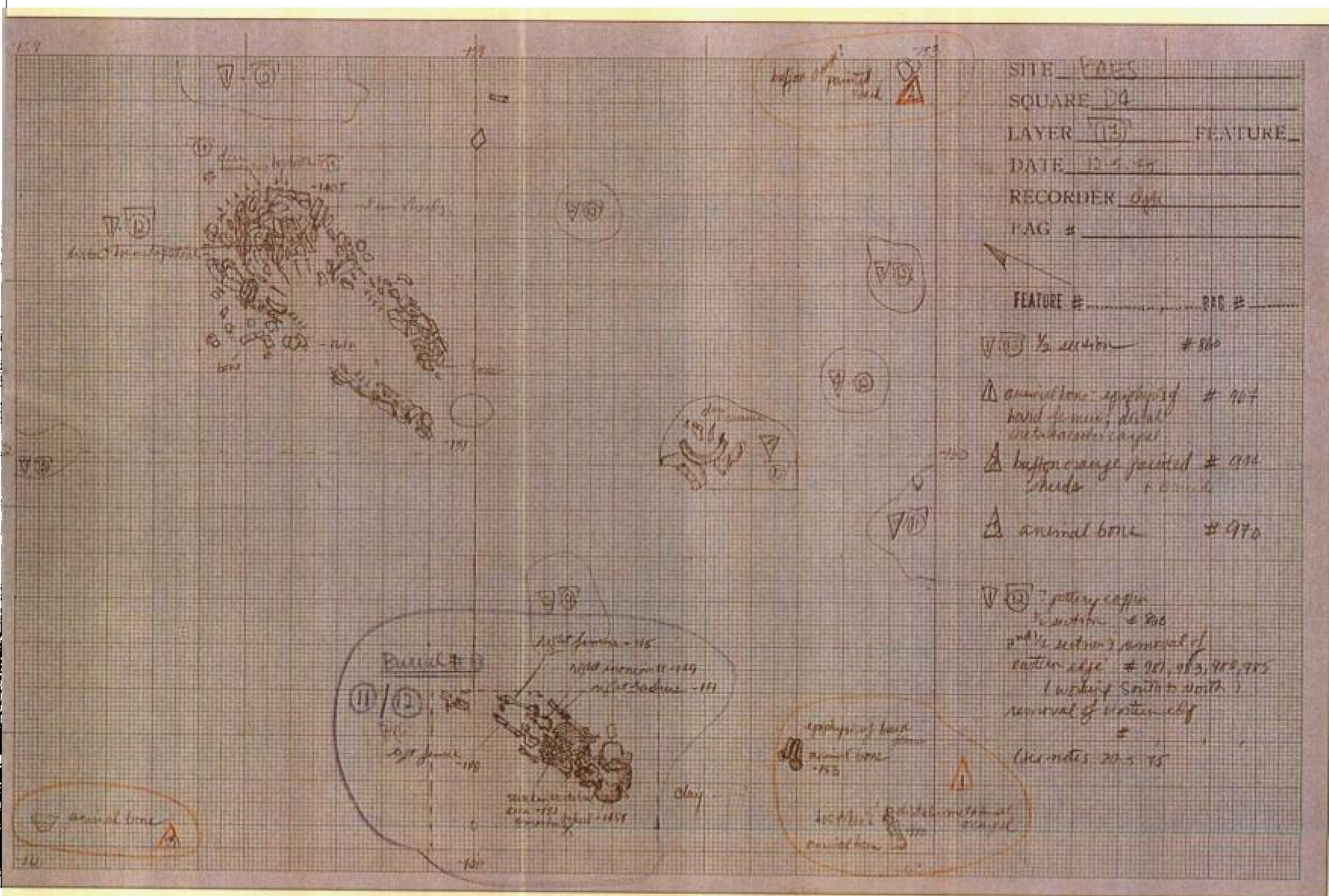
■ 皮西特·查罗恩旺猜（左边）观察美国的毕业生刘易斯·弗莱姆（中间）和威廉·斯考弗勒尔将挖掘出来的泥土倒入泡沫浮选机器。较轻的有机物被上升的气泡浮到表面，而泥土则沉积在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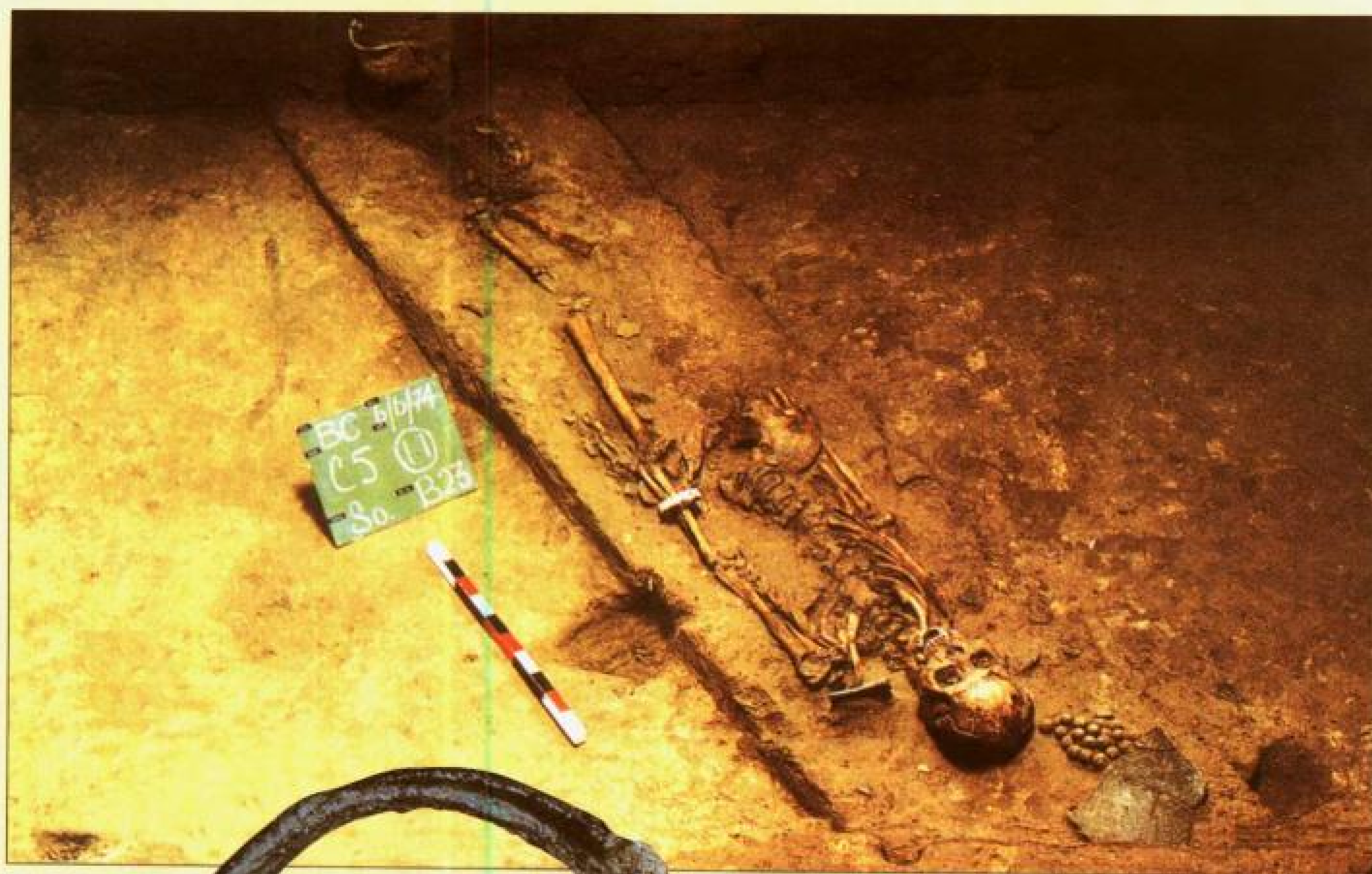


■ 这是一张 1975 年 5 月 16 日在 D4 号方坑拍摄的照片。方坑被两根拉线分成四部分。右下方是一具有一半被移走的骨骼，而左上方是埋藏陶器碎片的一个长方形的土坑，陶器尚未被完全取出。有两根木棍长 2 米（约合 6.5 英尺），可以测量高度和宽度。考古学家们为了拍摄到所有的细节，常常拍摄发掘场面的黑白照片，同时也使用不同的光线设置拍摄彩色照片。

■ 这是一张记录细节的野外草图，由美国的学生迪勃拉·克莱默绘制。所示为 D4 号方坑于 1975 年 5 月 12 日的挖掘情况。尽管右面的文字将左上方陶器碎片所处的位置标为“陶器棺材”，而在三天以后所做的野外记录承认它“仍然是一个谜”。在进一步挖掘之后，显示出它并非是一个棺材，而是一具婴儿的骨骼，上面覆盖着按仪式被打碎的陶器。

■ 一位泰国的考古学家正在分成四块的方坑里进行测量，然后在笔记板的图纸上把测量结果记录下来。每向下挖掘4英寸做一次这样的记录。这是在土层较厚的地方选用的测量标准。当发掘结束的时候，考古学家已经向下挖掘了13英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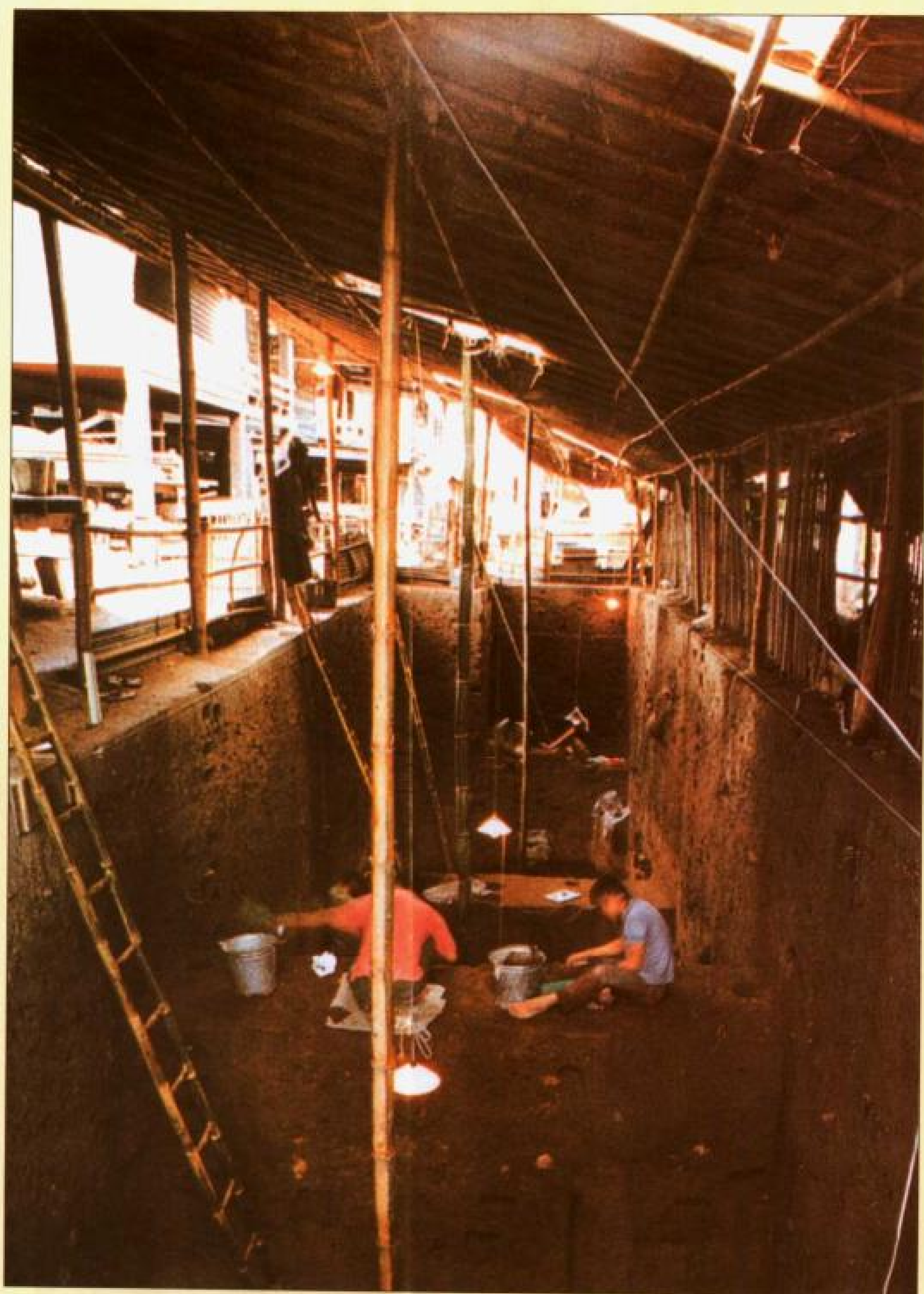


■ 这具骸骨已有3200年的历史，系中年男性，于1974年6月6日最终出土，考古学家给他取名叫“金工”，因为在他的墓穴中出土的金属物件非常突出，包括他左手腕戴的一只被锈腐蚀的青铜手镯。在他左肩处出土了一把有插孔的青铜制扁斧。在其头部附近的地方出土了经过烧制的黏土球，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弹弓所使用的子弹。在20世纪早期，班奇昂的村民仍然使用这种弓箭。





■ 在离班奇昂不远的班奥高村，一位年长的村民正在编织用来弹射弹丸的小藤条平台，小平台连接在两根弓弦中间。这种弓箭现在已经很少见到。射手捏住弹丸并向后拉引弓弦然后发射。这种武器被用来捕捉小动物和放牧水牛。



■ 1975年9月，当班奇昂的发掘工作进入最后阶段，考古学家开始挖掘分隔挖掘区的土墙。这种土墙是在挖掘过程中用来作垂直顺序或者地层标记的，上面显示着自然和文化遗迹的分层。并非所有的土墙都是经过挖掘而倒塌的，在这张照片拍摄后不久，有一面土墙发生部分坍塌，使以后的发掘工作随时面临危险。

■ 图中是两位考古学家，一位是泰国的维加·因泰科塞，另一位是美国的威廉·斯考弗勒尔。在这间村舍里，班奇昂出土的 3400 袋碎片包围着他们。共计 125 万块碎片将从这里被运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进行分析和编目，然后再运回到泰国。

■ 泰国的发掘人员在草图的帮助下对各种骨骼进行分类包装，并准备将班奇昂出土的人类骨骼运往夏威夷大学，再由物理人类学家迈克尔·皮特鲁斯基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班奇昂的史前居民总体上身高属于中等，体格健壮，头颅较阔，而且脸型突出。





第二章

神秘的铜鼓遗产

THE HAUNTING LEGACY
OF BURIED DRUMS

一艘长60英尺的双体独木舟升帆起航，从母港夏威夷的希洛出发，迎着信风驶向浩瀚的海洋。船上没有任何导航设备，连罗盘针和六分仪也没有。独木舟将抵达位于东南方向2000英里处的一座小岛塔希堤岛。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这艘船的建造者和水手开始的是一次古老的航程。

船员都是波利尼西亚航海学会的成员，由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本·芬尼招募和领导。他们驾驶的船舶(大角星是塔希堤岛之行的导航星，故名“大角星号”)和数千年前波利尼西亚航海者所使用的船舶相仿。

这艘船是按大致的猜想而建造的，这一点要承认。双船体(和最初的船舶一样，用夹板制成，而非挖空的圆木)被绳索(合成索具，而非椰树纤维)捆绑在横梁上。横梁用以支撑甲板和桅杆(用于悬挂纺织成的船帆，而非编织成整块的树叶)。这样的独木舟尚未见于考古挖掘。原来制造的船舶所用材料是有机的，所以可能不久便腐烂掉了。在欧洲人的探险时期以前，亦未有任何记录下来的草图和书面描绘。然而，18世纪欧洲人的观

■ 这是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爪哇人的死亡面具，这种怪诞的表情保留着死者的面容。它也许代表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也许是一种家族的崇拜，也许是含有某种恶意，但是无论如何，死人所戴的金面具标志着印度尼西亚群岛早期对金制器具的使用。

察资料显示，欧洲探险者对太平洋岛屿居民的制船工艺和航海技术相当了解，芬尼和他的学生们据此向前推测，并相信他们重新制造了一艘石器时代的航海独木舟。

这艘船于1976年夏启航。后来，芬尼将这次航海任务称为重新发现之旅。这是一次尝试之旅，它将证明最初南太平洋岛屿是怎样发现的，人们又是怎样在那里定居的。这也是一次否定之旅。有名的挪威探险家索尔·海尔达尔于1947年乘著名的“孔蒂基号”做过类似的航行。海尔达尔可算是一位权威人物，他宣布古代的航海者只可能以偶然方式发现波利尼西亚小群岛。因为这里盛行从东吹来的信风，古代的航海者顺着盛行的信风航行，才会偶然发现波利尼西亚小群岛。信风的得名也是因早期的欧洲商人曾经利用它们，从东向西绕过非洲南端而返回母港。所以海尔达尔断定，偶然发现波利尼西亚群岛的航海者只能来自秘鲁。这次否定之旅就是要否定海尔达尔的权威言论。

波利尼西亚群岛岛民的语言和种族与秘鲁的情况不相同，而与处于下风向数千英里以外的东南亚人的情况相近，这是问题的所在。而东南亚人要发现这些岛屿，并开拓殖民地，以及后来同岛民进行贸易往来，那么他们必须有能力在浩瀚的海洋上航行数千英里，而且要逆风行驶。这究竟可能不可能？本·芬尼决定找出答案的惟一方法就是“重新建造古代的航海独木舟，重新学习古老的导航方法，然后再在波利尼西亚漫长的海上航道上进行实验”。

经过广泛的寻找之后，在波利尼西亚岛民当中，芬尼找到了一位掌握传统航海技巧的人：他在加罗林群岛找到了毛·皮艾鲁格。皮艾鲁格在海上航行可以不用罗盘针、地图或六分仪，在夜间，他通过某些星星和星座升起和落下的位置来给自己定位，在早晨和傍晚，他通过太阳的位置来给自己定位，而在中午或者多云的条件下，他通过大片海面的缓慢起伏的主要方向来给自己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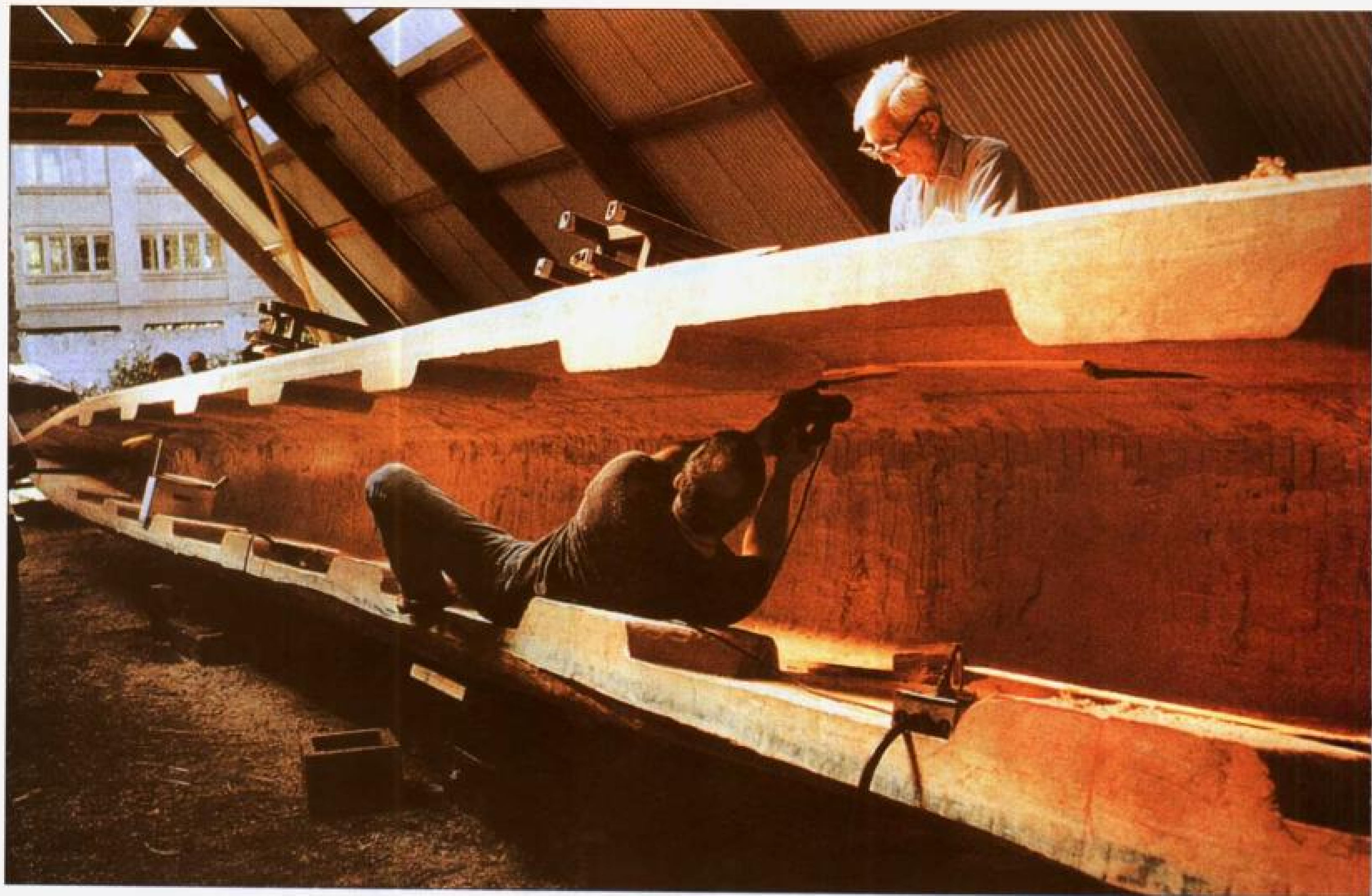




■夏威夷“大角星号”于1995年春天升帆出海。船上载有12名成员，船身完全由自然材料制成，他们借助海风、海浪和天上的星星进行导航。建造这艘长57英尺的双体独木舟是实验的一部分。他们将证明史前的东南亚航海者是否有能力利用这种船只到达南太平洋群岛并定居在那里。

位。他通过记住一路上所遇到的风和海流情况，并定时校正航线以抵消漂移，而在头脑中印记着自己在航线上所处的位置。他留心观察陆地迹象，比如远方的在陆地上空集结的云层，或浪涌形式的变化。

现代的观察家大多都嘲笑这种想法。他们认为，在相隔仅数百英里的两地之间，用这种方法为独木舟导航都是可笑的，更别说相隔数千英里了。专家们坚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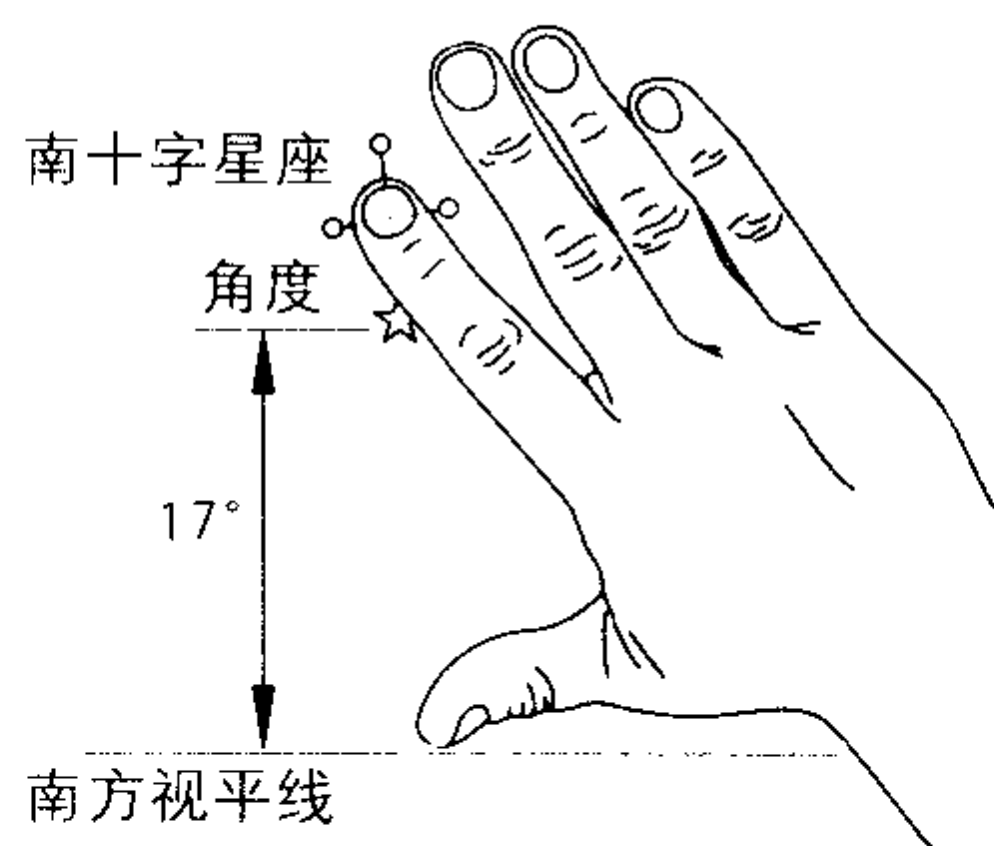


说，从估计与星星或太阳所成的方位角，而不用任何仪表，到推算侧风和洋流的影响，每一步都存在不精确之处，这种不精确会迅速积累起来，而使精确航行成为不可能。然而，皮艾鲁格和航海学会成员不仅到达了塔希堤岛，并于1976年行驶回到夏威夷，而且还于1980年又重复航行一次。此后，他们完成了其他数次航海旅行。到1993年，他们已在浩瀚的海洋上航行达5万海里。他们没有任何仪表、航海图或其他借助手段。一路之上，他们还招募了其他导航员，其中包括奈诺阿·汤普森。他是一位夏威夷人。

专家们所坚持的不可能精确航行，需要经过复杂的分析，才能解释其错误的原因。芬尼的航海独木舟在其甲板上没有携带任何可供使用的仪表。然而，在船头

■夏威夷“大角星号”的建造者将一根巨大的圆木挖空，作为船体的一部分。100多名志愿人员用数日的时间将两根北美云杉树干制成船身，他们挖出的木屑有6000多磅重。这两根树干是阿拉斯加送来的礼物，它们已经生长了400年。史前太平洋的航海者可以获得这种木材，它们以圆木的形式由阿拉斯加沿海地区被冲入大海，又被洋流带到太平洋的海滩。夏威夷人把这种圆木看成是上帝的恩赐。





■ 图表显示使用星体进行导航具有可能性。拇指与南方视平线持平，食指放在组成南十字星座的四颗星中间。导航员夏威夷人奈诺阿·汤普森利用这种方法能够计算出船在航行过程中的纬度位置。比如，他知道南十字星座最下面的一颗星位于距赤道水平线 27 度角的延长线上。如图所示，如果他发现这颗星现在的角度是 17 度，那么他便知道自己肯定处于北纬 10 度线上。经过多年以来对夏威夷海域和天体形态的研究，汤普森重新找到这种已经失传的航海技巧。利用这种导航方法，研究人员成功地完成了实验航行。

的一侧确实暗地安装了一个卫星转发器，独木舟的实际位置可以通过卫星加以跟踪，以便日后进行研究。比如在 1980 年越海前往塔希堤岛期间，一股狭窄的洋流已经将独木舟冲离航线偏西 90 英里，而汤普森没有意识到这股洋流，他以为自己仍航行于其实际航线以东 90 英里。11 天以后，又因过高估计了大面积南赤道洋流的影响，他以为自己正航行于其实际航线以西 90 英里，于是，在调整航向以后，他的航位推测法正好使“大角星号”位于正确航线上。专家们坚信，在漫长航程中航位推测难免出错。他们是对的。然而，这种错误未必会积累。错误随机出现，而在很大程度上又自相抵消。

在塔希堤岛和夏威夷之间往返航行四次之后，索尔·海尔达尔所持的反对意见有效。索尔·海尔达尔认为，如此原始的船舶不可能直接逆着盛行的信风行驶。尽管塔希堤岛位于夏威夷以南 2000 英里，但是在向东方向上，或在逆信风方向上，仅有约 300 英里的距离。此种航海独木舟船帆面积小，船身平浅，又没有吃水较深的龙骨，其逆风行驶的能力受到限制。现代赛艇可以侧风 50 度行驶，相比之下，此种航海独木舟仅能侧风 75 度行驶。于是，芬尼强调说，要直接逆着盛行的信风和洋流行驶，哪怕仅行驶 500 英里，那么航海独木舟必须做“之”字形来回移动，其总航程将达 2000 余英里。而从印度尼西亚群岛到塔希堤岛之间的航行，直接逆着盛行的信风和海流行驶，其所跨越的距离将达到地球周长的三分之一。

“解决这道明显的难题，”芬尼写道，既不需要高难的技术，也不需要抽象的推理。简单的事实是，“信风并非总在吹。它们定期平静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阵

的西风。”假定存在的石器时代的航海者，只要等着相反方向的风吹起来，就能乘风破浪向东进发。事实上，18世纪的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船长，他有一名塔希堤向导，曾向库克描述过这种方法，而库克对这次谈话做了记录。但是直到从1985年开始，芬尼和他的水手们用两年时间航行了1.2万英里，才使此种方法得到证实。在此以前，这种方法很少为人注意。“大角星号”时而以12节的速度顺风行驶，时而因反方向的风而停止前进，或者靠岸停泊。在漫长的海上航行途中，“大角星号”平均每天行进100英里。更重要的是，航行结束后，芬尼一点也不掩饰他的自豪，他写道：“我们想到哪里去，我们就能够驾驶‘大角星号’准确地到达那里。”

确实如此。1995年上半年，“大角星号”又做了一次航海旅行，姊妹船“夏威夷号”一同随行。“夏威夷号”是一艘新船，她和多次出海的“大角星号”不同。“夏威夷号”船长57英尺，主要用木料制成，船帆用剑形的露兜树叶编织而成。这两艘船一同驶往塔希堤岛西面150英里的胡阿希内岛。在胡阿希内岛，有分别来自塔希堤岛、新西兰和库克群岛的传统航海独木舟加盟，他们形成了一支小型船队，继续向塔希堤岛和马尔萨斯群岛前进，然后返回夏威夷。早期的东南亚航海者有可能驾驶帆船到达遥远的太平洋群岛，通过这次航海旅行，为此种说法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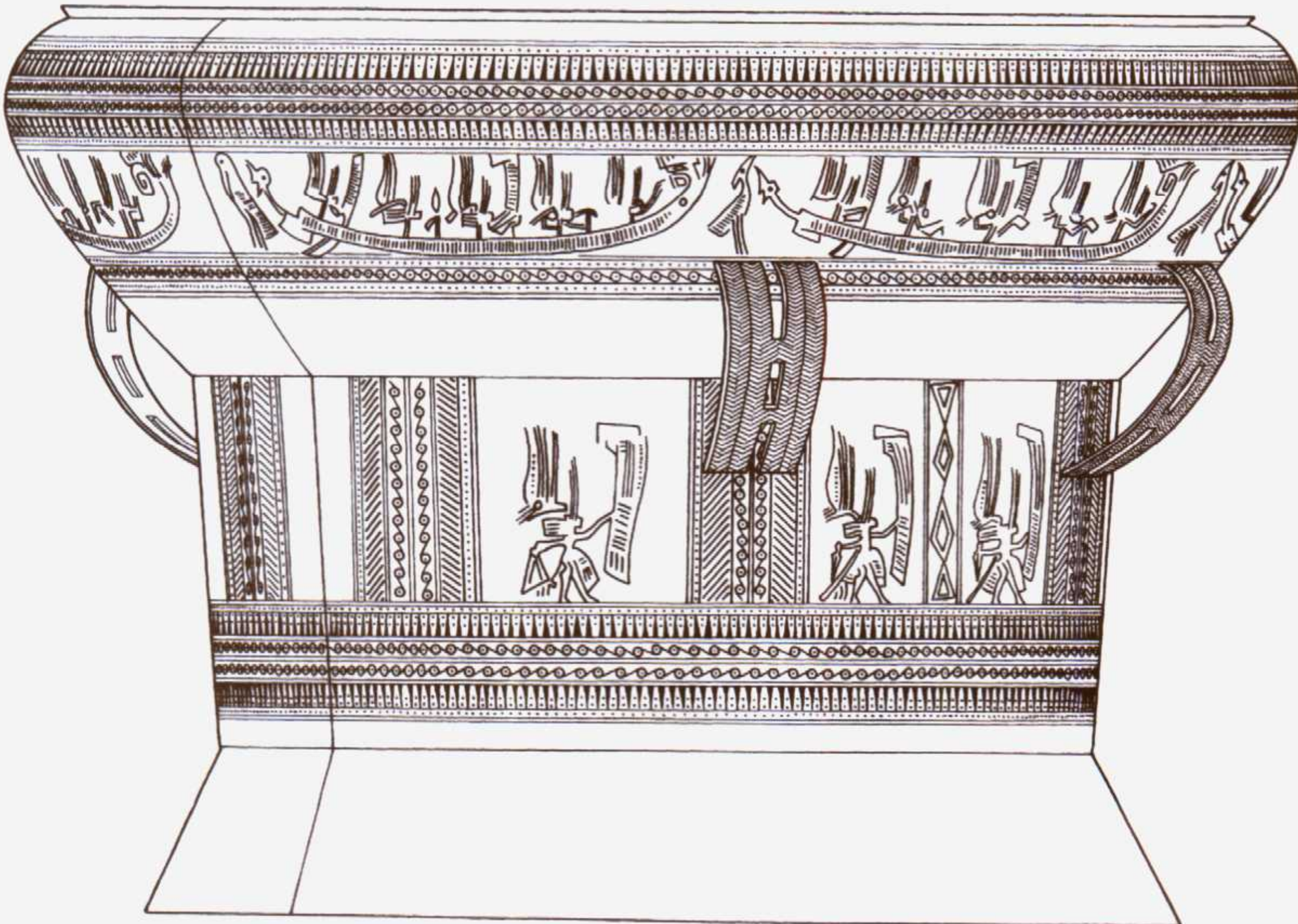
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和语言的传播，以及包含着复杂的地理和航海知识的古代时的向远方移居的行为表明，在史前时期，东南亚地区绝非只是被动接受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和技术。斯皮里特岩洞和班奇昂等遗址发现的考古证据，加之芬尼的航海旅行，都强调了一点，即对长期以来有关东南亚地区史前史的种种假设进行重新评估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种修正不得不面对有传统倾向的科学家所提出的种种反驳意见。他们所提出的反驳意见是，



变革倡议还太多地凭借猜测,依旧是在猜测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新的思想缺乏具有广泛基础的常规的考古记录作为支持。仅有极少数的几个遗址,如班奇昂遗址,代表着当地的史前文化的发展是长期的、连续的,而且是可以证实的。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战火连年不断。冒着枪林弹雨,寻找并解释其他遗址,即使能办到,也是极其困难的。

然而,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有关东南亚地区史前史的证据不断积累。特别是本地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考古学家,随着发现本地拥有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倍加活跃。他们以不断高涨的热情拥护并实践各种新的思想。考古学家们获得了非传统的数据,如本·芬尼的航海创举以及语言学家的种种研究所不断积累的那些数据,在这些非传统数据的帮助下,考古学家越来越细致地描绘出东南亚民族的生活景象。那时候的景象中,中国人尚未从东北方向到过今天的越南北部地区,而印度人亦未从西方将贸易商品和宗教信仰传播到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新的景象将向人们展示这样一个民族:不但他们从其他文化接受的东西很少,而且他们还贡献了很多,跟以前所猜想和怀疑的情况刚好相反。作为东南亚民族所贡献的礼物,东山铜鼓当属更令人惊奇,也更引人入胜的一种。

19世纪期间,巨大的青铜铜鼓,后称东山铜鼓,第一次在欧洲展出。东山铜鼓大概是由从东方返回欧洲的好奇旅行家带去的。一经展出,其古老和充满异国情调的艺术风格备受青睐。东山铜鼓装饰豪华,上面所绘图案景致独特。其图案人物通常是乘着船,并戴有夸张的头饰。铜鼓上面亦有诸如同心方块和平行条纹及行行圆点等几何图形。数十年来,欧洲人不知道其古老若何,也不知道其出处在哪。直到1902年,铜鼓才得以确定为东南亚所造。1929年,有学者确定铜鼓年代约为公元1世纪前后。此前,考古学家报告称在越南北部位位于河内以南的一个叫东山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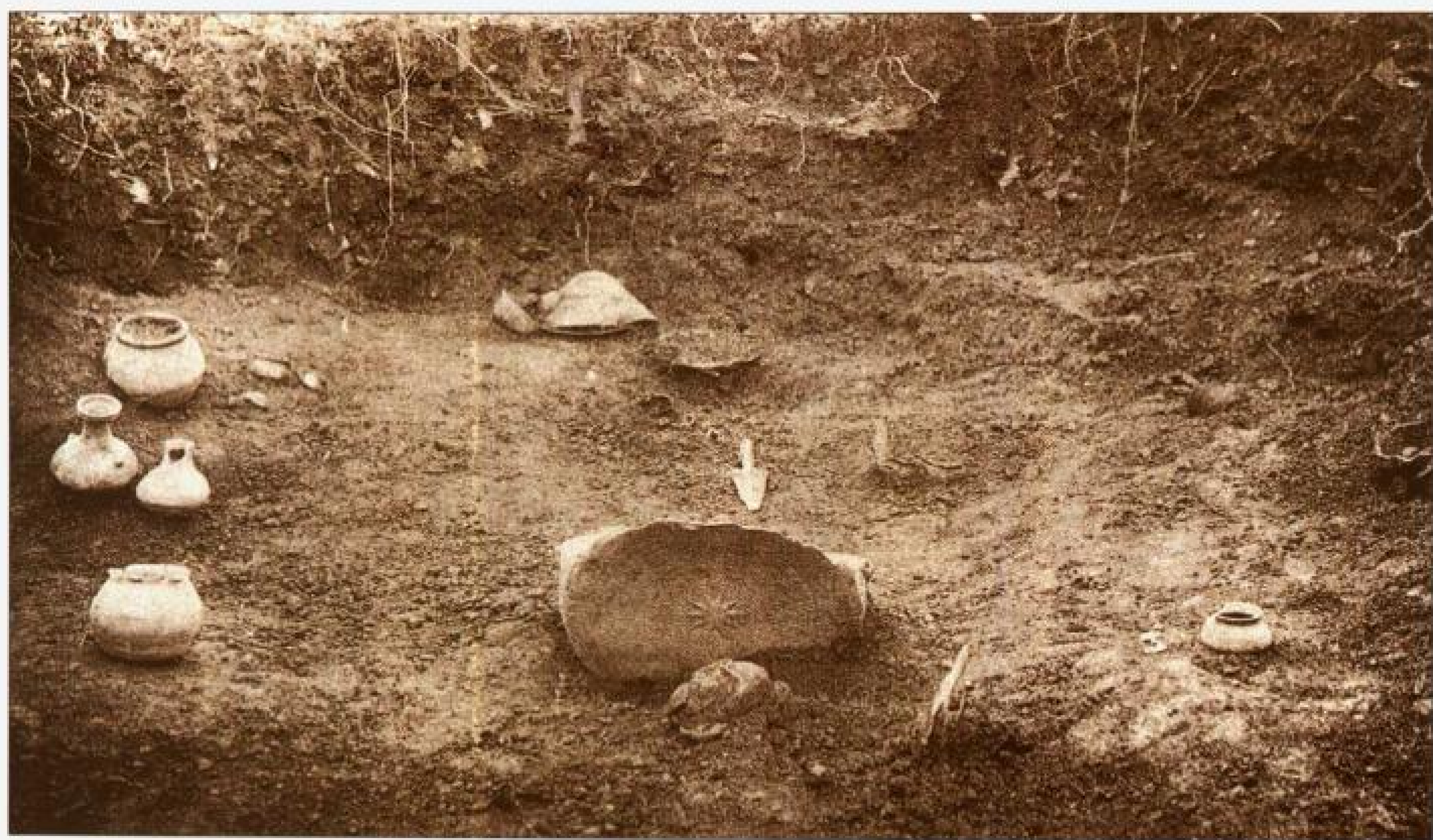
发现了典型的此种铜鼓。此后，有报告称在整个东南亚大陆和东南亚海岛以及中国南部，均发现了相似的铜鼓。

铜鼓对东山人情况有大量揭示。东山人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生活在红河三角洲。工匠在铜鼓上密集地装饰着取自其生活的场景。例如描绘战争事件，斗士们头戴华丽羽饰，乘一流战船前去作战，船上设有船舱和作战平台。还有描绘奏乐的场面，铜鼓分两只为一组，或四只为一组，并与其他乐器伴奏。事实是铜鼓代表着明显先进的金属加工技术，浇铸如此体大而壁薄的铜鼓，且加以严密装饰，这已是一项重要的技术成就，亦是一项重要的艺术成就。暂且不说这个，关于铜鼓，最引人入胜的事实是，此种珍贵器物与亡者一同埋葬。富足的东山人其墓穴中常有数只完整的铜鼓，而且有形状相对较小但制作同样复杂的小型铜鼓，这些小型铜鼓用于盛放火化后的骨灰，或者有时盛放被砍下的头颅。

第一只测定年代的铜鼓可能于公元1世纪期间制作，比中国人到达此地区的时间晚一个多世纪，而且早就有人猜测，把冶金知识以及文明的其他方面带给此地区的就是那些中国人。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汉朝早期的历史文献，于此种传统看法有所支持，文献中称位于其西南方向的东山人野蛮人。

然而，东山墓葬文物(因土壤酸性作用，人类遗骸罕有发现)经过运用现代研究技术，考古学家迅速描绘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的一个社会面貌。社会生活中尽显由文化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如栽培

■ 东山人掌握了超凡的金属冶炼加工技术，古代的中国人称他们是铜鼓制作师。他们制作了数百面装饰性的礼仪铜鼓。这是一面高2.5英尺的铜鼓(如图)。鼓面上带有14个尖的星体可能代表太阳。鼓身侧面有载着头戴羽毛的勇士的船只(草图)，显示出东山民族是一个面对海洋生活的社会群体。



水稻的灌溉和畜力，冶金，精良的手工艺制作技术。考古学家还描绘出一个集中化和专业化的社会。一切社会生活景象都出现在中国的汉朝人到来之前。确实如此。当中国人出现在东山人的土地上之前的400年里，东山人的文化已发展到其正常水平。

从东山铜鼓的起源被确定时开始，表示怀疑的学者就存在疑问，如此先进的冶金工艺和文化，东南亚地区的土著民族是怎样取得的，他们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个问题。20世纪30年代期间，两位东南亚史前史的学生，一位是奥地利的罗伯特·海因—格尔登，另一位是瑞典的伯纳德·卡尔格伦，他们俩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关于东山文化的兴起时间，以及将铜鼓这种艺术形式带给东南亚地区的究竟是哪个民族，他们俩存在意见分歧。关于东山文化的兴起时间，他们俩的意见则相差数个世纪。然而，有一点他们俩都没有疑问，即铜鼓艺术独特的几何风格，及其青铜制作工艺，均由某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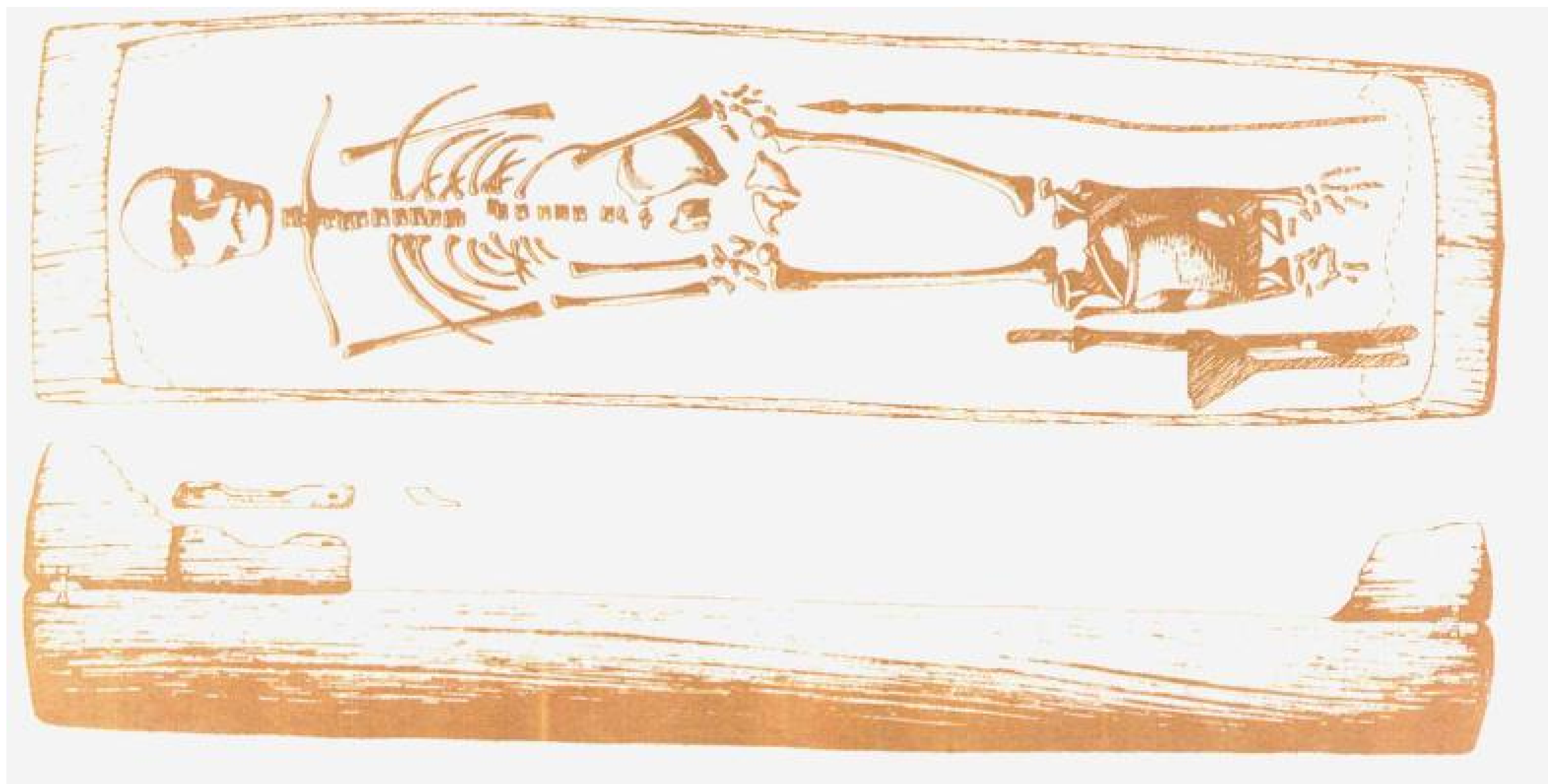
■ 20世纪30年代由考古学家奥利弗·珍塞在一个墓穴中发现的东山铜鼓鼓面(上图)，上方有一个矛头。铜鼓鼓面直径约18英寸，鼓身已破碎，也许是根据仪式的要求在埋藏前打碎的。铜鼓周围的其他青铜制随葬品显示出这是一个东山首领的墓穴。



“文明化的”外来赠予者带到这里。罗伯特·海因-格尔登和伯纳德·卡尔格伦两人分别从其他史前文化中，找到具有相同艺术要素的陶器或人工制品，他们认为那些史前文化更有资格作为先进的东山文化的源头。海因-格尔登认为东山文化始于欧洲，约于公元前800年后被带到东南亚地区，而卡尔格伦驳斥说，东山文化来自中国中部，并可上溯到公元前4世纪或公元前3世纪。

在更古老的东南亚民族文化中，可以找到与东山文化相近的艺术主题。此时，考古学家开始怀疑海因-格尔登和卡尔格伦的推断。更早期的原生的青铜冶金工艺传统，首先在泰国的农诺塔遗址被发现，后来在东南亚大陆的诸多遗址均有发现。这表明青铜器制造先于东山时期上千年，甚至更早。到1989年，农诺塔以及30余个类似遗址的研究，都显示出存在更早期的东南亚民族文化，如越南北部的凤元文化，可上溯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此项证据使东山文化在其自家土地上获得更深的根源，一直追溯到东南亚地区最早的定居

■ 这个东山男性的遗骨被安放在一具圆木棺材里，里面有矛尖和斧头以及一根竹柄，还有被塞放在两腿中间的陶器，这些东西都是为他死后的生活而准备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掘出了许多东山时期的遗址，发现这个墓穴的高甘是其中之一。这些遗址中都发现了安放精英们的遗体的圆木棺材。除了不如（左图）这个墓穴那么奢侈以外，在这个地区极强的酸性土壤中能够把这个武士的骸骨保存下来是罕见的。





村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30年，红河三角洲地区冲突四起，战火纷飞。关于东山人的考古研究最多只是间断进行。然而，越南的研究人员取得了进步，其发现亦于1975年越南恢复和平后逐渐广为人知。现代的分析 and 年代测定确定东山人及其前人，在中国的汉朝人到达之前，已经在这个地区繁荣发展至少1000年了。

在古典的东山时期之前，其墓葬中的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这大致属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期间的文化。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青铜器广泛可见。除铜鼓外，亦见图案丰富的金属制桶状容器、灯具、短剑、刀把、斧头、犁头以及种种饰物。古螺属东山遗址之一，位于河内西北，聚落占地近250英亩，筑有围墙，有壕沟。古螺出土的一只重达160磅的青铜制铜鼓，其材料需要冶炼一吨多的红铜矿石。仅在东山文化晚期，

■ 这个镀金青铜制扣形饰物高3.5英寸，上有歌手和乐师，于1955年至1960年期间在滇人的一个皇室墓穴中出土，这种滇人的皇室墓穴共被发掘出50个。鼓师和笛手给上面的歌手伴奏，歌手们穿着长袍，佩戴耳环，头上戴着帽子，形状如同小丑一般。滇人和位于他们南部的东山人一样，其铜鼓被后来的汉人所吸收。

即公元前1世纪期间，其随葬品始见中国的器物，如钱币、印章和铜镜。

拥有独特的铜鼓的东山文化，数十年以来，是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东南亚文明的最著名的例子。东山文化比相邻的同时代的文化内容更加丰富。东山文化不仅靠近红铜矿和锡矿，还靠近陆路贸易通道。然而东山文化绝非一枝独秀。在今天的越南，亦有其他文化繁荣发展，其中一个位于越南东部沿海的中部，另一个位于南部。在泰国东北部和中部，亦有其他文化，且得到迅速发展。在今天的中国南部，亦有另一个铜鼓文化在发展演化。

■ 这个鼓形的贝壳(贝壳是滇人的一种货币)容器盖子在滇人的墓穴中出土，直径12英寸，上面有127个人物造型。在带顶的平台下面有16面铜鼓，这大概是宣誓效忠仪式的一部分，也许还包括人和动物的献祭活动。当时在中国的西南部相当流行，这种杀生形式的献祭活动被认为是祈祷土地丰产的仪式。

滇族文化，位于东京平原西北，在今天的中国南部云南省境内。滇族文化比东山文化更加丰富。从公元前1000年前后，滇族文化在富饶的滇池盆地地区繁荣起来。在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2世纪期间，这个地区和





中国的汉朝人有所往来，汉朝人视其南方人为野蛮人。公元前109年，滇国归顺了汉朝。

滇族人把仪式活动和宗教信仰的证据保存在铜鼓和鼓状容器上。在铜鼓和鼓状容器上，有细腻的三维舞台造型。鼓状容器用于盛放属宝贝科的贝壳。这使现代考古学家们能够更多地推断出此种器物在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例如，一只随葬的铜鼓上有一个小型场景，描绘了一幢木构房屋，房屋四周有13个人物，他们正在准备食品、演奏乐曲并举行一项仪式，这项仪式无疑和房屋里面的事物有关。房屋原本是空的，而此时在一根柱子上有一个被砍下的人头。还有一个较为复杂的场景，场景以一排铜鼓为中心，旁边则站着一位女性，显然她拥有一定的地位，一个跪着的女性正为她敬献饮品。在其周围，还有其他人物组合。一个大块头的男性身旁，站着或跪着数人，他们手持容器，里面盛着鱼、谷物、水果和蔬菜。此男性靠着一根柱子。一个大块头的女性身旁，亦有他人围绕，此女性由两名男性用担架抬着。其他人牵着家畜。

由此场景以及至今这个地区仍然保留的习俗遗迹证据，研究人员拼合出一个民族的生活景象。对于这个民族，在确保其农田丰产和保证其能够与神灵沟通方面，铜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周围的自然界的万物充满着神灵，与神灵世界的沟通对其精神健康很重要，而且此种沟通只有通过鼓声才可能进行。人、铜鼓、自然界以及亡者，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帮助解释此种珍贵器物被埋葬的原因。

东山铜鼓此种证据显示出，中国的汉朝人进入东京平原时，他们所发现的并非是野蛮人，而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东山绝非是中国文化的被动接受者，其生活方式早已确定，而且生动活泼。

在发现班奇昂遗址的同时，考古队在泰国的昭披耶平原的山丘地带开始挖掘，这是同样重要的一次挖掘。1957年，曼谷国



■ 这是在越南北部沿海村庄拉荣被发现的一个汉代风格的砖砌墓穴（如上图），属于20世纪30年代由奥利弗·珍塞发现的27个墓穴之一。汉人于公元前111年征服东山人，并建造了数百个这样的墓穴。墓穴上面覆盖土墩，像是为这些精英建造的家园一样。墓穴中出土的小型青铜雕像（如右图）显示出越南的影响，但已被做成中国随葬的灯具的模样。灯芯从铜像头部塞入，小雕像内部装有灯油。





家博物馆的考古学家金佑迪指出，在泰国中西部边远地带存在一个岩洞，岩洞周围树木丛生，岩洞里很可能存在史前时期的珍贵文物。泰国和丹麦组成联合探险队在1960年抵达该岩洞考察，他们发现了四个东山风格的铜鼓遗迹。他们看得出翁巴赫岩洞有很多研究的价值，尽管当地的农民为了收集蝙蝠粪便作农肥已经破坏了岩洞的原貌，然而直到1965年他们才开始正式挖掘。一些寻宝者在此期间来到这里给岩洞造成了更严重的破坏。

翁巴赫岩洞洞体很大，长100多码，明显是一块古代的墓地。这暗示附近曾有人居住，虽然具体方位还不清楚，但这里确实是个好地方。它位于两条河流之间，正好位于通向西海岸的一个山口处(今天的泰国和缅甸以这条山脉作为边界)，而且岩洞附近有一个铅矿。挖掘人员在未遭破坏的地方发现了两种墓葬形式，一种使用船形的木制棺材，而另一种则是不使用棺材直接下葬。

研究人员断定，棺材是为那些地位最高的人准备的，而属于第二等级的则采用后一种埋葬方式。这两种方式所埋葬的尸体都有各种铁器作随葬品，偶尔还有青铜制品。考古学家发现，有些尸体用玻璃球作饰物。玻璃球只可能出自印度，而经过贸易通道来到这里。文物经过年代测定显示，其起源时间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后半叶，与相隔遥远的东山人出现技术爆炸属同一时期。

公元前500年前后发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与外国入侵无关，亦明显不关及和特定的东南亚文化相隔绝的东西。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而就是这件事情为东南亚地区的技术和艺术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并突出表现在青铜器、铁器以及班奇昂出土的陶器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一个重要的线索又以不寻常的方式出现了。

20世纪40年代晚期，对考古学感兴趣的英国陆军图像判读员彼德·威廉斯-亨特，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拍摄的

呵叻高原的航空照片中有一些存在异常情况。异常情况是一些地表植被形成暗色圆圈，其包围的面积从 50 英亩到 175 英亩不等，散见于泰国东北部的蒙河盆地一带。暗色圆圈基本上从地面观察不到。原来，暗色圆圈是曾筑于村落或城镇四周的古代土木工事表面所生长的密集植被。

最后，研究人员在航空照片中确认出 91 个遗址。这些遗址大多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繁荣发展。这些土方工程多属挖掘壕沟和其他水利工程的副产品，同时亦是其防御性城墙。此种土木工事明确了一个无争的事实，即只有一个有组织的农业社会方能开创有组织的村落和大规模的公用工程。此类土木工程的发展，或许仅是一条简单的土堤，为村落周围的稻田保存水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土木工程的改造开始了。因为注意到了工程和效用的关系，其社区工程逐渐复杂起来，人们建立复杂的堤坝、壕沟、水库和河道系统。

启动如此大规模的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其社会性质的重要含义由此直接显示出来。班奇昂希延是其中的遗址之一，其周围的壕沟如果只有 3 英尺深，其土方工程则达 100,000 立方码，需要 500 人用一年时间完成。如果没有妥善的计划与合作，此项任务无法完成。工人们大概在湿季从事农业劳动，而在干季里再挖掘壕沟。

经仔细考察昭披耶河谷挖有壕沟的遗址，研究人员 C.M. 霍在 1984 年发现，其分布形式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随着金属时代的推进，有些遗址其规模开始大于相邻遗址，暗示出政权集中化在扩大。她发现，最终当青铜器已广泛使用，铁器亦开始使用时，规模最大的遗址其间隔大约相距 18 英里。于是，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泰国中部和东北部的壕沟修造者、泰国西部的船形棺材制造者，以及越南和云南的铜鼓工匠，都正在经历其最伟大的发展时期。



中国人来到越南地区之前，越南北部已经取得了重要进步，这已经清楚了。印度人到达缅甸地区之前，缅甸亦取得了重要进步，缅甸发现的新证据也如此显示。而且缅甸的发展揭示出与东山铜鼓存在更多的联系。

公元5世纪时，缅甸已具有复杂的佛教文化，卑谬古城遗址可以证明。20世纪50年代，这已广为人知。因明显具有印度宗教和文化的印迹，此遗址看似支持通常的猜测，即外来力量塑造了东南亚民族文化。然而，据缅甸当时的首席考古学家乌昂索称，在1959年以前，关于遗址起源的调查只是零碎的。他在1966年写道，虽然收集了单个城市的大量信息，但是“尚未做出尝试，将调查结果互相联系起来，以获得缅甸早期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年代顺序”。

贝克塔诺古城，筑有城墙，规模宏大。贝克塔诺古城遗址为缅甸专家提供了这种机会。在相对比较完整的贝克塔诺古城遗址上，他们有机会采用新的更加有序的方法。乌昂索如此写道，在收集其他信息的同时，他和他的同事们开始获取固定的一个时间点，“由此时间点开始，建立一个系统的文化序列”。

贝克塔诺古城相当大。其外围城墙呈长方形，用砖砌成，包围着近4平方英里的城区。由于几千年的风化，一面城墙已完全消失，其他三面也仅剩6英尺高了。城内的中央宫殿占地约4英亩，其他地方有近100个乱石堆，城内树木丛生。在城外，调查人员发现许多低平的土堆，土堆系城中居民的墓地，用以埋葬经过火化的亡者。骨灰盛放在赤土陶瓮里。发掘贝克塔诺古城的25个遗址历时4年多方告完工。结果，缅甸的史前史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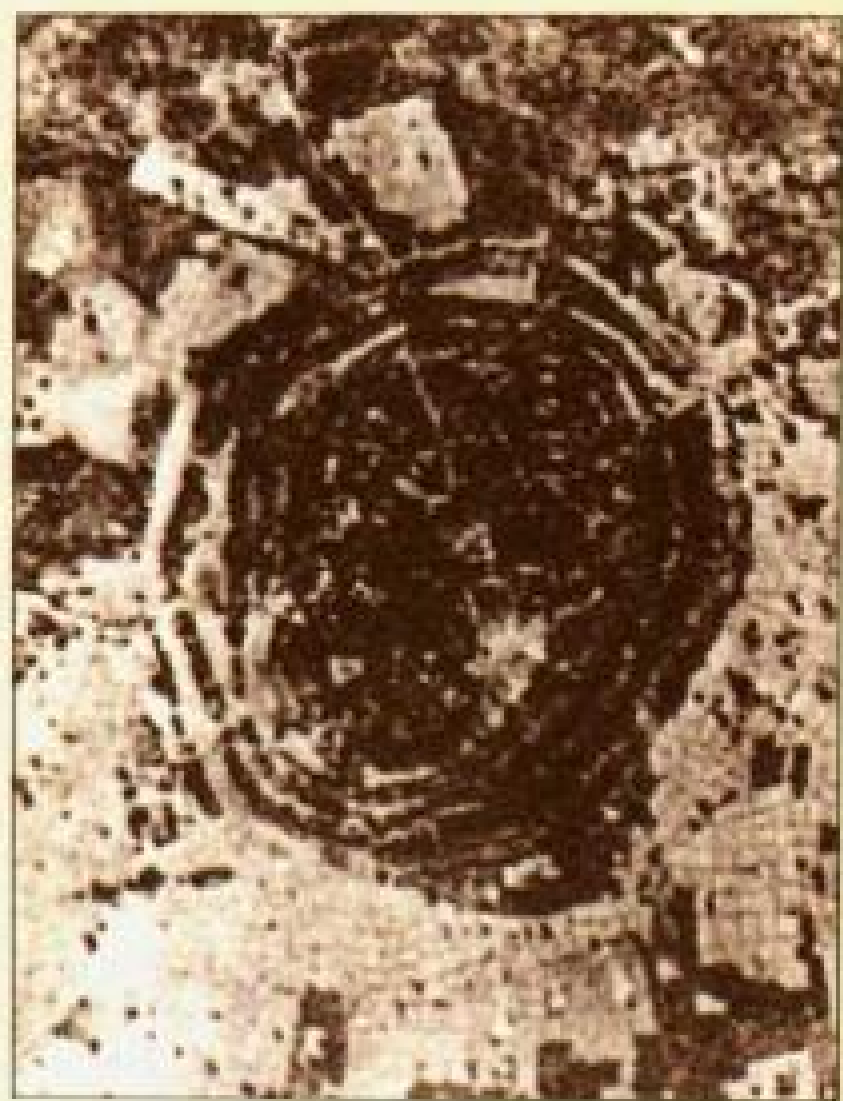
航空照片中的线索

RINGS SEEN FROM ON HIGH

1982年，美国考古学家伊丽莎白·摩尔在英国博物馆的档案室经过长期而细致的研究，发现了55个卡片箱共有5000多张关于东南亚的航空照片。摩尔是研究东南亚历史的考古专家。这些照片摄于1945年至1950年期间。彼得·威廉-亨特少校(下图)是英国陆军图像判读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对东南亚进行航空考察。这些照片正是由他所收集。照片中常见的同心圆形状的植被激发了他的研究兴趣。其中有些照片是他亲自拍摄的。他开始集中力量研究这些同心圆形状的植被。结果发现它们正是史前时期泰国北部挖有护壕的村落遗址。

1949年，亨特少校被派遣到马来西亚。在那里，他娶了





塞迈塞诺伊的一位酋长的女儿。他的收藏品有被蠹虫和当地潮湿的环境所破坏的危险，所以他将这些收藏品寄给在伦敦的一位朋友，打算“几年以后”再索要回来。但是在1953年，他被一根因朽坏而倒塌的圆木砸伤并致命。按照当地的习俗，人们把他埋葬在塞迈塞诺伊，在他的墓穴中还放置了面包、刀具和一个吹风管，人们把他的斜纹呢制服、衬衫、领带、梳洗用具、香烟以及一本《国家地理杂志》也放在他的墓穴中。

大约30年以后，摩尔对威廉·亨特留下来的数千张照片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开始在美国东北部亲自寻找那些有护壕的遗址。她的寻找工作最终发展成为对东南亚史前水资源管理状况的系统研究。1994年“奋进号”航天飞机地球成像雷达拍摄下吴哥的照片，给摩尔的工作提供了更令人兴奋的前景。照片中显示出古代吴哥的踪迹，以及吴哥早期的水利系统。

推进了约400年。亦与公元前500年前后东南亚地区所发生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公元第一个千年中期，在卑谬等城市获得发展的民族，其祖先生活在1000年前诸如贝克塔诺这样的城市里。他们被称作彪关人。他们最有可能是从位于北方的中国西部迁移至此的。那时候，他们由于某种原因被迫离开家园。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他们向南迁移到云南境内，在那里，他们和生活在滇国的青铜工匠和铜鼓制作者密切接触。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他们迁移到今天的缅甸。他们和位于西方的印度边界中心城市、位于东北方的中国以及位于南方的沿海生活的民族都有联系。

有证据表明，贝克塔诺的彪关人和滇池以及东山地区的民族属同一时代。彪关人以农民为主。他们学会灌溉农田，以便在缅甸的干旱地区生存。根据东山铜鼓的黏土遗迹，彪关人和滇族人以及东山人存在某种联系。其鼓形、装饰和用途，与其他两种文化相似。这表明彪关人向外迁移期间，他们有过早期的接触。同时，他们之间也存在重要的差异。彪关人并不制作青铜器具。他们所制作的是精致的形状像鼓的赤土陶器。很明显，彪关人没有冶炼青铜所需要的矿产资源。青铜铜鼓沿海上通道向外流传，或许彪关人孤立于海上通道之外。

通过研究当代幸存的使用铜鼓的少数民族，如缅甸的克伦族和邻国老挝的兰姆特族，人类学家所收集到的证据表明，在古代东南亚社会里，铜鼓占有突出地位。兰姆特族有保存至今的警句：“没有铜鼓，难见其祖。”祖先的护佑对其自身的繁衍、田地的丰产以及牲



畜的兴旺起到关键作用。剑桥大学的研究员贾尼斯·斯塔加特研究发现，一个没有铜鼓的人就“偏离了生活的主流，在所有重要的方面，其身份和福气靠血缘关系来获取”。

斯塔加特称，在某种意义上，彪关人和滇国人以及东山人存在联系，他们属同一时代，“滇国和东山使彪关人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在滇国和东山，有着生动活泼的各种文化。铜鼓在信仰和种种仪式中居核心地位。信仰和种种仪式都关系着人类最根本的问题。包括和祖先的沟通，人的死亡与复活，植物和动物等等”。在越南、泰国、柬埔寨以及缅甸，考古遗址上发现的证据日渐增多，加强了革新观念论调的力度。革新者认为，东南亚地区生动活泼的文化，其进步不能完全归功于中国、印度或其他外来影响。恰恰相反，正如斯塔加特所说：“东山文化仅仅是最后和最辉煌的阶段，在此之前，其青铜冶金工艺技术已经长期发展。”

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东南亚地区依靠自身力量获得发展的数个文明，在自发的基础上，又取得新的进步。此种证据的存在亦否定了外来影响所发挥的作用。大约公元前500年以前，其定居规模基本相同，发展速度也较缓慢。已知的多数文化均熟悉青铜冶炼加工技术。然而，从单件金属制品的规模和精致程度看，其生产制作速度较低。不同社会之间由广阔的贸易网连接，如昭披耶河流域、红河和湄公河流域，以及越南沿海地区。通过贸易网，石器、贝壳和金属制品得以交换。

拥有此类珍贵物品，或许确定着地位的高下，并刺

一只古代巨瓮

GIANT URNS OF A VANISHED PEOPLE

在劳田高地上，几十只巨大的石瓮散落在这片土地上。长期以来西方人对这些古瓮的起源感到迷惑不解。当地人相信它们是由一个巨民族制造的，认为他们用这些古瓮来装粮食和酒。1931年，法国考古学家梅德森·科兰尼和她的妹妹来到这块被人们称作古瓮平原的土地上进行考察研究，并揭开了这个谜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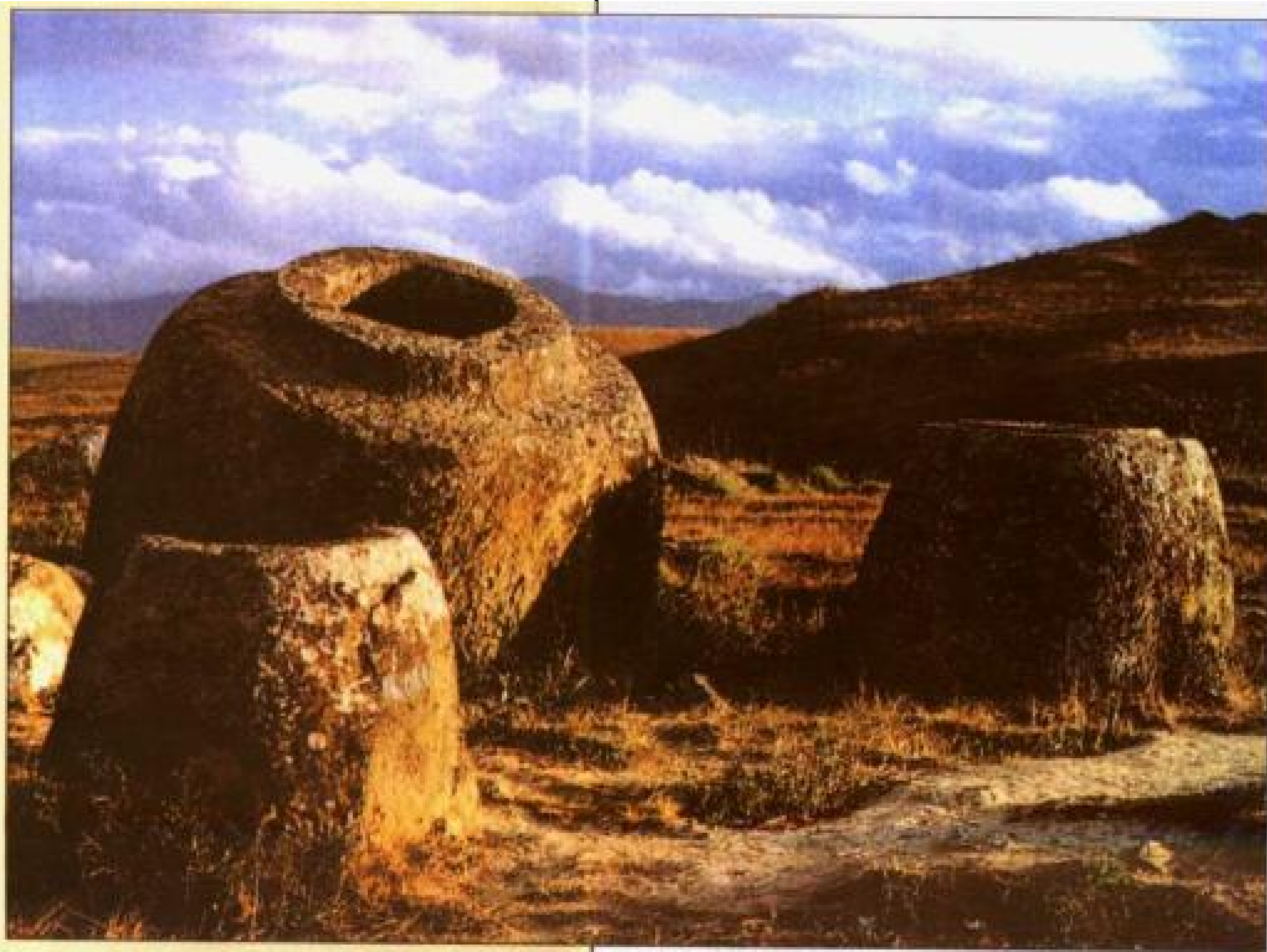
因为古瓮的数量很多，所以科兰尼决定从位于平原中部的一个小岩洞开始她的考察研究工作。幸运的是她开始考察的地方正好是一个火葬坑洞，里面有大量的灰烬和人类的骸骨。她认为这些石瓮很可能是一些随葬的瓮棺，里面和外面都可以放置随葬品，如玻璃和玛瑙珠子、珍珠贝、青铜制铃铛和手镯、铁刀、矛头和弓箭等。

经过放射性碳进行年代测定，这个遗址的时间为公元前300年—公元300年之间。这暗示出古瓮和东山人属于同一时代。古瓮的所有者可能享有突出的优势。他们也许控制着这个地区盐的生产并在广阔的地区从事盐业贸易，他们的贸易通道通向中国、泰国以及越南

等地。他们依靠这种贸易兴旺发达起来。

1931年以后，古瓮的数量由科兰尼统计的250口减少到200口。当法国和美国在东南亚作战期间，这个平原遭到轰炸，然而只有一口古瓮被炸毁。其他古瓮落入不讲规矩的古董商手中。对于希望重返这里的考古学家而言，最大的困扰是老挝的掠夺者拥有强大的实力和组织。许多考古学家相信，只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到保护中来，才有可能防止古瓮平原遭到更多的破坏。

■ 在古瓮平原上发现一口巨大的圆形石瓮及另外较小的两口。古瓮由当地松软的石头雕刻而成。最大的一只石瓮重约15吨，高8英尺，直径达10英尺。最初的古瓮可能安装着木制盖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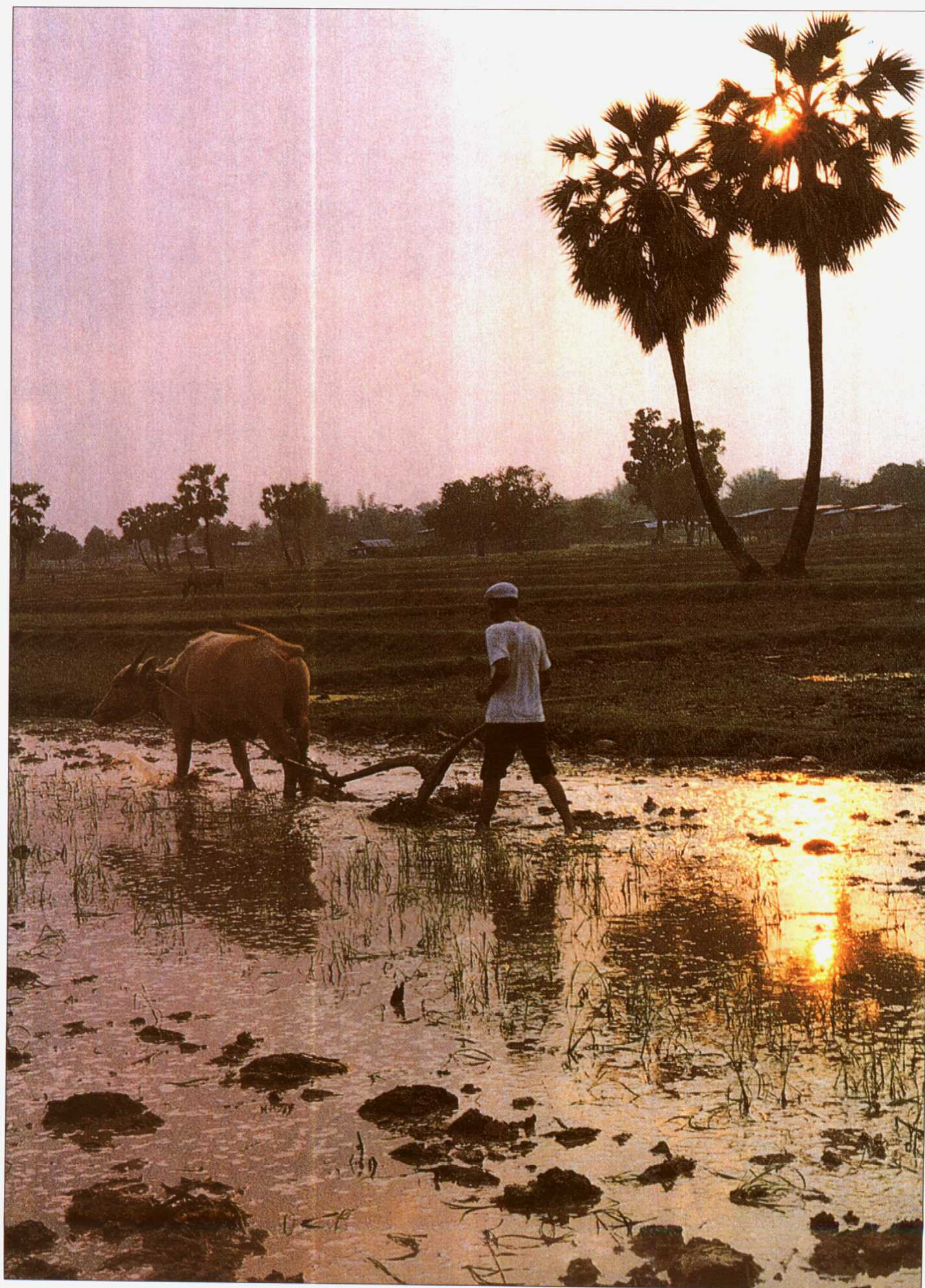
激占有欲望。随着各种物品需求的增加，竞争自然也在增加。有些村落发现自身存在某种优势：也许比相邻村庄有更肥沃的土壤，故而能够生产出过剩的粮食，并利用过剩的粮食进行贸易；也许控制着山口、河流交汇处或特殊原材料资源和贸易商品。

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以前，稻米是主要的粮食。水稻生产需要发现并占有湿地。稻田需要在干季加以整理，树丛要砍倒，杂草要用锄头铲除，并将稻草烧掉。这样，在雨季水稻就能生长茂盛。这种生产制度受到耕地数量的限制，可找到的适种水稻的土地有限，水稻栽培亦依靠人工劳动。

然而，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情况得到大大改善。役畜开始用于湿水稻种植。水牛用来拉犁耕作，不仅增加了单个劳动力所能耕种的稻田面积，同时还提高了水稻产量，因为通过犁耕，土壤的透气性好了，而且被耕翻在下面的植物使土壤增加了有机肥料。更重要的是，通过使用耕犁，农民有能力修建小型的堤坝，

使水源得以保留在过于干燥的土地上，有利于水稻的生长。

在使用水牛耕地以后，可以获得更大的丰收，丰收的粮食可以维持增加的人口，或者可以改变人口的集中状况。农业的发展给社区带来了贸易方式的变化、社



会地位的变化以及经济专业化的变化。于是,较富裕和强大的社区给邻近较落后的偏僻而分散的社区带来影响。人口密度的增加鼓励人们在节日和种种仪式上,更多地显示出社会等级的不同,工艺品的需求也随之而增加,就像东山铜鼓在集体意识形态领域的活动中所具有的作用一样。尽管考古学上尚无证据证明,在制作大型青铜铜鼓的地方,其生产组织发生某种变化,但是似乎仍可看出,在越南北部地区,青铜工匠的经济地位已经发生变化,他们从小规模的个体制作演变成为大规模的生产制作。青铜工匠或许得到社会上层人物的赞助。

由这种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而且在逐渐扩大。社会组织因此而发生变革。聚落的规模在扩大,政权也日渐集中化,或许当地的酋长掌握了聚落的统治权。这种聚落代替了自治性质的聚落,社会存在的基础已不同从前。技术也因此而发生变革。工匠开始铸造铁器。商业变革也是如此。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的随葬品中,始见来自印度和中国贸易而来的商品。这种发展给东南亚大陆和附近岛屿的居民带来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岛屿居民开始四处寻找资源以及新土地。世界各地都因此发生了空前的变革。

东南亚地区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繁荣,其诸多证据中,非考古发现,亦缺乏传统意义的,也有许多。其中,植物学家通过对栽培植物的起源研究,做出重大贡献。他们发现,东南亚地区是多种作物的发源地。而语言学家则对东南亚地区的最早民族亦有崭新的发现。

文字的发明、改革和保留,通过间接而生动的形

■ 在东南亚的泰国,农民使用水牛耕种村边的稻田,就像他们的祖先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里劳动的方式一样,那时候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水牛进行水稻耕种。这种变化使粮食生产出现剩余,进而使人口大量增加。



式，提供了人们的生活和历史的证据。对东南亚民族所使用的文字进行分析，起初是不知所云的，因为其所使用的语言达1000余种，各自不同，互不相通。通过对文字用法和结构的分析，语言学家发现，不同语言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可按相同语族加以分类。他们可能有相同的祖先。世界上有近50%的人口所操语言属印欧语系，其中包括印度。此种语言起源于俄罗斯中西部，由一种典型语言发展而成。印度对东南亚历史中的建筑、文学和宗教具有深刻影响，但除此之外，东南亚地区的语言却不属印欧语系。

东南亚地区的语言主要可分为四个语族。一是汉藏语族，包括普通的缅甸方言。二是泰语和老挝语语族，主要见于泰国和老挝的昭披耶河流域以及湄公河盆地一带。东南亚大陆的第三个语族是南亚语族，包括越南语和高棉语，现多见于柬埔寨境内，在其邻国泰国和越南也有，但较少见。农诺塔和班奇昂的史前居民，

■ 这是一把青铜浇铸成的仪仗斧头，上有螺旋、卷带、同心圆环以及其他艺术造型，和东山所发现的文物造型有相似之处，1875年出土于印度尼西亚的罗提岛，与它同时出土的还有其他两件文物。这把青铜斧长约30多英寸，可能在公元第一个千年期间由当地的金属工匠制造，其祖先在和东山民族保持接触的过程中受到东山文化的影响。

其语言可能是这种语言的古代形式。第四个语族是南岛语族，这种语言在很多方面都比较突出，它所包含的语支数量和传播范围都是最突出的。

南岛语族传播的范围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从马达加斯加岛到复活节岛之间的地区都属南岛语族范围，其中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三国的国语以及这三个国家的方言和数百种少数民族语言，南太平洋岛屿居民的语言也属于南岛语族。南岛语族包括近1000种语言，比其他任何语族包含的语言都多。所有语言都由同一种语言发展而成，即第一南岛语言。语言学家相信，中国的台湾使用这种语言。公元前4000年之后，第一南岛语言开始向南传播，到达菲律宾和婆罗洲(加里曼丹岛)，再向西传播，到达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最后向东传播，到达太平洋诸岛，向西传播到达马达加斯加岛。

语言学家已经证实，南岛语族的词汇中包含着其使用者的信息，其词汇中含有工具的名称，如短桨、船帆以及带有舷外支架的船舶。这项证据表明，当时已拥有航海独木舟，用于航海旅行。其词汇中还含有水稻以及多种粟类，表明当时已存在种植谷物的农民。确实如此。最近，有人宣称，只有当农民拥有过剩的粮食和较高的人口密度时，才有可能大规模移居和开拓殖民地。据有些语言学家，如夏威夷大学的罗伯特·布卢斯特称，在古代，台湾人所居住的房屋，以夯桩为基础，自己织布，熟悉冶金加工技术，使用弓箭打猎，驯养水牛、猪和狗。

语言学家在诸多证据背后，推断出看似寻常的一个道理，即所谓的文化遗失现象。虽然看似寻常，但是这个道理却能帮助考古学家解释发掘过程中所遇到的非正常情况。当第一南岛语言使用者向海上移居并在海岛定居时，经历数世纪后，其语言表明，人们又忘记了前几代人已经掌握的本领。也许因为这种本领不再有什么用处，一些群落丢掉了水稻农业，没有了宽敞的房屋，忘记



了纺织技术。一些群落最后连驯养的牲畜、冶金加工技术或陶器制作技术也消失了。

所以，仅调查最近一段史前史的研究人员，未发现什么特别先进的文化技术，便错误地以为其调查根本是白费劲。直到语言学家发现太平洋诸岛居民的文化遗失现象，加上夏威夷大学人类学家本·芬尼证实古代人可以使用航海独木舟完成航海旅行，考古学家才能完整地解释，到底南太平洋诸岛是由哪个民族定居的，而且是怎样定居的。

■ 这是公元8世纪时由信仰佛教的爪哇人建造的婆罗屠浮神庙的一部分。使用火山岩雕刻而成的组画描绘了一艘正在海上航行的船舶以及船上的乘客，他们正受到陆地上的人们的欢迎。陆地上的人们可能居住在背景图画所描绘的房屋中，房屋被建在桩柱上面。远涉重洋的东南亚航海者建立了通往远方的贸易路线，他们可能到达印度、亚洲、太平洋以及非洲东海岸，所乘的船舶就是这样，带有舷外支架和许多面船帆。





现在已经得到普遍承认的是，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东南沿海的航海者是促成移居的最重要的力量。公元前1世纪时，他们到达非洲东海岸。最终，他们建立了通往印度、红海和南太平洋诸岛的贸易通道，并逐渐在这些地区定居以及开拓殖民地。

芬尼指出：“南岛语族的人口广泛分布于东南亚沿海和海岛，以及马达加斯加岛之间的地区，几乎遍布整个太平洋，这使南岛语族成为世界上分布最广泛的语言之一。此后，西欧人才发展了自己的航海技术，才把

印欧语言带到世界各地。”这的确是一次了不起的移居行动，其跨越的海区相当于欧洲和亚洲的面积之和。

有学者曾尝试把东南亚历史的诸多片断拼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并提出了更大胆的猜测。塔夫茨大学的林达·谢弗提出，使用双体独木舟航海的民族在波利尼西亚群岛定居，成为类“西方化”进程的代理人。所谓西方化，指西欧将其文化和技术上的进步向外传播。然而谢弗发现，有诸多证据表明，在最近的西方化进程之前，还存在一次文化进步的过程，她称之为“南方化”，意思是东南亚地区将自身取得的文化和技术进步向外传播，包括印度次大陆和广大的东南亚地区。他们将冶金、医药、农业、纺织和贸易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向外传播，其目标不仅包括中国和非洲，还包括中东以及世界其他地区。

换句话说，从公元1年到1500年，东南亚地区是全球的经济中心，也是世界上最活跃的意识形态中心和宗教中心。直到欧洲社会通过技术创新和经济变革，能够控制以南方为基础的香料贸易时，全球经济中心才由亚洲南部海域转移到北大西洋地区。

谢弗的“南方化”说法能否获得广泛认同，姑且不论。然而，有一点却毋庸置疑，那就是公元1世纪时，东南亚民族通过自身努力，取得了相当高水平的文化和技术成就。东南亚民族已经有了再次革新的准备，然而这一次的革新，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其革新范围更加广大，他们正努力成为其中的一员。



揭开吴哥的历史面纱

LIFTING ANGKOR'S VEIL

对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来说，东南亚的那些被丛林覆盖的已经废弃的古城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亨利·莫霍特是法国的一位年轻的博物学者，他被这里的古老城市深深地吸引着。1858年，他甘愿拿自己的健康和家庭幸福作为资本，并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赞助下，开始了他的探险历程。他受到柬埔寨国王的热情款待，还会见了法国的传教士团体成员。有一位传教士带他来到著名的吴哥古建筑群。这里就是建有围墙的吴哥古城。

颇具异国情调的吴哥古建筑被藤蔓植物和树根缠裹着。在莫霍特到来之前，中国的外交官、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游客以及法国的传教士都对吴哥古建筑做过描述。然而他们的记述对西方人并没有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大概是因为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将神秘而壮观的吴哥形诸笔端。而莫霍特将他所观察到的都用素描的方法描绘下来，人们才得以重新目睹吴哥的壮美景象。

35岁的莫霍特又勇敢地前往老挝进行探险活动。他在老挝感染上严重的发烧并于1861年去世。他的游记被寄回给他的妻子，游记里面充满了生动而形象的描述和插图。他的妻子于1863年将他的游记发表，法国的印刷商将他的素描制成雕版一同出版。尽管他在记述中并没有称自己是吴哥的“发现者”，但是出版界和热情的公众却认为这个荣誉非他莫属。

在莫霍特以及后来的艺术家们的鼓舞下，游客们纷纷来到柬

埔寨参观游览这些古老的神庙建筑。这幅照片(下图)是19世纪90年代由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拍摄的，其中有一位不知名的法国游客以及他们的向导，在吴哥，像他们所留影的这种小型神庙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照片同样激发了殖民者已经高涨的情绪。古代的高棉帝国国王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神庙建筑群，为的是取得上帝的喜悦并使他们自己获得荣耀。不久之后，这些控制着柬埔寨的西方殖民者开始对它们进行重新修建，以宣称他们对这块被称作印度支那的土地拥有合法统治地位。



东方的 “所罗门神庙”

RIVAL TO SOLOMON'S TEMPLE

■ 这是根据莫霍特去世前不久寄给他的家人的水彩画而制作的雕版画。图中莫霍特(图左)正在丛林里作画，他身边有几头大象。莫霍特在报告中写道，在去往吴哥的途中，他遇到一群大象。领头的是“一头雄象”，象群发出“震天的”吼叫声，欢迎莫霍特的到来。但是，随着一声枪响，“象群惊得鸦雀无声”，然后便退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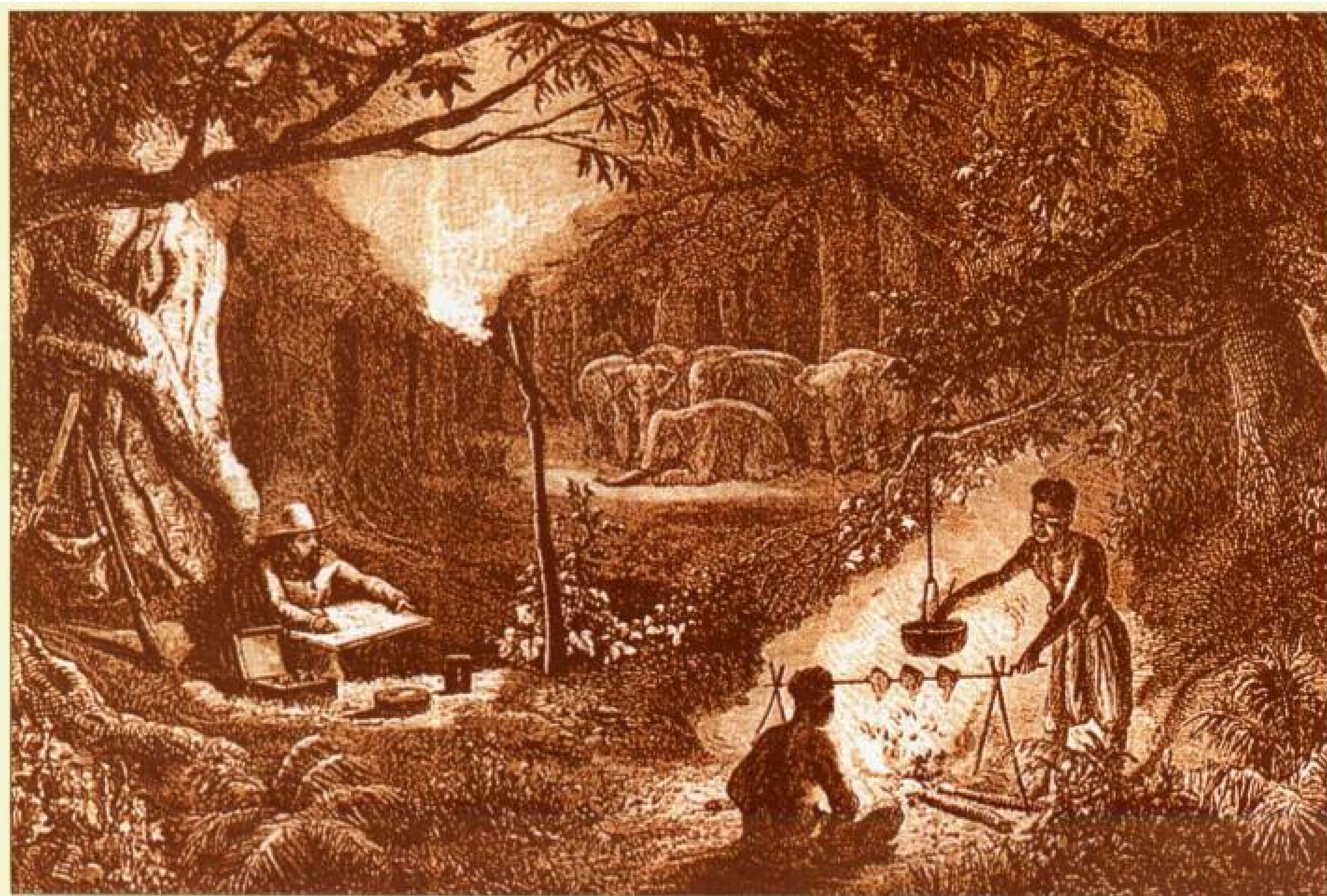
莫霍特是位博物学家，然而他的兴趣很快就从有生命的事物转移到了雄伟的吴哥古建筑。尤其是保存完好的吴哥寺，他称之为东方的“所罗门神庙”。他甚至想到吴哥寺是由古代的一位“米开朗基罗”所建。在莫霍特的眼里，吴哥比“希腊或罗马留给我们的任何建筑都更加雄伟壮观”。

吴哥古建筑以丛林为背景。莫霍特面对如此雄伟的古建筑结构，感慨地说“旅途的疲劳一扫而光”，心里充满的只是“崇敬和喜悦”。他记录下那些被当地的柬埔寨人称为“巨人”所建造的神殿和寺庙群落。欧洲人要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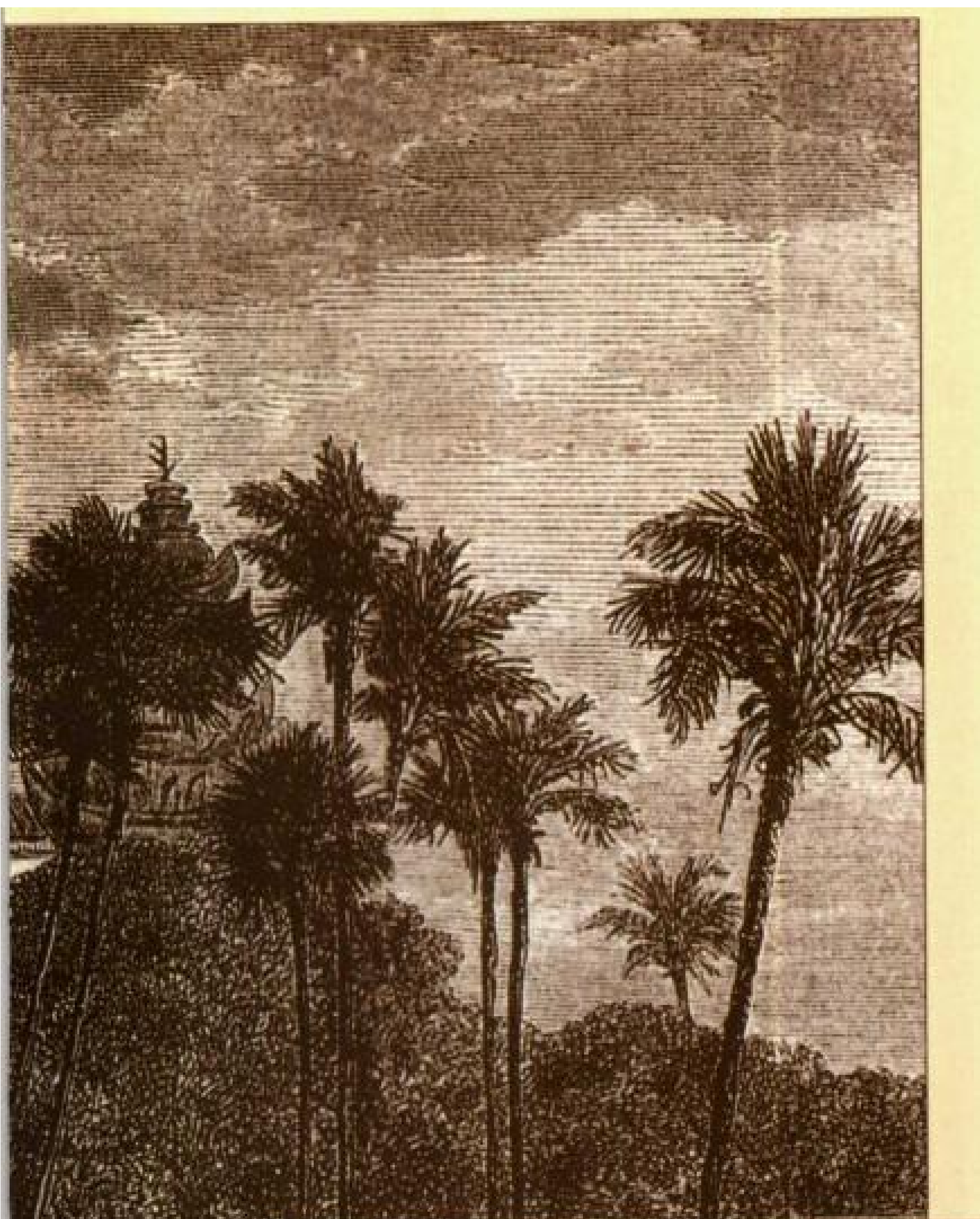
吴哥设想一位他们认为合适的创建者，他们将这建筑史上的杰出作品归在罗马人的名下，他们认为这是亚历山大大帝所为，或者是中国的犹太人所为。他们忽略了一个史实，即完成这项任务的正是12世纪期间的柬埔寨国王。

一路的艰辛和繁重的研究终于使莫霍特倒下了。当皇家地理学会于1862年宣读他撰写的论文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一年了。在他的论文中，饱含着他的研究考察成果。

“染疾在身。发高烧。”他在日记中写道。十天之后，他写下最后一则日记：“求您怜悯我吧，哦，我的上帝……”







■ 这是从吴哥寺的中门所延伸出来的一条画廊(下图)。莫霍特在这里描绘了一个苍鹭巢。到达这个主要入口(左图)需要经过跨越寺外壕沟的一条甬道。甬道长 1000 多英尺, 宽 30 英尺。其栏杆建在石柱上(左图左下), 并雕刻成毒蛇的样子。此毒蛇是神话中一种动物造型。



被丛林包围的 皇家古建筑

A MUCH-COVETED ROYAL BEAUTY

864年，当柬埔寨成为法国的保护地以后不久，六名法国探险家被派遣来调查湄公河的适航情况。刘易斯·德拉波蒂便是其中一位。他是一名海军军官，善于绘图。在这次任务中，他的另一个目标是为法国获取有关高棉古国的艺术品。

德拉波蒂曾两次到过柬埔寨，在1873年，他将70多件雕塑和建筑残片带回到法国。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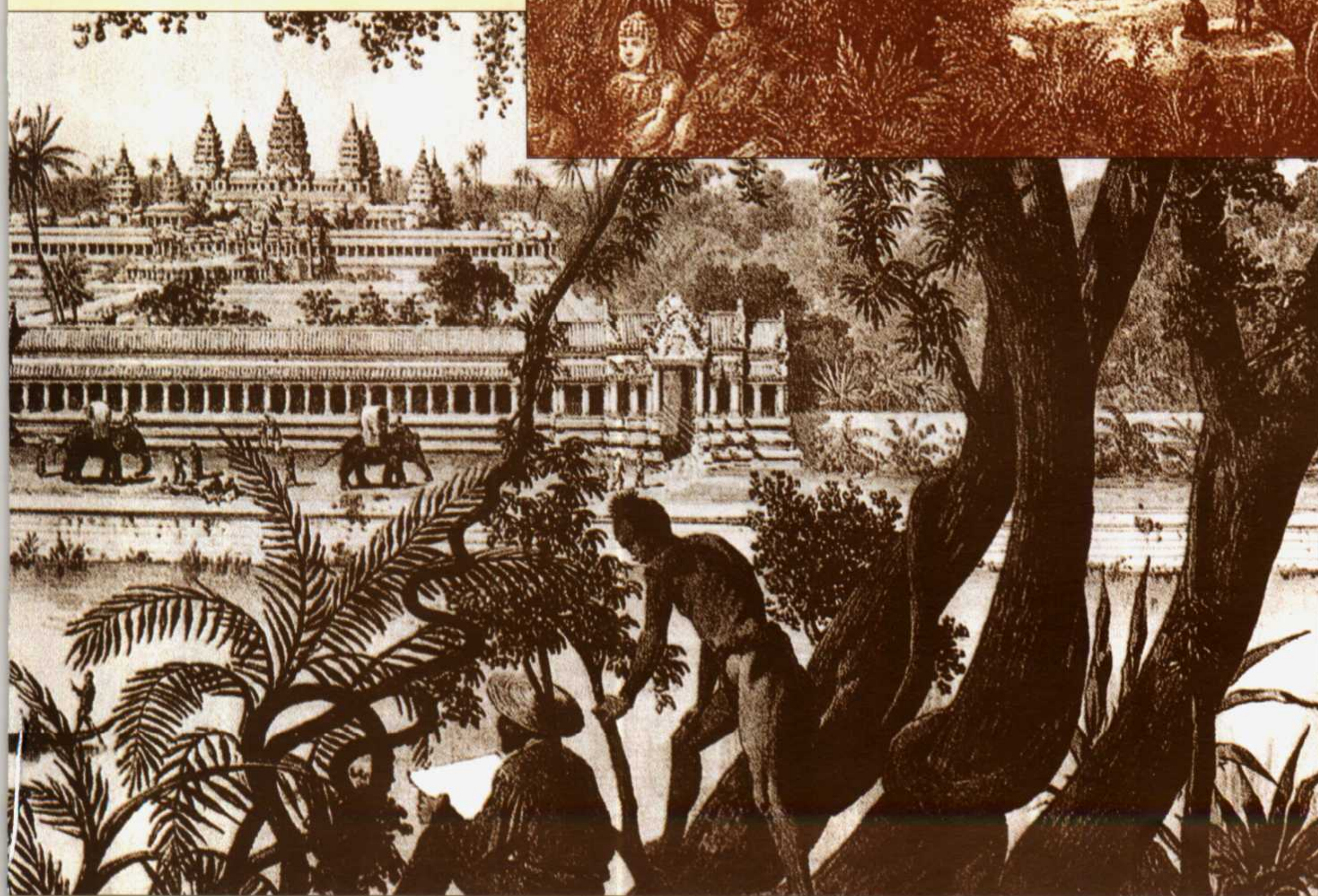
来，这些艺术品成为由他控制的新建印度支那博物馆的重要收藏品。他还带回去大量吴哥古建筑的拓片，用这些拓片可以再现高棉的建筑风格，而不必重建任何实际的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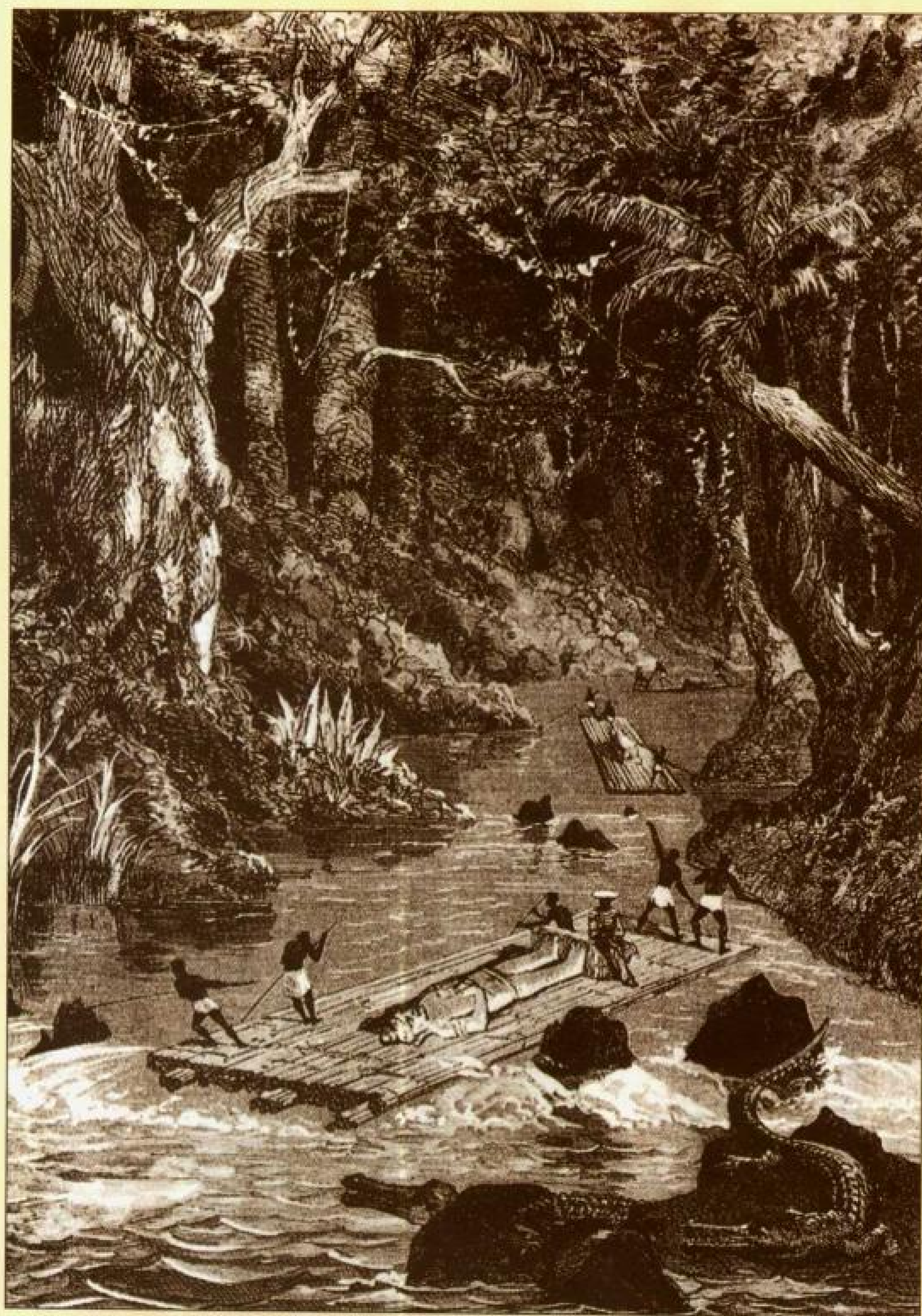
■ 这是耶跋摩七世国王的多面像。他是公元13世纪时吴哥大部分建筑的建造者。他按菩萨或“觉者”的形象为自己造像，欢迎从吴哥皇城南门前来的参观者（右图）。人们骑着大象在甬道上往来的景象以及吴哥寺西面的地形完全展现在这幅图画中（下图）。德拉波蒂将自己画在图中。



78







■ 高棉另一个宗教中心波列甘神庙距吴哥以东约60英里，从这里发现的大量雕刻通过水道(上图)被运往法国。人们相信几个世纪以前建造吴哥所使用的就是这样的筏子。他们从位于东北方向25英里外的采石场将数百万块砂石运到吴哥。法国人从波列甘神庙运走的许多雕像在运输途中因筏子发生翻覆而丢失。

FINDING THE
HIDDEN MEAN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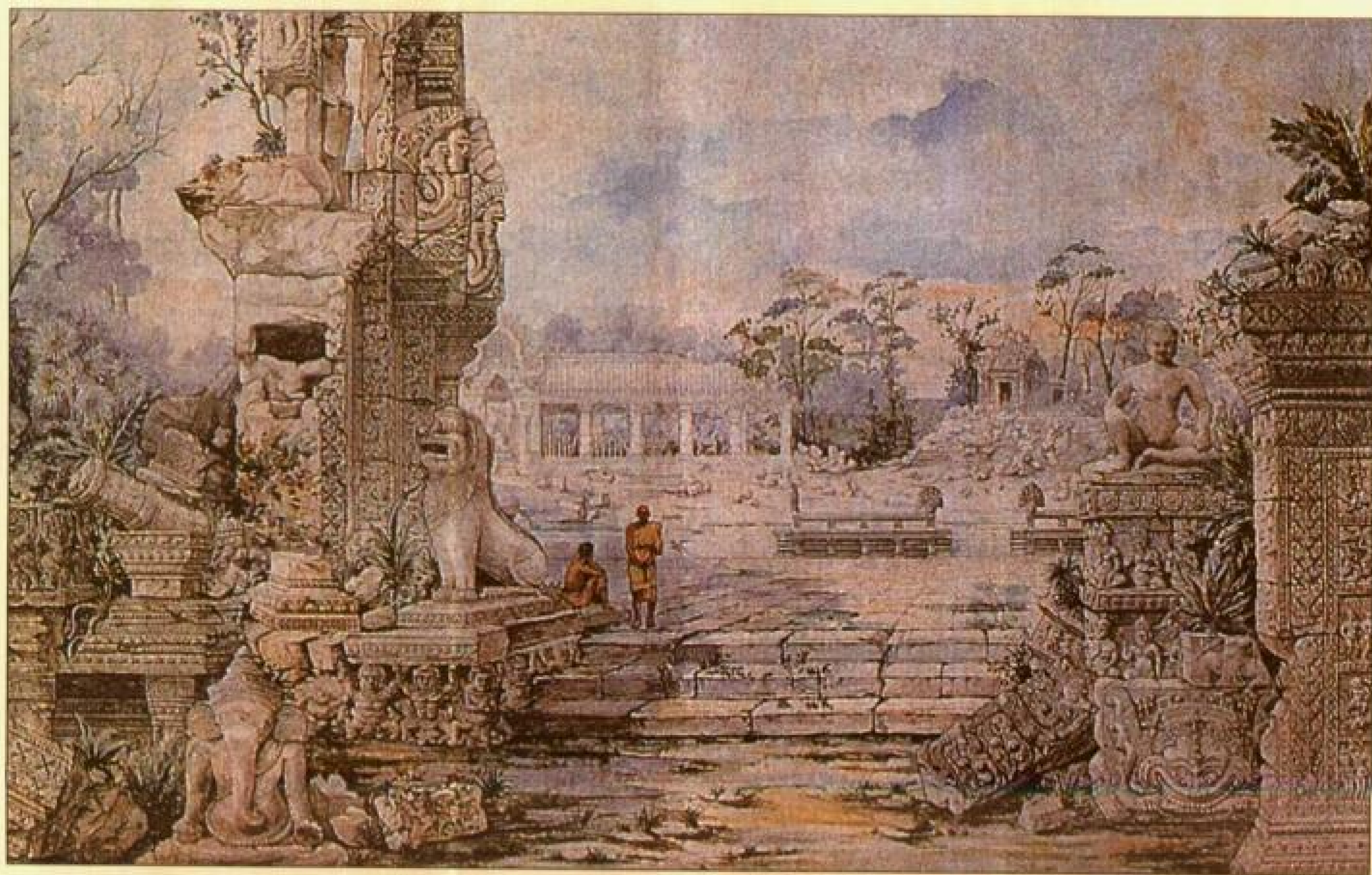
前来瞻仰高棉神庙古建筑的欧洲人，在刚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为高棉不同寻常的古建筑感到迷惑不解。然而在不久以后，随着学者和建筑家们的不断研究，其中包括绘制这些彩图的卢塞恩·方纳罗，他们做出结论，认为高棉古建筑中的护城河、台形地基以及许多佛塔分别代表着印度教宇宙观中的大陆、高山和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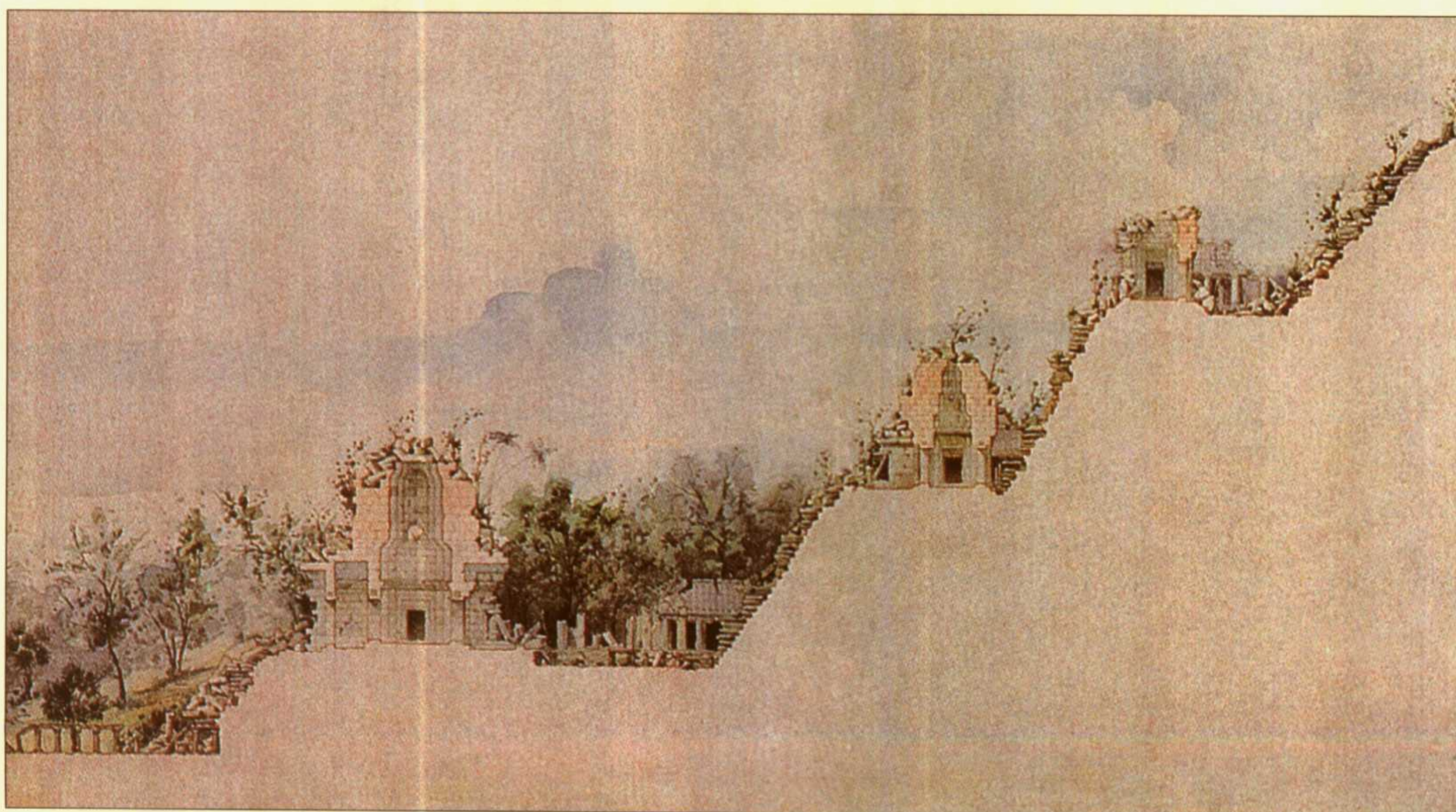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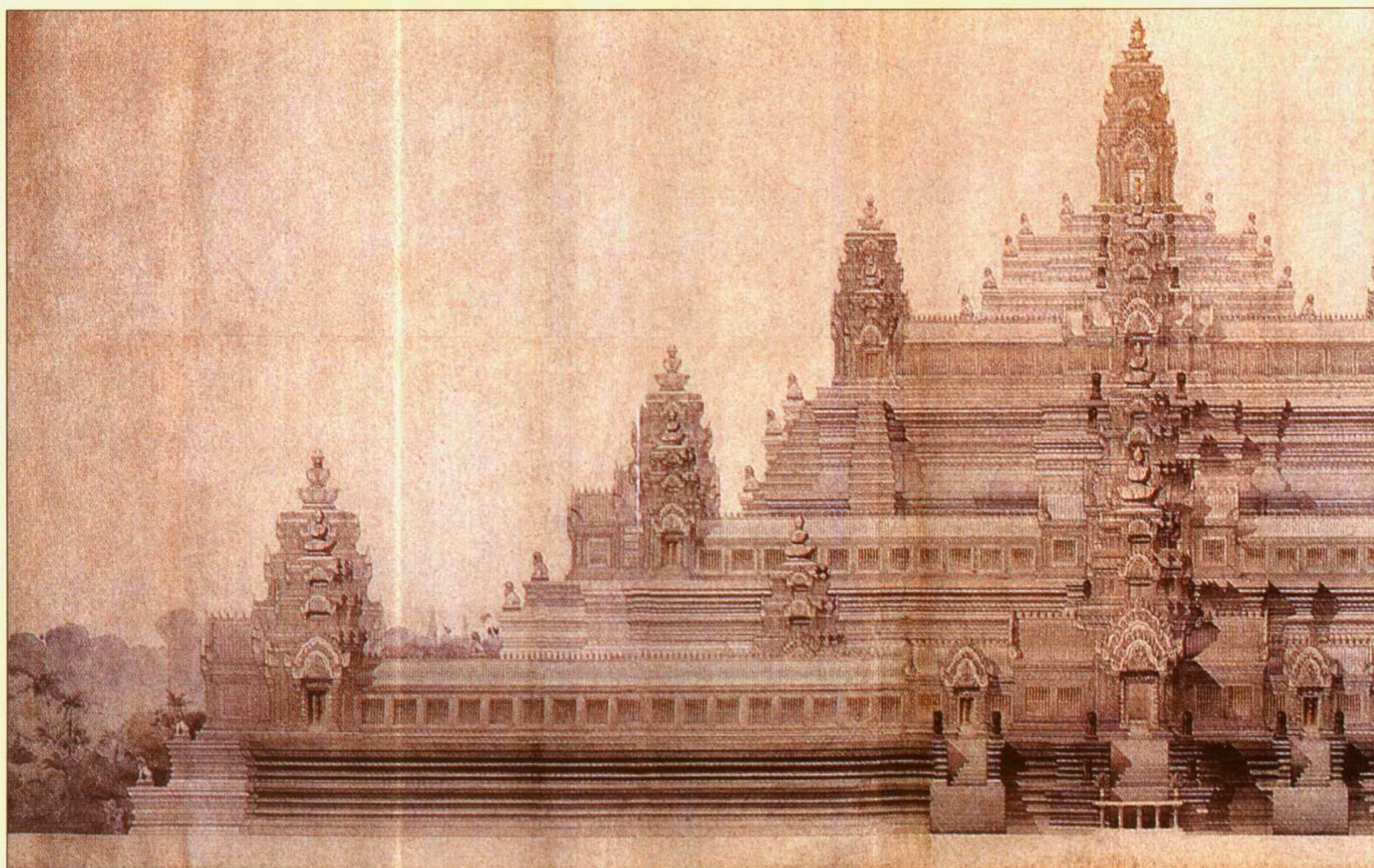
19世纪60年代，方纳罗在南美洲的圭亚纳从事探险活动。由于受到德拉波蒂的启发，他于1887年来到吴哥。他在这里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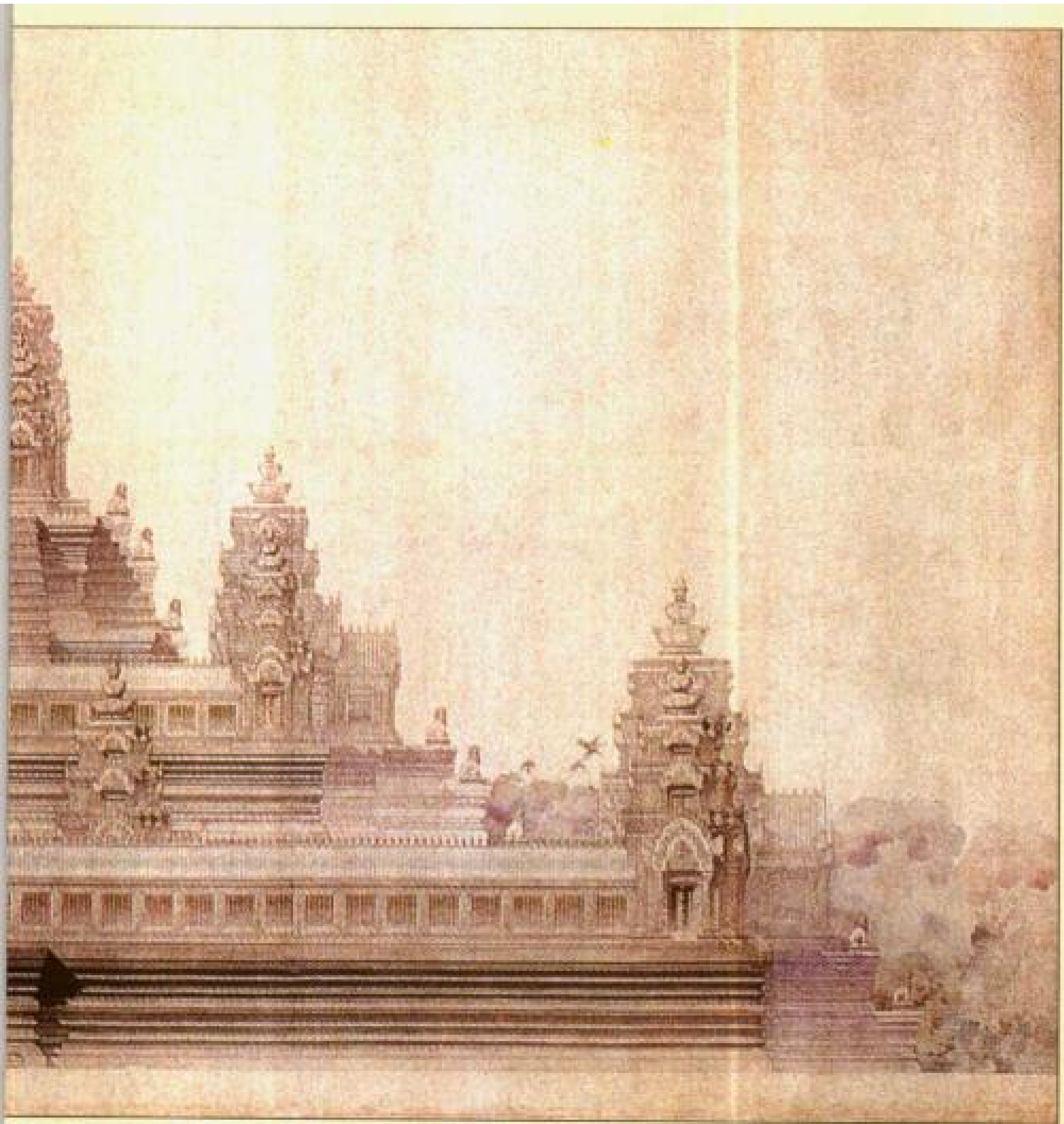
描绘和拍照，并制作了500多件神庙建筑拓片。他和他的前人一样，在水墨和水彩绘画中显示着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同时，他还绘制出建筑的设计方案、截面和地形地势图。在后来的70多年里，从其研究的范围和绘图的精确角度来看，无人可以超越。

当方纳罗回到巴黎的时候，他在法国重要的年度性展览沙龙中展示了他绘制的图画。方纳罗的作品对人们理解高棉民族的创作天才起到推动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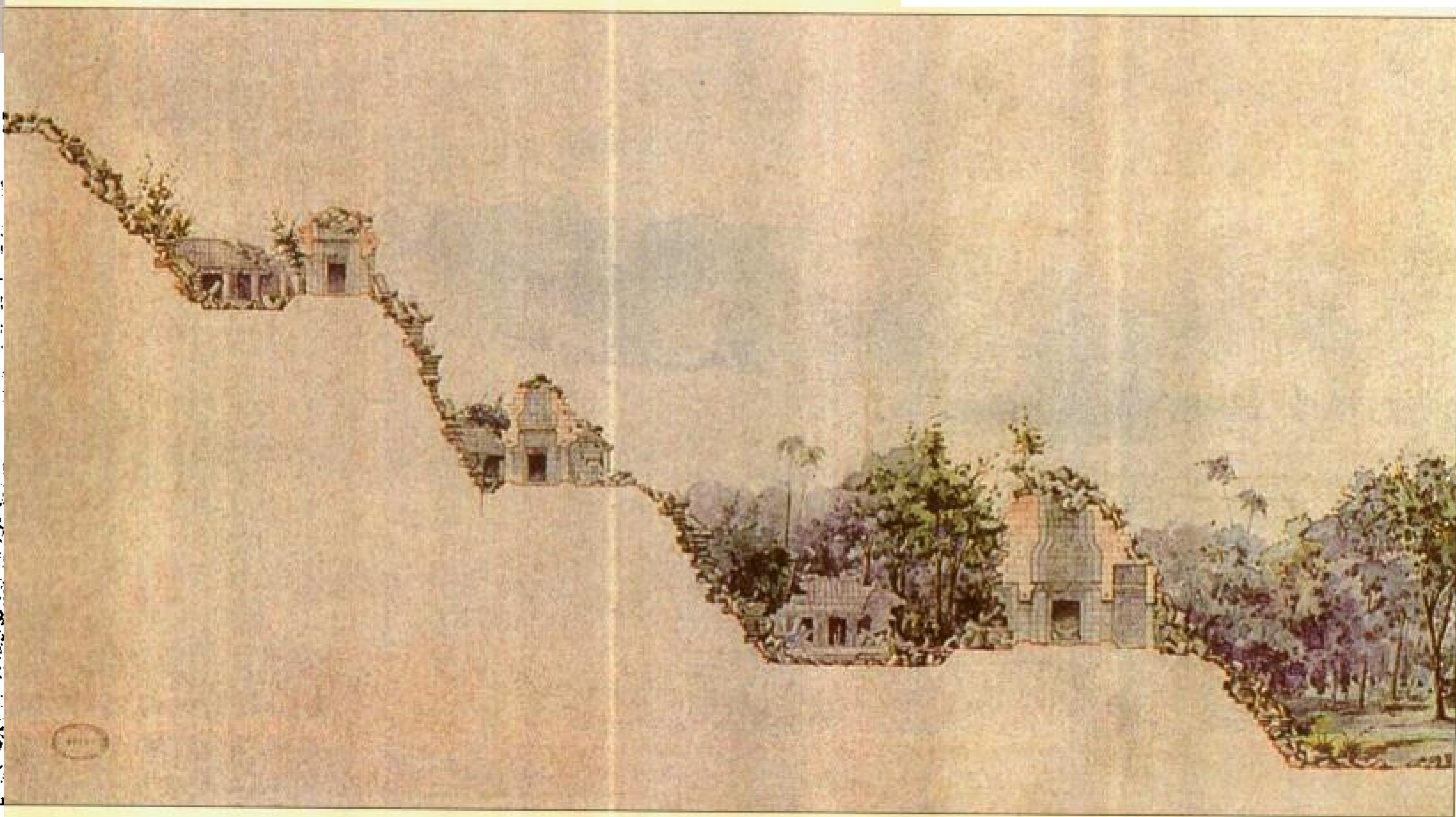
■ 两位僧人在所谓的“患麻风病的国王”雕像(图右男性裸体雕像)近旁沉思。曾有人认为该雕像为耶跋摩七世的造像(根据高棉的传说，因一位敬拜者在冲动之中的亲吻，使这位国王患上麻风病)。现在，人们认为这是一位神明的雕像。







■ 这两幅彩图由方纳罗绘制，为公元 11 世纪时的吴哥古城贝弗昂神庙。彩图显示出完整的古建筑外貌和东西走向逐渐升高的地势。如图所示，简单而对称结构的复原图反映出神庙所代表的高山形象。贝弗昂神庙和这里的其他神庙一样，被建造在升起的土堆顶端。松软的土层使这座吴哥最雄伟的古建筑有坍塌的危险。



历史在照片中定格

DREAMS CAPTURED ON FILM

在摄影家和殖民者莱昂·伯西于1921年到达吴哥进行拍摄的时候，古建筑群的清理和保护工作早在1907年就已经开始了。他接受法国的一位银行家和慈善家阿尔伯特·卡恩的派遣，到这里进行奥托克罗姆彩拍，这是一种早期的彩色照片拍摄方法。阿尔伯特的工作是被称作“地球档案”计划的一部分。这是一项全球范围的大计划。他所拍摄的照片饱含着诗情画意，现在人们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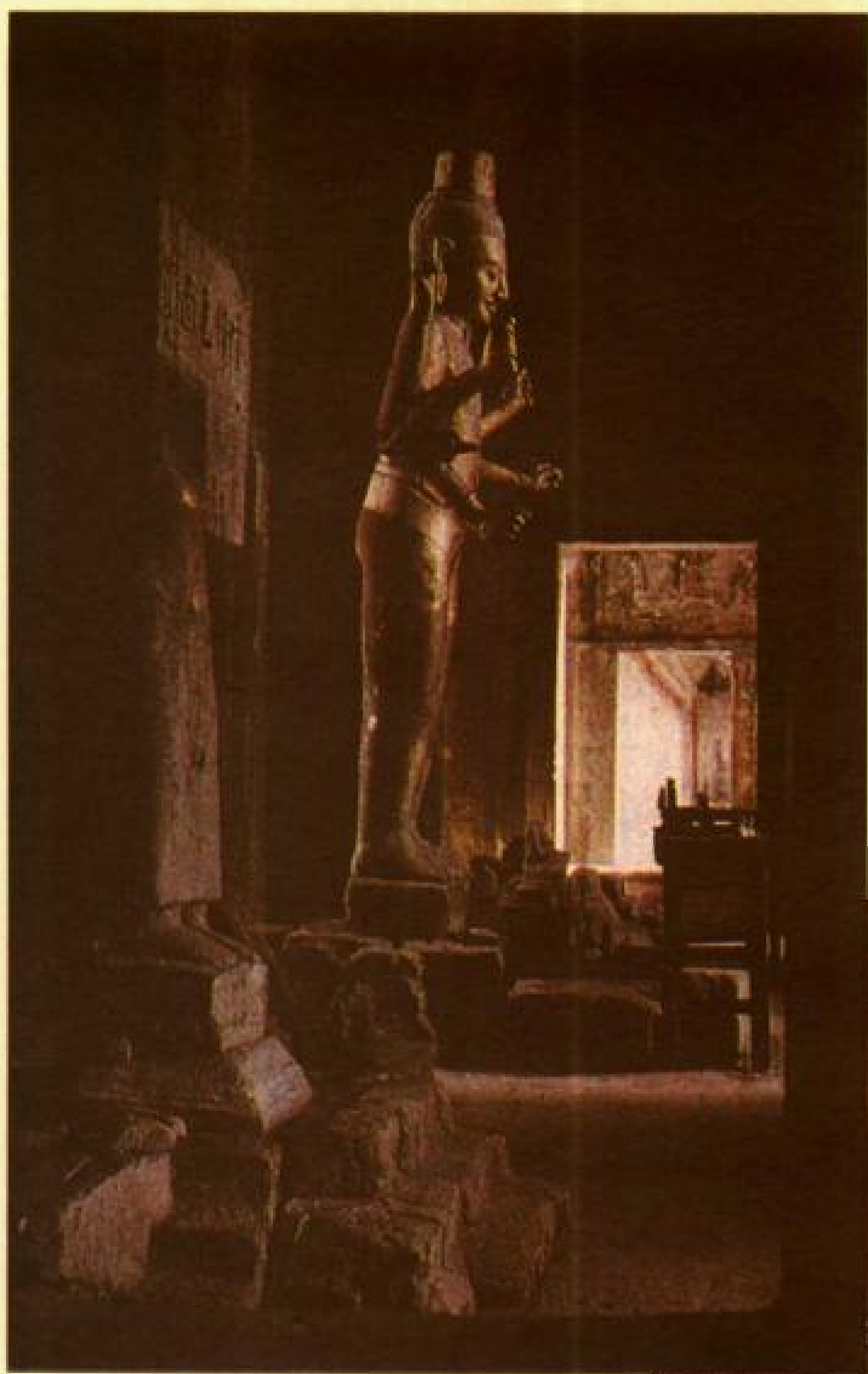
然在不断地参考引用。

从莫霍特到达这里至今，吴哥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现在的游客们可以在平房中享用食宿。人们仍然喜欢由莫霍特所绘制的被丛林覆盖的古建筑面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反对把周围的植物铲除。为安慰这些持相反意见的人，法国方面对一些建筑结构进行了保留，并把它们定为“保护区”。在经历数十年的战火以后，到公元20世纪末，丛林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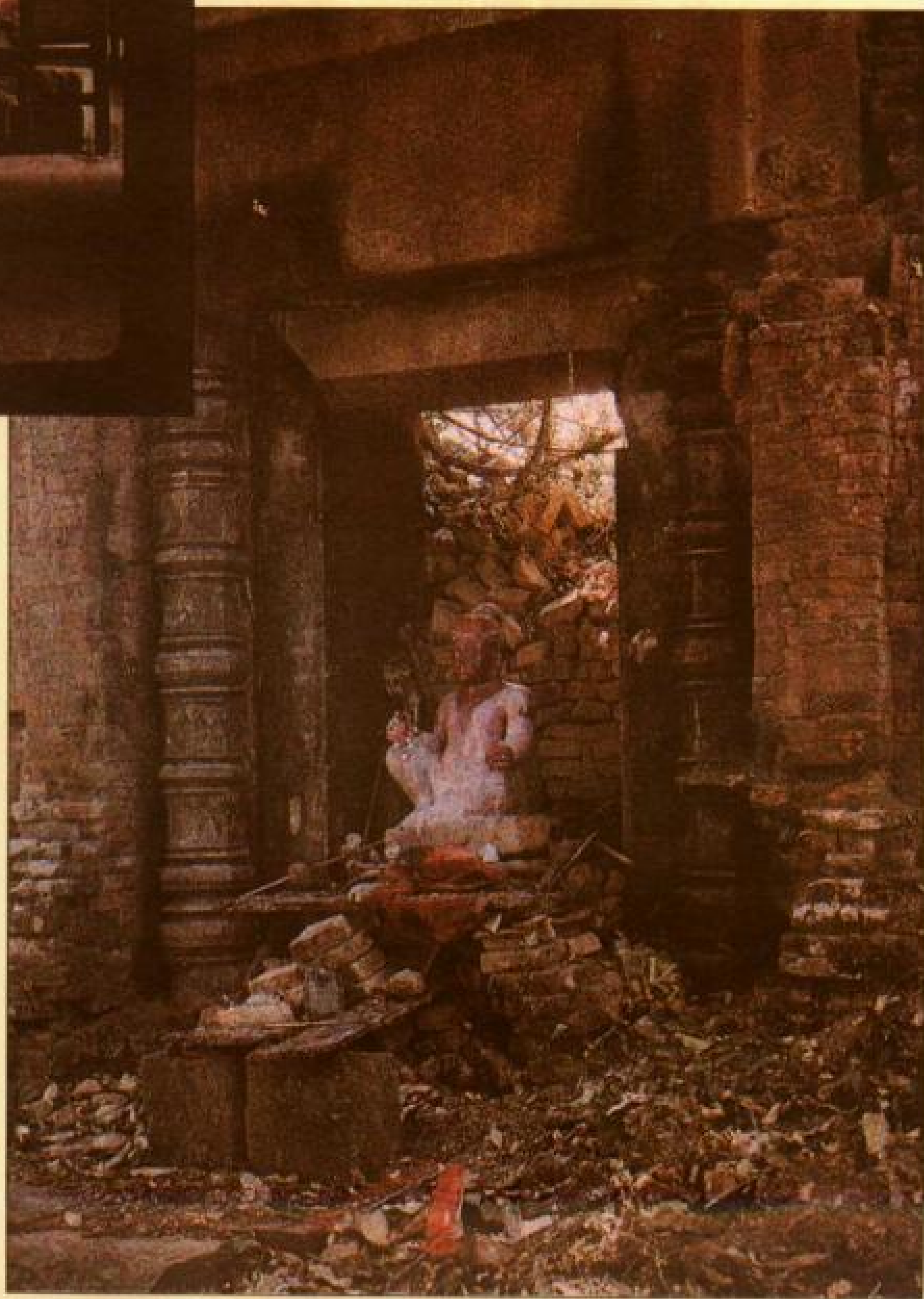
新将神庙古建筑包围起来，使吴哥重新回到莫霍特最初发现它们时的模样。

■ 吴哥古都王宫前面12座石塔中的两座，这些石塔被称作“舞绳者之塔”，清澈的水池倒映着石塔的影子。根据公元13世纪中国的一位游客记载，石塔是当时用酷刑进行审判的法庭。如果疑犯能够呆在石塔中而不生病，那么他将被判为无罪。





■八手毗瑟雕像，属印度教众神之一，现在仍然受到人们的敬拜。高10余英尺，位于吴哥寺西门的画廊里。毗瑟被吸收进入高棉的传统文化，并成为当地的一位神灵，人们称之为尼塔莫阿里奇。



■ 贡献给神灵的祭品用众神所喜悦的红色织布包裹，表明人们仍然在敬拜这尊神像。祭品放在雕像前面（如右图）。雕像位于吴哥最早建造的巴克恒神庙砖塔废墟当中。伯西拍摄的彩色照片是吴哥的第一张彩色照片，所花的时间比拍摄黑白照片要多30倍。



王宫和神庙古建筑

ARCHITECTURE
IN SERVICE OF KINGS
AND GODS

泰国曼谷到邻国柬埔寨中部平原，有将近200英里的路程，骑着大象走过，这可是遥远而漫长的一段道路。然而，对安娜·哈丽雅特·利奥诺文斯和她的同伴来说，浪漫的异国风情使一路的艰辛和劳苦显得不算什么。安娜·哈丽雅特·利奥诺文斯是英国的一位女家庭教师。旅行当年是1865年。“早晨，彩虹般的雾气在平原上低徊，”利奥诺文斯回忆时写道，“微风中沁透着香气和歌声，雾气尚未散去。高高的树梢随着微风轻轻摆动。我们骑着大象前进，色彩缤纷的野花像地上铺的毯子。大象迈着四方步子，沉沉的样子，却没有发出嘈杂的声音。”

安娜·利奥诺文斯是一个著名人物，就像描写的一样，她满怀热情。像她这个年纪的妇女，通常都在做家务，她却像一位不同凡响的探险家，津津有味地从事着她的探险事业，这可不是妇女的传统职业。利奥诺文斯的丈夫是一名陆军少校军官，在英国派驻亚洲的军队服役，于1858年去世。丈夫去世的时候，她年仅24岁。她决定继续留在新加坡。4年后，应暹罗国国王蒙库特

■ 班迭斯雷神庙建筑群上的浮雕，神话传说中两只猴王在凶狠搏斗。该神庙位于吴哥以北10英里处。是公元10世纪的建筑杰作。浮雕内容源自印度婆罗门僧侣和商人所讲述的印度教传说。

■ 太阳升起来，使清晨的迷雾逐渐散去，露出吴哥寺的佛塔的轮廓以及巨大的毒蛇石雕。多头毒蛇出自印度的神话，并成为高棉建筑师所喜爱的一个雕刻主题，通往吴哥寺的主要甬道两侧由这种石雕排成护栏。此时期中国和印度艺术中多见的狮子，在高棉亦属多见。一只狮子把守在甬道的入口处。





邀请，利奥诺文斯来到位于曼谷的王宫。在王宫里，她给国王的孩子当家庭教师。后来，她把自己的经历写成《暹罗王宫里的英国女教师》一书，并公开出版了这本书。在20世纪期间，有人根据她的故事写书、拍电影和电视剧。罗杰斯和哈默斯坦编写的音乐剧《国王和我》，或许是其中最有名的作品。

1865年，利奥诺文斯到达柬埔寨中部平原，这里茂密的丛林吸引着这位女家庭教师。早在两年前，法国博物学家亨利·莫霍特发表了她的日记，欧洲人惊奇地发现，在茂密的丛林中，有遗址存在。利奥诺文斯从暹罗(暹罗即今泰国)出发，向东越过扁担山脉，进入柬埔寨境内。这里属广阔的河谷地带，海拔高度仅6英尺，湄公河流经这里，注入中国南海。洞里萨湖位于平原中心，属于淡水湖。洞里萨湖的东北地区，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和树丛，有高高的树木，也有硕大的无花果树，青苔、藻类和藤蔓植物缠裹着它们。阳光从树梢缝隙中透射过来，弥漫着柔和的绿色。利奥诺文斯到达了她的目的地。

整个古城耸立在她眼前。古城周围，树木丛生，人类的杰作和自然的杰作融合在一起。茂密的丛林使古城更加庄严肃穆。石塔向天高耸着，高大的古建筑已经出现裂缝，树木从裂缝中钻出来。古城围墙上布满了石刻浮雕。巨大的人面石刻雕像，从粗壮的相互缠绕的树根背后，仿佛正在凝视着她。这就是古代柬埔寨废弃的一座都城——吴哥古城。

在所有古城遗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吴哥窟，亦称“吴哥寺”。利奥诺文斯及其同伴沿着一条甬道，越过壕沟，来到吴哥寺。甬道十分宽阔，可容纳20人并肩行走。甬道两边摆放着一段段石头护栏，每段石栏尾端高翘，像多头眼镜蛇的模样。从吴哥寺的外墙入口进去，他们来到寺内区。“我们一边走，一边惊叹，真是为之倾倒。”利奥诺文斯写道，“寺内区的院落、回廊以及庙



室好像迷宫一样，我们走在里面，转弯抹角的，新奇的东西到处都有。以前，这些东西我们闻所未闻，连做梦也没见过。”三层宽阔的台基拔地而起，最上面一层，五座圆锥形尖塔直耸云端，仿佛盛开的莲花，生机盎然。

吴哥寺建造者的建筑技术毋庸置疑。石料如同打磨过的大理石一样平整，砌筑时不加任何灰泥，但因经过仔细切削，其接合处几乎找不到缝隙。石柱和墙壁无一没有浮雕装饰。利奥诺文斯写道：“整个吴哥寺像悬挂着固定的织锦。”然而，制作这些艺术品的工匠为何许人，却不得而知，好像是一个谜。利奥诺文斯宣称说：“建造吴哥寺的民族，就其存在而言，西方国家一无所知，历史上也没有其名字。然而其瑰丽、壮观、持久的建筑风格，却胜过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建筑作品。”

在当地，关于吴哥古城被建造的传说既丰富又遥远。柬埔寨的一位老人告诉博物学家莫霍特，吴哥古城建“在森林深处，神灵发怒了，把这座城市隐藏在那里，不教人看到它”。也有人说，吴哥是巨人们建造的，他们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件建筑作品。有人告诉莫霍特说，一位了不起的国王建造了吴哥古城，然而他触犯了神灵，被变成了麻风病患者。国王遭受苦难，吴哥古城也随之衰落。

早期的欧洲人对吴哥古城的理解，有些缺乏想像力。他们断定，如今的柬埔寨人是原始的，他们肯定和建造吴哥的人不是同一个民族。吴哥的建造者肯定是欧洲人。“或许学问渊博的人会猜想，吴哥是图拉真建造的。”图拉真是伟大的罗马皇帝。17世纪时，西班牙传教士来到吴哥，他这样猜测道：“图拉真皇帝在其前人的基础上，把罗马帝国的疆土扩大了不少，然而他能到达柬埔寨，我还没有听说过。”亚历山大大帝到达过东方，比罗马人强得多。故而有人把吴哥古城归在他的名下。1860年，莫霍特重新发现了吴哥古城遗址。吴哥真正的历史由此才逐渐被揭示出来。

为系统了解吴哥古城的历史，学者们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证。一是考古学记录以及雕像记录；二是吴哥古建筑上的铭文；三是外国游客的记载。这三个方面考证的结果都表明，吴哥曾经是高棉文明的中心，而当今的柬埔寨人确实是高棉人的后裔。

公元8世纪晚期开始，在半个千年的时间里，缔造吴哥的民族拥有一个帝国，其疆土覆盖东南亚大陆大部分地区。吴哥通是安娜·利奥诺文斯所到达的地方之一。吴哥通或称“大吴哥”，位于洞里萨湖附近，是高棉的最后一个都城。吴哥是一座人间圣城，按理想中天国的模样建造，统治吴哥的君王拥有和神灵等同的地位。世人的居所用容易朽烂的树木和杂草建造，经久不坏的神殿则用石头建造。高棉人在古建筑上雕刻的铭文，揭示出神灵与世俗的君王之间的联系。

高棉人所崇奉的神灵，并非源自柬埔寨国内，而出于遥远的地方。吴哥都城中的古建筑，其周围有壕沟，古建筑亦称神殿山，其台基式建筑结构代表梅鲁山。依据传统，印度的梅鲁山是印度教的众神灵的居所。湿婆是印度教神灵之一，主司创造。湿婆给统治吴哥的君王带来灵感，使君王可以与神灵合二为一；甚至印度教的神圣语言梵语中吴哥亦有“城市”之义。

从基督纪元开始，印度文化由南亚次大陆不断向其他地区传播。此时，整个的西欧地区正普遍享受着罗马文明的成果。当季风吹起的时候，印度的航海者前往中国。他们穿过孟加拉湾，在东南亚地区离船上岸。每次停留数月，等待风向改变。乘船而来的有印度教的婆罗门和佛教的传道僧，他们将其信仰带到这里，也把梵语带到这里。同时带来的还有他们的信条，即无所不包的宇宙天国和世俗世界紧密相连。

现在已经知道，印度航海者第一次到达东南亚地区时，东南亚地区的社会业已成形。东南亚社会的精英没有被动接受印度人





■ 20 世纪 20 年代在吴哥寺内部的画廊里拍摄的照片，显示出极佳的内部建筑、雕刻以及独立的雕像，令当时的欧洲游客喜出望外。高棉的建筑师并未掌握建造拱顶的工艺，不能像罗马和欧洲的建造者那样创造巨大的拱顶，而他们使用枕梁达到了这种建筑效果。这种假拱顶常常是不稳固的，并会发生坍塌。

所带来的影响，而可能的情况是，他们把新的思维方式同当地的习俗传统相融合，进而产生了特有的东南亚文化。例如有人提出，早期的柬埔寨人有“灵魂不平等”的理论，他们相信，优等灵魂中的伟大人物居于领导地位，劣等灵魂可以从中获益。而印度教具有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这使才能非平均分配的信念得到巩固，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得到加强。

在东南亚，力量依靠领导者的个人素质来决定，依靠其吸引追随者和稳固联盟的能力来决定。领导者所统治的领土，既没有边界哨卡，也没有固定边界。有历史学家认为，其领土划分成数个流动的势力范围，称作曼荼罗。在梵语中，曼荼罗是描述感染力周期的一种政治制度，感染力周期说明了每位统治者的力量极限。随



着联盟的交替变化,感染力周期此消彼长。曼荼罗的统治者,通过战争或者结盟,在相邻的曼荼罗中确立其霸主地位。然而,依靠个人才干所建立的霸权,一般寿命都不长,霸主死后,这种霸权很少有能长期维持的。

在巩固霸主地位的长期斗争中,霸主们纷纷向神灵求助。特别是与湿婆成为一体,历史学家则称之为“君权神授”。君权神授的信念支撑着东南亚地区的文化达数世纪之久。然而最终,侍奉神灵的种种要求又逐渐摧毁了他们亲手创造的文明。

研究曼荼罗兴衰的学者,对湄公河三角洲的历史颇感兴趣。湄公河三角洲位于越南南端。沿着海岸而来的印度商人,进入中国南海之前,需要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绕个弯”。约从公元100年开始,以贸易闻名的扶南王国控制着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有学者设想,扶南人接受了那些航海者所带来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事实上,通过接触新的思想观念,扶南王国的统治者巩固了地位,使国君赢得了“山岳之帝”的称号,将他们和印度教众神灵的圣山梅鲁山联系起来。然而,于公元550年前后,扶南人被北方来的入侵者推翻,权力转移到柬埔寨境内的平原地区。

公元6世纪期间,到达柬埔寨中部的中国游客,提

越南的 古代商城奥佑

OC EO:
A CITY WITH
CONNECTIONS

1944年,当法国的考古学家刘易斯·马尔勒雷在奥佑开始发掘的时候,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这里的古代居民没有属于自己的生动的文化和技术。他们从较为先进的印度文明那里获得他们所缺少的东西。这里地处湄公河三角洲,位于现代城市胡志明市西南150英里处。然而,马尔勒雷的发掘显示,奥佑属于扶南文化的一个海港城市,大约从公元1世纪到6世纪一直控制着越南的南部地区。

奥佑古城长2英里,宽1英





里，呈长方形，周围建有护城河和城墙。古城被河道分为约10个区。其他河道通往相邻的泰国湾和附近的聚落。奥佑城中的房屋和宫殿多属木构，现已无迹可寻。然而，有数座神庙类的建筑由更加持久的砖和石料砌成。

马尔勒雷指挥越南的工人进行挖掘(如左下图)，结果发掘出大量的文物。其中包括一面中国汉代的铜镜，还有印度的珠宝，包括金制环，上有用梵语书写的封文。这表明奥佑是位于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古国之间的一个贸易中心。马尔勒雷同时还发现证据，证明这里设有正在兴起的青铜业、珠宝业和制陶业。他还找到了地中海地区制造的器物，其中包括属于公元2世纪时的罗马钱币以及一件玛瑙凹雕(如上图)。

越南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又进行发掘，结果发现了更多的印度贸易商品，进一步证明奥佑联系着亚洲的其他地区。

到另外一个王国，中国称之为真腊。然而，当今学者不愿承认真腊王国是统一的政治实体，他们更愿意承认真腊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曼荼罗不断交替变换，而其寿命都不长久。真腊的古建筑上，有铭文记载真腊的君王。洞里萨湖东边的一座古城，其梵语铭文这样描述一位霸主：“他如同天上的太阳，权威的光芒耀眼闪烁，他是地上的君王，令人敬仰。圣水为他施膏礼，他得到祝福，是贤德中的俊才。”位于湄公河谷中心地带的一个遗址，在发掘中，挖掘出三个神庙区。神庙区筑有围墙，神庙区雕刻有装饰性的主题，如树叶、海洋中的怪物以及天鹅，在印度的古建筑上，可以找到同样的装饰性主题雕刻。神庙区内部有砖石结构的神殿，殿里供奉着生殖崇拜雕像，生殖崇拜雕像是风格化的一座男性生殖器石像，这座生殖器石像代表湿婆创造生命的力量。

建造神殿的霸主，到一定时候，开始以更加明白的方式宣布，他们具有神灵般的统治地位。神庙的铭文有固定的套路，其固定套路的微妙变化表明，公元6世纪—公元8世纪，在真腊出现了更为强大的统治者。有铭文甚至把一位真腊国王描述成“道成肉身的上帝”。

印度人的思想开始跨过曼荼罗不固定的边界，而在众多的曼荼罗之间广泛传播。例如，在真腊的东部，即今天的越南中部地区，有一个占婆国，占婆的统治者也接受了湿婆崇拜。占族人是既农耕又经商的民族，大约在2000年以前，定居在漫长的中国南海沿岸地区，在内地遥远而狭窄的河谷地区也有定居。在1902年出版的地图上，此地大部分地区仍是一片空白，这里被当做“没人了解的多山地带”而拒绝加以标注。

■ 这是一位挥舞着宝剑的卫士。他的表情稍显凶恶，头上戴着生有3个脑袋的蛇神饰物，发型别致。曾是公元9世纪时越南东洋占族人佛教寺院里的装饰雕像。他站在水牛身上，有一名武士面对着他，相比之下，武士显得微小得多。



占婆和真腊一样，在中国当时的记载中，被描述成一个统一的王国，这种描写同样也容易产生错误。占族人铭文所提供的零碎信息以及考古学证据都表明占婆社会属于另一种类型。山地和不便的交通，使占婆的聚落出现规模小而且分散的社区，以至于有学者把它们描述为内陆山地。互相隔绝的社区里，雄心勃勃的霸主建立了不断变化的数个权力中心。

“君权神授”的信条同样维持着占族人的霸主地位。从公元7世纪—公元10世纪，在占婆的北方，在青翠的山谷中，坐落着占婆的神圣中心米山。从最近的一条现代公路穿过崎岖山地，经过一个小时的步行可以到达米山。在这里，曾有70座用砖砌成的神庙，显示着君王的权力。现在其中的10座仍然耸立在那里。未通窗户的神庙位于正方形的内殿四周，内殿里供奉着湿婆的生殖崇拜石像(见148-149页)。

和真腊的神庙有所不同，占婆的神庙有奢侈的雕刻装饰，如柱廊、弧拱以及叠加的屋顶等，其曲线和圆筒形状非常突出(见133页)。其风格变化明显不同于西边的邻居真腊。占婆可以直接受到印度习俗的影响。其漫长的海岸线，可为从中国往返的印度商人们提供理想的登陆点。印度商人用日本和中国的丝绸换取占人的檀香木、黄金和奴隶。最终，像商品自由贸易一样，占婆受到来自海上的印度、中国以及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文化影响。

1902年，法国人亨利·帕门蒂尔发现了占婆受到印度等国文化影响的证据。当时，他正在越南的东洋挖掘一个遗址，只挖掘了遗址的一部分。东洋距离米山约20英里。帕门蒂尔在东洋的遗址上，发现了大型的佛教寺庙古建筑群落，有3个院落围绕在中央佛塔的四周，还有18个殿堂。寺庙古建筑群落四周筑有围墙，围墙长330码，宽170码。根据在遗址上发现的铭文显示，寺庙古建筑群落约于公元875年根据皇家命令而修建。从这里似乎可以发现，占人社会中的某些成分，可能是社会的精英，他们已经



同时吸收了佛教和印度教，这两种宗教信仰和平共存。

佛教发端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当时，印度的一位王子乔答摩·悉达多，亦称佛，意思是“觉者”，佛所宣讲的道理后来发展成为佛教。最初的佛教训导称，极乐境界或曰涅槃，其获得并非通过敬拜神灵，而是通过个人修养道德，并放弃谬误的思想就能获得。然而，佛教又演化出许多支派，使更多的信徒都能够获得涅槃，也演化出不同的仪式、表现形式和信条教规。在某种表现形式上，如大乘佛教敬拜菩萨，或曰“觉有情”，确实，佛教已经和印度教虔诚敬拜众神灵有相似之处。

在佛教的启示之下，雄伟壮观的寺庙开始在东南亚地区广泛兴建。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上，公元9世纪时的统治者建造了婆罗浮屠。婆罗浮屠是一座石构建筑，高大如山，表现着佛教的教义(见116-117页)。在缅甸中部，红砖砌成的古寺庙和石塔有2000多座，现在仍然耸立在蒲甘古城中。蒲甘是历时400年的一座古代都城。蒲甘王国的民众用其大部分劳力和财富，侍奉着自己的信仰(见124-125页)。

然而，东南亚各民族在受到印度影响的同时，也对其加以修正。例如在越南东洋的石构神庙古建筑群，其石头雕像就显示出佛教从根本上发生的演变。佛像的双腿呈下垂姿势，而不是通常的盘腿姿势。艺术史学家相信，其雕刻风格并不是印度的传统表现形式，而体现了东亚人对佛教的理解。

学者戴维·斯内尔格罗夫指出，占族人所雕刻的佛像“是一种崇尚力量而非古典美的艺术作品，由佛教所产生的最具震撼力的审美经验或许在此得到了最佳体现”。在柬埔寨，佛教最终也将扎根。然而，在柬埔寨

■ 在越南，人们在稻田里劳动，头上戴着宽边草帽以遮挡阳光。从他们的祖先开始，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景象也没有变化。在人们背后耸立着公元11世纪占族人建造的神庙。入口处已长满植物。占族的农民利用湿水稻栽培技术，生产出丰富的稻谷，并把剩余的粮食以贸易的方式输出到中国。



境内，在印度教婆罗门的布教启发下，因着“君权神授”的信仰，再加上原住民的想像力，首先兴起的将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因为在占婆的西边，继真腊之后，以吴哥为中心的高棉王国正在崛起。

1 865年，安娜·利奥诺文斯到达吴哥。她为吴哥古城的壮观感到惊奇。她所提出的吴哥古城的建造者问题，学者们一直都在努力寻找答案。“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他们的文明和文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们又怎样从世界各国中消失了，而且消失到哪里去了？”

到19世纪末，法国人控制了印度支那地区。印度支那包括今天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法国人最先尝试着回答利奥诺文斯所提出的问题。为了统治其新领地，法国殖民当局在越南的河内成立了远东研究院。鉴于吴哥的重要地位，远东研究院专门成立了吴哥研究分院。

吴哥研究分院的负责人纷纷来到吴哥，他们对吴哥的古建筑进行清理，清除碎石和杂草树木，制作铭文拓片，绘图照相，撰写有关论文。随着古城变得越来越著名，他们还为玩家提供向导。树丛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雨季过后，它们又重新生长起来，所以清理工作从不间断，工作人员的生活非常艰苦，他们需要有一种奉献精神。来自其他方面的挑战也不少。1908年，琼·康迈尔成为研究分院的负责人，在吴哥寺的甬道旁边，他为自己搭了一间茅草屋。然而，他的妻子抛弃了他。他的妻子抱怨说，在她的生活中不能没有钢琴。8年后，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康迈尔遭到谋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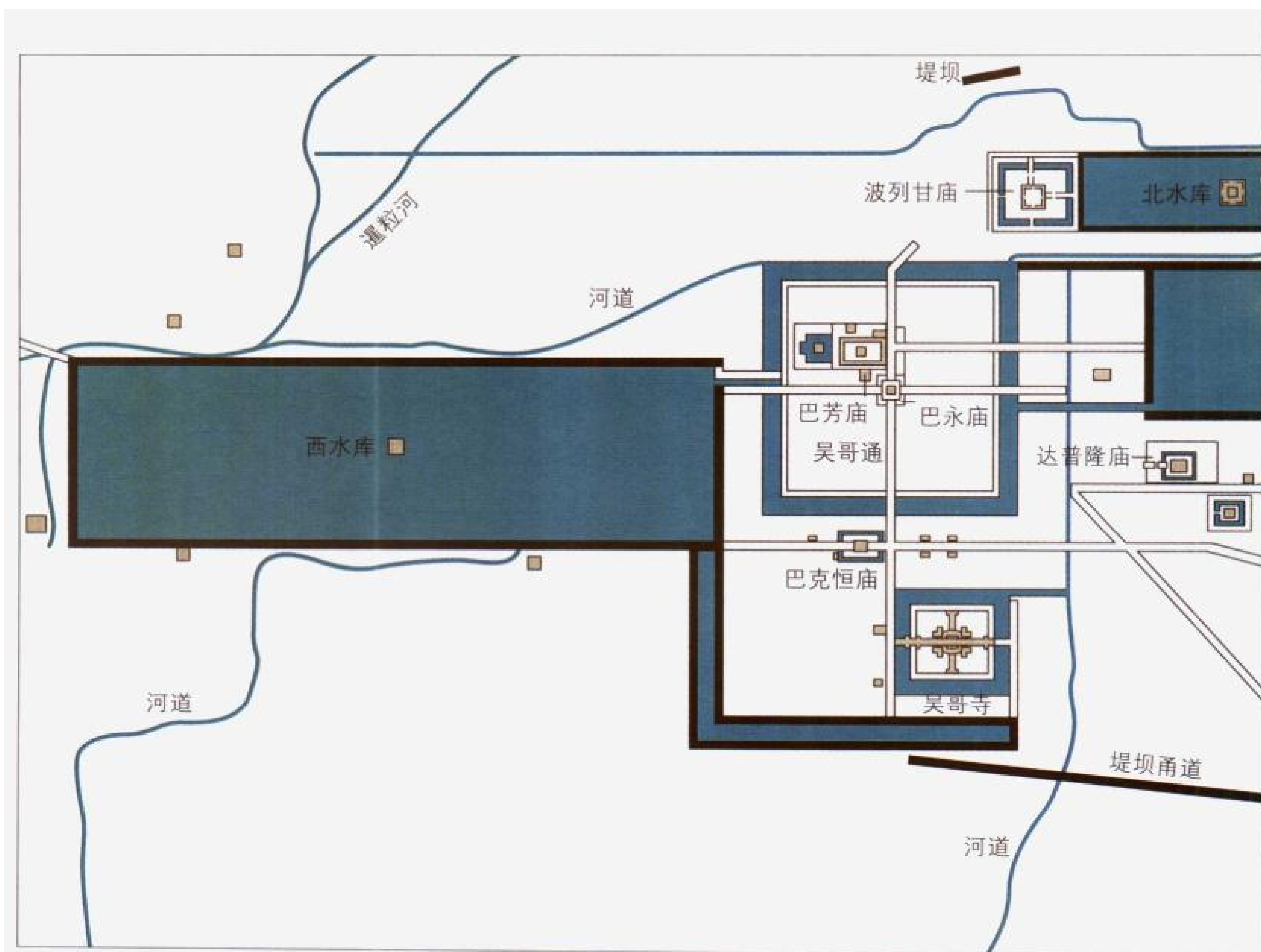
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法国考古学家垄断着吴哥的考古工作。然而，在遗址上没有常见的那些线索，考古学家无法再现当时吴哥人的生活。那些已经消失的吴哥人，其一般的居所或房屋不得而见，也找不到其定居的痕迹，没有买卖店铺，也没有作坊或者厨房之类的建筑设施。同样，日常用品也少有发现，比如厨

房用具、兵器和衣服布料。此类文物在其他古代城市遗址中都是标志物品。确实如此，在吴哥，只有遗址上的古建筑本身可以作为考古证据。

为了解吴哥这个失落的文明，吴哥研究分院的研究人员走遍柬埔寨的丛林，把这个国家所有的神庙古建筑都统统记录下来，列出清单。他们记录下的神庙古建筑总共有910个。不论其规模大小以及名气如何，他们给每个神庙古建筑分配一个代号。例如，在吴哥有一座小型的神庙，其代号是486，而吴哥寺的代号则是497。与此同时，吴哥研究分院的乔治斯·科蒂斯用了几年时间，把当代柬埔寨人的照片和吴哥通墙壁上雕刻的面孔加以对照。他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生理上的相似之处。这驳斥了高棉人是一个已经消失的民族的观点，他证明了当今的柬埔寨人确实是吴哥建造者的后裔。

然而，深入丛林去研究那些遥远的遗址仍然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多数学者还是更情愿把较多的精力放在研究用梵语和高棉语写成的神庙铭文方面，他们更有能力把握住这种证据。铭文摹拓可以在丛林里进行，然后，他们把拓片拿到巴黎去，舒舒服服地对拓片加以研究。然而这种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困难。研究铭文的专家对如何准确翻译和解读这些符号争论不休。判断其正确与否的标准和依据无法获得。下命令雕刻铭文的统治者一般不大关心铭文的史实准确性，他们更关心所雕刻的铭文是否能够塑造其君王地位的形象。比如，宣布征服了一块新领土，在其所雕刻的铭文上，反映出来或许只是一种愿望，即以一次辉煌的战斗便将这块新领土纳入版图。

虽然铭文上难免皇家的这种炫耀和夸张，但是，吴哥文明的历史框架还是逐渐开始呈现出来。铭文中所记载的历代高棉君王，其名字后面都加有表示尊敬意思的跋摩，在梵语中，跋摩是“保护人”的意思。带有此固定称谓的名字在铭文中反复出现。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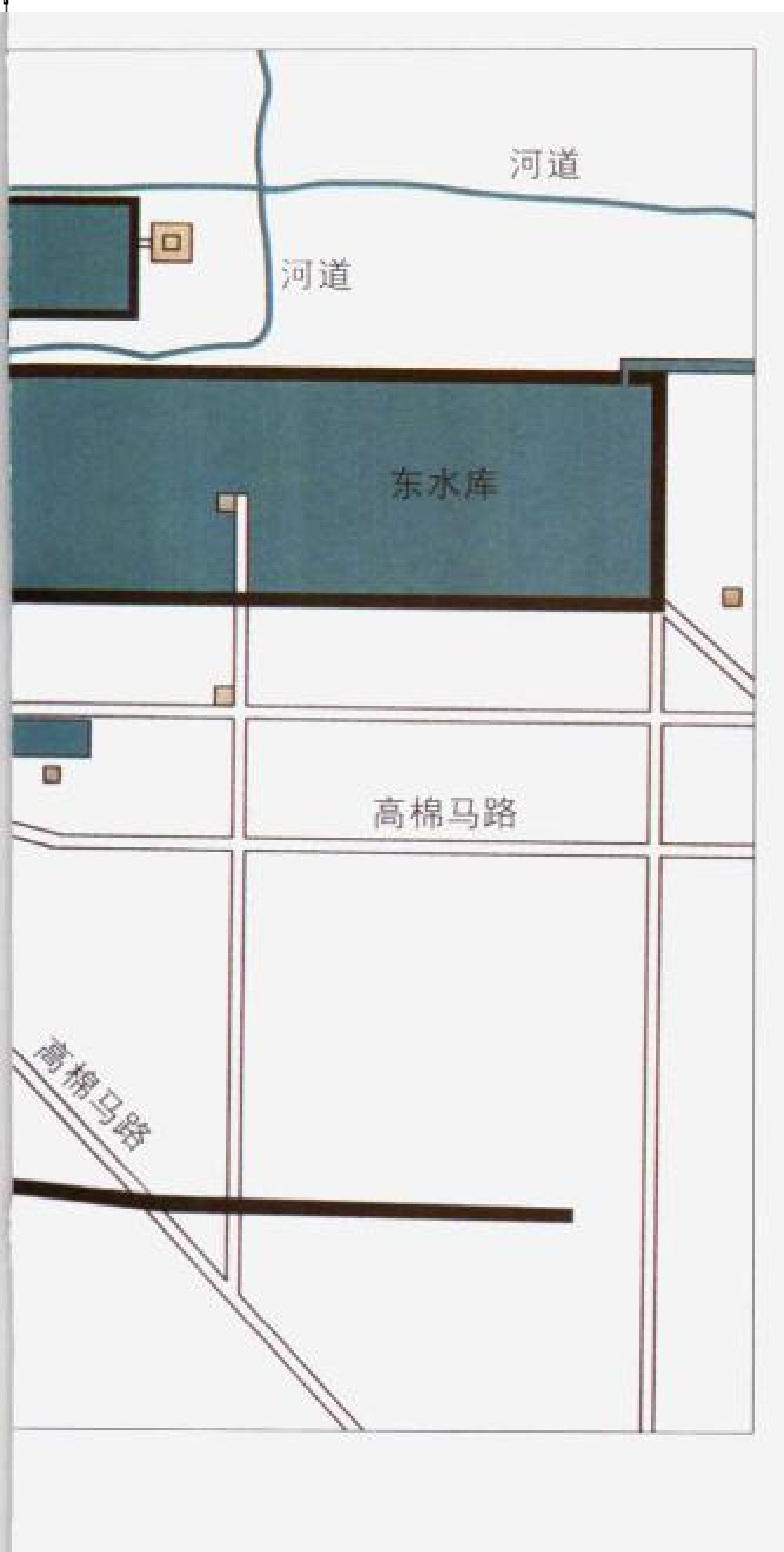


能够表达清楚，西方学者给其历代君王编了代号，使历代君王听起来就像威廉三世和亨利八世一样响亮明确，所差的只是他们在东南亚而已。铭文中的证据，以及和历代君王相联的古建筑的研究，互相结合。在芸芸众王之中，一些高贵的名字终于开始脱颖而出。

公元9世纪初，在今柬埔寨的大部分地区，一个叫做耶跋摩二世的君王地位开始突出。经过战争、篡夺王位、王朝更迭和邻邦的挑战之后，耶跋摩二世最终建立了曼荼罗，并延续了近500年。

然而，和吴哥的历代君王及其民众一样，耶跋摩也

■ 这是一幅在世界古建筑基金会指导下绘制的图表，上面描绘了吴哥护城河、河道、水坝和水库网络。这个网络具有多种用途，如举行仪式、进行防御、灌溉排水、交通运输、蛋白质生产（鱼类和水禽养殖）以及饮水和沐浴等。除具有审美效果外，神庙周围的护壕还可有效阻挡白蚁，防止它们咬噬用棕榈树叶写成并保存在神庙里面的宗教书卷。



爱好炫耀。只在斯多克加克通的铭文中 有他的记载。斯多克加克通建造于他死后 200 多年。著名的铭文研究学者法国人克劳德·雅克写道：“由于这种情况，耶跋摩二世是高棉的国王中我们了解最全面的一个。”学者们根据雅克从铭文中所收集到的零碎的信息，对耶跋摩二世的生活可以有大致 的了解。

耶跋摩二世在成为国王以前，在信奉印度教的爪哇的朝廷中呆过很多年，他在那里到底是做客，还是被囚禁，或者是当人质，其具体情况不得而知。然而他知道，爪哇国为征服更多的领土而四处作战。他自己的雄心壮志亦由此而发。公元 790 年前后，他成为高棉相互竞争的诸多君王之一。他为争夺湄公河下游洞里萨湖一带的平原而征战。在征服许多相邻的曼荼罗以后，他在库伦山上扎根。他来到这里，也许是为了躲避宿敌。库伦山位于今天的吴哥古建筑群落以北 25 英里。公元 802 年，即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在罗马加冕之后两年，“精通魔法的”印度教婆罗门为他主持了一个仪式。他在位的 48 年里，这个做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高棉的历史上具有突出地位。斯多克加克通遗址的铭文有这件事情的记载。在仪式上，印度教婆罗门宣布，耶跋摩二世是整个宇宙的统治者，照着神的旨意他成为国王，他是道成肉身的湿婆。作为国王，耶跋摩二世有权要求其民众对他效忠。而今，他已经如同神灵一样，受到崇奉和敬拜。他宣布，神灵将使他成为万王之王。当然，他肯定没有想过，要求刚加冕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来臣服。其目的是要将高棉人从爪哇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在爪哇，信仰佛教的王朝正在驱逐信仰印度教的邻邦(公元 10 世纪时有位阿拉伯作家曾记载：爪哇国王沿湄公河入侵至此并斩杀高棉首领)。新的佛教王朝在爪哇继承了扶南



“山岳之帝”的称号。而耶跋摩二世宣称，他有权获得这个称号。

耶跋摩二世在山上登基，这为他提供了更多的力量，以获得“山岳之帝”的称号。在库伦山上，他修建了许多高塔，塔里只有一个小房间。塔顶呈阶梯状，使人联想起印度教的圣山梅鲁山。几百年以来，由于季风带来的大量降雨的侵蚀以及纵横交错的树根的破坏，高塔古建筑毁坏殆尽。然而，这些高塔仍然是柬埔寨一流的寺庙建筑。

耶跋摩二世的权力和自信心不断扩大。他开始向洞里萨湖北部的低地进行扩张。在这里，他建立了一座新的都城，叫做哈里哈亚雷亚。然而，他并没有忘记以前重要的南部高地的家园。像穆罕默德一样，耶跋摩二世建造了大型的台基式神庙金字塔，和库伦山上所建造的一样。尽管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都使用过金字塔，然而在印度却找不到金字塔的任何痕迹。在信仰印度教的同时，柬埔寨人发展了属于自己的建筑风格。就像印度教相信梅鲁山位于宇宙的中心一样，在哈里哈亚雷亚以及更晚时候所修建的城市里，神庙也同样位于城市的中心位置。神庙中一样供奉着湿婆的生殖崇拜石像，统治者的名字和神灵的名字一起被雕刻在石像上。

为众神灵而修建的庙宇，为统治者维持统治地位提供了保障。在这种作用的吸引下，吴哥的历代统治者都建造了各自相应的神庙。在建造者死后，这些神庙通常成为他们的陵墓。例如，公元877年，耶跋摩二世之子死后，因陀罗跋摩继承王位。因陀罗跋摩最多不过是耶跋摩二世的侄子，甚至很可能和耶跋摩二世毫不沾亲带故。大概他觉得自己的统治地位没有血缘关系作为保证，所以修建了庞大的巴公神庙。此神庙建在五层台基上，就像评论家所讲的那样，这座神庙由大量的“石头堆砌而成”。因陀罗跋摩使用了100倍的建筑材料来修建巴公神庙。他把耶跋摩二世



■ 吴哥寺是由瑟亚跋摩二世构思建造的陵墓，亦属在人间落成的印度教义的宇宙中心。吴哥寺神庙建在数层台基之上，直通云霄。最高处距地面约90英尺，游客于此可将周围的平原尽收眼底。

的石像放在神庙中，当做自己的祖先来敬拜，他利用这种方法为自己的统治提供合法地位。

喜马拉雅山脉北部是印度教众神的居所，那里有湖水围绕，根据这个说法，吴哥的大型神庙也同样都有护城壕沟围绕。在原有的基础上，因陀罗跋摩修建了一个大型的水库，比以前修建的大150倍。这个供水系统不单纯具有象征的作用。吴哥古城坐落在平原相当有利的位置上，可以利用洞里萨湖丰富的鱼类资源，河道交通十分便利，农田因定期河水泛滥而相当肥沃。然而，季节性的缺水时有发生，这座大型的水库可以用来缓解这个问题。通过最近的研究，包括1994年在“奋进号”航天飞机上使用地球成像雷达所拍摄的照片，提供更多有关这个水利系统的情况。然而，对于边远的乡村来说，这个水利系统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现在仍然

不得而知。考虑到吴哥对众神灵的崇拜，这个水库有可能和城中的石构古建筑一样，都是为敬拜神明而建造的。

在吴哥的铭文中，提到一种更为神秘的水源。一位印度教的宗教领袖在因陀罗跋摩的铭文中写道：“仿佛是出于对干旱的恐惧，他把自己的魅力放在万物的心中。妇女们用她们那双眼睛贪婪地享用这灵魂的源泉。”男性并不被排除在外。这位神职人员还写道：“只要触摸他那化作莲花的双足，不必到圣地去朝拜和受洗，也能够获得同样的效果。”

在 吴哥，亚索跋摩是建造城市的第一个国王。公元889年，他继承了因陀罗跋摩的王位。由他开始的建造工作在以后持续了4个世纪，覆盖的地区相当于曼哈顿岛那么大。根据铭文的记载，在吴哥城中由他所建造的神庙指的是巴荣寺。然而，后来的学者们认识到，巴荣寺是一座佛教建筑，而不是印度教建筑。经过对其雕刻风格的仔细分析，其建造时间比亚索跋摩的死亡时间公元900年晚很多年。真正由亚索跋摩建造的神庙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被维克多·高罗佩发现。高罗佩是出生在俄罗斯的一位考古学家，他在法国的远东研究院担任过考古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掌握了航空照相技术，他运用这种技术，对这里的地图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在巴荣寺南部一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一个遗址，这正是由亚索跋摩所建造的神庙。这座神庙被称作巴克恒神庙，或者叫做“先祖庙山”。

巴克恒神庙作为吴哥最著名的建筑之一，在曼荼罗雕刻家的创造力中融合了深刻的宇宙象征意义。20

超凡脱俗的 制陶工艺

POTTERY THAT TRANSCENDS THE MUNDA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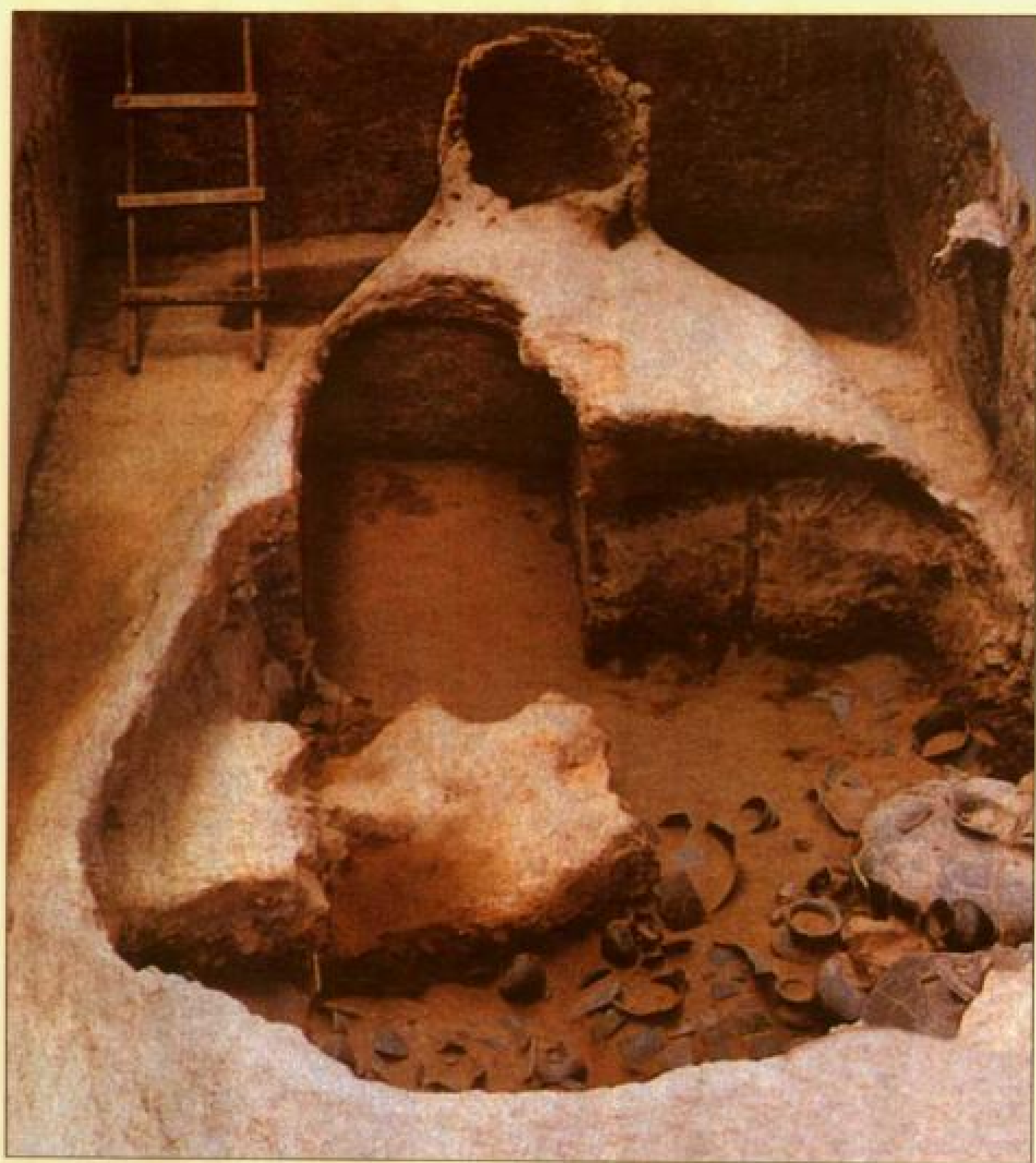
吴哥神庙具有浓厚的艺术色彩，相比之下，同时期的陶器设计则相当简单。当游客面对这两者的时候，不禁会提出一个好奇的问题，创造这两者的人们是不是属于同一个民族？神庙以雄伟见长，而陶器则以朴实为尚。探险家们首先注意到的是神庙。这些古建筑在丛林中展示着自己的雄伟和博大，塔尖和庙顶高过树帽直冲云端，藤属植物的缠绕更使它们浪漫多姿。但是欣赏出土的陶器却非一日之工。因为陶器的出土随着考古活动的增多而增多。所发现的陶罐和瓷缸造型优美而脱俗，装饰既简单又惹人注目。建筑和陶器之间的差异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神庙为众神修建，而陶器则为人们而作。

尽管陶器相对比较朴素，但东南亚的陶器制作称得上是首创。它们将单一的釉彩和雕刻的纹饰结合在一起，或者使用不同的釉彩绘出精美的图案。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这些技术为中国首创，然而在东南亚出土古代陶器以后，这种理论无法再继续坚持。泰国的素



可泰地区是公元15世纪世界最大的制陶中心之一，那里制作了大量的陶器。在素可泰北部的西萨差那莱，考古学家发现了先进的陶窑，这个陶窑的下面是一个更原始的陶窑(如右上图)。证实这里取得了技术上的进步，以满足公元11世纪及再晚一些时候制作更加细腻和彩釉丰富的陶器之需。

■ 在西萨差那莱出土的此陶窑代表着陶窑发展的第三代，陶窑下面是更加原始的前两代陶窑。陶窑分多个炉膛，制陶工人可利用它们烧制不同的釉彩，尽管他们一直在制作未加釉彩的储藏用陶罐(如右上图中所示)。



■ 装有多种饰物的双彩釉大象。高棉于公元11世纪后半叶所制，属罕见品种。动物造型的东南亚陶器，其制作时间仅有数百年。尽管外观耐看，然而高棉制作的这种陶器并未通过贸易而流传到东南亚以外的其他地区。



■ 耶跋摩七世国王率领他的军队与占族人作战，士兵脚下的尸体成堆(图左底部)。该砂石浮雕见于吴哥都城的巴荣寺墙壁。作战用的大象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而高棉的勇士克敌制胜。占族人在耶跋摩七世之前曾占领吴哥，而耶跋摩七世在复仇中不仅打败了占族人，而且直捣占族人老巢，还夺取了他们的都城。





世纪50年代，研究院的琼·菲利奥扎特对这种象征的含义做出解释。他是研究印度宇宙哲学和天文学的一位权威人物。神庙建在一个长方形的台基上，分为五层，在顶部有五座主塔，下面的四层总共建有104座小塔，呈对称分布，从台基每一面的中心位置看这座神庙，都只能看到其中的33座。菲利奥扎特指出，33这个数字正好是梅鲁山上的众神的数目。巴克恒神庙总共有109座塔，这个数字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按照菲利奥扎特的说法，最上面一层的中央高塔，代表世界的轴心，剩下的108座塔代表四个月相，每个月相有27天。神庙的七个层次象征七重天国，每一层含有12座塔，代表木星12年一个运行周期。芝加哥大学的学者保罗·韦特利称这座神庙是“一部用石头写成的天文历法”。

在亚索跋摩死后的200年里，他的许多儿子、侄子以及篡夺权位的人，交替掌握政权。公元1113年，吴哥又有一位伟大的统治者掌握了政权。他叫做瑟亚跋摩二世，也被称作“日护王”。在这位新国王的统治下，吴哥曼荼罗向四周进行扩张。向南到达马来半岛，向东到达占婆，向西到达暹罗，并继续扩张到缅甸的蒲甘王国边界。

有一段铭文这样记载道：“从前，有一位国王叫做瑟亚跋摩，他具有太阳一样的品德，使莲花盛开，使一切不断走向繁荣。”这位胸怀壮志的统治者建造了最大的神庙。当欧洲的工匠在欧洲建造哥特式风格的教堂时，这位“日护王”瑟亚跋摩正在计划建造吴哥寺。

然而，瑟亚跋摩面临着一种困难。到公元12世纪的时候，高棉王国的都城，以前的国王所修建的神庙和河道已经占满了整个古城，已经找不到能够建造大型神庙的空地。因此，他在城外建造了属于自己的神殿。围绕吴哥寺修建的回廊长1700英尺，宽1500英尺，吴哥寺高200英尺，建在三层庞大的台基上。在最上面的一层，矗立着5座圆锥形的高塔。尽管有人把它们比做翅膀



和菠萝，然而，事实上它们代表的是莲花，呈五点形状分布，方形平台的四角各有一座，而最大的一座在平台中央。

像 埃及吉萨的卡弗雷金字塔一样，建造吴哥寺需要大量的石料。当代的工程师估计，现在，建造吴哥寺也要花300年的时间。在瑟亚跋摩登基之后不久，吴哥寺的建造工作就开始了，在他死后不久建造工作便完成了，期间不过40年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吴哥寺建筑的表面，包括圆柱、横梁和屋顶，都有雕刻作为装饰。长达几英里的浮雕描绘了印度史诗文学的画面以及有关保护神毗瑟的传说。瑟亚跋摩选择毗瑟作为他的崇奉之神，这座神庙也是献给这位保护神的。墙壁上画满了各种怪兽，包括独角兽、狮身鹫首的怪物、驾车的翼龙，还有长着孔雀尾巴的鹰隼。墙壁上还雕刻着许多勇士，他们跟随在骑着大象的头领的后面，同敌人展开战斗，作战的对象既有魔鬼，也有人类。浮雕的画面到处都有翩翩起舞的天女，她们梳着讲究的发型，戴着华丽的珠宝首饰。

安娜·利奥诺文斯骑着大象走过200英里的漫漫长路，当她来到吴哥寺的时候，她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庄严的吴哥寺遗址耸立在那里，仿佛是被定格的一种梦境。”她写道，“和希腊罗马的遗址相比，它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更美。”后来很多的游客都被它的壮观所打动，以至于都要做同样的比较。英国的外交官马尔科姆·麦克唐纳说：“就吴哥寺而言，它是法国巴黎圣母院和查特雷斯大教堂以及英国的埃利和林肯大教堂同时代的产物。只是吴哥寺建造在亚洲。然而在宽敞和华丽方面，吴哥寺更胜一筹。”英国的作家雷·威廉姆斯写道：“面对吴哥寺，最庄严的中世纪欧洲建筑也显得有些逊色。这个建筑上的杰作被丛林掩盖了300多年，当这座雄伟的建筑重见阳光的时候，我欣赏着它，简直为它感到着迷。”然而，吴哥寺表现出高棉人的目空一切，并达到了辉煌的

顶峰。法国考古学家伯纳德·菲利普·格罗斯利尔指出，高棉“毁于太多的荣耀”。吴哥因为载不动沉重的建筑负担而最终消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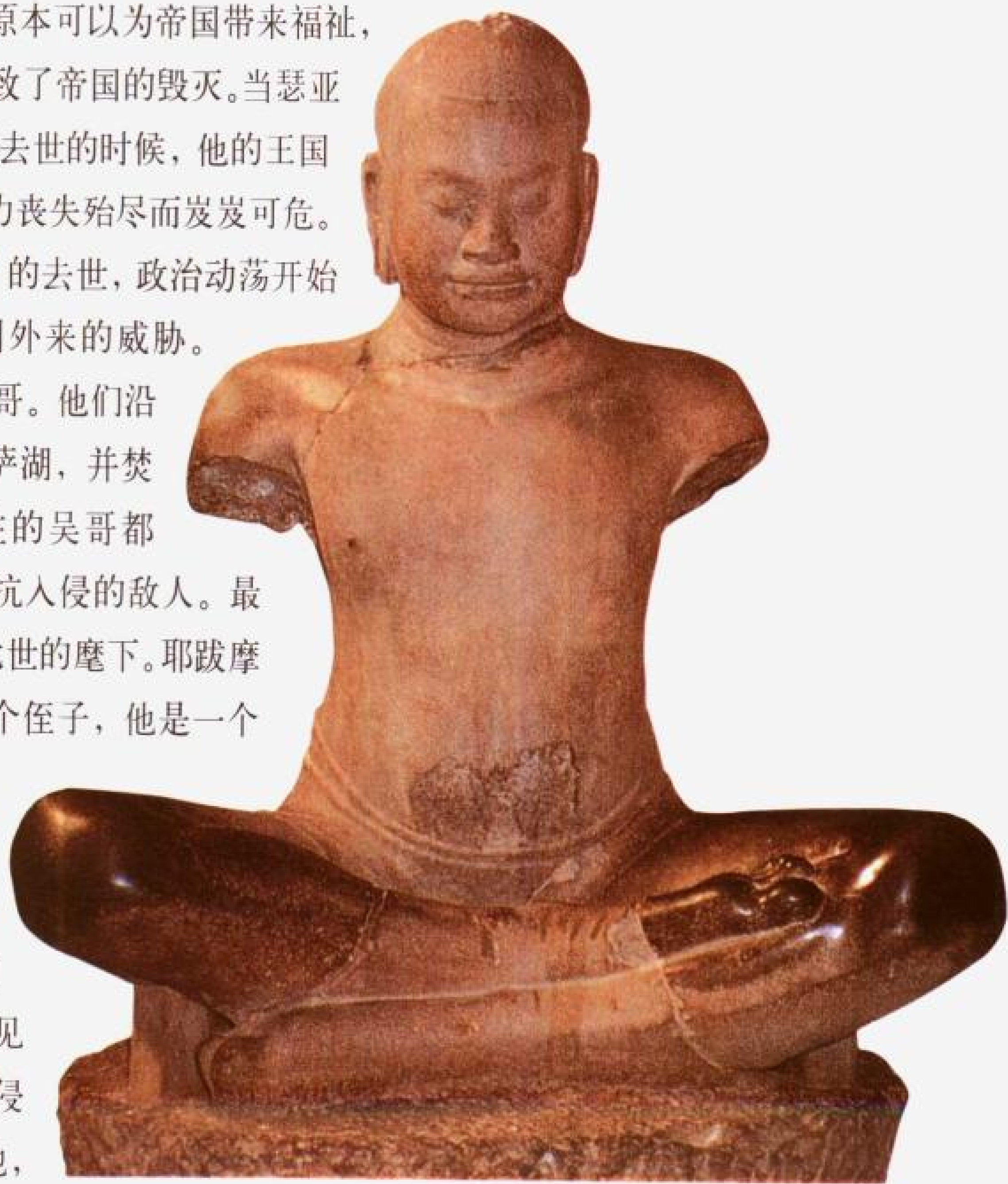
高棉国王指定的浩大的建筑计划使人民的负担相当沉重，人们实际上像奴隶一样提供无偿劳动。与此同时，其他的工作无法进行，经济陷于停滞状况。更重要的是，瑟亚跋摩的军事征战使帝国过于扩张。总之，在国王加强统治地位的同时，王国也开始解体。神

灵和国王的神圣联合，原本可以为帝国带来福祉，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却导致了帝国的毁灭。当瑟亚跋摩于公元1150年前后去世的时候，他的王国已经因为过度扩张和国力丧失殆尽而岌岌可危。

随着这位“日护王”的去世，政治动荡开始发生，同时吴哥也受到外来的威胁。

1177年，占族人入侵吴哥。他们沿湄公河而上，越过洞里萨湖，并焚毁了以木结构建筑为主的吴哥都城。高棉人似乎无力抵抗入侵的敌人。最后，他们集合在耶跋摩七世的麾下。耶跋摩七世是瑟亚跋摩的第二个侄子，他是一个年近半百的佛教徒。这位新的高棉领袖不仅在陆地上打败了占族人，也在柬埔寨大湖和河道进行的水战中取得胜利(见108-109页)。他打败入侵者，并占领了他们的土地，

■ 人们认为此为耶跋摩七世的造像，用砂石雕刻，在吴哥都城发现，被称作“历史上最杰出的雕像之一”。因缺少有关的生平记载，学者们通过对比巴荣寺中已知的国王形象特征，暂时认定此为国王造像，甚至可能以真人模特而作。其虔诚的仪态反映出耶跋摩七世已经皈依了佛教信仰。



重新占领的土地在后来的20年里成为吴哥的一个省。在这位勇士国王的统治下，高棉王国的领土比以前扩张得更大。

吴哥通是耶跋摩七世的都城，有一部分建在老城之上。这座城市占地4平方英里，城里的居民达到100万之多，居民数量比当时任何一座欧洲的城市都多。都城的中央建造了耶跋摩的神庙，即巴荣寺。耶跋摩没有把最大的神庙献给湿婆或毗瑟，因为原来的这些印度教的神灵未能保护他们的城市免遭占族人的侵略。他将吴哥最后的一座伟大的神庙献给了佛。

巴荣寺建筑被描述成一座雕塑作品，被称作“石头之花”。在用石头筑起的台基上建造了50座佛塔，像吴哥寺盛开的莲花一样。它们分布在中央尖顶的周围。每座佛塔都雕刻着4张神秘微笑的面孔，他们注视着东西南北四方(见142页)。总共有200张这样的面孔。所有凝视着远方的眼睛都使巴荣寺看上去泰然自若。法国远东研究院的亨利·帕门蒂尔在吴哥逗留了数年，然而，他对此仍然感到不舒服。“造访者被一种不祥的感觉笼罩着，”他回忆道。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有同样的感受。“我的血液都凝固了。”他写道，“四面八方都有眼睛在盯着我。”

很久以来，塔上雕刻的四个面孔一直被认为代表着湿婆的模样。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者做出结论，认为雕刻这四个面孔的灵感很可能来自佛教，而不是印度教。按照这个理论，这4个面孔代表观音菩萨，他已经有佛一样的神圣地位，然而他选择留在人间，普度众生到达极乐世界。这个理论认为，耶跋摩七世具有像神一样的地位，他的目光注视着远方，仿佛小心地看顾着他的臣民。“他更多地感受到臣民的痛苦，而不是自己的痛苦，”有一段铭文这样写道，“因为民众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且比自己的痛苦更加深刻。”

在巴荣寺的周围，耶跋摩建造的吴哥通是一个宇宙的模型，其含义是：“这座古城会像太阳和月亮一样永存。”城墙的外面有



护城壕沟，传说原来壕沟中充满了鳄鱼。在8英里的护城壕沟里面，是吴哥的城墙。内部有甬道相通，甬道的两边有护栏，其实就是两排巨大的石像。每一排都有一条巨大的九头蟒蛇。甬道的护栏使人想起有关创世的神话。在神话中，众神和魔鬼一起合作，搅动最初的牛奶的海洋，吴哥的护城河代表牛奶的海洋，他们这样合作了1000年。这条巨蟒盘绕着梅鲁山，他们拖动这条巨蟒的头和尾。这座高山也就成了搅棒，从牛奶的海洋中产生了世间的万物。

从更加实用的角度，耶跋摩在这里建造了200所房屋和医院。像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耶跋摩修建了道路系统，把帝国的都城和边远的中心联系起来。历史学家乔治斯·科蒂斯指出：“使用如此大量的石料，在柬埔寨的国王中，耶跋摩是绝无仅有的一位。”然而，这位信仰佛教的国王是吴哥的最后一位建造者，在他的领导下，吴哥建造成最终的模样。因为曼荼罗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和以前的统治者所崇奉的印度教信仰不同，长期以来，佛教一直受到民众的欢迎。人们可以充分地参与佛教信仰。例如，作为佛教建筑的巴荣寺，是惟一一座没有围墙的寺庙。就墙壁上所描绘的有关生活的画面而言，巴荣寺也是惟一的。巴荣寺不是安放已故国王的雄伟陵墓，而很可能是向民众开放的一个敬拜场所。

在以后的150年里，吴哥继续作为高棉王国的都城。到公元13世纪末，中国一位叫做周大宽的大使到柬埔寨访问。在他的报告中，他描写了吴哥都城的辉煌。他写道：“国王离开王宫时，出行的队伍由武士开道，然后是旗队和乐队，三五百名宫女，身着彩装，头

元诺伯约的 令人迷惑的珍宝

THE PUZZLING TREASURES OF WONOBOYO

1990年10月，西普托·苏瓦诺夫人雇用邻人在元诺伯约村附近自家拥有的土地上开始挖掘。元诺伯约村位于爪哇中部。她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把土山包铲得低平一些，好使附近的灌溉渠能够通到这里，以便浇灌她的土地。而印度尼西亚的伟大考古发现也从此开始。

10月17日那天，雇工挖掘出三只绿色的陶制容器，高约12英寸。陶器里面及其周围发现了耀眼的金器和银器，数量极多，重达36磅。其中包括有耳环、耳缀、项链、手镯、钱币、盘子、水舀、汤勺以及一只金制莲花状大碗(如图)。这只金碗可能在仪式中供盛莲花花瓣之用。后来还发现了更多的文物。11月26日，出土了一个容器，内有6396枚金币，重计33磅。于下一个星期二又发现一个容器，里面有重达10磅的珠宝和其他饰物。

两个星期之后，考古学家小组来到元诺伯约进行发掘，他们对这些器物的起源进行初步鉴定。从发现第一个容器的地方向外挖掘了100码的距离，

结果发现了一个用砖砌成的地基以及动物的遗骨和陶器碎片，显示出金器所埋藏的地方靠近或位于一个聚落里。

埋藏金器的是何许人以及埋藏的时候和原因等疑问都不得而知。大碗和盘子的底部有用古代爪哇语写成的简短的铭文，它们显示出两个人名，但考古学家不能确定这些器物属于谁，也不知他们的性别。退隐的贵族通常在放弃世俗生活以后，选择过牧师的生活，金制钵盂是他们乞求施舍的持物。一位学者猜测，这些财富可能是因为公元10世纪早期附近的火山爆发而被放弃的。这次灾难使中部爪哇王国突然灭亡，而东部的另一个势力开始兴起。这些器物不是有意埋藏的，而可能是被火山灰埋藏在那里的。



戴鲜花，手持小蜡烛，单独列成方队。即使在白天，蜡烛也点燃着。”这位访问者注意到，随着队伍的前进，景象越来越壮观，手持矛盾的武士过后，是“由山羊和骏马驾驶的车辆，它们都披挂着黄金”，后面紧跟着“乘坐大象的大臣和王子”。

接下来是皇室的妻妾妃嫔，她们或者坐轿，或者乘车，或者骑马坐象，有黄金点缀的黄罗伞盖不下100余把。出行队伍的最后是国王，他站在大象身上，象牙用金子包裹起来。这位特使观察到，“周围的大象组成亲兵卫队，它们阵形紧凑，后面还有更多的士兵进行保护，他们排着整齐的队形”。

尽管这位大使所描述的是一个强盛的都城景象，然而他所观察到的却是高棉帝国最后的岁月。吴哥正在走向衰落。耶跋摩七世是最后的一个伟大的建造者，最后的一位勇士。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里，蒙古正在崛起。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这些善于骑马打仗的勇士横扫中国，而且在1259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

烈汗继续向南推进。他将安南人从

越南北部赶走，而安南人向

南又占领了占婆，于1220

年摆脱了高棉的统治。

与此同时，中国南方的

泰族人迁移到今天的泰

国。此时的柬埔寨被夹

在具有侵略性的国家中

间，一个是西边的泰国，一

个是东边由安南人建立的国

家。高棉帝国最终被泰国人灭

亡。然而，吴哥所经历的伟大辉煌，被侍奉众神的沉重负担消耗殆尽。后来，吴哥古城又被另一种势力所征服，这个侵占者从四面八方逼近，这就是无情的丛林。

在 吴哥向南约1500英里的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上，耸立着庞大的佛教建筑婆罗浮屠。从规模和造型的角度看，婆罗浮屠是一个杰出的建筑。这是一座高大的寺庙建筑，台基呈正方形，边长400英尺，它建造在爪哇的克都平原中部，底部有6个正方形的台基，接着是3个圆形的台基，最上面是一座钟形的佛塔，它是一座传统的陵墓建筑，同时又是一座佛教建筑。

婆罗浮屠于1814年被欧洲人发现，从那时起，它被认为是一座不同寻常的寺庙古建筑。不仅因为它的规模宏大，而且含义相当复杂。寺庙的每一层四周都有一条通道，由大约1460块经过雕刻的石板建成，还有500多尊宣讲佛教教义的佛像。寺庙的顶部有一座宝塔，代表最后进入涅槃境界。事实上，婆罗浮屠显示着一条通往智慧的道路，它代表着佛教的宇宙观念。

■ 建在婆罗浮屠顶部的竹亭里游客济济。这幅照片拍摄于1860年。竹亭始建于1844年，结构脆弱，但可供爬上九层台基到达顶部的游客小憩，这里距地面110多英尺。到1835年时，碎石和杂草树木已清除殆尽，攀爬者可在古建筑上随处登攀。游客当中的寻宝者将雕刻和佛头砍下，当做纪念品拿回家去。

■ 如下图所示，婆罗浮屠的台基和画廊中生长出树木，而游客们正在这里漫步。原图为1814年由H.C.科尼利厄斯绘制。他是荷兰的一位工程师，他首次领导为古建筑清除生长数百年的植物。此图第一次面世于1830年，见于由陆军中尉、总督托马斯·斯坦福·拉费尔斯撰写的《爪哇史》第二版，这是首次将这座雄伟的古建筑公诸于众。







在1885年，荷兰工程师J.W. 伊泽曼在婆罗浮屠北面一侧发现了一块原来支撑台基通道的石头。他注意到在内部，石头连接的中间存在一条缝隙，看起来这条缝隙没有什么用途，只能说明最初的设计和最终完成时的形态存在差异。他对此感到不解，他在一码长的距离上把石头挪走，以便露出最初的墙壁。他的发现表明，这座神庙的造型有另一个模样。伊泽曼还发现，台基完全由一系列的浮雕作为支撑。上面的雕刻保存完好如初（见120-121页）。

伊泽曼猜测认为，在雕刻有装饰的台基的外面增加一层墙壁，是婆罗浮屠在建造的过程中不得不做的事情。建造这座寺庙使用了100多万块石料，而实际上，这些石料是借着一座天然的小山建立起来的，建筑师们必须在台基的周围进行加固，最初的台基称为“被埋藏的根基”，这样可以防止这座石构建筑因为上面过于沉重而坍塌。继伊泽曼的发现之后五年，荷兰的一个考古小组在几码长度上把整个加固的部分全部挪开。他们按照一定的前后顺序进行，以免发生坍塌的危险。经过努力，他们总共发现了160个浮雕。

用来支撑被埋藏的根基的浮雕上面，描绘着世俗的享乐和未来世界的惩罚。在它们被永久地埋藏以前，有些雕刻工作才刚刚完成，有一块上面还雕刻着工匠的铭文。通过研究铭文的风格，他们甚至可以看到建造者书写时的潦草和漫不经心，然而，学者们还是能够估计出这座寺庙大概的建造时间。它建造于公元750年—公元800年之间，和高棉王国兴建雄伟的神庙在同一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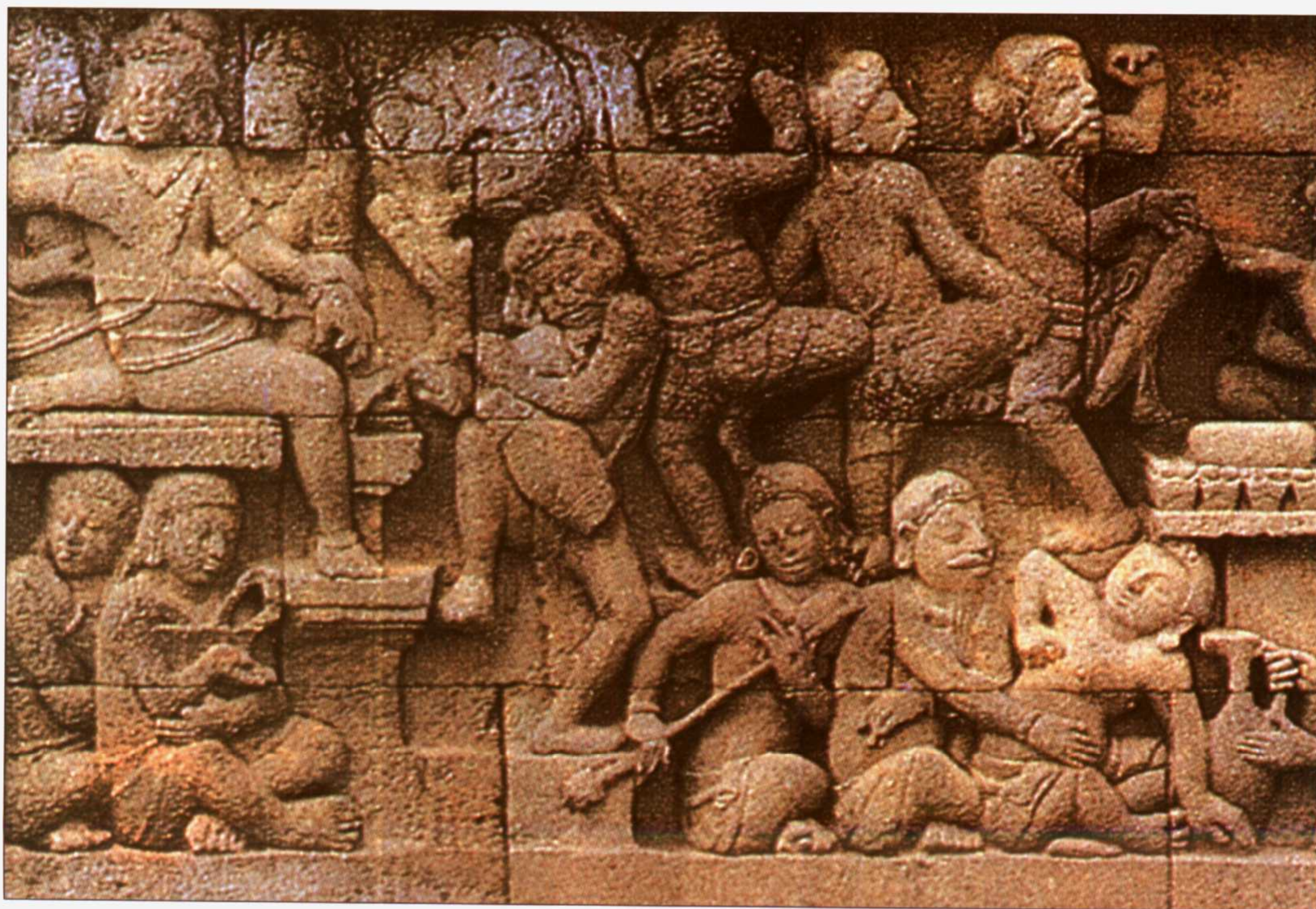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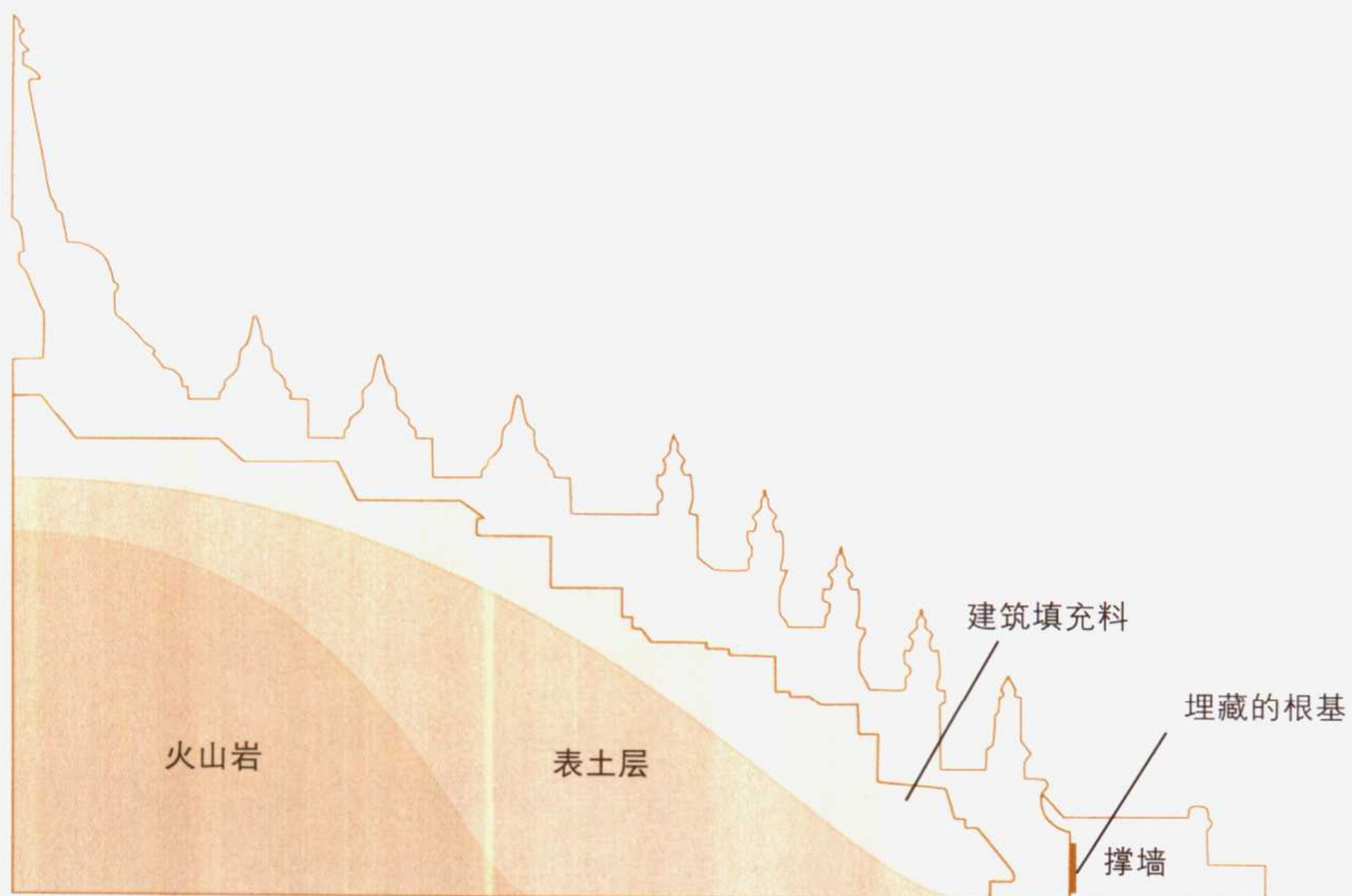
因为没有当时的铭文作为参考，这个时间为婆罗浮屠的历史提供着绝无仅有的重要线索。这个时间把婆罗浮屠和神秘的夏连特拉王朝联系在一起。夏连特拉王朝在公元778年到公元864年期间统治着爪哇中部。关于夏连特拉王朝和当时的人民，人们了解甚少。他们大概从爪哇的农业和以村落为基础的文化中兴起，

当时已经继承了从印度传播而来的印度教和佛教。无论他们的起源如何，他们的势力一定相当强大，因为夏连特拉王朝最终取代了扶南“山岳之帝”的地位。当时的耶跋摩二世于公元802年建造吴哥曼荼罗，就是为了抑制夏连特拉王朝的影响。夏连特拉王朝控制着爪哇的中部，并将信奉印度教的赞耶王朝驱逐到爪哇岛以东地区。

然而，婆罗浮屠没有显示关于建造这座寺庙的民族的情况。当代的考古学家估计，这座神庙的石料来自附近的一个河床，建造这座古寺庙将花费70年的时间，劳动力则来自克都平原的农业社区。这个建筑计划必须得到国王的支持。然而，婆罗浮屠并不像吴哥的神庙那样，它不是专门为皇家建造的神庙。这里没有举行皇家仪式的地方，四周没有阻挡性的建筑和围墙，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是专门由社会精英所使用的建筑。尽管现在还不知道建造这座寺庙的人是怎样的一个民族，但看上去这座古寺庙却是为民众而修建的。

在婆罗浮屠，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是这座古建筑的含义。因为这座寺庙的造型正好表达了建造者的信仰。对于佛教信徒而言，婆罗浮屠是上帝和人类互相联系的建筑。几个世纪以来，到这里参观的信徒登临这座建筑，使灵魂得以升华，他们从平常的世俗世界上升到涅槃的境界。他们按顺时针的方向，沿台基而上，达到顶部需要走3英里的路程。爬上最底层的方形台基，这里刻画着佛的生平事迹。信徒由此而上，他们经历过佛的一个又一个理论王国，从“欲望天”一直到达“有形天”。当到达3个圆形平台的时候，这里没有任何装饰，他们进入“无形天界”，这是比世俗更高的一个境界。这里代表着信徒广阔的精神境界。位于寺庙顶部的大佛塔是第10层。考古学家相信，这个数字代表着十个境界，是菩萨积德行善最后修成正果的十个阶段。

在婆罗浮屠建成一个世纪以后，佛教王朝夏连特拉的势力开



■ 婆罗浮屠的横断面图示。这座公元8世纪时的佛教古建筑建于火山岩形成的山丘之上。图右下角处可见所谓的“埋藏的根基”，由许多块浮雕构成。婆罗浮屠建成后不久，为防止建筑滑坡又修建了加固性的撑墙，浮雕被埋在里面。1885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而发现了浮雕。经过研究之后，除其中四块外，其他都被重新埋藏。如下图所示，婆罗浮屠的这块浮雕描绘了道德与罪恶的对比，既有舞者和乐师们的下流行为，也有值得尊敬的家庭的优雅举止。

始衰弱。而被驱逐到爪哇东部的赞耶王朝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势力。公元850年前后，根据铭文和传说的暗示，雄心勃勃的夏连特拉王子巴拉普特拉想成为爪哇的最高统治者，他和赞耶国王展开消耗战，夏连特拉战败并逃往邻近的苏门答腊岛，使赞耶统治了爪哇。在岛上再没有兴建其他的佛教建筑。然而，在公元928年，赞耶所创造的文明时期宣告结束，后来的铭文提到它的灭亡只是一场“灾难”的结果。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考古学家们对岛上可能发生的事情提出了一系列的解释：也许是一次火山爆发，也许是瘟疫和干旱，也许是夏连特拉从苏门答腊岛发起的一次报复性进攻。就像婆罗浮屠神庙被埋藏的经过雕刻的根基一样，几百年来没



有被人发现，赞耶文明灭亡的真实原因现在仍然不得而知。

当爪哇的神秘的婆罗浮屠的建造者走向衰弱的时候，在东南亚的另一个地区，一个长期存在的文化正在兴起。缅甸的蒲甘王国逐渐走向繁荣，直到公元12世纪结束的时候。蒲甘王国的都城位于伊洛瓦底江的转弯处。都城的建筑相当牢固，而且数量众多，现在仍然保留在那里。在方圆30多平方英里的平原上，建造了2217座红砖结构的佛塔、神庙和寺院，它们像平原上闪耀的明珠，如同火焰一样的塔顶高耸入云。一位参观者称它是“失去角色的史诗般的舞台”。

像吴哥一样，都城的遗址让西方的造访者首次领略到历史的辉煌，他们认为相当原始的民族却创造了如此的辉煌成就。在19世纪期间，欧洲人关于蒲甘的记载开始增多。于1827年到这里参观的苏格兰东方学者约翰·克劳弗德描写道：“庞大的蒲甘遗址，以及雄伟壮观的宗教建筑，可以被人们看做是缅甸人取得大量的文明成就的证据。”28年以后，苏格兰士兵亨利·于勒利用他作为军队工程师的经验，对蒲甘的建筑开始第一次考察。“从河上看整个的蒲甘建筑，”他写道，“仿佛看到的是另一个星球的景象，建筑风格相当奇特，而且超凡脱俗。”

蒲甘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地方。然而现存的建筑相比曾经矗立在都城和平原的1.3万座建筑而言，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尽管到达这个遗址受到各种限制，而且用来进行发掘的资源相当少，然而新近的发现不断证明，这个社会的人们虔诚地敬拜着他们的神明。

英国于1886年开始对缅甸进行统治。然而，英国的统治并没有给蒲甘带来多少进步，不像法国统治下的其他东南亚地区一样，获得了进步的机会。在此期间，对蒲甘的研究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比如，原来许多不大知名的建筑的名称是不够准确的，这些名字都是当地村里的头人编造出来的，他们只是为了应付来到这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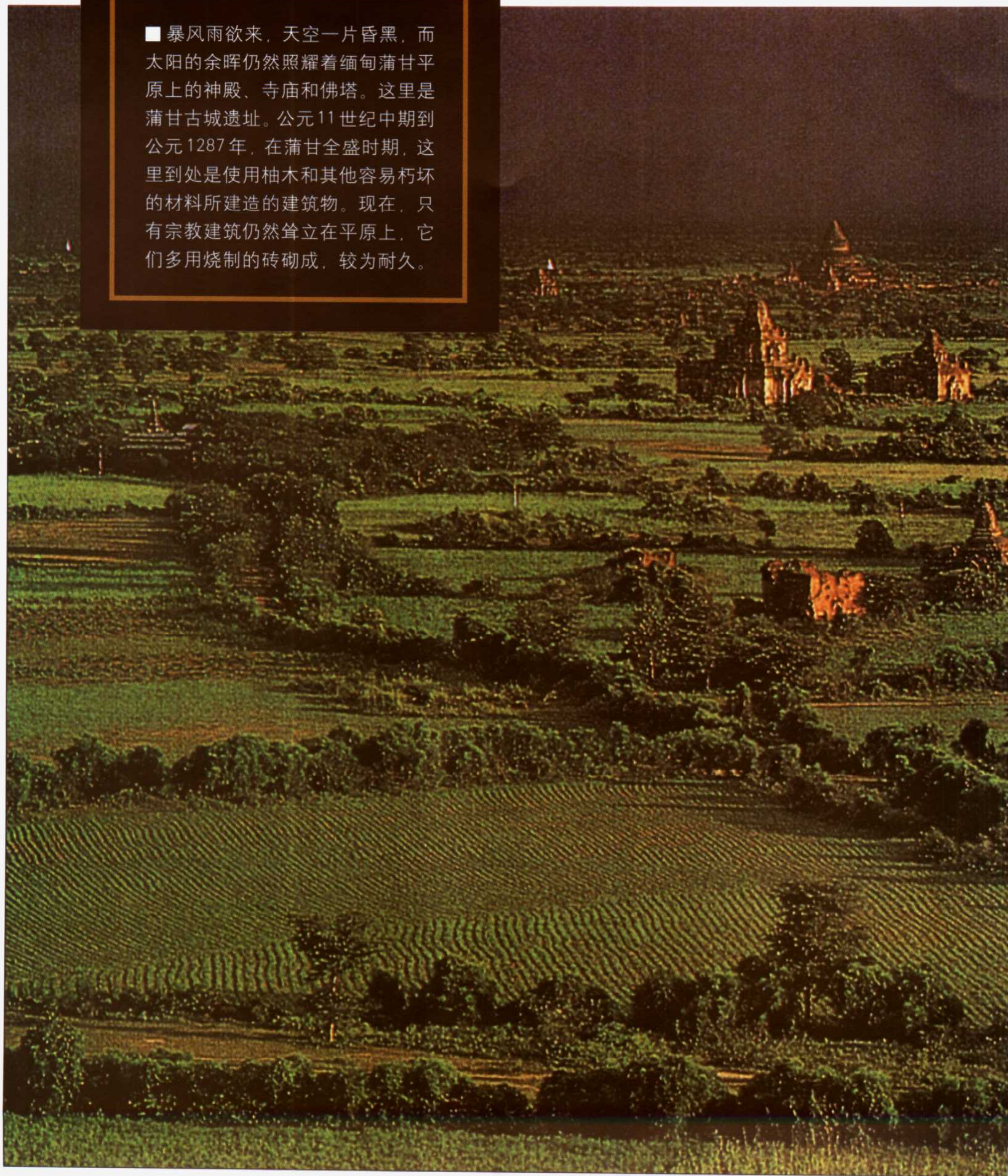
英国的印度考古团成员代表。然而在1912年，一位剑桥大学的毕业生戈登·鲁斯来到缅甸的首都仰光，到政府创办的大学任教，他的努力标志着决定性的变化。鲁斯对这个国家深感兴趣，他娶了当地的一位女子为妻，并开始钻研蒲甘的历史。他用毕生的工作确立了他在这个领域的突出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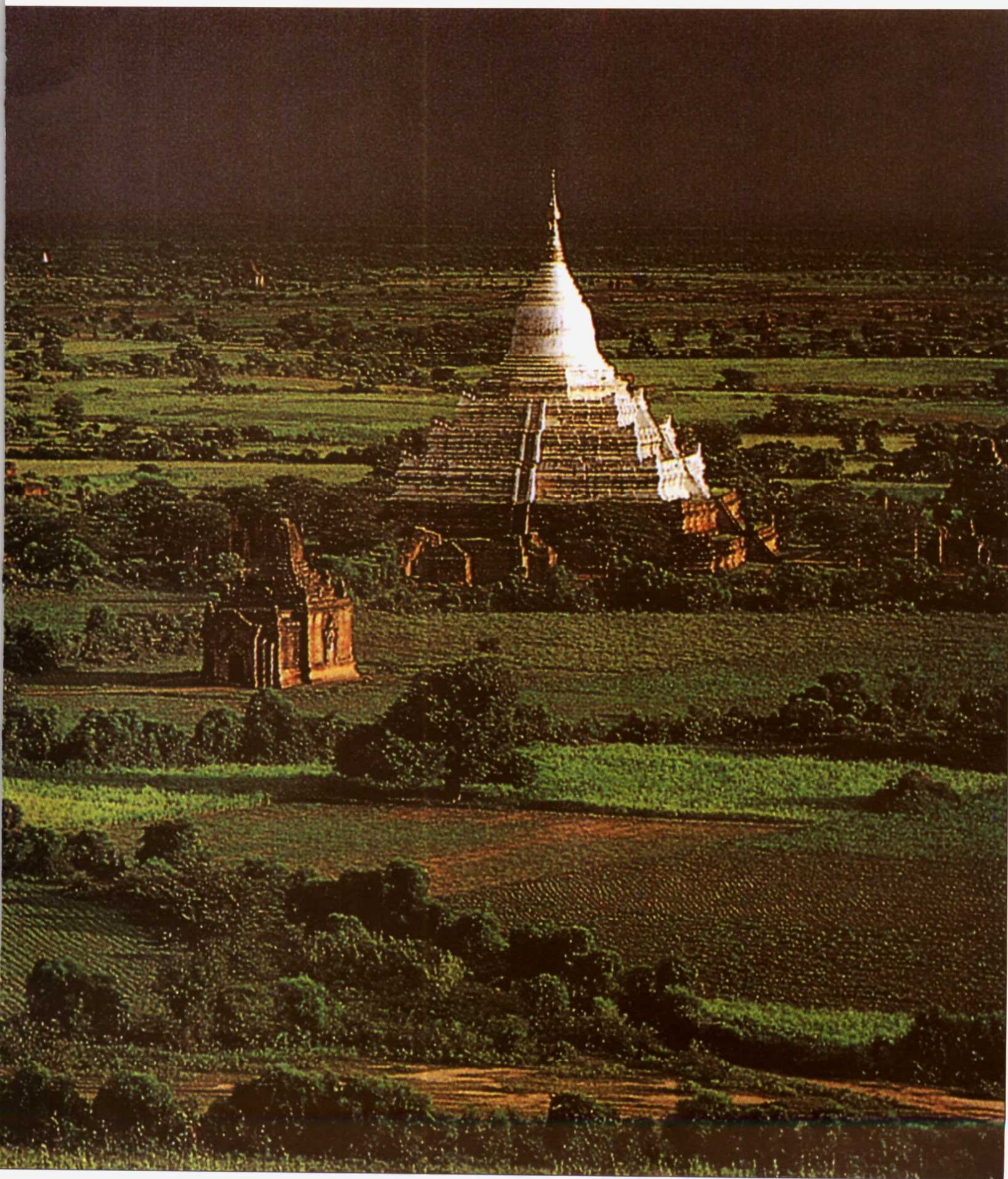
为了帮助自己进行研究，他训练自己的一名仆人进行摹拓，然后派他去寻找尚未被发现的铭文石刻。因为鲁斯相信，铭文中蕴含着理解蒲甘的钥匙，而且他开始学习古老的缅甸语言和孟语，因为铭文都使用这两种语言进行记录。学习古老的语言对于这位英国人算不上困难。有一位对他表示崇拜的人说：“那些语言都是其他人需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才能掌握的，而他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把它变成了自己的工具。”他的研究作为后来研究蒲甘铭文奠定了基础。

通过铭文研究再次发现，建造寺庙的目的在于获得宗教信仰的善果。就蒲甘而言，其信仰的是小乘佛教，是一种以经文为基础的苦行形式的宗教信仰。城中的居民都可以通过修行而获得正果，无论是奴隶还是国王，只要多行善事，比如建造和修缮庙宇。一旦获得善果，还可以进行分享。专门记载蒲甘国王的养母的铭文曾经表达出她的愿望，她希望她所获得的救恩能够和“世界上所有制度下的”人们共同分享。另一块铭文记载道，有位获得正果的人向寺院奉献牛群、土地和劳动力，她希望通过这种奉献，“把她所获得的救恩和当时的国王、未来的国王、她的父母亲和儿子以及所有的生灵共同分享”。

小乘佛教于1056年成为蒲甘的主要宗教，取代了这种宗教的早前的形式，以及民间对自然神灵的崇拜。这种改变是通过国王阿罗隆多的命令而形成的，阿罗隆多传统上被认为是蒲甘王国的建立者。通过发掘用砖砌成的加固城墙发现，比阿罗隆多早200年以前，蒲甘已经有一个中心城区。

■ 暴风雨欲来，天空一片昏黑，而太阳的余晖仍然照耀着缅甸蒲甘平原上的神殿、寺庙和佛塔。这里是蒲甘古城遗址。公元11世纪中期到公元1287年，在蒲甘全盛时期，这里到处是使用柚木和其他容易朽坏的材料所建造的建筑物。现在，只有宗教建筑仍然耸立在平原上，它们多用烧制的砖砌成，较为耐久。





鲁斯相信，在公元9世纪期间，现在的缅甸人的祖先离开他们在中国西藏边境的家园，来到缅甸中部定居，和生活在那里的彪关人一起生活。在这些新来的人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的过程中，他们从彪关人那里学会了湿水稻栽培农业，为后来兴起蒲甘的早期城邦国打下基础。信仰佛教的彪关人在公元9世纪或公元10世纪期间建造了第一座佛塔。然而这座城池真正的发展是从阿罗隆多于1044年继承王位开始的。这位新国王修建了蒲甘的防御工程和新灌溉工程。然而修建这些工程需要更多的资金和劳动力，在1057年，阿罗隆多的军队沿伊洛瓦底江而下，吞并了位于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孟王国的都城直通。一位孟王国的史官面对王国的灭亡哀痛地写道：“伟大的直通都城成了一片废墟，沉寂笼罩着这里。相比之下，蒲甘却闪烁着胜利和荣耀的光芒，仿佛成了众神灵的庇护所。”

阿罗隆多从直通战役中攫取大量的财富，并集中到信仰佛教的统治者手中。他把3万名孟王国的战俘带回到蒲甘，其中包括建筑师、手工工匠以及小乘佛教的僧侣，他们为长达两个世纪的宗教建筑提供了推动力，这些建造者平均每月建造两座宝塔。皇家对佛教的支持刺激了蒲甘经济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也威胁到蒲甘王国的存在。

在蒲甘古都城的东门附近，考古学家于1990年前后发现了王宫的遗址。王宫最初是木结构的建筑，像吴哥一样，石料只用于佛教建筑。尽管如此，王宫用砖砌成的基础结构依然存在。通过发掘，人们发现了一些仅用砖建成的圆柱。其直径为4英尺，高同样为4英尺，这些用砖砌成的圆柱也许是支撑整个建筑的圆木柱子的基座。一项重要的发现支持了考古学家的结论。在检查古代手稿的时候，缅甸的铭文学家和史学家乌芒芒丁发现了一张地图，记载着王宫的精确测量记录，以及王宫和城门的相对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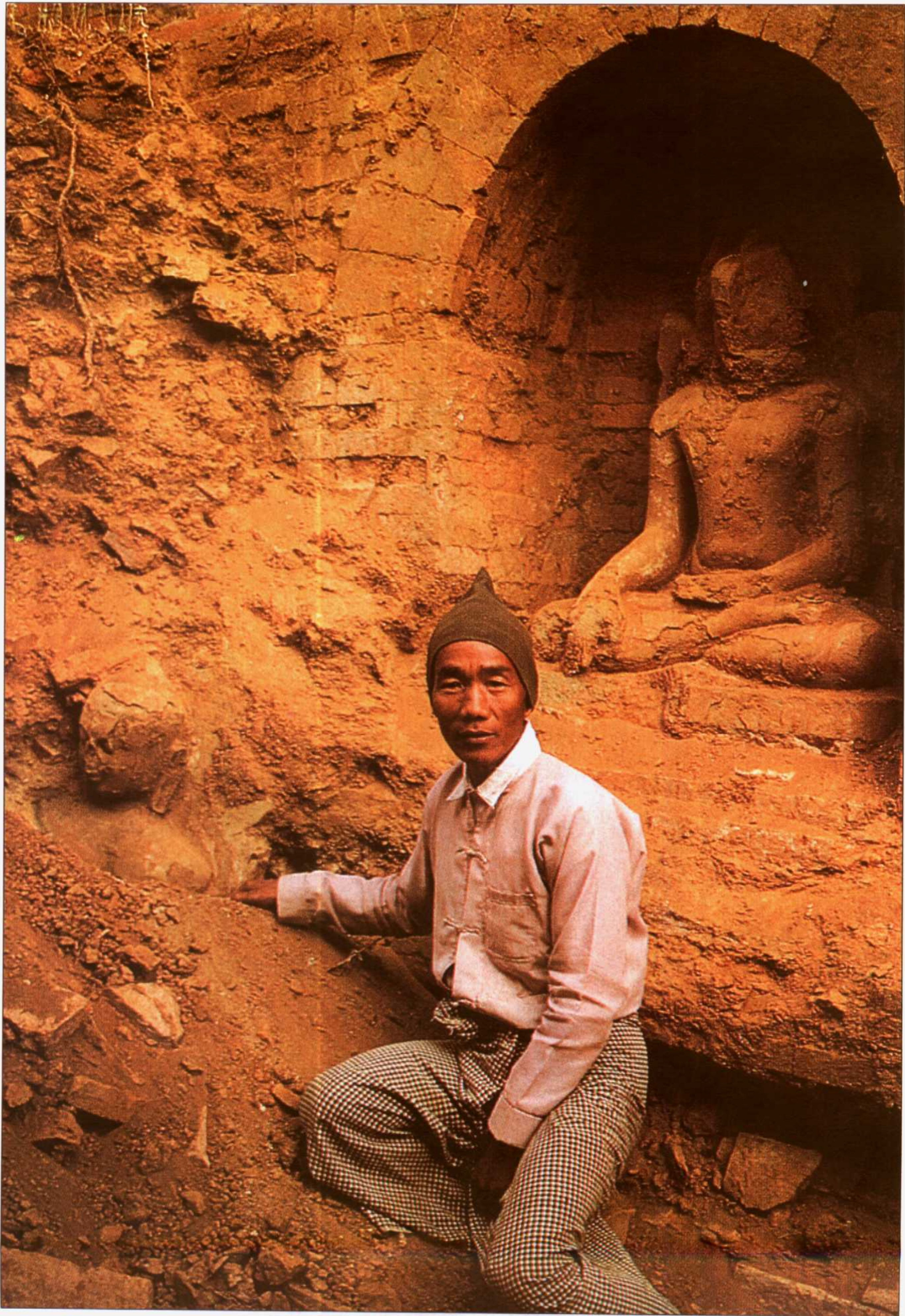
这个发现肯定了这个基础结构确实是王宫的建筑遗址。

缅甸的统治者从这里控制着一个相当复杂的王国。“这个时代的特征很复杂，既有军事统治，又有彪关的传统文化，还有孟文化和小乘佛教文化。”一位研究克延奇塔国王统治时期历史的专家这样写道，克延奇塔的统治从1084年一直延续到1111年。长期的影响提供一种真正的创造环境。在克延奇塔统治了21年以后，蒲甘的建筑师和雕塑家们完成了这座著名的建筑，即阿难陀神庙（见136-137页）。

根据缅甸的记载，这座神庙的建筑受到来访的八位印度僧侣的启示。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寻求施舍。他们向国王讲述了他们在喜马拉雅山洞穴庙宇中的生活，他们借着冥想的力量，给国王描绘出一幅白雪覆盖的景象。克延奇塔如此的着迷，以至于他下令在蒲甘的平原上再现这样的一座庙宇。当这座建筑完成的时候，根据缅甸人记载，国王亲自处决了那位不幸的建筑师。克延奇塔为这座建筑感到叹服，他决定不能再有和阿难陀庙一样的建筑。

阿难陀神庙的里面光线昏暗，里面有四尊用柚木材料制作的佛像，每尊佛像高31英尺。光线从寺庙顶部的裂缝透射进来，使佛像看起来像悬浮在空中，仿佛上升的样子。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这是对12世纪的建筑风格的一种演化，那时候的寺庙以宽敞明亮的内部为特征。蒲甘的建造者还建造了至少17座具有五个侧面的建筑，这是最早的五角形的建筑。这种对印度的建筑形式大胆的改进，反映出国力几乎发展到顶峰的国王的自信心。12世纪晚期到13世纪早期，在纳拉帕蒂奇图国王的领导下，它扩张到最大的范围，遍及整个的伊洛瓦底江流域。新的农田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也吸引来更多的追随者，也因此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来维持耗资巨大的教会和王国。

阿罗隆多的光辉历史由此开始逐渐走向完结。在大约200年的时间里，信徒们向他们所信仰的佛教进行了大量的捐赠，他们



非常希望走上得到救赎的道路。这使得蒲甘的大量财富不能为国家所占有。随着宗教中心的兴起，王权所依赖的税收日益严重地流失。有学者曾经指出：“最先使蒲甘王国兴起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成为阻碍和摧毁蒲甘王国的力量。”和吴哥一样，这种文明因侍奉神灵而得到发展和强盛，最后又因为不堪重负而消亡。

1283年，忽必烈汗乘虚侵入蒲甘王国。根据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的记载，他没有访问过蒲甘，然而听说过有关蒲甘的情况，他称要征服蒲甘这块土地，只需要一些小丑和玩杂耍的人就可以了。缅甸的有关记载称，蒙古的军队有600万骑兵和2000万步兵。事实的真相可能既不像前者那样轻而易举，也不像后者那样兴师动众。作为文化和宗教的中心，蒲甘将永远存在。然而它的黄金时期已经不复存在了。

蒙古的统治没有给蒲甘带来明显的影响。然而自然的力量却更加无情。比如，伊洛瓦底江已经将古老的城池的三分之一冲刷殆尽，在1975年发生的一次地震又破坏了许多存留下来的建筑。然而蒲甘依然具有考古价值。在20世纪90年代初，工人们在为一座宾馆修建游泳池的时候，挖掘出土了一块石碑。在最近，研究的重点已经从19世纪集中研究铭文开始转移。考古学家开始研究受到佛教启发的那些建筑和人工制品。然而和东南亚的其他地方一样，研究人员面对着不同寻常的困难。缅甸政府使很多研究人员无法进入蒲甘进行研究。在吴哥，红色高棉控制着文明遗址所在地。历经数百年的古代王国的光辉历史遗产仍然受到当今世界不稳定的政治局势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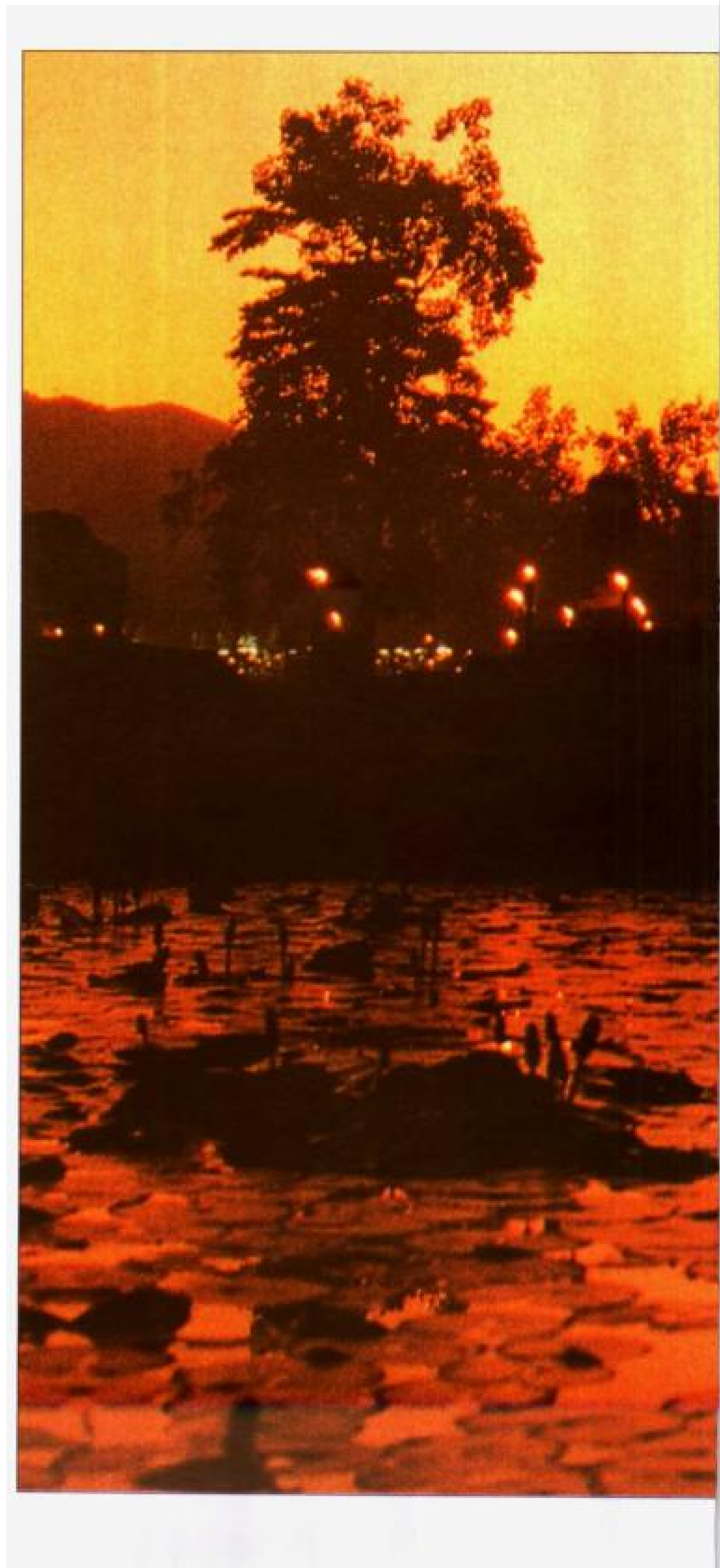
■ 缅甸人都知道，“在蒲甘，无论走到哪，举手投足之处，皆可遇到圣物。”此照片中的工人表情生动，正在给佛头清扫泥土。此处遗址为1992年挖掘发现。蒲甘曾有1.3万多座砖构古建筑，现挖掘出土的有数千座，仍有数千座埋藏在地下，待考古学家挖掘发现。

文化融合产生的艺术瑰宝

DAWNING OF A NEW BEAUTY

东南亚的艺术和建筑在越南、缅甸、柬埔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普遍存在，无论其风格怎样独特，都可以在印度找到他们的源头。东南亚民族所独具的天才体现在他们对印度教和佛教的吸收方面。早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初期，印度的传道僧和商人就将宗教和宗教文化带到这里。东南亚各民族吸收并利用它们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已经掌握制作青铜器和赤土陶器技术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们，发展了反映地区特色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比如右图的这幅神庙景象，一眼即可确认为傣族人所建，其他不说，因为在坐姿的佛像头顶上面，有一簇高高的火焰形象(显示出佛体内具有火热般的精神)。这是典型的傣族人的风格。右边更远处的佛塔同佛头火焰造型相映成辉。

东南亚人除了敬拜自己本地的神灵以外，还敬拜印度教和佛教的神灵。东南亚古代各国的帝王利用佛教和印度教的教义来增强精神控制力量。他们用这种方式吸引追随者，从而加强世俗的权力。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增加财富，比如栽培水稻和从事陆路、河道以及海上贸易，这为他们提供了经济基础，以便建造多层次神庙，并按印度人提供的模式在神庙中装点佛、湿婆以及毗瑟雕像。



这篇随笔附有彩图，表现出国外的思想和当地的传统一经融合便最终形成了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以及风格的多样性。如今，这里有无数废弃的古城和雄伟神庙，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这里被保存下来，东南亚也借此而闻名。





132

SOUTHEAST ASIA: A PAST REGAIN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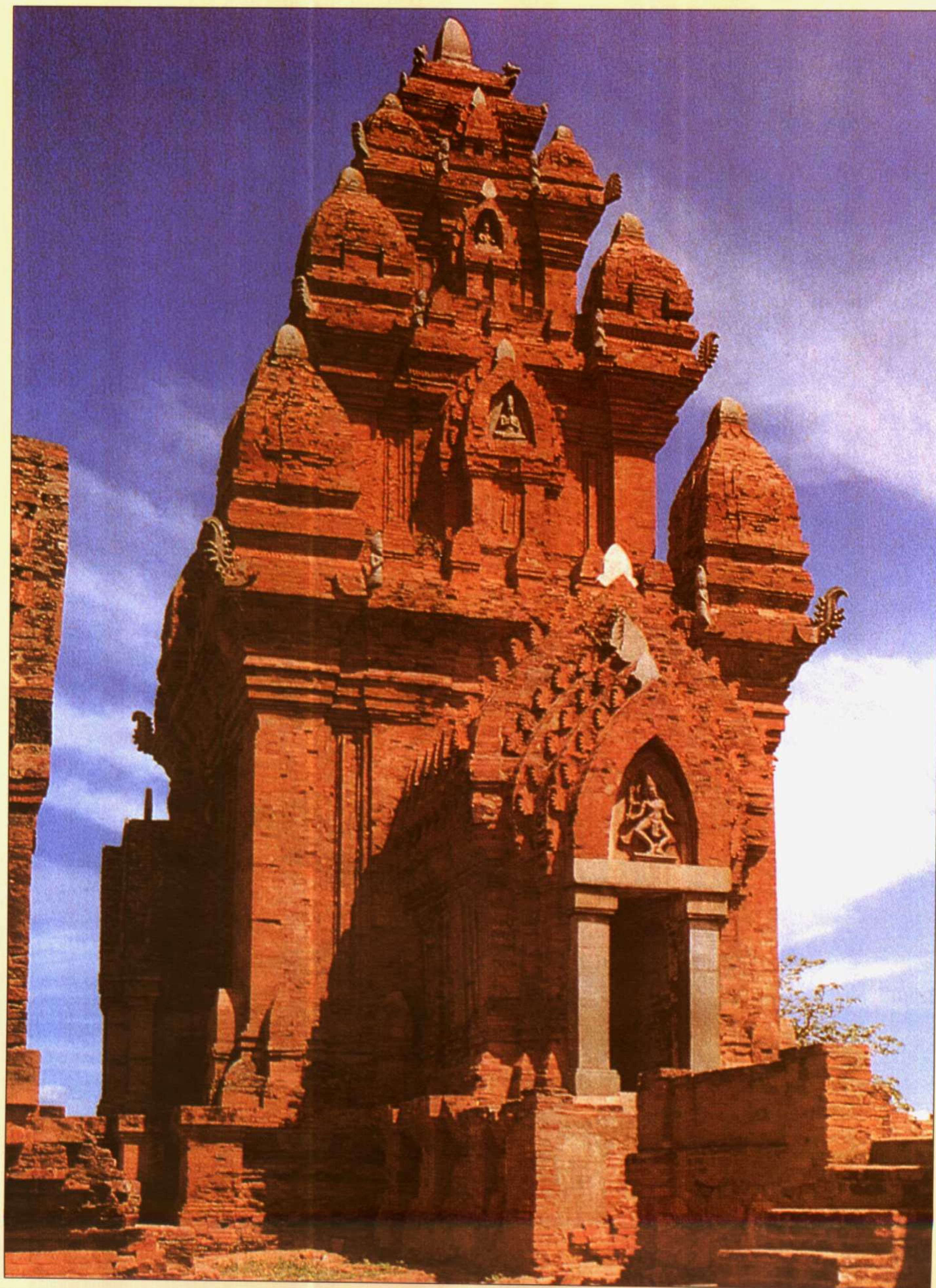


混合艺术风格在越南

VIETNAM: A BLENDING OF STYLES

占婆是占族人的王国，历时1000余年，曾占据越南南部许多地方。占婆留下相当多的印度教和佛教神庙，还有众多的石刻雕像。占族人同西部的高棉人以及北部的越南人连年作战，在公元15世纪时最终被越南人打败。在一个被称作波克隆加莱的地方，有占族人最晚修建的神庙之一（如右图）。神庙为印度教的湿婆而建，庙内的湿婆呈风格化的一条阴茎形状，其面孔被认为是国王的模样，庙外东门入口的上方，湿婆像呈舞者的模样。

■ 公元7世纪时的毗瑟砂石雕像。大概出于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那里是占族人的家园。雕像原为一石拱的冠部，上面仍留有石拱的一部分。使用石拱和简单而有力度的的人物造型是早期占族艺术的显著特点。





■ 印度教的神灵湿婆和他的配偶帕尔瓦蒂(见右图)，以及湿婆的传统高贵坐骑公牛。见于公元11世纪时的砂石阴茎雕像之上，雕像高24英寸。此雕像起装饰作用。湿婆像的头饰为曲线图案，属占族艺术中的常见主题。



■ 公元11世纪的水兽头像。口边衔着一位挥舞宝剑的斗士(见下图)。此种水兽头像多见于占族人最后所建神庙顶部尖塔的钩角处(见前图)。属印度艺术的一个变种，在中国和越南的艺术中多呈龙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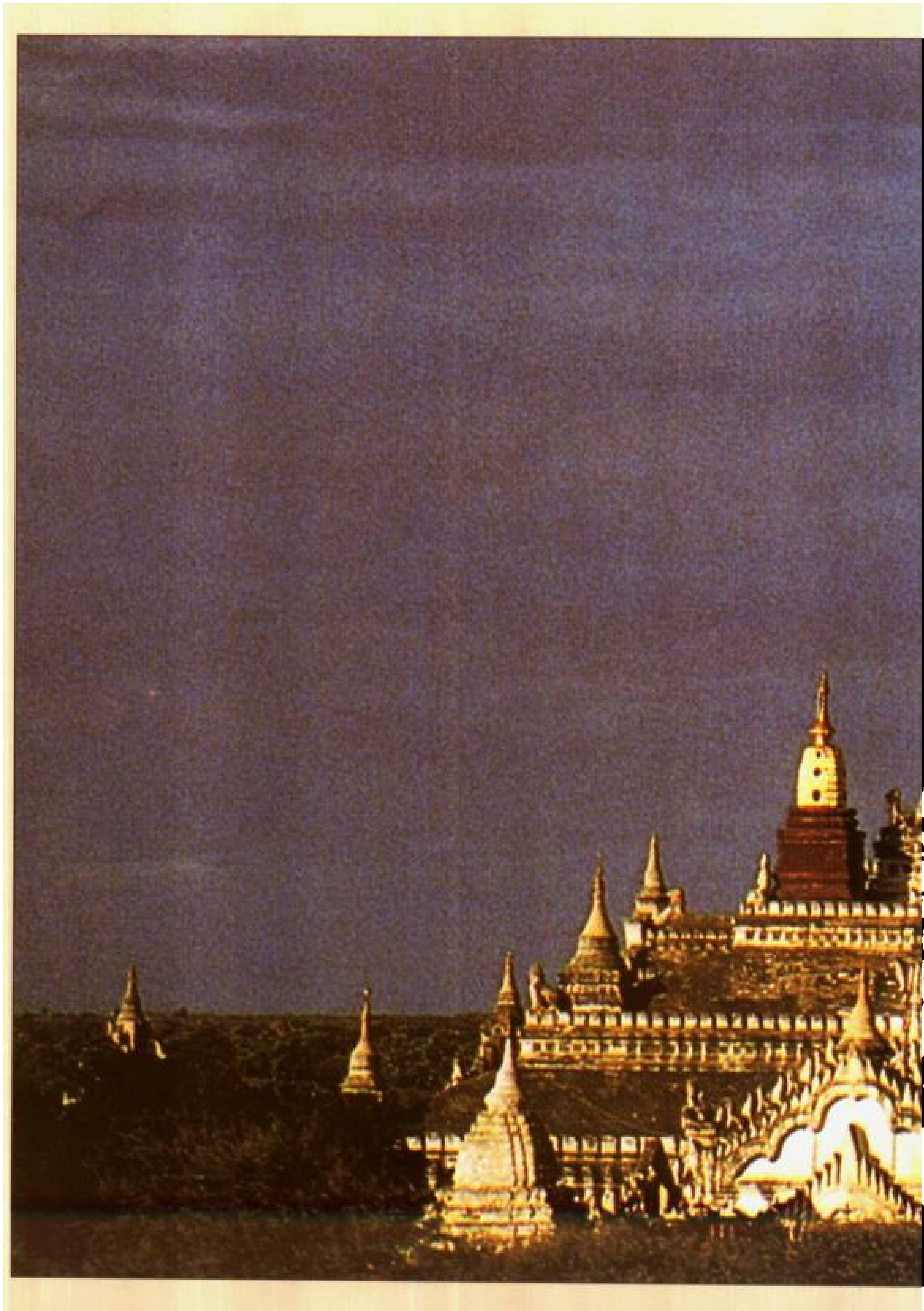
富有活力的缅甸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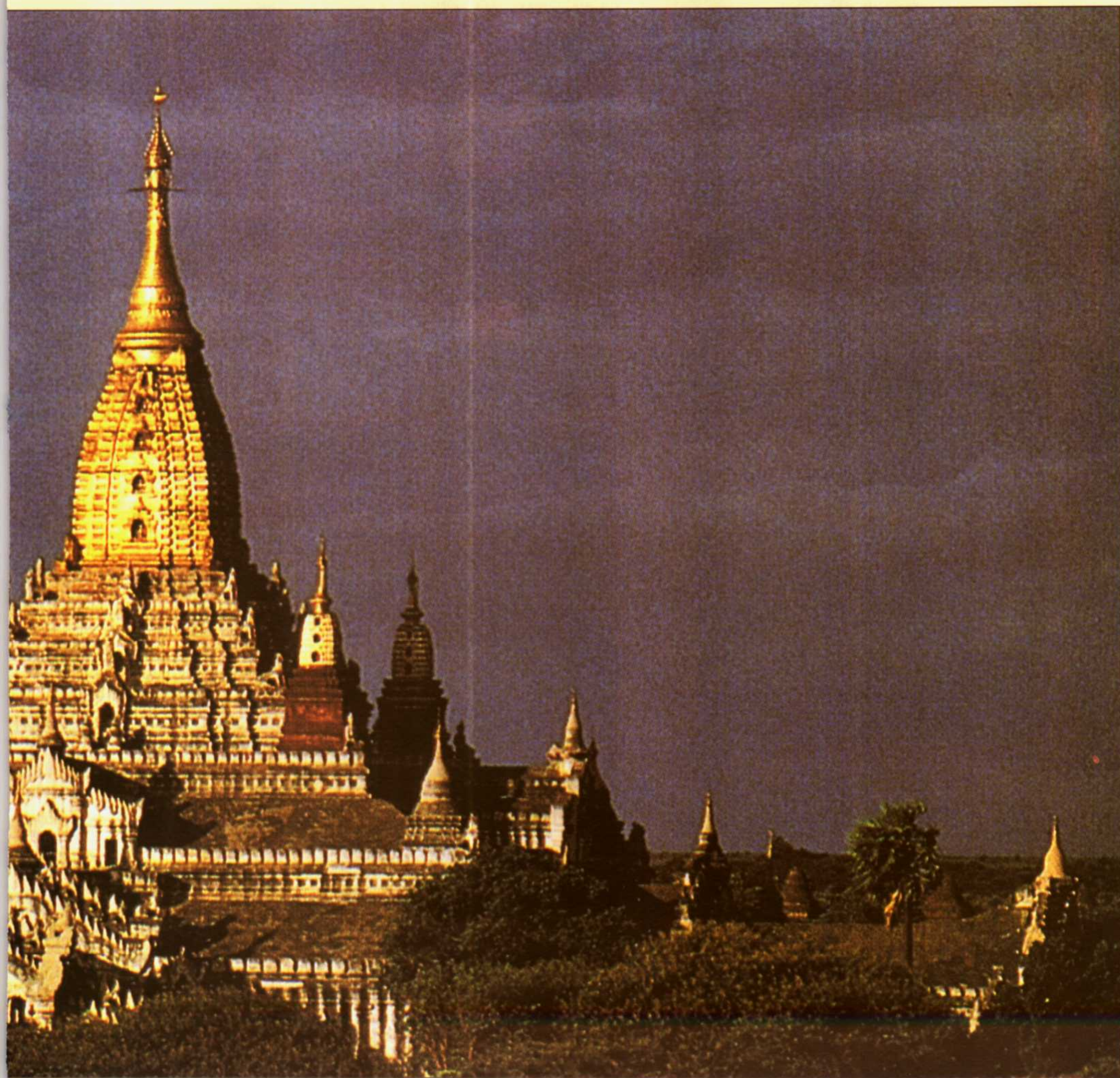
BURMA:

A VIGOROUS HYBRID

蒲甘古城位于缅甸中部，在伊洛瓦底江沿岸。这里是印度、中国和东南亚的文化交汇处，商人、外交官和佛教传道僧经常往来于此。蒲甘古国建于公元9世纪，是缅甸的第一个王国。较早的王国分为两大群体，一个是孟族人，一个是彪关人，他们的艺术和文化已经呈现印度化的特点，缅甸人依靠前人取得的成就，在蒲甘古城建造了1.3万座神庙和佛塔。

阿罗隆多统治期间(1044-1077年)，缅甸的艺术和建筑开始步入全盛时期。他们信奉小乘佛教，通过向僧侣献礼，世俗的人能够为将来的生活积累善因。阿罗隆多统治期间，广修寺庙。在他之后，克延奇塔统治期间(1084-1113年)，修建了阿难陀神庙(如图)，可见受到印度神庙造型的影响，并包含孟族人和彪关人的建筑特点，比如“十”字形的基础设计。蒲甘神庙内部装饰着色彩艳丽的壁画，描绘佛和宫廷的生活景象，神庙外面有用灰泥制作的动物雕像和植物图案，一切都按照独特的缅甸风格进行雕绘。







138

SOUTHEAST ASIA: A PAST REGAINED



■ 公元8世纪时的金地黑漆壁板装饰画。由技术高超的彪关艺人制作，上有坐姿佛像，有拉长的耳垂，面带安详的笑容。

■ 约公元12世纪由树干雕刻而成。雕像高6英尺，身上有金叶和黑漆与红漆的痕迹，关于其身份，学者们尚有争议。可能是一位去世的王室成员造像，化身成理想中的菩萨或头戴冠冕的佛。



■ 这幅布画描绘了佛的生活场面，属公元12世纪的作品。1984年在蒲甘发现它时，它被卷折放在涂漆木制佛像中。蒲甘神庙内部由艺人描绘的壁画多数和这幅布画相似。



印度尼西亚的岛国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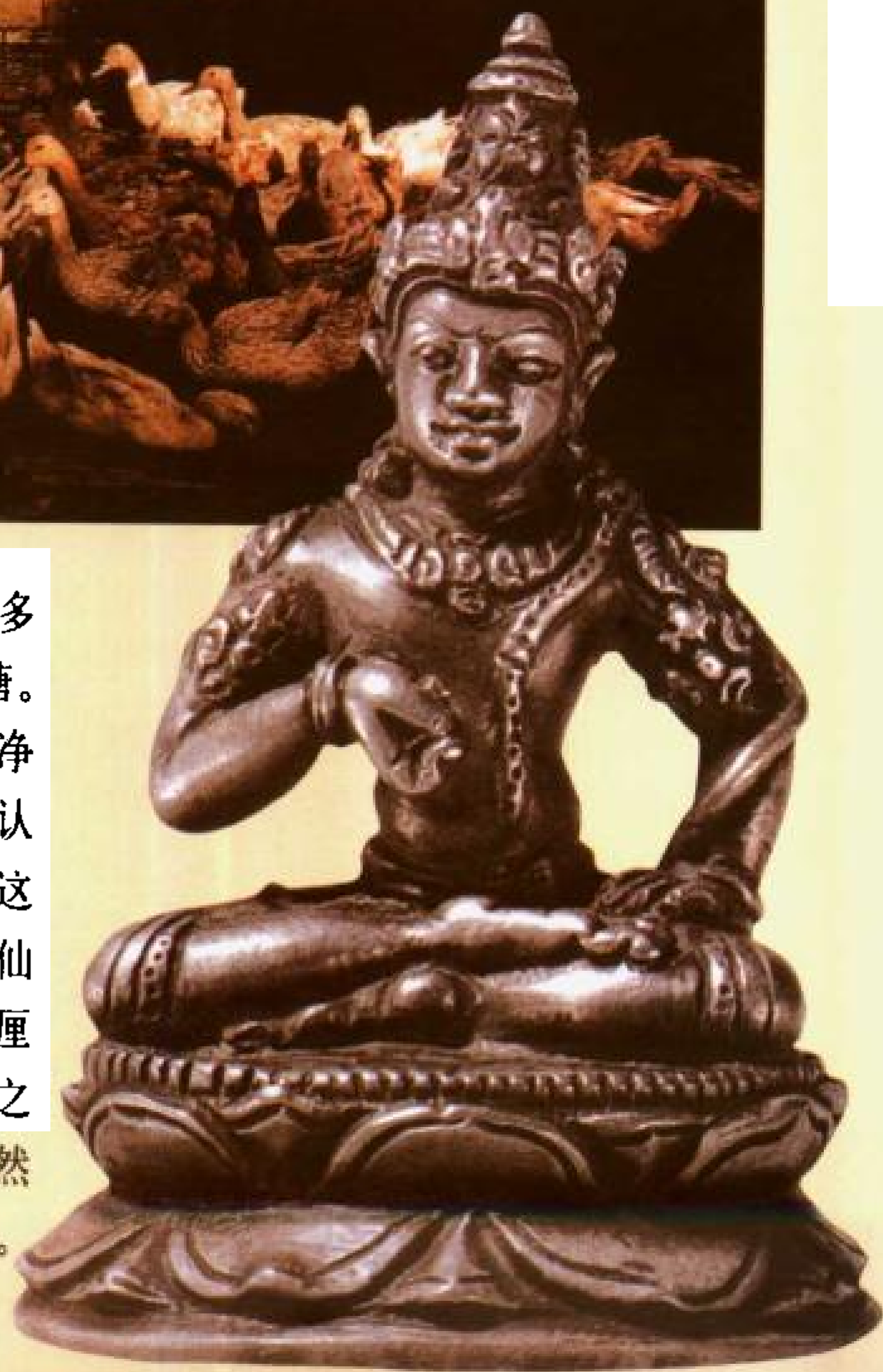
INDONESIA:
AN ISLAND CHANGE



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巴厘岛和苏门答腊岛吸引着印度的商人来到这里。他们寻找香料、金子和银子以及其他的东西。印度尼西亚人敬拜祖先和有灵万物，这种传统由来已久，然而他们接纳了印度教的超自然的神灵，包括许多神秘的创造物，甚至还接受了密宗佛教的宗教仪式。

利用印度宗教中的这些特

点，印度尼西亚人建造了许多神庙，修建了沐浴用的池塘。在印度人的观念中，水具有净化的力量，而在当地，人们认为水能够滋养万物。他们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在上图中，仙女们作为池塘的注水口，巴厘岛上的这个浴池已有1000年之久。今天，印度尼西亚人仍然以独特的方式信仰着印度教。





■ 印度教的神灵毗瑟(上图)站在大鸟坐骑揭路荼上面，系公元9世纪时的青铜制灯具，于爪哇中部发现。举行仪式时，用这种灯在神庙中照亮。



■ 阿迪提亚跋摩(右图)是西苏门答腊岛的最后一位国王，他信奉佛教。此石刻于公元1350年。这位国王站在头盖骨上，仿佛佛教中的恶鬼，手持献祭用的匕首。他皈依的是密宗佛教，信徒需要饮人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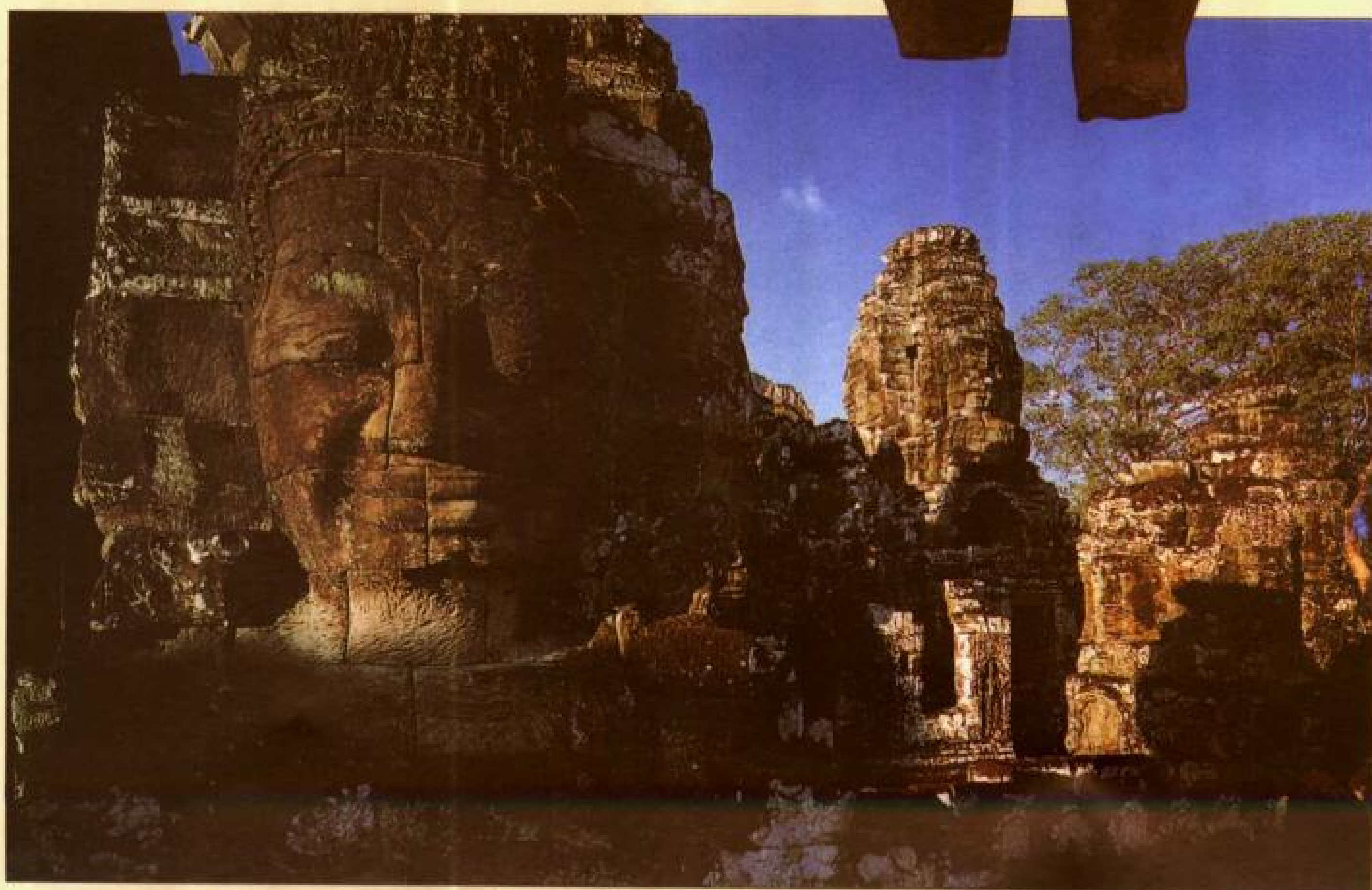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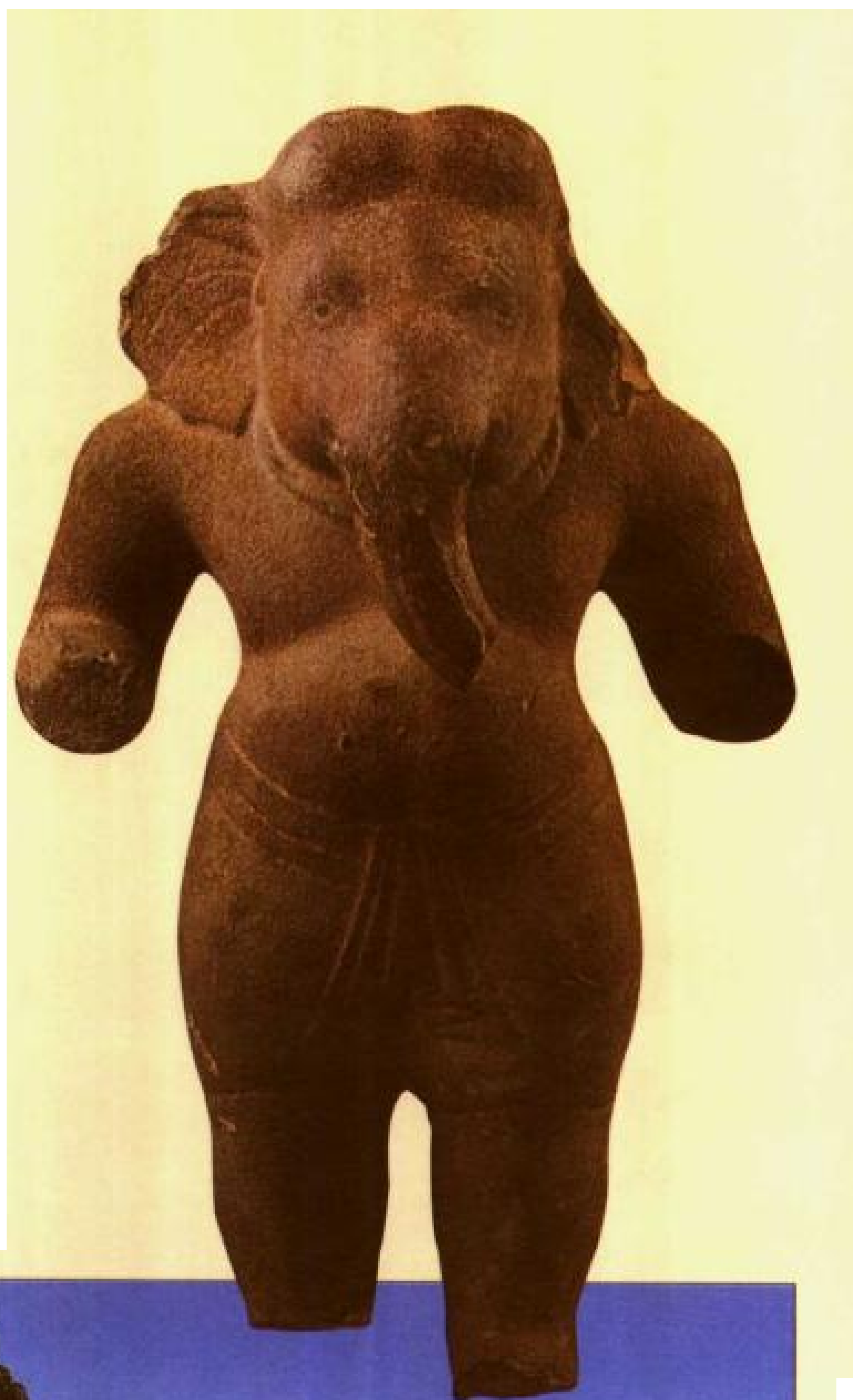
■ 属公元9世纪或10世纪时的银制菩萨像(左下图)，高2英寸，坐于双莲花宝座上。爪哇工匠以善制小型雕像闻名。在爪哇中部和东部均发现许多银制、青铜制和金制小件器物。

柬埔寨的人间天堂

CAMBODIA: HEAVEN ON EARTH

在柬埔寨中部地带，强大的高棉帝国曾在这里兴起。这里的人们将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的信仰纳入自己的智慧和传统之中，并创造了世界上空前的艺术成就。前吴哥时期的刻石工匠已经掌握了圆雕石像的工艺。如公元7世纪时雕刻的印度教幸福之神甘尼莎(见右图)。当时，同时代的印度工匠还在进行较原始的浮雕雕刻。这件作品尚未竣工，装饰极少，人物服饰雕刻简陋，反映出柬埔寨人的风格，后来的吴哥国王的雕像也属于这种风格。

耶跋摩二世于公元802年创建吴哥，此后，高棉人用4个多世纪的时间建造多层次石构神庙，献给印度教以及佛教的神灵和他们的国王，他们认为国王是道成肉身的神灵。通过建造神庙，高棉的艺术家和建筑师相信，他们正在创造人间的天堂。





■ 此为公元12世纪时吴哥寺浮雕的一部分，总长160英尺。此图中魔鬼拉瓦那和他的军队正拖着多头巨蟒搅动海洋，灵巧的天女阿普萨拉斯正在起舞助威（拉瓦那头顶上方）。故事源于印度教的创世史诗《搅动牛奶之海》，为高棉人所喜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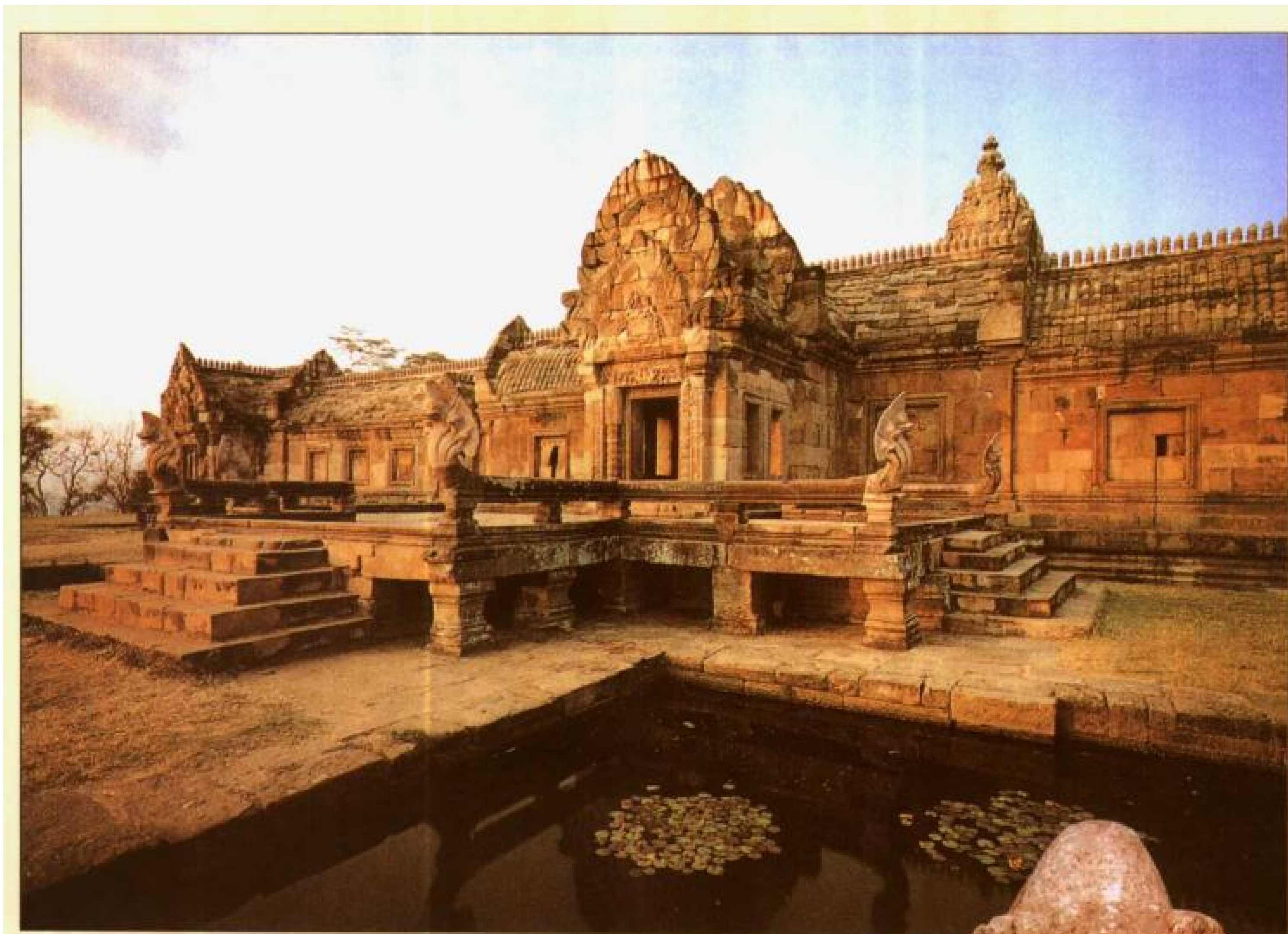
■ 国王的巨大面孔有如富于同情心的观音菩萨。位于吴哥的巴荣寺建筑群石塔顶端。建于高棉最伟大的统治者耶跋摩七世在位期间，巴荣寺建有佛塔50座，共有200个巨大的面孔雕像。

■ 高棉时期吴哥寺常见的人物形象，戴着皇冠和珠宝。此属公元12世纪，高14英寸，镀金青铜制。可能代表印度教的女神乌玛，或属王室女子的造像，她将自己和这位女神等同。



靠近艺术源头的泰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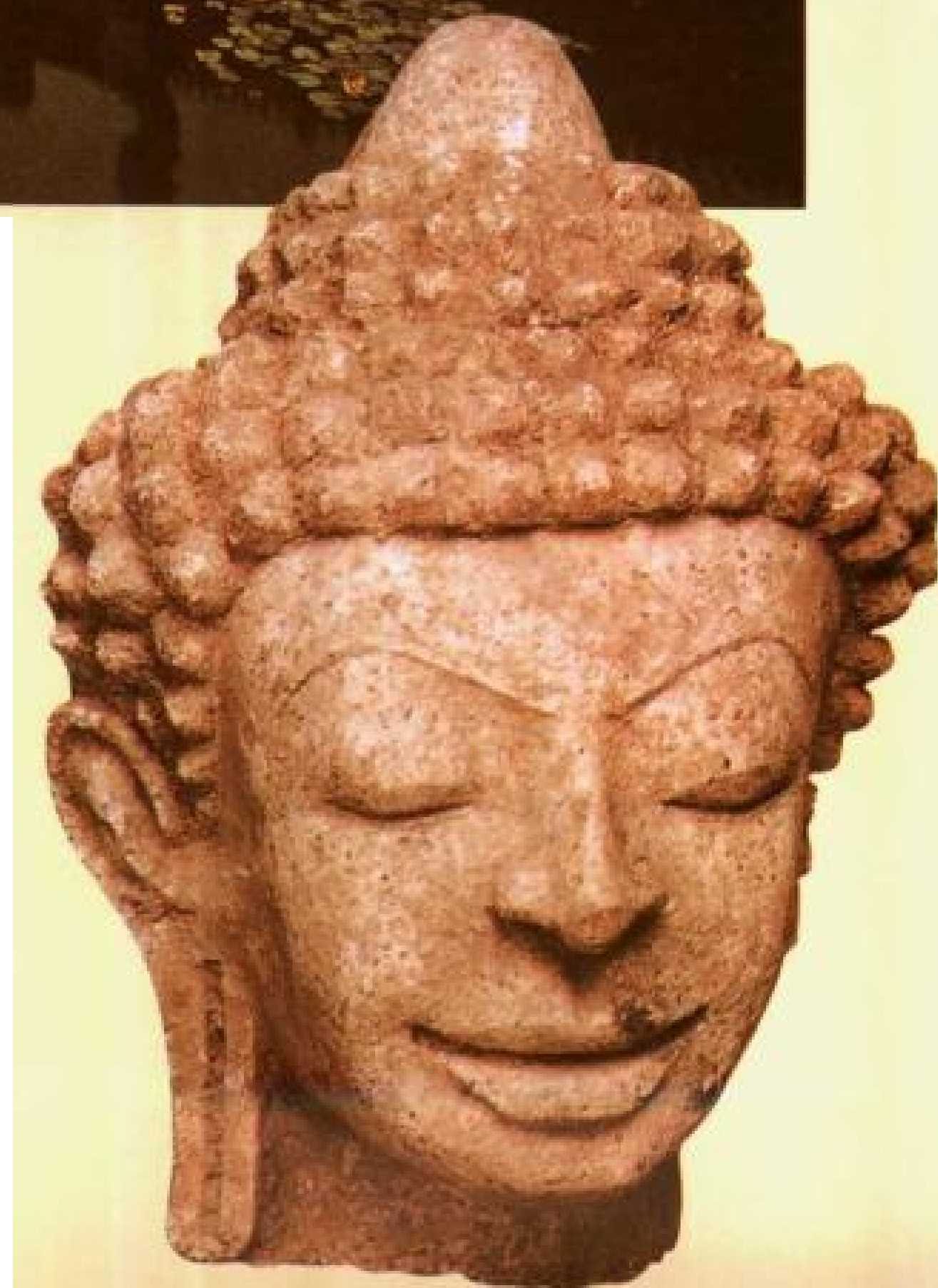
THAILAND:
ART CLOSE TO THE SOURCE



泰国的沿海城市作为重要的港口，印度和中国的商人经常往来于此。这里发现的东南亚最古老的艺术品当中，展示着印度教和佛教的影响。在泰国中部，与孟族人有关的早期佛教文化创造了数千件艺术作品，包括这件公元7世纪时的法轮(见145页左图)。

公元12世纪前后，当泰族人进入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时期，他们还在吴哥时代的高棉

人统治之下，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逐渐在北部的素可泰建立了自己的都城。素可泰时期的圆滑而优美的艺术风格成为泰国的一个象征。泰国是世界上幸存的几个佛教国家之一。在公元11世纪，吴哥时代的高棉人开始统治素可泰王国的部分地区，这时建造了许多高棉风格的神庙，其中包括上图中的这座神庙，其护栏有巨大的毒蛇石雕装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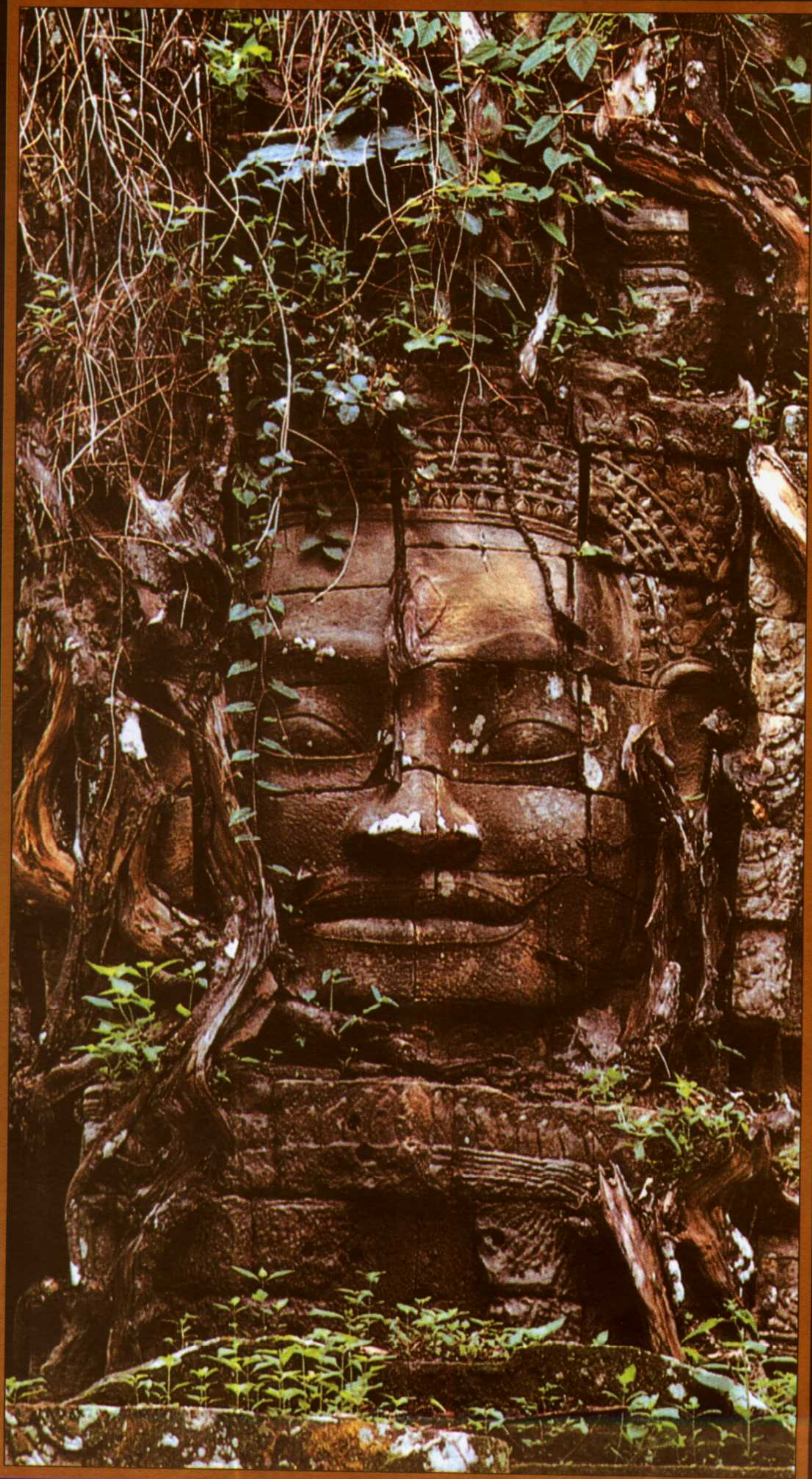




■ 公元7世纪或8世纪由泰国工匠雕刻而成，造型取法于印度，高3英尺，用石灰石雕刻，表现佛教教义原则，称为法轮。鹿暗指印度的鹿园，是佛首次传教的地方。

■ 素可泰青铜铸像的精品。这位公元14世纪的人物造型即为“行步佛”。素可泰的工匠最早制作圆雕动感佛像。佛像的右脚抬起，左手半举，这个姿势即所谓的“消除恐怖”。

■ 在泰国的那空帕松遗址出土，高11英寸，灰泥佛头。公元8世纪时制作，露出孟族人的面部表情。孟族人在此期间占领了该地区。



艰难的文物保护之路

LESSONS IN
CONSERVATION
LEARNED THE
HARD WAY

1969年夏，越南战争期间，在米山周围地区，战火纷飞。这里有占族人所建造的古代神庙。在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从公元4世纪直到公元13世纪，占族人控制着越南的滨海平原地区。米山位于越南中部城市岬港西南约43英里，神庙建筑群是经过几代统治者共同建造完成的。最早的木构基础建筑已经消失殆尽，然而从7世纪开始，使用砖和砂石所建造的庙宇依然存在。到公元12世纪的时候，建筑工程基本结束，大约70座宗教建筑已经在米山落成，使这块神圣的地区别具规模，而且地位重要。其中约有20座现在仍然存在于米山。

米山塔是神庙的中央建筑，高70英尺。在那个战斗激烈的夏季，越军用这里作为隐蔽地点和军火仓库，并在塔顶安装无线电发射机。1969年8月8日，一轮又一轮的空中轰炸未能将塔摧毁。此后，美军的一支突击队潜入到这里并安放了炸药。随着一声爆炸，占族人的建筑杰作被化为一堆碎石。

在战火连绵的20世纪，东南亚的许多建筑遗产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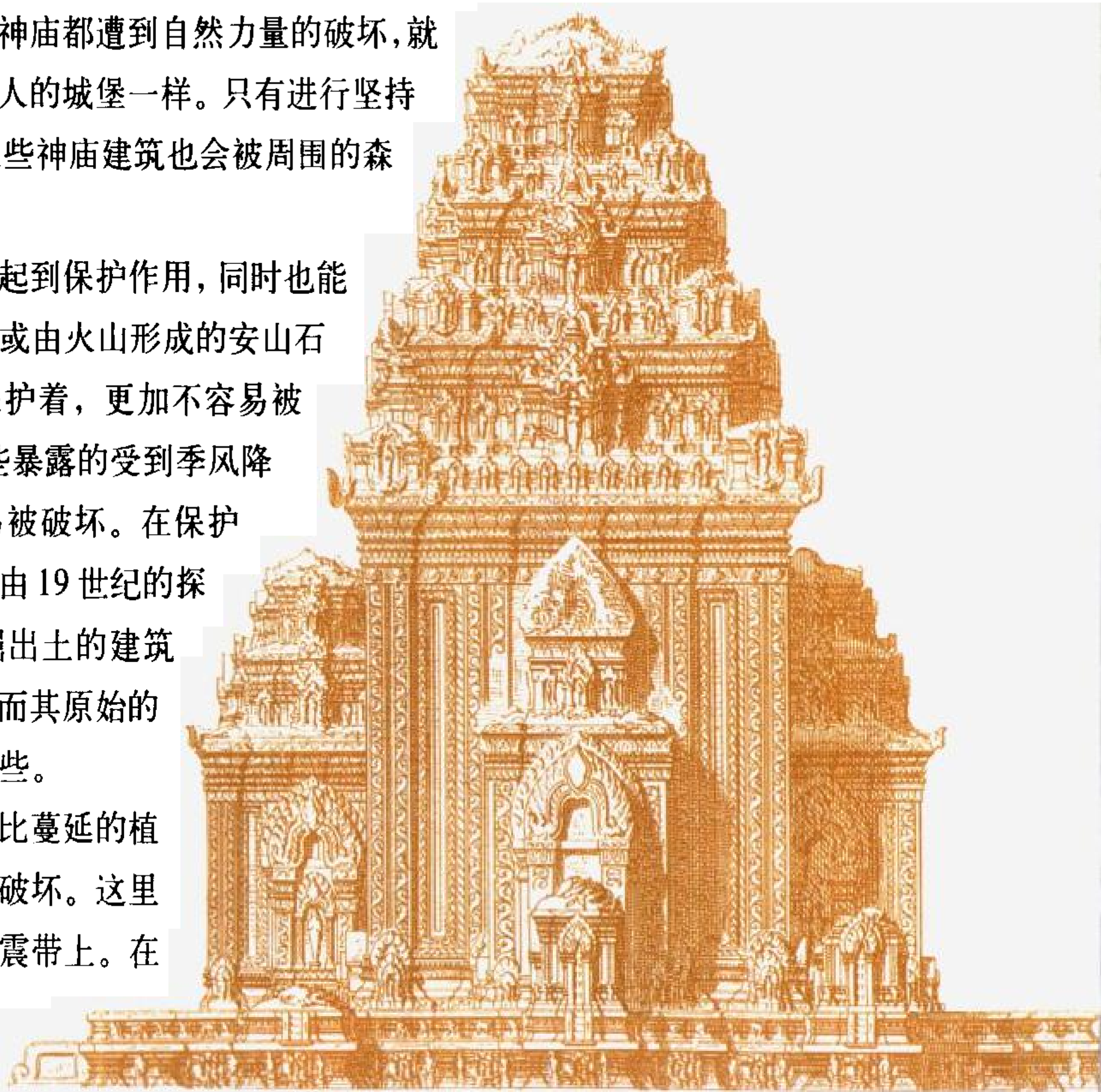
■ 装束像佛一样的国王，面容慈祥，在吴哥的达松，隐在丛林背后。无花果树在他的头顶盘枝绕节，像用树叶为国王织了一顶王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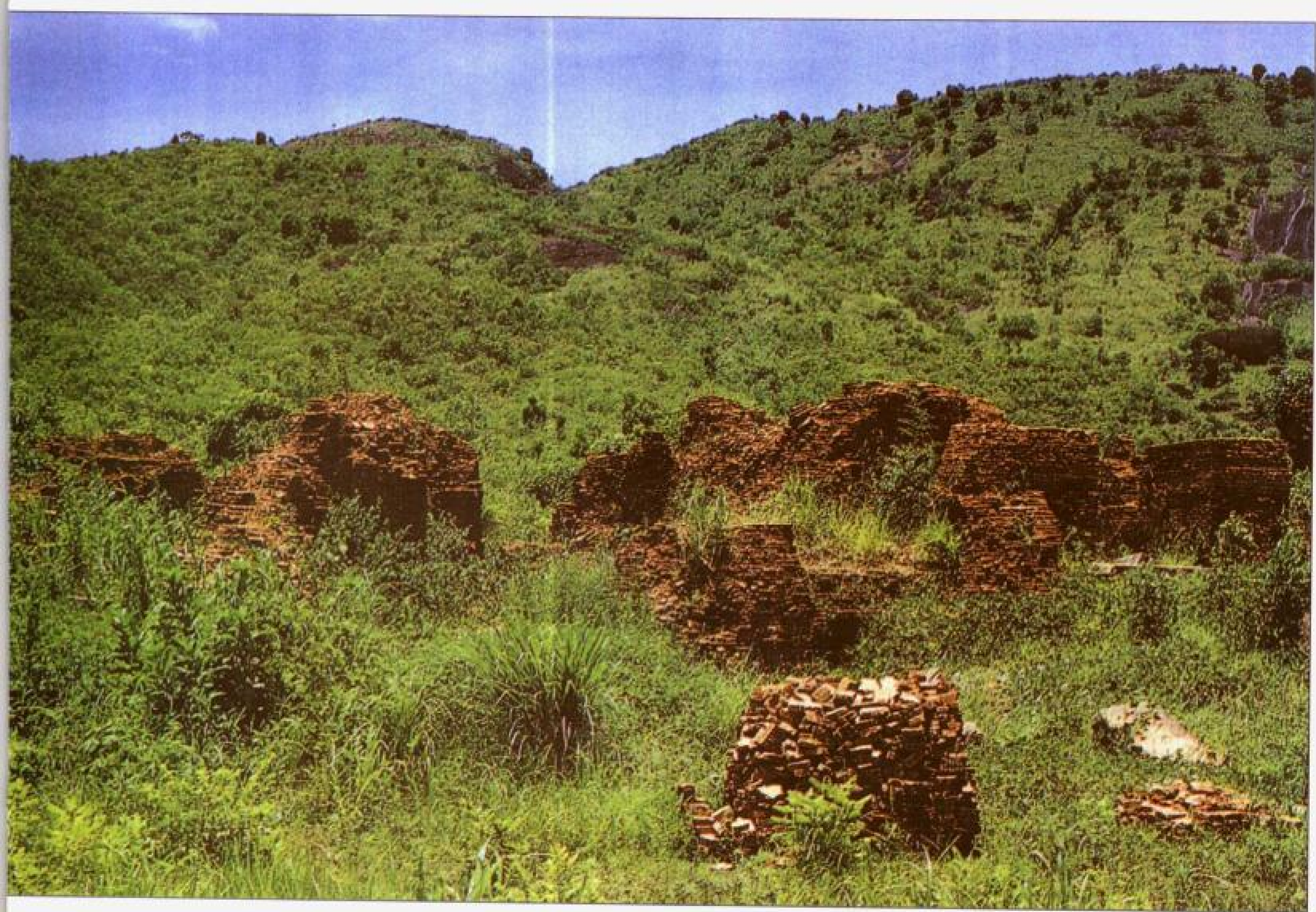
面临同样的危险命运，米山只是其中一例。冲突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这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这里发生了一系列的反殖民斗争和独立战争，随后，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共产党领导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1975-1979年，随着红色高棉的胜利，这里的情况更加复杂。在20世纪80年代，这里出现了一丝和平的迹象。直到今天，政治上的分化仍然是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障碍。

对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这里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里的热带植被时时有机会对人文建筑造成破坏。几个世纪以来，婆罗浮屠和吴哥的许多神庙都遭到自然力量的破坏，就像童话故事里的睡美人的城堡一样。只有进行坚持不断的保护，否则，这些神庙建筑也会被周围的森林所吞没。

然而自然界既能起到保护作用，同时也能成为破坏力量。砂石或由火山形成的安山石浮雕被一层腐殖质保护着，更加不容易被侵蚀，相比之下，那些暴露的受到季风降雨侵蚀的浮雕更容易被破坏。在保护不利的情况下，那些由19世纪的探险家和考古人员发掘出土的建筑被破坏的风险更高，而其原始的保存条件显得更安全些。

其他的自然现象比蔓延的植被可以造成更严重的破坏。这里的大部分地区位于地震带上。在1975年，这种破坏力量明显地显示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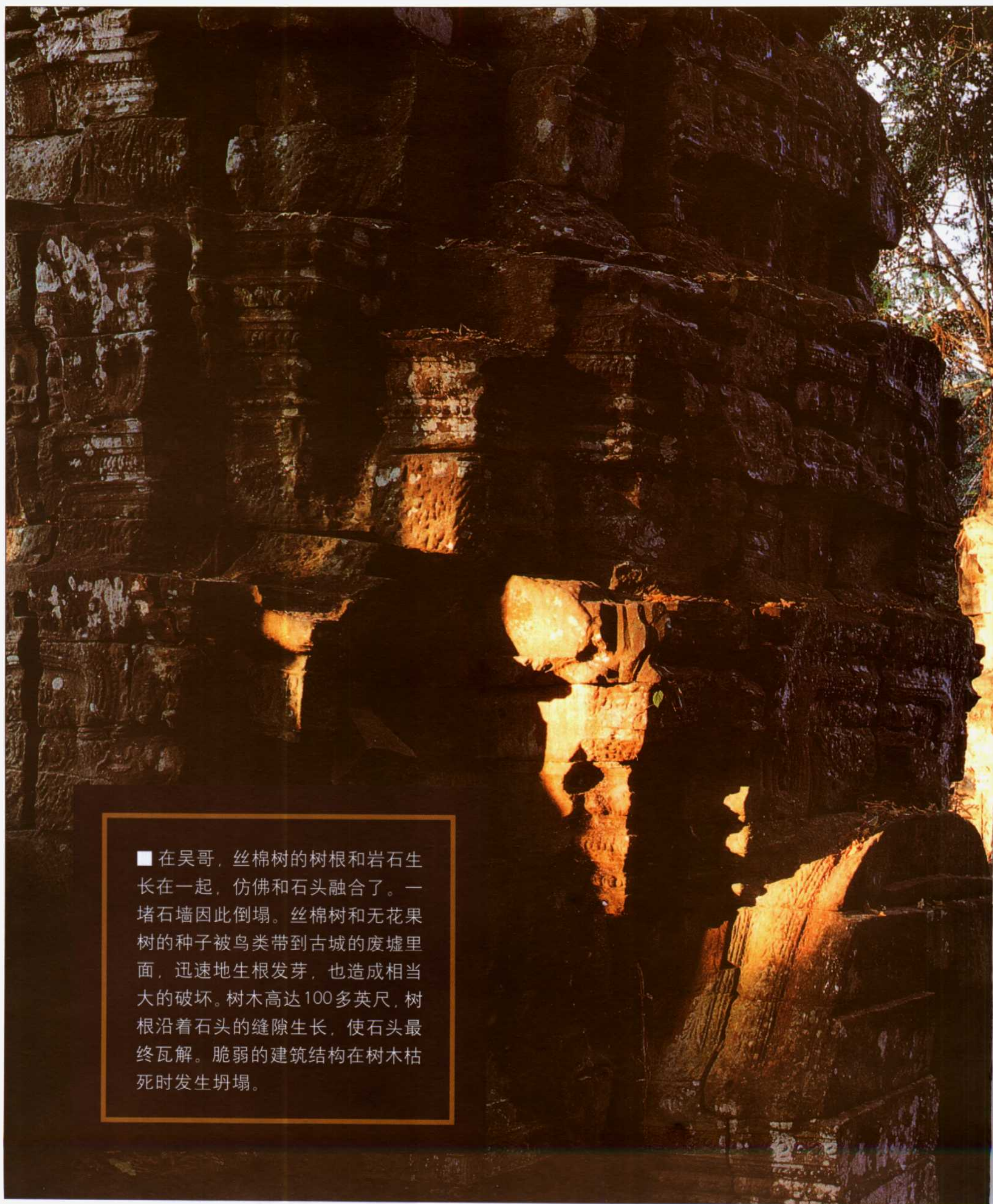


■ 1900年，法国考古学家、建筑师兼艺术家亨利·帕门蒂尔到达越南，研究占族人的建筑。这是一座由占族人建造的代表性建筑（见左图），为一座装饰豪华的米山佛塔，1969年被美军摧毁，现只剩下一堆乱石（上图）。帕门蒂尔在东南亚度过余生。他在米山创建了一个考古中心，并于1949年他在金边去世之前不久发表了他对占族人艺术和建筑的系统研究论文。

当时在缅甸的古都蒲甘发生地震，所有的神庙被地震摧毁。地震学上的证据显示，这里存在再次发生地震灾难的危险。

然而，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对东南亚历史文化建筑最严重的破坏并非由自然所造成。人类的掠夺尤其是对石雕和浅浮雕品的掠夺，几乎是所有重要遗址都面临的问题。东南亚古董市场的增多，充斥着人们从遗址中砍锯和偷窃来的文物。政府为制止掠夺而出台了各种条文规定，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条文规定实行起来困难重重，而且在发生战争的时候根本就成了一纸空文。这里的文化遗产长期以来遭受着严重的破坏。

对考古遗址的掠夺而言，不独发生在东南亚，世界



■ 在吴哥，丝棉树的树根和岩石生长在一起，仿佛和石头融合了。一堵石墙因此倒塌。丝棉树和无花果树的种子被鸟类带到古城的废墟里面，迅速地生根发芽，也造成相当大的破坏。树木高达100多英尺，树根沿着石头的缝隙生长，使石头最终瓦解。脆弱的建筑结构在树木枯死时发生坍塌。





上的其他地区也有发生。例如在拉丁美洲，印加和玛雅文化遗址上的文物被盗，并有着活跃的贸易市场。有些专家估计，即使到现在，仍有大量古埃及的文物被从塞加拉的古代墓场上盗走，那里建造有埃及的第一座金字塔。

东南亚历史文化遗址的诸多破坏性因素当中，包括战争、地震、自然力量的肆虐和人为的掠夺，由战争造成的直接破坏是最少的。从这方面看，不幸的米山塔案件属于例外，而婆罗浮屠则是一个更典型的例子。爪哇战争是19世纪发生的土著人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一场战争，在战争期间，战斗在神庙附近进行，战斗双方都没有把神庙用做军事目标，神庙也因此战争中保存下来。

在近代历史上，吴哥所遭受的最大威胁是在20世纪70-80年代连绵不断的柬埔寨内战。内战各方互相残杀。在1972年以后的10年里，西方人被禁止进入神庙周围的地区。有传闻称在战争期间神庙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在最后又被允许进入该地区的时候，考察人员高兴地发现，吴哥的大部分古建筑依然保存完好，交战各方没有对这些古老的建筑进行破坏。一位美国的记者在1982年到吴哥访问，他发现在浮雕和雕像上偶然能够找到弹孔，而吴哥寺的一块著名的浅浮雕被弹片炸出不少的麻坑。对于庞大的古寺庙建筑群而言，这点损坏是轻微的。他在对建筑进行考察后在报告中写道：“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在经过数年的战争以后，这些建筑几乎没有受到损坏。”尽管物理上的损坏相对较少，而政府垮台所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在战争以前，吴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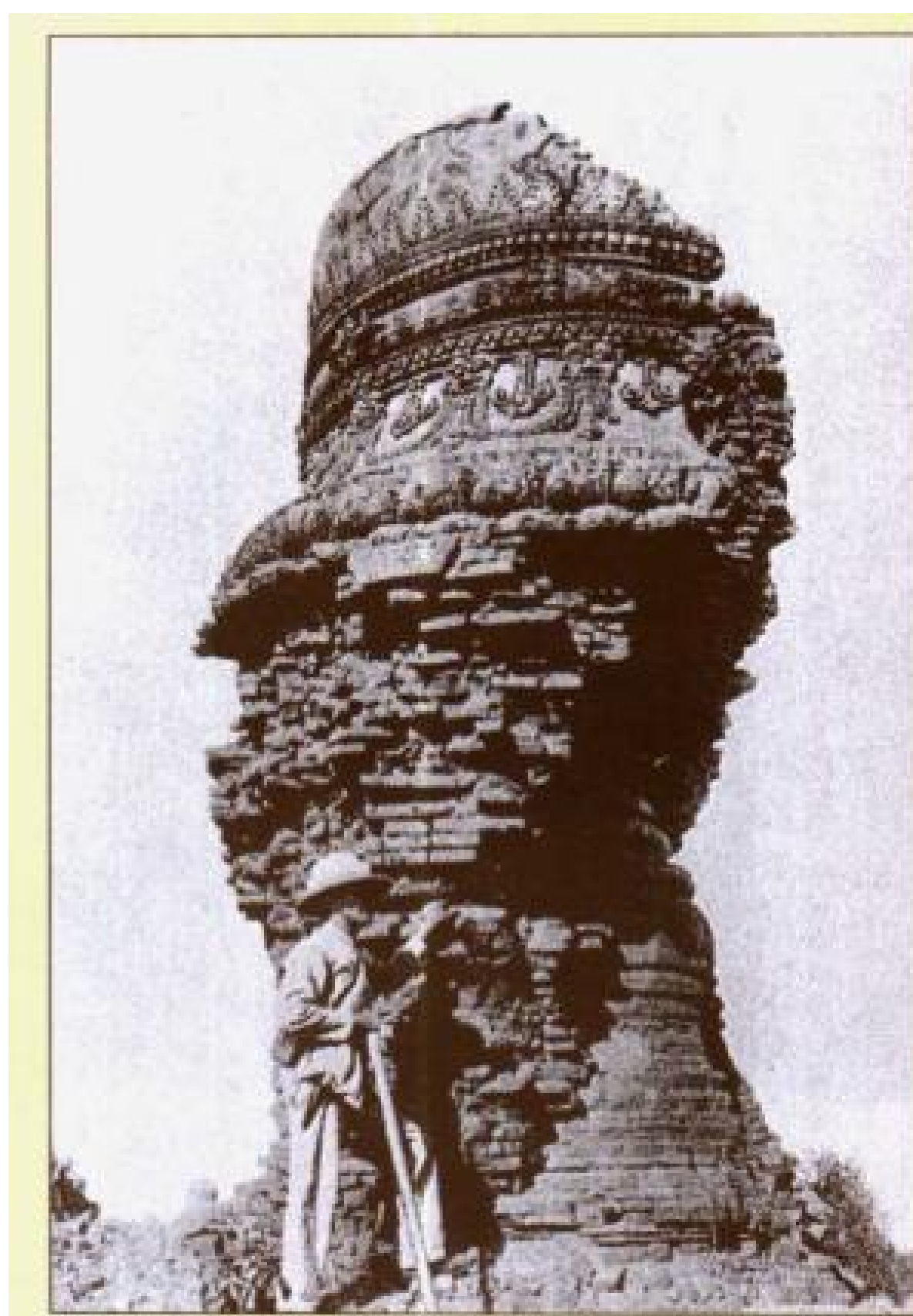
掠夺和贪婪 导致的悲剧

A SORRY STORY OF PLUNDER AND GREED

19世纪90年代晚期，在经历几年的战争和动荡之后，缅甸专门从事货物和邮递服务的公司开始使用汽船提供服务，将欧洲的游客运往古城蒲甘参观游览。西奥多·托曼是众多游客中的一位。他是德国人，还有五个同伴，他们于1899年6月到达蒲甘。他们在伊洛瓦底江畔的一座寺庙中安寨宿营，并开始掠夺古神庙的珍贵财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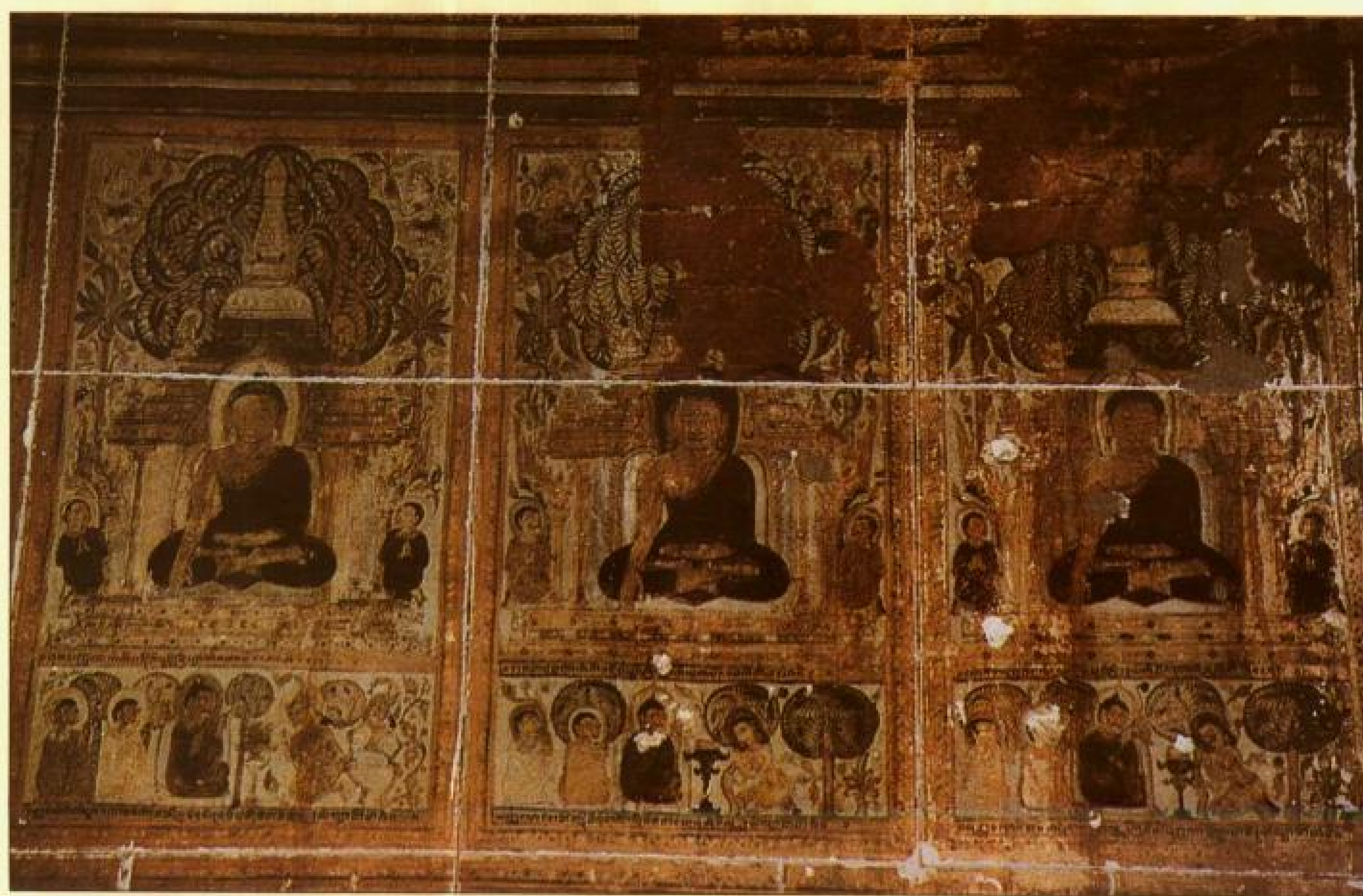
他们凭借德国皇帝的一封信，可以随意进出这些古代遗址。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毫不留情地从神庙中盗走数百幅壁画。在当局得知这宗盗窃案件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珍宝已被运往德国。托曼被驱逐出缅甸，回到老家。经过数月的谈判，他将这些文物卖给汉堡博物馆，自己捞了相当大的一笔钱。

■ 这是未遭德国人盗窃的一幅壁画，上有盗贼留下的切割痕迹，盗贼通常用锯将壁画取下，给这些无价之宝造成难以修复的损坏。



■ 1923年，西奥多·托曼发表了描写蒲甘的一本书。书中含有遗址的照片。包括此处的两张照片在内，许多照片中留下了

他们在废墟上冒险的经历。托曼以人种学和考古学博士的身份进出这些遗址，他身着旅游服装，照片中的他表现得自信而从容。



保护组织负责对这里的古建筑进行维护，这是一个装备精良的组织。它拥有上百种车辆，其中包括一台200英尺长的起重机，还有装备有空调的实验室以及电厂和气象站。维持保护工作的收入由柬埔寨政府、



西哈努克亲王、法国以及每年多达7万的游客共同提供。两家豪华的宾馆在最近建成，以求吸引更多的游客。

敌对各方的斗争迅速改变了这种局面。1972年，法国负责保护的一位学者伯纳德·菲利普·格罗斯利尔遭到驱逐。直到1981年，当他首次试图继续开展工作的时候，游客人数已经锐减，由柬埔寨人担任的保护组织新任负责人所能够获得的技术资源只剩下一辆卡车和一辆自行车了。

更令人悲痛的是，由格罗斯利尔所培训的那些柬埔寨人多数已经被杀害。红色高棉在1975年占领金边。在四年统治期间，他们梦想着重温吴哥帝国自给自足农耕社会的辉煌岁月。在追求这种幻想的过程中，城镇被清空，中产阶级以接受政治再教育为名，被迫在农民代表的监督下从事田间劳动。红色高棉的理想和他们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没有能够充分利用那些可以帮助他们保存吴哥文明并重温辉煌的资源。

■ 此为罗马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的一名成员，正在清理在1975年地震之后于蒲甘佛教寺庙发现的12世纪的一块织物残片。这块布料已相当易碎。在该中心里，由卡罗·吉安托马西和扎利·唐纳提拉夫妻领导的研究小组，通过一年多的辛苦工作，像做拼图游戏一样，他们对布画进行了恢复整理。

■ 此彩绘长55英寸，宽32英寸，历经近1000年之后仍然色彩鲜明。上面绘有佛的生活场面。显示出画工和修复人员的技巧。修复人员称，“其色彩至今仍然相当细腻，显然没有经历过多的温度和湿度的起伏变化”。此外，没有阳光直射、尘土和各种污染物的破坏也相当重要。







吴哥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然而又再次遭到自然力量的破坏，因为年久失修的缘故，其建筑结构显出危险的征候。战争还为这里留下更多危险的纪念品。直到今天，雷区还一直困扰着这里，人们踩上被埋在地下的地雷，经常造成人员的伤亡。现在，对于负责保护古建筑的人们而言，首先需要完成的任务之一就是确认危险地区，并建立明显的禁区标志，以防止造成更多的伤亡。游击队的活动也迟迟不肯撤退。1995年，红色高棉的战士在丛林和吴哥北部之间活动，他们能够对公元10世纪建造的邦提斯雷神庙进行短暂的控制，如果他们受到进攻，他们威胁要摧毁掌握在手中的这座古老的建筑。

在内战中吴哥所遭受的破坏经历了20年的时间，然而蒲甘古建筑被摧毁则发生在几分钟之内。1975年7月8日，这里遭受地震的袭击，这次地震被称作“大概是现代历史上在考古区所发生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砖结构的建筑发生断裂和坍塌，小型的建筑几乎全部被毁，许多无法移动的壁画遭到破坏。

然而在遭到地震破坏的同时，一些以前未被发现的珍贵的东西也在地震中显露出来。蒲甘的建造者经常把一些小的物件封存在为神庙增添光彩的佛像里面。地震的力量使其中一些佛像裂开，在900年的时间里首次使这些东西重见光明。画在棉布上的一张彩图描绘了佛的生活场景，这幅彩图就是因为地震而被发现的。它被卷在一节竹竿上，放在一尊佛像的手臂里面。另一幅类似的图画在神庙顶部的一个残存的房间里被发现。在这些发现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系列的坐姿佛像浮雕，佛像的四周描绘着这位宗教领袖的生活故事。最精美的一块浮雕其尺寸仅有5英寸×2.5英寸，然而却包含了78个单独的人物。不幸的是保存下来的佛像大多数现已被希望发现更多珍宝的人们所毁坏。

战争和自然灾害对单个遗址造成损坏，然而几乎所有的遗址都存在被掠夺的问题。即使是蒲甘也遭到同样的破坏，尽管缅甸

于1948年从英国独立出来以后，历届政府对文物的移动都加以限制。有传闻称外国使馆的官员在外交邮袋中把文物走私运出国境。

在 1814年被重新发现以后的100年里，婆罗浮屠丢失了很多艺术品。神庙顶部的神殿中的文物在神庙被发现后不久就被移走，而现在已经丢失。有人暗示整座建筑的修建是为了拥有一座巨大的遗骨箱，来存放佛的一部分遗骨，这是由公元前3世纪时的印度统治者阿育王从原来的存放地分出来的一部分遗骨，以便于同世界各国分享保存。然而根据一份报告，现在人们所知道的神殿中存放的东西是一个金属瓮，里面有少量的一些灰烬，还有一些金属塑像以及一些钱币。

曼都特是距婆罗浮屠2英里远的一座属于同一时代的佛教神殿，盗贼也早已侵入到这里，在1836年对这里进行清理之前，他们洗劫了曼都特。工作人员在火山灰和热带植被的下面把这座神殿挖掘出来，发现其墙壁已经被洞穿，寻宝者或者运走或者砸碎了神庙中所有的单个雕像。

在婆罗浮屠，大约从19世纪中期开始，随着游客的增多，文物被盗问题日益严重。在1850年以前的某个时候，在神殿的最高处建造了一个小棚子，里面还有一个石头座位，以便游客能够舒服地欣赏这里的景色(见117页)。有人坚持要拿走一些浮雕和雕像作为旅游纪念。当地的村民使情况更加复杂，他们从古建筑上取下石头作为方便的建筑材料。在19世纪80年代里，曼都特的一部分被卸除以供建造桥梁使用。

在这一段不幸的岁月里，古建筑的保护工作由当地政府经营的宾馆经理掌握，监督工作很不充分。据称在附近驻扎的士兵用婆罗浮屠的石头佛像来磨剑，而军官们则在晚餐会结束后模拟对神殿发动进攻。

更糟糕的是在荷兰当局明知并准许的情况下，外交人员对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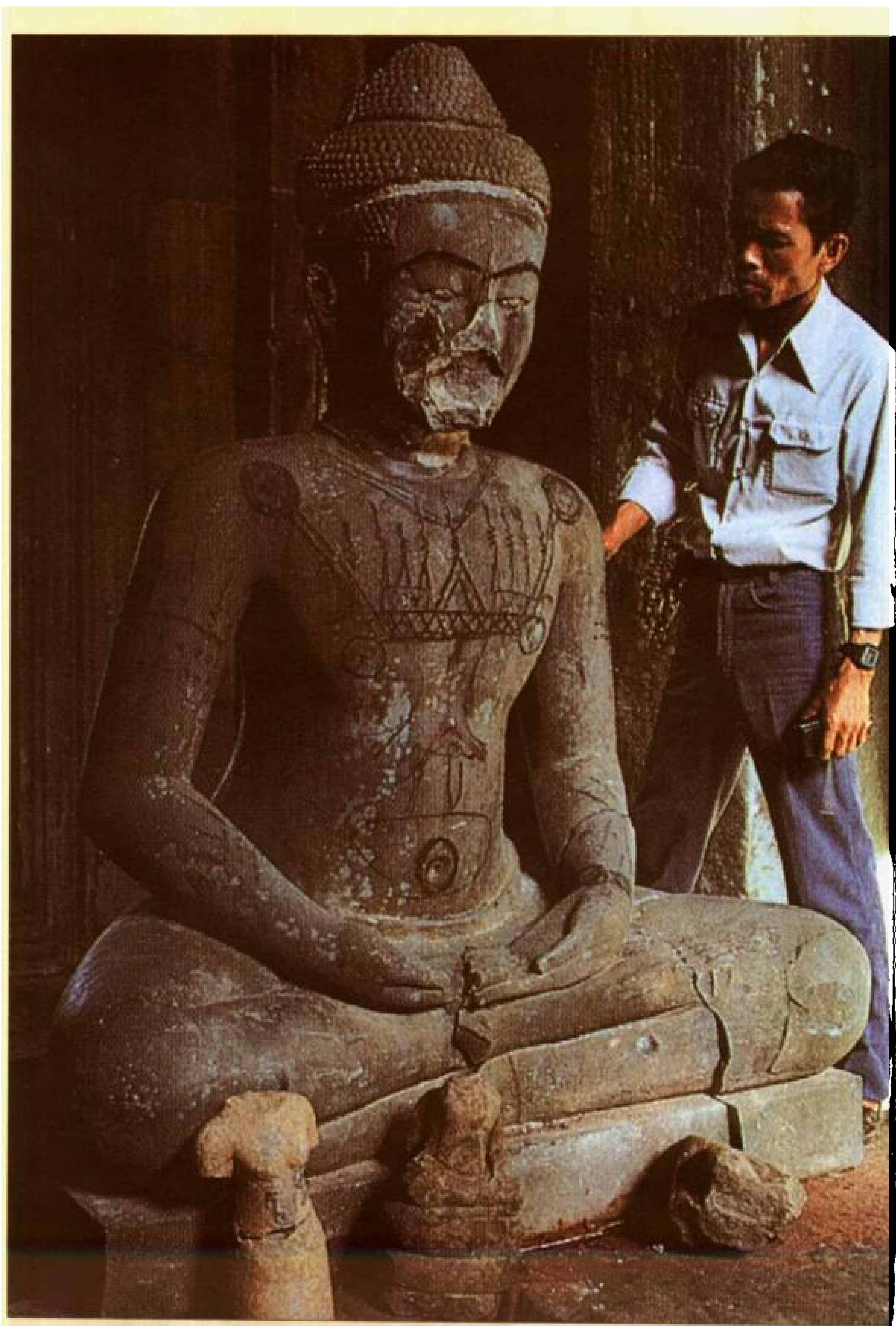
经历过战争与和平 的吴哥

WAR AND PEACE
IN ANGKOR

柬埔寨人皮克·乔是一位幸存者(见右图中的照片)。他和法国远东研究院院长伯纳德-菲利普·格罗斯利尔合作多年,以保护和修复吴哥的古神庙建筑。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战争迫使法国人离开柬埔寨,这位年轻人不得不依靠自己顽强地生存下去。皮克·乔是幸运的。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数百万人包括几乎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被杀害。有幸存活下来的少数人也被下放去稻田里,为新政权而劳动。

1979年,越南人将红色高棉从吴哥赶走,皮克·乔和其他数百名原来的工作人员回到这里。他们发现神庙建筑群长满了杂草和丛林,这里到处是垃圾,并贴满了寻找失散亲人的寻人启事。事实并不像皮克·乔听说的那样,战斗在神庙中进行以及神庙被摧毁的消息属于谣传,不是事实。尽管年久失修使古建筑严重受损,但由战争所带来的破坏却微乎其微。

在皮克·乔回到吴哥后不久,他被任命为吴哥保护委员会主席,他手下的工人、供应和装备都很少,甚至根本没



有，就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开始在越南士兵的严密监视下，维修和照管这些古建筑。然而在数年之后，柬埔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终达成协议，由国际社会提供财政援助和专业技术，保护和重建工作才得以真正开始。现在，一些柬埔寨人在这位有决心的年轻人的带领下，正在拯救这项世界上最宝贵的遗产之一。

建筑进行故意的破坏。这是一种极不寻常的行为。1896年，暹罗国王到婆罗浮屠进行正式访问。东道主让这位国王随便挑选属于神庙建筑结构之外的任何艺术品。这位国王是亚洲艺术品的鉴赏家，他把佛像和浮雕装了八大车运回曼谷，其中的很多都属于上品。新的世纪开始不久，一位外国的观察家称：“与其说爪哇古建筑失于维护，不如说其中充满了各种丑闻。”这种说法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事实上，这种情况到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得到改善。1900年，最终筑起了围墙对这个遗址加以保护，另外还雇用了看守人员进行把守。还成立了一个研究建筑状况的团体，并在1902年公布一份报告。这标志着对古建筑进行严格保护的开始。如今，婆罗浮屠是这里具有考古价值的遗址中得到最好保护的一个(也是参观人数最多的一个)。而且在很多方面也是其他当权机构学习的榜样。

泰国的班奇昂特别需要吸取婆罗浮屠的教训。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和东南亚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遗址相比，班奇昂受掠夺者的破坏更加严重。史蒂芬·扬发现这里埋藏着距今2000年到5000年的古代陶品，已经掀起了谋取利润的狂热，这几乎使这块遗址的考古研究价值完全消失。

官员们的重视以及可供发现的宝藏日益减少，到20世纪70年代末，班奇昂的非法挖掘才最终得到控制。然而不幸的是，掠夺仍然在继续。寻宝者将目光转移到这里的其他墓葬区。领导发掘东南亚遗址的考古学家切斯特·戈尔曼对掠夺所造成的破坏感到吃惊。1981年，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在《艺术研究新闻》杂志上发

■ 皮克·乔正在检查吴哥的一尊佛像。佛教信徒给佛像画上纹身，希望可以由此带来护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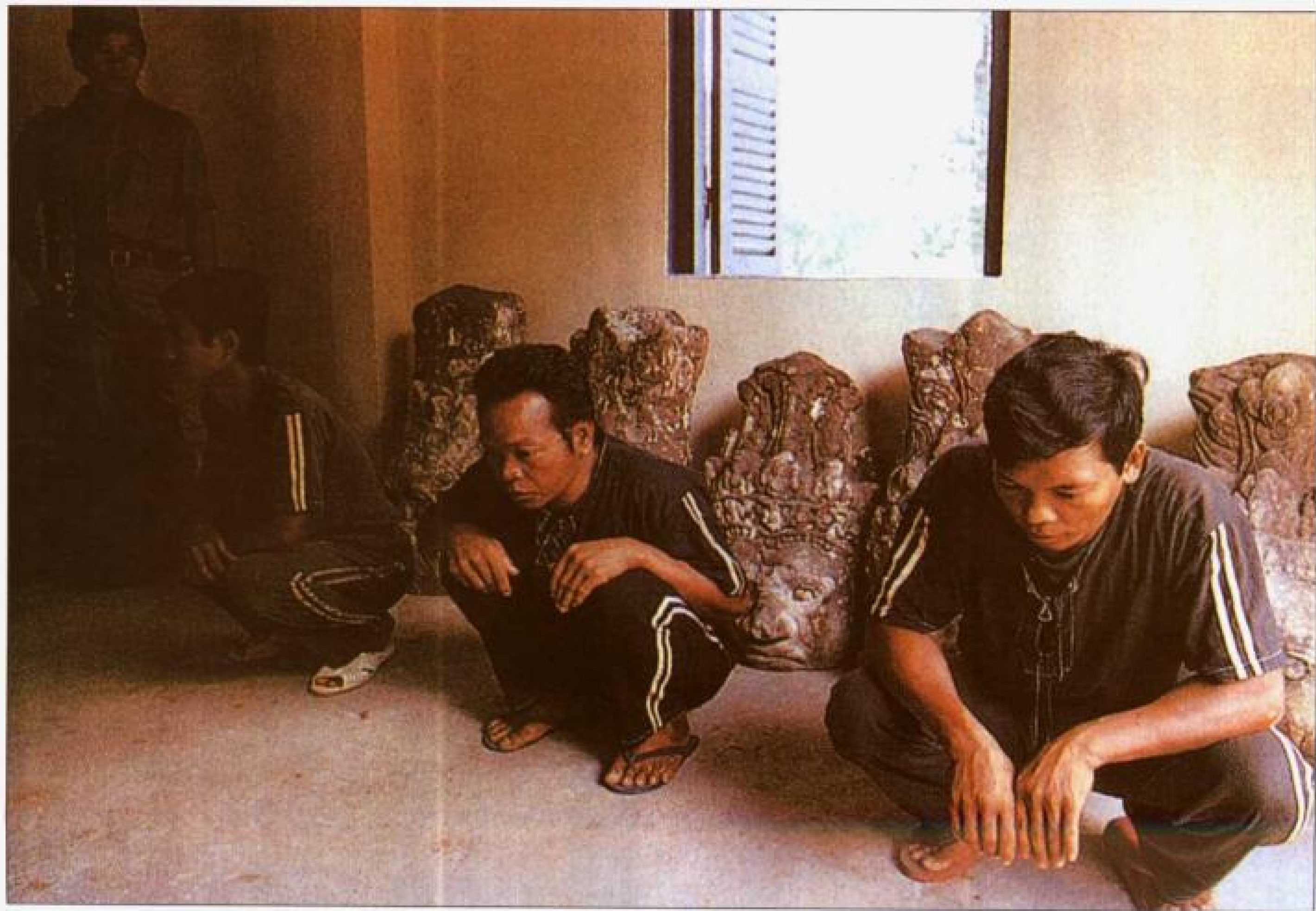


■ 雕像的头已被砍去，在黑市上可以卖个好价钱(左图)。吴哥古神庙建筑中精美的雕像和浅浮雕遭到令人痛心的破坏。尽管近年来大宗的盗窃案已绝迹，但对遗址的掠夺却由来已久。墙壁上的洞眼显示，墙上曾有青铜壁板装饰。在古代，这些饰物相当有价值，贴墙金属板是最容易的掠夺目标。

■ 盗贼蹲在所偷窃的雕像中。照片摄于吴哥城外的暹粒警察局。数年的战争和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导致法律保护缺少力度，执法工作缺乏效力，安全措施不够周密。柬埔寨和泰国的500英里长的国境线没有设置边防保护力量，使文物更容易流失到境外。当地的农民每提供一件雕像，仅获得10美元，而在黑市上，其价钱可以卖到数倍不止。

表文章，对文物保护所面临的问题表示关注。在这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一些泰国人和外国社团里的人物如何“利用他们的地位和财富对科拉特高原上的重要遗址进行了全面的破坏”。他失望地指出：“在最后5年的考察期间，找不到任何一个未被掠夺的遗址。”

班奇昂在20世纪70年代遭到严重的掠夺，而在接下来的10年里，黑市交易的目光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吴哥。长期以来吴哥已经遭到掠夺。最臭名昭著的当属法国作家安德雷·马尔劳克斯，他后来在二战英雄查理·戴高乐将军任总统期间担任文化部部长。在1923年，他还是一位21岁的年轻人，他和新婚妻子从巴黎出发，明确表示要从新近发现的邦提斯雷偷一块浮雕回来。他在金边被逮捕的时候人赃俱获，并被判处3年监禁，经请求缓期1年。事实上他从来也没有服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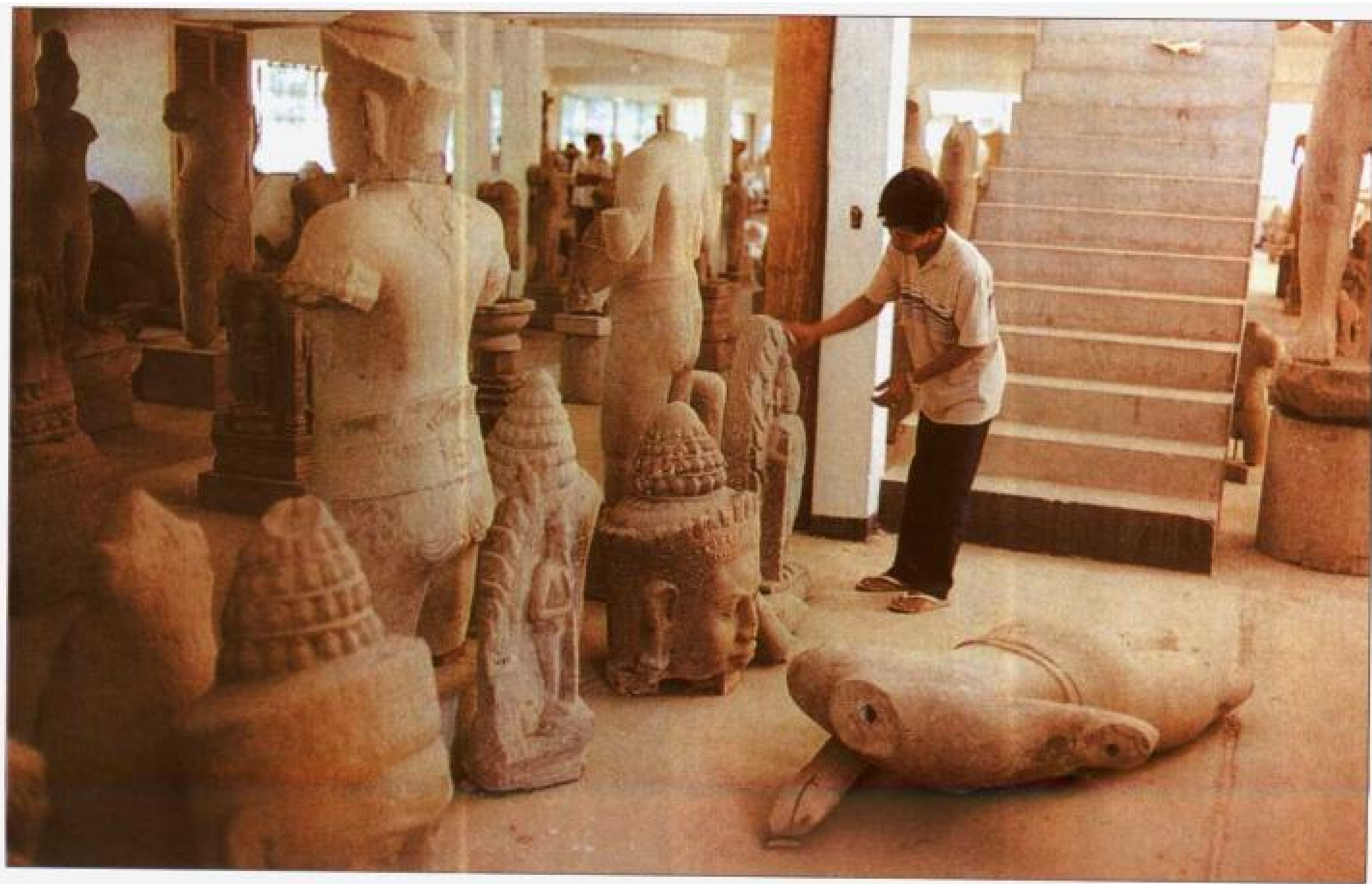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盗窃问题的严重程度足以使监管古建筑的法国方面采取预防措施。有些重要的文物被送到金边国家博物馆收藏。其他有价值的文物被保存在吴哥保护团体的仓库当中，这个仓库建在遗址上并有人把守。

值得注意的是在红色高棉掌握政权的20世纪70年代晚期，掠夺现象几乎被完全杜绝。柬埔寨的民族主义分子将吴哥的历史看作黄金时期，并对古建筑进行严格的保护。人们对政府所实行的严厉措施感到恐惧，所以掠夺现象被有效地遏制住了。

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由越南支持的洪森政府入主金边。红色高棉的军队利用丛林开展游击战，吴哥地区成为交战区。

到20世纪90年代，政府对这个地区的控制仍然不稳固。不稳定的形势对艺术品的盗窃活动相当有利。有

■ 此图为法国远东研究院吴哥保护组织的仓库。建于20世纪初，并于1966年扩建和改建，以增加实验室和修复工作房。当伯纳德·菲利浦·格罗斯利尔领导的法国考古队被迫于1972年撤退的时候，这里是存放高棉艺术精品的地方。该仓库曾有4000余件作品，在柬埔寨接管以后，现在仅存有雕刻2400件。



传闻称，红色高棉也放弃了原来的原则，开始掠夺雕像并越境卖到泰国，以换得硬通货币来继续他们的斗争。泰国的军官经常光顾曼谷的艺术品市场，并积极参与这种有利可图的贸易活动。其他人无疑也利用这种混乱的局面以谋取利润。

尽管局势昏暗不明，然而可以确定的是高度有组织的盗窃活动正在进行，其中包括武装集团首次对吴哥保护团体的仓库进行直接袭击。1993年，一支突击队装备着手榴弹和火箭发射器破墙而入，并运走10件有价值的石雕作品。在两个月后的另一次袭击中，有9名看守人员被劫持，他们用枪强迫这些被劫人员将佛头雕像运到周围的乡村，然后才释放这些看守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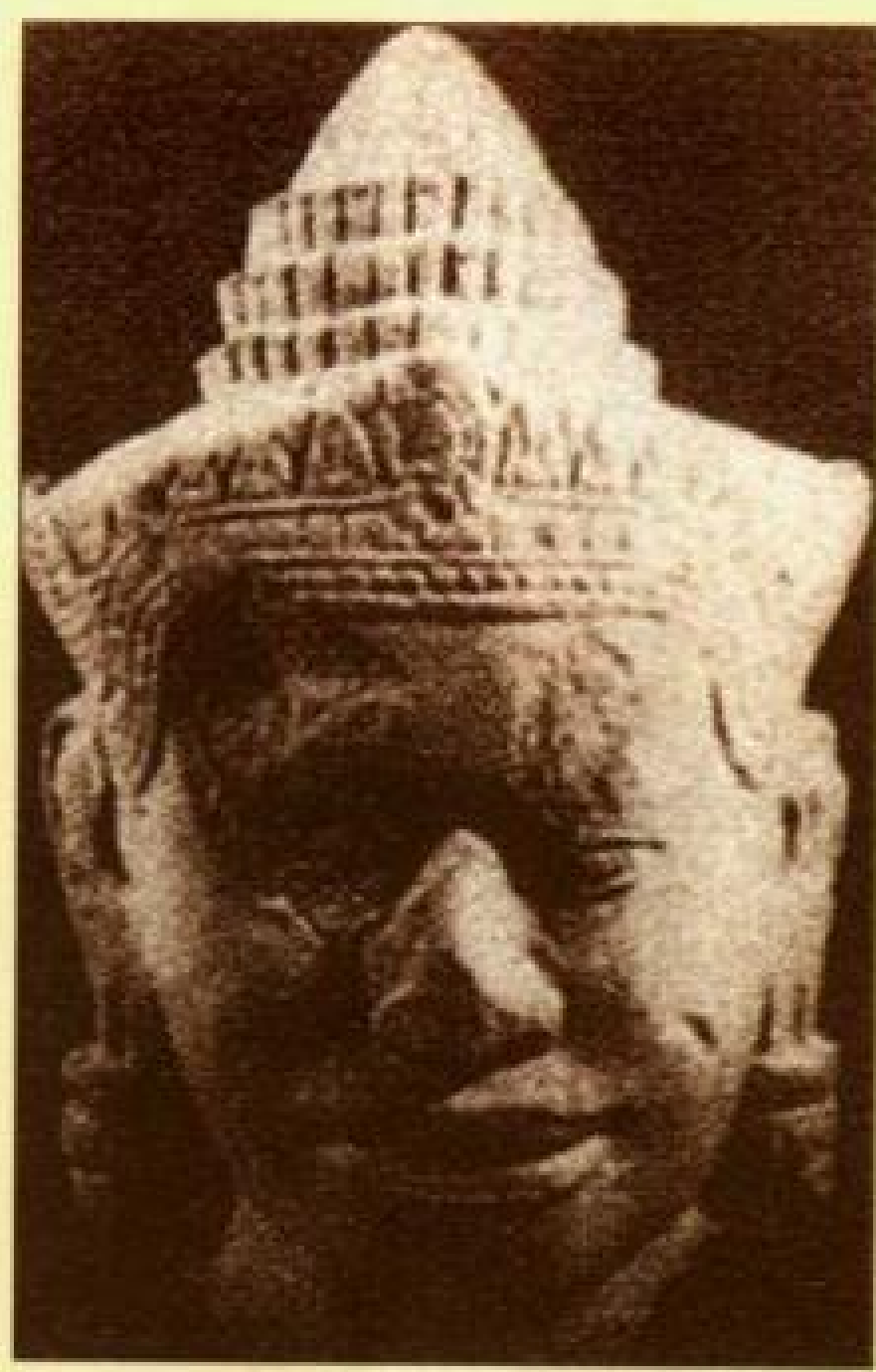
当地政府抱怨说他们既没有充足的资源也没有足够的人员为这里提供警力。他们有能力在柬埔寨国内采取行动，这意味着实际上他们能够处置那些向泰国边境偷运艺术品的窃贼，而对于在泰国从事交易的那些商人却不能绳之以法。被捉住的一小部分窃贼只受到了轻描淡写的处罚。结果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当地的农民只要拿到10-50美元就可以将雕像的头取下来或者说用牛车把它们运到边境。有报告称发生盗窃案件的几率是一天一次。艺术品甚至按照客户的订单被盗走，他们从古建筑的照片上预选所需的艺术品。一位美国的保护人士称：“我曾经在一个神庙遗址上听到泰国商人正在讨论着客户要他们提供的某些艺术品。”

最近几年在柬埔寨所发生的盗窃案件是令人吃惊的，所以很容易夸大掠夺问题在整个东南亚的严重程度。即使在吴哥，虽然现在大多数单个的艺术品已经消失，但是对于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来说，这种破坏对整体的影响并不大。就整个地区而言，由于人类的贪婪而破坏考古遗产的现象已经受到控制，保护工作的成果是巨大的。自从这里的古建筑在19世纪被发现以来，虽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坏，然而大量的保护工作一直在进行。除了那些不利的情况以外，过去200年来的保护记录总体上还是积极的。

被盗窃的 雕像艺术品

STOLEN OBJECTS

1994年春季的一期《米内尔热》展览展示了自1970年以来吴哥仓库被盗的雕刻珍品。《米内尔热》是一本专门研究古代艺术的期刊。该期刊主编杰罗姆·艾森伯格希望“通过在杂志上公布这些消息,不仅可以帮助找到其中一些珍品的下落,并使其能够归还,还可以向那些鼓励掠夺文物的人们发出一个信号,博物馆的专业人员以及从事亚洲艺术品收藏和经营的人们都不能容忍这样的文物走私行径”。



■ 这是某神灵的一个头像,用砂石雕成,头上戴着王冠。属于公元13世纪时的雕像,高22厘米,原藏于吴哥的班迭斯雷神庙。1993年在仓库中被盗。



■ 这是一个用砂石雕成的佛头,带有近期被贴金的痕迹。属于公元12世纪晚期到13世纪早期的作品。高28厘米。原藏于贡旁的普拉甘寺院。1993年在仓库中被盗。



■ 这是哈里哈拉神的头像,头戴王冠,有宝塔状假发(仅存有雕像的一部分)。深灰色,用砂石雕成。属于公元9世纪晚期的作品。高35厘米。原藏于罗洛的巴公神庙。



■ 这是一个男性头像,用砂石雕成,有圆柱状假发,顶部圆滑。疑为公元13世纪的作品。高27厘米。原藏于卡德的贡旁神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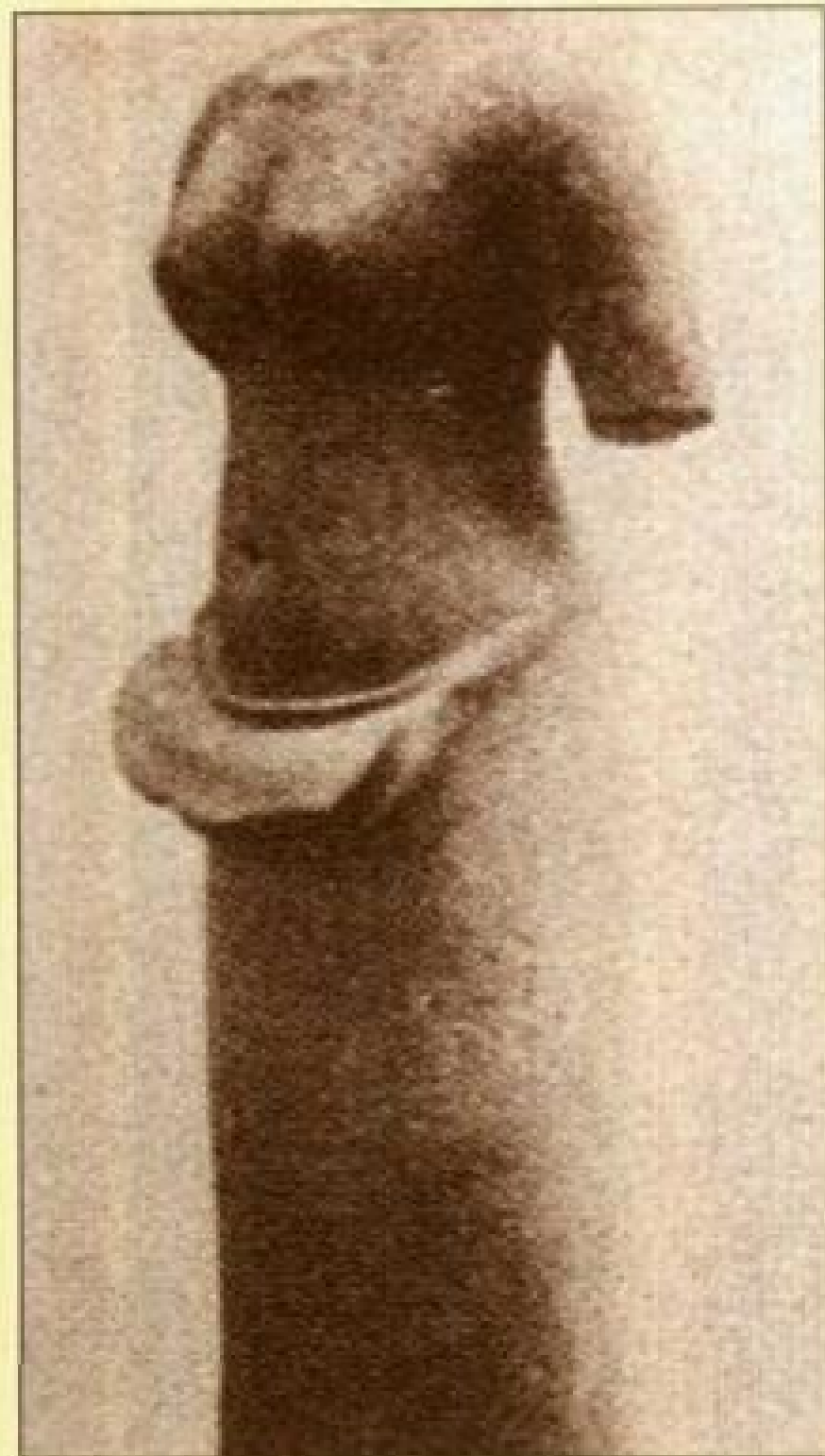




■ 这是用砂石雕成的浅灰色的毗湿拏身躯像，有方形基座，具有四支手臂。属于公元10世纪中期的作品。高84厘米。原藏于吴哥的普拉萨·卡拉万神庙。1993年在仓库中被盗。



■ 这是一个男性的四手臂身躯像，用砂石雕成。属于公元11世纪后半期的作品。高89厘米。原藏于吴哥的普拉萨·大东神庙。1993年在仓库中被盗。



■ 这是一座未雕刻完工的女性身躯像，用砂石雕成。属于公元10世纪晚期的作品。高56厘米。原藏于吴哥的帕萨特·特拉蓬甘神庙。



■ 这是一座用砂石雕成的灰色神像身躯，有四支手臂。属于公元12世纪的作品。高37厘米。原藏于奇克荣的桑乌伊村。



■ 这是一座用砂石雕成的浅灰色男性神像，神像呈咆哮状，有方形基座。属于公元12世纪晚期的作品。高35厘米。原藏于大普伦神庙。1993年在仓库中被盗。



■ 这是一座未雕刻完工的佛教神像，即11面海瓦拉神像，头戴王冠，王冠中央有大型徽章。属于公元12世纪晚期到13世纪早期的作品。高26厘米。原藏于吴哥通的“死亡之门”附近。



166

SOUTHEAST ASIA: A PAST REGAINED



■ 这是身骑大鸟揭路荼的毗湿拏神像，用砂石雕成，灰色。属于公元12世纪的作品。高19.5厘米。原藏于吴哥地区。



■ 这是一座用砂石雕成的灰色女性身躯像。属于公元12世纪晚期到13世纪早期的作品。高65厘米。原藏于吴哥地区。

■ (左图)这是一个男性神像的身躯，用砂石雕成，已经风化。属于公元11世纪晚期的作品。高40厘米。原藏于吴哥的普雷鲁普神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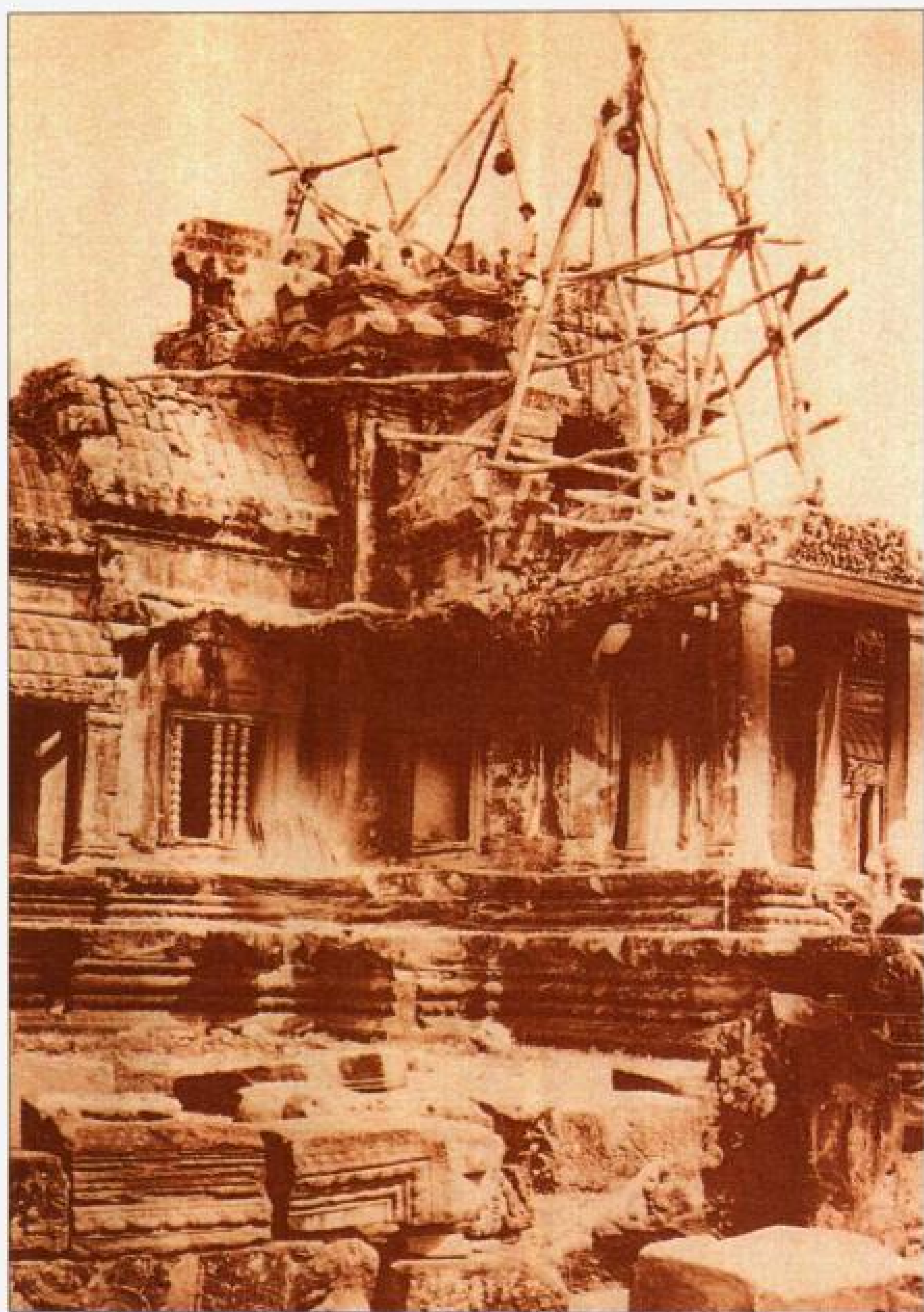
■ (右图)这是一座观音像，表面光滑，深灰色，用砂石雕成，头戴王冠，有圆柱状假发。属于公元12世纪晚期的作品。高81厘米。原藏于吴哥的大普伦寺庙。



■ 这是一座用砂石雕成的暗粉色的男性半身像，有圆柱状假发，呈佛像形状。属于公元10世纪晚期的作品。高25厘米。原藏于奇克荣附近的大普暹寺庙。



■ 此照片摄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为吴哥寺的一个画廊。这里到处是木制脚手架和三角架，法国远东研究院的成员正在对该画廊进行加固和整修。照片左上方是亨利·马查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任研究院院长，于 1947 年重返柬埔寨，当时他已经 71 岁，他被再次任命为考古任务的领导者。



保护工作的尝试从殖民时期已经开始。婆罗浮屠的保护工作走在最前面。英国从荷兰手中夺取了对爪哇的控制，并在 1811 年到 1816 年的五年间统治着爪哇岛。在此期间第一批欧洲的游客到达这里。托马斯·斯坦福·拉费尔斯爵士是这块殖民地上精力充沛的总督，他曾经派一名陆军工程师对废墟进行考察和研究。H. C. 科尼利厄斯是他选中的一名军官，他和一个拥有 200 多名劳力的工作组一起开展工作。他们砍伐树木，运走垃圾，烧掉丛林。按照当时的标准，科尼利厄斯工作得很出色。土壤和其他碎石被留下来作为墙壁的支



■ 吴哥的巴公神庙建筑群，属公元9世纪晚期建筑。图中新砍削的石块相当粗糙，无意仿制四周的雕刻（左图）。20世纪30年代之前，保护工作以清除废墟上的杂草和树丛以及用混凝土和木材进行加固为重点。亨利·马查尔发明了这种方法，他在建筑结构上嵌入新的材料进行加固，同时对原来的建筑材料加以保护。

■ 图中站着的是印度考古考察团的一个监工，周围是柬埔寨的工人，他们正在用化学药物清除吴哥寺石材上附着的青苔和杂草。印度考古队于1986年到达这里，他们对生长在石缝中的杂草也加以清除。工人们可以通过脚手架（图左上方）小心地将石材搬下来。所有被挪动的石块都进行标记，并在清理、烘干和存放之后进行重新组装。



撑，碎石块被仔细地存放在发现的地点，以便容易进行后续的研究，确定它们原来的准确位置。

在 荷兰重新控制爪哇岛以后，保护工作断断续续地进行。到19世纪30年代晚期，画廊已经清除了泥土和其他碎石。不幸的是，挖掘人员没有对水槽和兽形滴水嘴进行清理，这些都是原来的建造者用来排水的通道。以致造成新出土的雕刻遗迹完全暴露在季风降雨的侵蚀之下，却没有足够的排水系统。结果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浮雕遭到侵蚀，庙宇被雨水深深浸透。

清理排水通道的补救工作最终在19世纪70年代进行，在此期间人们对画廊重新进行清理。然而这座古建筑的状况继续恶化，直到1882年一份报告甚至提出将神庙卸毁，而浮雕则存放在专门建造的地方，以保护它们免遭自然环境的破坏。这份报告未被采纳实施。

寺庙基部的发现，在19世纪80年代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寺



170

SOUTHEAST ASIA: A PAST REGAINED



■ 图中显示出印度考古考察团使用化学药物的成果，菌类覆盖着画廊的表面(左下图)，而经过处理以后画廊显得既干净又朴素(右下图)。吴哥寺的神庙建筑表面必须长期不断地进行维护，才能保持这种效果。印度考古考察团还在表面涂上封闭剂(上图)。他们保留了60年前法国研究院用于加固的铁箍和混凝土扶壁，使古建筑更加稳固。





庙的基部拥有第一层浮雕，后来被加固的部分所掩盖。尽管如此，直到世纪交替的时候，珍贵的寺庙古建筑才得到更好的保护。婆罗浮屠考古团在1902年公布了一份报告，标志着保护工作的正式开始。这份报告建议采取紧急行动，将建筑受损最严重的部分支撑起来，最突出的是回廊的拐角，对回廊、壁龛和穹隆进行修复。其他建议包括卸除不碍观瞻的外部建筑，进一步改进排水系统，更换神殿顶部的尖塔。

这些建议的落实任务，最终委托给西奥多·范·厄普。他是一位军队工程师，当时33岁。事实证明，选择他来完成这项任务是完全正确的。从1907年开始，在接受任务的前7个月里，他集中力量对古建筑的周围地段进行挖掘，结果出土了一大批兽形滴嘴、石狮和佛头以及其他雕像。他还追查从这里被转移到附近村庄的石刻雕像。他在发现大量文物的鼓舞下，又努力使大规模的修复计划获得官方批准。这项计划不仅要重建残破的神殿，还要修复已经失去的部分建筑。通过他的努力，在3年的时间里，婆罗浮屠已经重现了当日的辉煌(见186-187页)。

在厄普开始重修婆罗浮屠的同一年，控制印度支那的法国当局将吴哥古建筑的修复工作委托给法国远东研究院的考古学家。直到1953年柬埔寨取得独立以前，法国方面一直垄断着对这里的控制。即使在柬埔寨获得独立以后，虽然已经和柬埔寨政府共同合作，但是他们仍然担负着领导的角色。两国共同成立了吴哥保护团体作为当地的总部。

法国远东研究院最重要的一位负责人是伯纳德-菲利浦·格罗斯利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久，他负责通过一系列的航空考察挖掘出吴哥古建筑群的全貌。在航拍照片中揭示出来的一些土墩尚待挖掘，所以看起来吴哥还有许多秘密需要进行揭示。其中聚居区的位置是最难以捉摸的。附近的人口中心还有待进行确认。

格罗斯利尔在担任吴哥保护团体负责人期间，他将看起来有倒塌危险的建筑结构支撑起来，他还努力强调建造隐含的排水系统以解决保护古建筑所面临的问题。按现今的标准看，远东研究院的举措已经受到批评，他们的做法显得拙劣。比如，他们用混凝土的支架和柱子支撑塌陷的屋顶，用来加固砂岩石柱的铁箍已经开始生锈。但从总体上看，在格罗斯利尔的领导下，吴哥的保护工作在当时堪称优秀的榜样。

然而随着越南战争的阴影笼罩着这个国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早期，安全局势日益恶化，直到格罗斯利尔离开这里，以及在1972年最后的一批维修人员离境。在此后的7年里，这里的古建筑没有得到官方的重视。皮克·乔是格罗斯利尔的一个学生(见158-159页)，到他领导的吴哥保护团体重新恢复工作的时候，已经既没有什么工具也没有什么人力来继续开展他的工作了。

这时，在发展中国家保护古建筑的任务日益受到全世界的重视，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为协调保护工作的主要机构。该组织始建于1945年，是联合国负责全球文化合作的一个分支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世纪60年代创建了世界文化遗产录，并动用数百万美元拯救埃及的阿布鲜贝神庙，避免因尼罗河上修建阿斯旺大坝而受到破坏。

作为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日益增长的标志，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大会，并公布了《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结果证明这是该组织的一项巨大的成功。开始的时候仅有40个签约国，而现在已经超过130个国家。现在这个《公约》成为惟一的一个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保护条约，保护的范围既包括文化遗址，也包括自然遗址。

该《公约》的中心内容是世界遗产名录，现在被列入清单的

重建古建筑雄风

RESTORING MONUMENTS AND PRIDE

20世纪60年代早期,詹姆斯·A. 格雷上校(美国陆军,已退役)向意大利官员递交了加固著名的比萨斜塔的计划。工程尚未开始,意大利政府已失去对这项计划的兴趣。然而格雷帮助别国拯救著名历史建筑的想法却被保留下来。1965年,世界古建筑基金会诞生。到1995年,这个非营利性的组织已在29个多个国家累计进行了100多项重建工作。该组织执行主任邦尼·波恩海姆说:“我们必须把伟大的建筑和艺术保留下来,而且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必须承担起集体性的责任,保护它们不让它们消失。我们对这些历史宝贵遗产的保护越来越少,而问题却是越来越多。”

世界古建筑基金会最重要的也是最深远的计划是保护波列甘,这是吴哥的一个建于12世纪的神庙群。除建筑结构已损坏外,杂草已经将古建筑覆盖,在实施保护之前,必须加以清除(如图)。

该计划从1992年开始,预计需要10年时间。该计划包括三个目标,首先是培养柬埔寨的年轻学生,教导他们学习野



外保护和重建的技术知识,以便将来为保护吴哥服务。其次是为指导现场工作而研究提出标准的方法论,同时要适用于吴哥古城的所有古建筑的保护需要。最后是准备把吴哥的这块地区向游人开放。

对许多柬埔寨人而言,吴哥是他们伟大的历史遗产的代表。重建工作不仅为他们带来一种对历史的自豪感,而且令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因为他们具备了训练有素的人员,并获得了新的工作。世界古建筑基金会的官员希望,波列甘的重建工作将成为“这个国家重建和平和繁荣的关键一步”。

全球重要遗址已经达到378个。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条件是由所在国家对遗址的位置和建筑进行提名,然后由一个专门性的非政府性的专家组织根据《公约》条款的精神进行评估。公约要求所列入的遗址必须具有突出的全球性的价值,而且需要通过真迹鉴定检验,还必须提供足够的法律上的机制以及管理结构以确保进行长期的保护。专家组织的推荐需要经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批准然后才能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名录》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其他倡议所不能相比的。尤其从国际整体上看,它体现的崭新思想是所列入的遗址不仅是一个国家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全人类遗产的一部分。同样属于《世界遗产名录》创新内容的是将自然和人文奇观混合并列在一起,于是泰姬陵、维多利亚瀑布以及拥有自由神像的加拉帕戈岛被并列在一起。根据现在的统计,属于文化遗产的条目有276项,自然遗产有87项,而混合的遗产有15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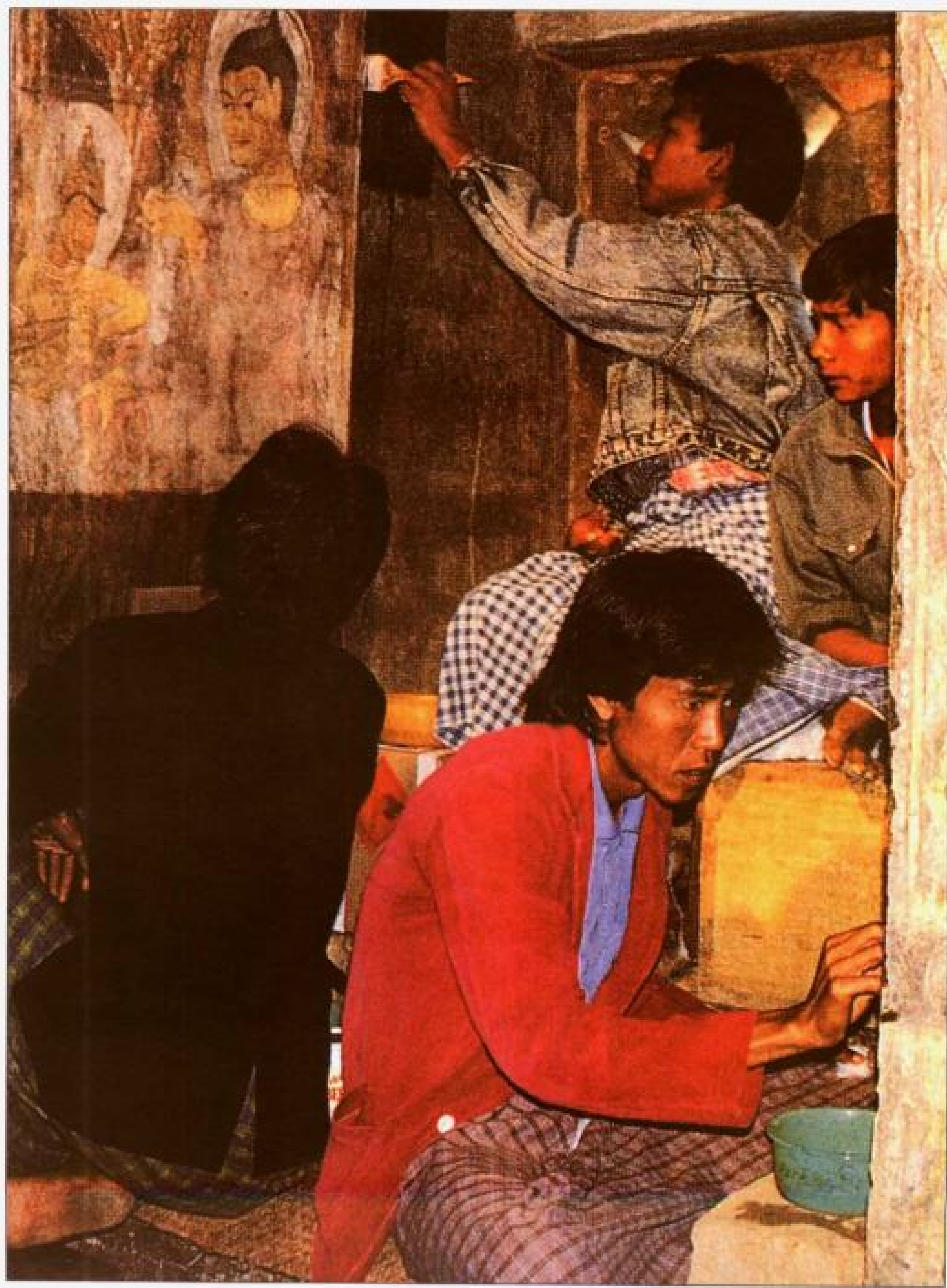
尽管世界遗产名录具有广泛的普遍性,但是所能实现的保护却受到很多限制。进行遗址登记的条件是有关国家提出申请,而有些国家相对其他国家而言不愿提出本国的保护对象。法国登记了20项,印度有19项,而在日本和肯尼亚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缅甸、越南或老挝均没有古建筑保护登记项目。遗址的保护机制同样缺少,尽管事实上有规律的定期检查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并从长远角度可以节省开支,因为造成破坏以后再进行修缮的费用更加昂贵。从总体上看,贫穷国家缺少保护古建筑所需的资金,虽然世界遗产基金已经成立,但是还不足以满足所有的需要。

除上述缺陷以外,《世界遗产名录》仍然是保护工作中可以利用的工具,而且从1990年开始,婆罗浮屠、吴哥以及班奇昂的土墩已经被列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遗址进行保护的新的阶段已经开始,尽管在官方提出登记以前该组织已经对上面提到的两三个遗址承担了保护义务。

事实上,在《世界遗产名录》上进行登记并不是寻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援助的一个先决条件。比如这个组织早就参与了蒲甘的保护工作,而蒲甘还没有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1975年发生大地震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要求提供资金和专家以帮助这里进行重建工作。在缅甸,这项申请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缅甸以前一直不情愿让外国的学者到这里来工作。

在地震之后形成的合作关系被证明是持久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1980年以后,在联

■ 缅甸工人正仔细修复蒲甘阿佩亚丹那神庙的精美壁画。图为他们在墙壁上涂防腐剂加以保护的场面。在此之前,他们先将灰泥剥离的地方修整好,然后再用氨基溶液仔细清理干净。因为壁画没有阳光的直射,所以在清理干净之后,壁画将再现亮丽的色彩。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财政援助之下，一直担负着对蒲甘古建筑的考察、修复和重建工程。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是如何对古建筑进行加固，以防受到今后地震的威胁，他们的主要做法是在古建筑内部嵌入钢筋进行加固保护。

另一项工作是对蒲甘的所有古建筑进行全面登记。这个想法并不新鲜。在15世纪的时候，一位缅甸的国王曾下令对所有的建筑进行统计，结果超过4000多个。由于任务规模过于庞大，以前的保护尝试均未能顺利展开。但是一旦将来发生灾难，需要进行重建，现在已经准备好的九卷之多的各种计划、照片和文字描述都将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参考资料。

这项工作同样帮助修建队伍确定保护优先顺序。一项清理被蝙蝠粪便和烟迹弄脏的壁画的计划正在展开。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躲到神庙中的村民生火而造成的污染。考古学家也一直在发掘位于古城东门附近的王宫遗址。尽管使用木料建造的基础结构早已消失，通过发掘已经找到了用砖砌筑的圆台，每个圆台的直径约4英尺，人们相信支撑整个建筑的木柱就建在这些圆台之上。

尽管蒲甘没有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仍然按照其正式的保护行动模式展开工作。该组织在班奇昂所面临的任務却完全不同。尽管这个遗址毫无疑问地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大部分珍宝仍然被埋藏在地下，遗址的上面是居民生活的村庄。随便到此观光的游客除了能够参观一个遗址博物馆和一个考古挖掘壕以外，见不到其他的东西。然而考古坑本身并不牢固，时刻有发生四壁倒塌的危险。用密封剂进行加固可以暂时解决问题，但是从长远看更增加了坍塌的可能性。难怪专家组织在建议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同时指出这给世界遗产委员会带来了一个挑战。



178

SOUTHEAST ASIA: A PAST REGAINED

吴哥所存在的危险更大。除非采取紧急措施加以保护，否则这个伟大的古建筑群将有彻底毁坏的危险。单为这个占地 156 平方英里的遗址提供警力以免遭掠夺所需的费用都难办到，更别说在失修 20 年之后考虑进行重新修缮的任务了。

保护主义者长期以来能够理解吴哥所面临的困难的实质，人们担心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其建筑的基础不够牢固。古建筑群被建造在沙地上，既无法避免其下沉，同时还使石料受到水的渗透和侵蚀。格罗斯利尔所提出的隐含的排水系统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当时的建造者运用的是干建方法，石块之间没有使用任何灰浆加以黏合。铜箍只是偶然用来进行内部加固，而其中的大多数已经在几百年前被掠夺一空。现在只有重力作用使石块保持在原来的位置上。而在古建筑的周围，原先的丛林具有遮挡阳光暴晒的作用，在被砍伐以后，建筑材料的热胀冷缩作用加剧，更增加了古建筑发生解体和断裂的危险。

其他力量也造成古建筑的解体。热带植被从墙壁的裂缝中生长出来，它们像撬棍一样对建筑结构造成破坏。最大的威胁来自盘根错节的无花果树，树种被鸟类带到墙壁顶上而生长起来。树根深入一石缝中使石头断裂。然而砍倒树木反而可能使危险增加，从外面包裹着城墙的巨大的树根常常起到加固的作用，抵消由于小的树根所造成的破坏。当树木死去而且树根腐烂的时候，倒塌的危险也就更增加了。

由渗透所带来的危险是隐性的。水从干摆在一起的石料的裂缝中渗透进去不能被排放出来。它只能漫漫渗出到建筑的表面然后再蒸发掉。水中的矿物质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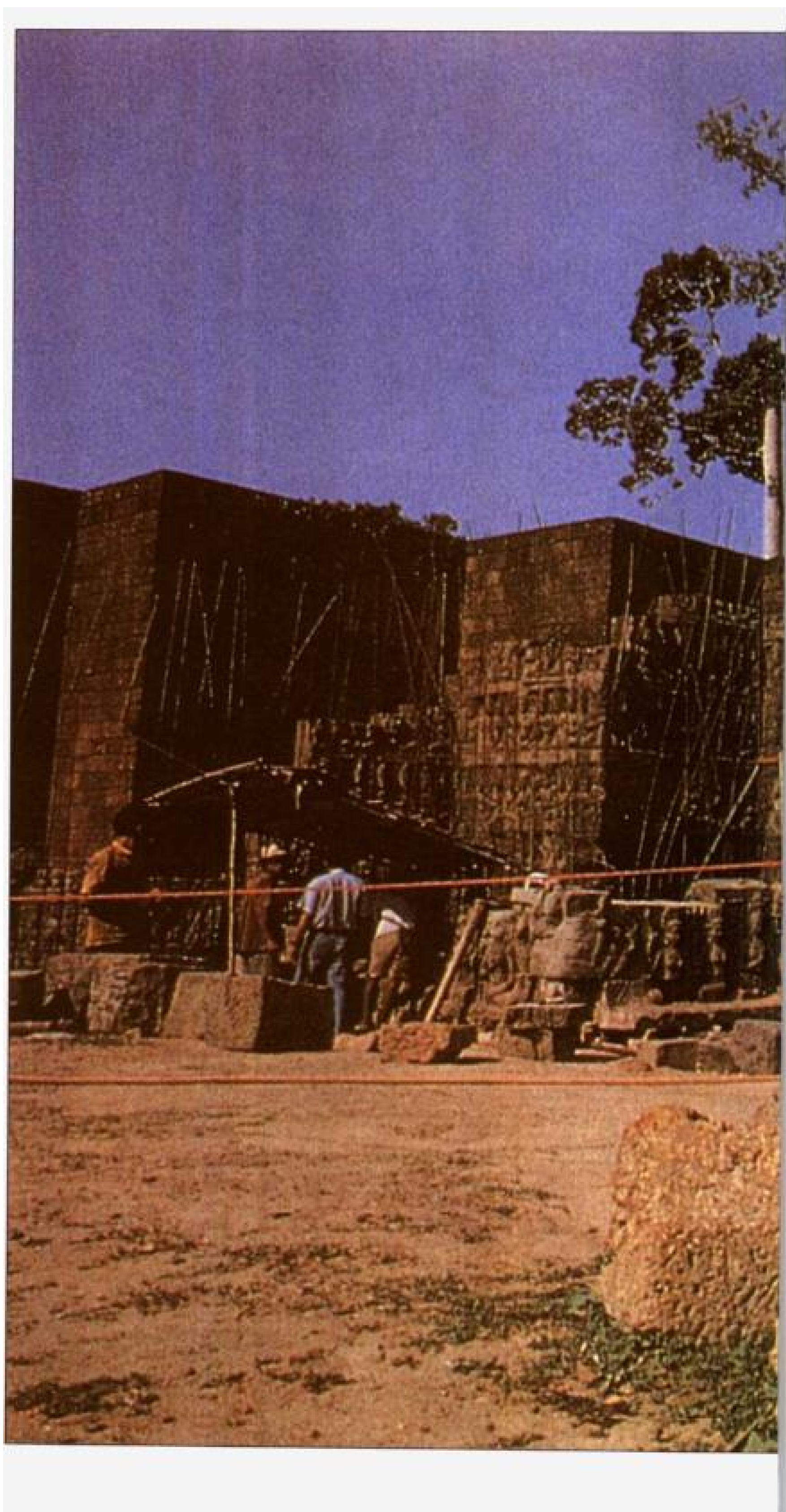
■ 宗教狂热分子对艺术的故意破坏也时有发生。他们要“改善”神圣的艺术作品，并希望由此可以获得保佑。他们在蒲甘的神庙里向墙上和雕像上泼洒石灰水。尽管不很明显，尽管很不雅观，但这些污迹是可以清除的。绘画和雕刻都可以恢复原来的美。

成水垢。潮湿的表面刺激了苔藓的生长，苔藓所产生的酸性物质腐蚀岩石表面造成进一步破坏。蝙蝠的粪便经雨水的混合形成硫酸，使问题更加严重。这里的植被生长迅速，一个月的时间里杂草能够生长到3英尺高，这使得保养工作必须不间断地进行。

即使在红色高棉于1979年结束统治以后，各种政治上的考虑也使多边行动在10多年的时间里不能有效展开。没有几个国家承认由越南支持的洪森政府，对这个国家的国际援助也被有效禁止。

印度是最先和越南所支持的洪森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几个国家之一，结果印度考古考察团成为第一个获准派遣重建队伍到达这里的外国组织。在1986年到达这里的时候，考古考察团的重建小组开始砍除植被，对主要建筑进行清理，他们使用了在国内被证明有效的各种技术(见169-171页)。

印度方面所做的贡献受到了一时的欢迎，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矛盾开始出现。批评人士指出，考古考察团为消灭苔藓地衣等植物而最初使用的杀真菌剂含有二氧(杂)芑，是越南战争中被发现的臭名昭著的橙剂。有科学家还指出，使用不透水的密封剂来防止渗透只能使水分更多地在石头表面以下集结，形成更严重的破坏危险。有报告称未经训练的工作人员过于用力的刮擦也造成石料表面的损坏。





■ 法国的考古学家和建筑师们帮助柬埔寨保护吴哥的场面。他们正在保护和重修“患麻风病国王”那一层台基。工程始于1993年，接着1972年法国远东研究院未完成的工作继续进行修复。当时，红色高棉占领了吴哥，法国人被迫离去。除重建工作外，法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柬埔寨文化部一起，为吴哥的研究活动和培训计划提供财政援助。



在1989年，根据联合国提出的和平倡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得到充分的授权对这里的古建筑进行保护。该组织派遣两个调查团到吴哥考察遗址现状。面对以前提出的各种不足，专家们召开了圆桌会议来研究由调查团提供的报告，并提出行动计划建议。在1991年出现工作成果，当时一项和平协议被最终签署并解除了国际援助禁令。最先取得的一个成果便是根据新政府的申请，通过简要的紧急程序使吴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附近的一个小城暹粒开设了办事机构，用以协调国际保护工作。第二年，该办事机构协助组织在东京召开了政府间的会议，专门讨论吴哥的保护问题。最后在1994年，柬埔寨政府接受了一项主要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的紧急计划。

这项冗长的专项保护计划的最终结果是提出建造吴哥国家公园，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这项计划不仅包括指导吴哥古建筑的重建工作，以及对柬埔寨方面的培训计划，还包括建立游客信息中心和吴哥研究院，以及大规模的环境控制计划，其中包括建造水电大坝为这个地区提供电力。

虽然吴哥的保护工作仍然存在许多难题，但也存在可喜的消息。因为以前的保护经验鼓励人们去解决这些问题。早在40多年前，婆罗浮屠面临着和吴哥同样的问题。婆罗浮屠的古建筑同样没有使用灰浆，而且缺乏牢固的基础。这里在季风季节里的日降雨量高达8英寸，从岩石的缝隙中渗透的雨水侵蚀浮雕的表面。藻类和苔藓使浮雕人物发生变形。然而在1955年，印度尼西亚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请求帮助，经过长期的努力，婆罗浮屠成为现在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之一(见184-193页)，而且也是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一个，每年接待的游客数量达到100多万。现在它所面临的问题是由成功所带来的。游客人数过多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旅游公共汽车所排放的废气

对石构建筑造成损害。现在人们想出许多办法来鼓励更加注重环境保护的旅游形式，他们鼓励游客去参观附近的加工传统的印尼手工艺品的作坊，这些作坊专门制作蜡染以及竹制工艺品。

拯救吴哥可以从婆罗浮屠学习到很多有用的经验教训。事实上现在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磋商和讨论程序，以仿效20世纪60年代印度尼西亚对婆罗浮屠的做法。柬埔寨为保护吴哥古建筑群所采纳的计划在规模上和婆罗浮屠的保护非常相似。在吴哥，保护的领域更加广阔，其中包括对环境的保护，这比以前的任何计划都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只有岁月能够证明吴哥的保护工作能否取得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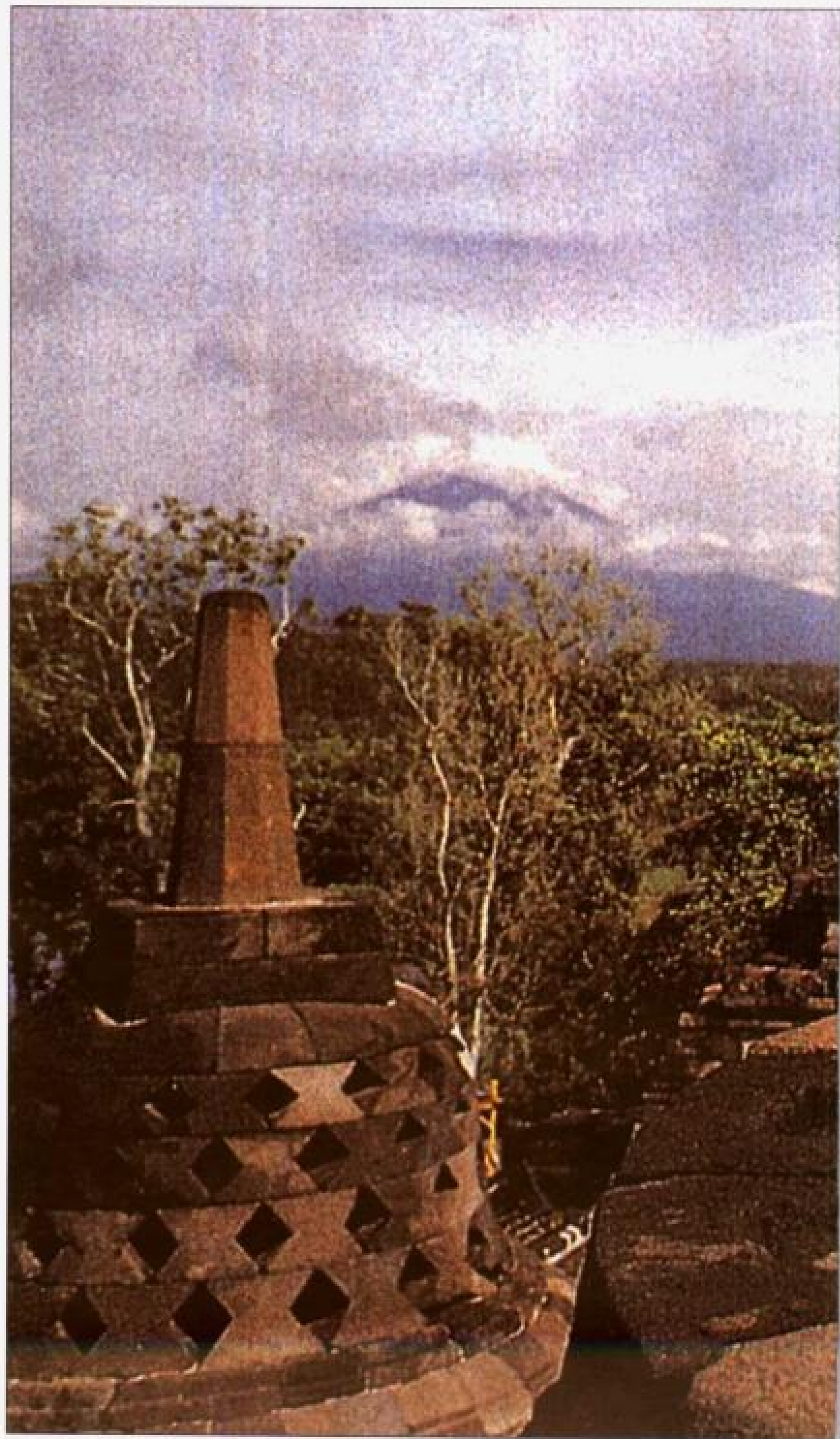
同时，国际社会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制止文物的非法走私，以帮助保护吴哥和全世界所有的历史文化遗产。这种举措包括在贸易场所和拍卖场所加强警力巡查，因为如果掠夺来的文物不能通过公开的市场进行销售，那么掠夺本身也会降低温度。同样重要的是对被盗的文物进行全面的登记。世界各地的警察部队都可以获得这样的登记清单，进一步完善和更新的措施也正在实行。仍然存在的问题是到从根本上杜绝黑市贸易的时候，已经破碎的东南亚历史文化遗产还能有多少被保存下来。只有到那时候，这块土地上历史悠久的古代帝国所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才能真正得到安全的保护。

婆罗浮屠的新生

THE REBIRTH OF BOROBUDU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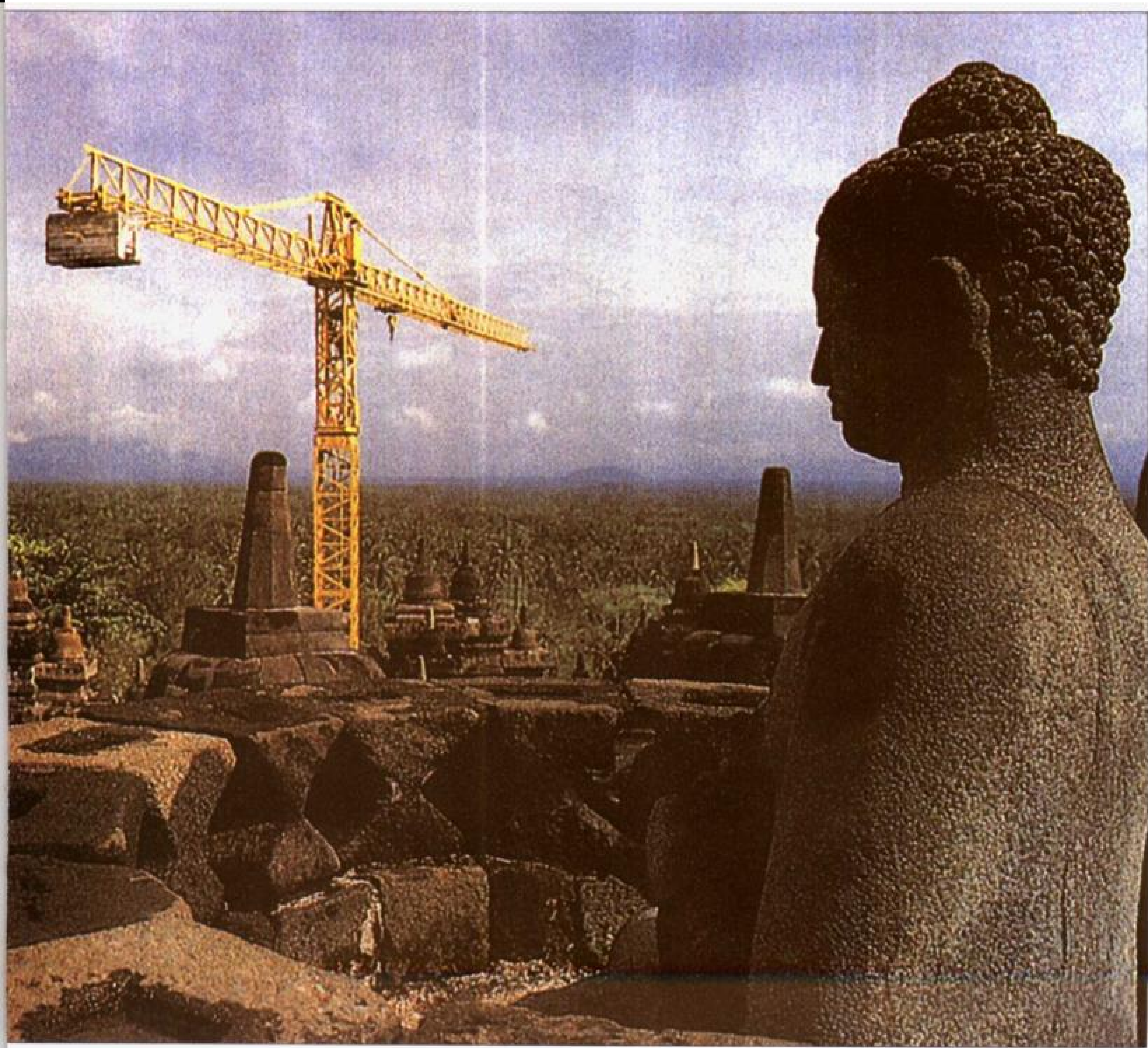
1968年，法国考古学家伯纳德-菲利普·格罗斯利尔发出警告，庞大的婆罗浮屠寺庙将“出现惊人的泥土和雕刻塌方”。这座高大的寺院始建于公元800年前后，坐落在爪哇中部，在1911年进行的早期重建中已得到加固。然而现在情况很清楚，恶化一天天加剧，已面临紧急关头。基本的问题是雨水形成的河流，在没有灰泥黏合的石材中间冲刷了千余年，建筑结构下面的土丘已被冲刷殆尽。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婆罗浮屠在劫难逃。

相信保护方面的专家已经听到这些危险的消息。此前的50年里，考察做过，报告写过，计划制定过，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包括世界范围的萧条、战争和资金匮乏，急需的重建工作始终未破土。格罗斯利尔可怕的预言受到重视的时候，他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考察婆罗浮屠。两年前，该组织在阿布辛别挽救了埃及法老莱姆西斯二世的古庙，使之免于尼罗河上修建阿斯旺大坝后因洪水泛滥而毁坏。现在，印度尼西亚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有能力开始进行婆罗浮



屠的拯救工作。

在世界各国的财政援助之下,1973年开始动工。随着装备和人员的到位,不久,寺庙周围就变成了一块建筑工地,巨大的起重机(如图)开到这里,把数千块石材和雕像都替换下来,建立的临时设施为保护工作提供存放的空间。婆罗浮屠的新生从此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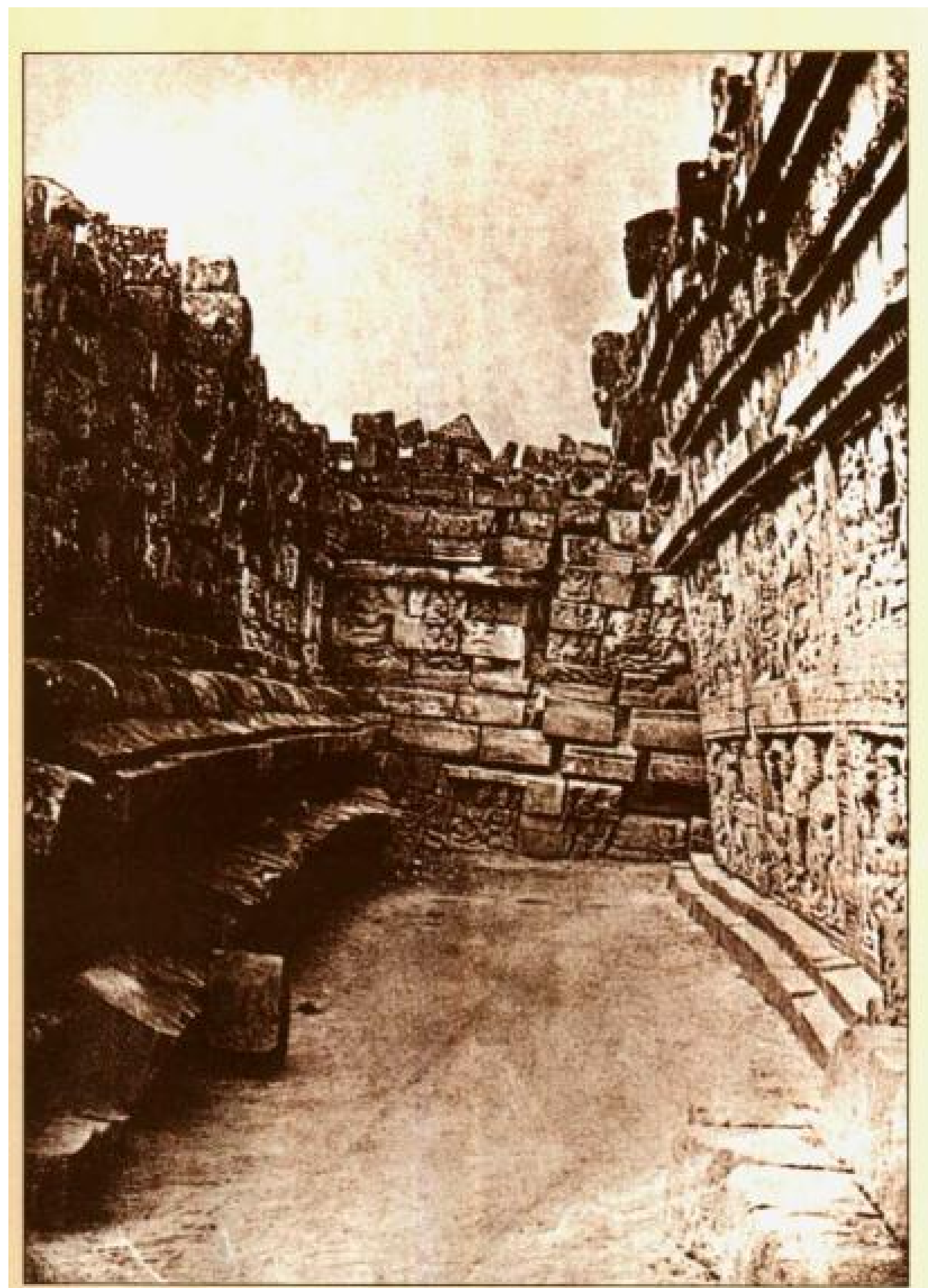


荷兰人的早期贡献

A DUTCH ENGINEER SAVES THE D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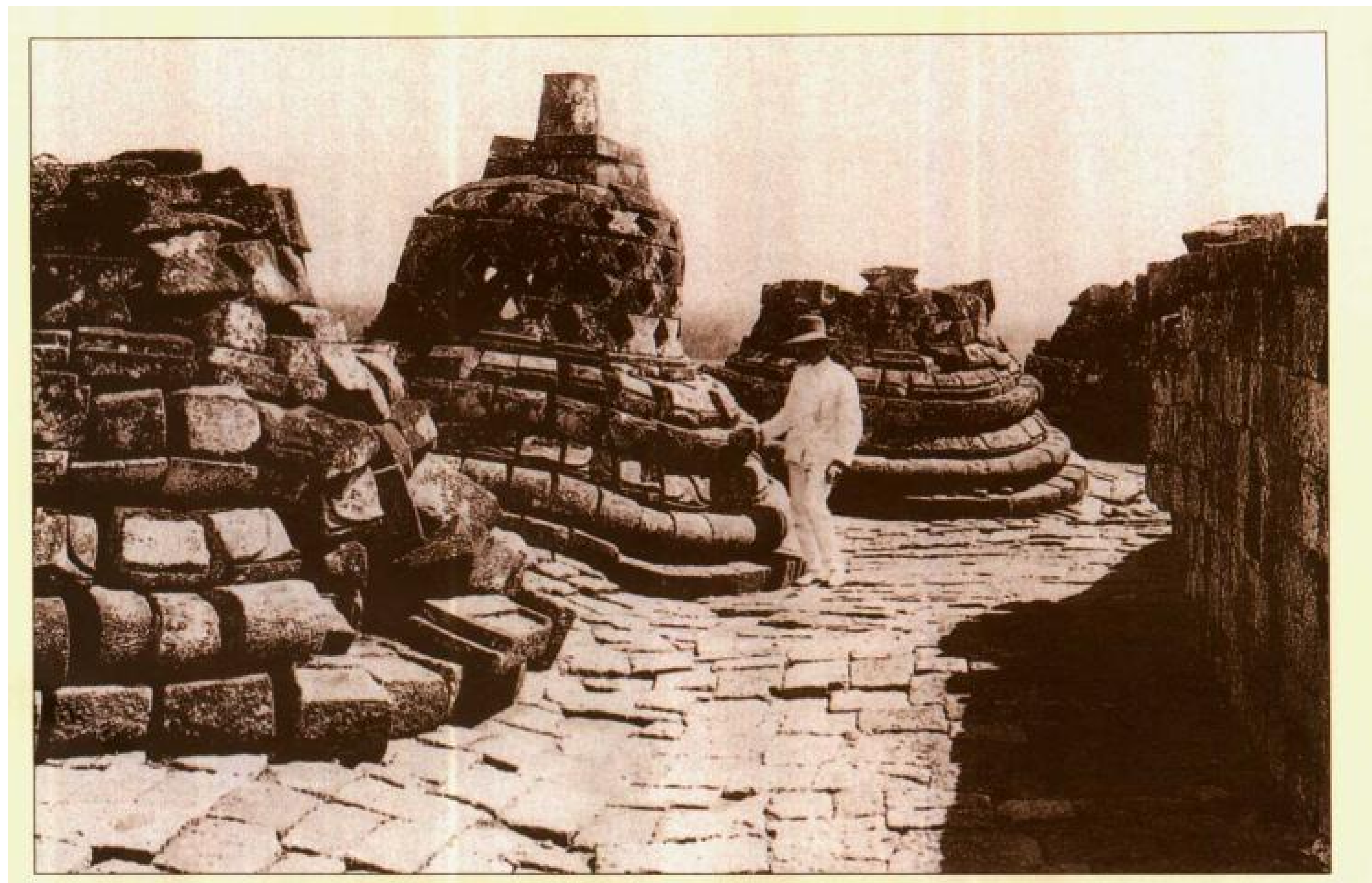
到1900年时，曾经雄伟壮观的婆罗浮屠已经变成了一堆石头(如右图)。恶化的严重程度促使荷兰殖民政府采取行动。1907年，西奥多·范·厄普接受了保护任务，他是皇家工程师团的一名年轻军官。荷兰的工作队所承担的任务相当广泛，加之厄普坚持正确的工作思路，使婆罗浮屠的保护成为当时的模范工程。厄普是一位富于才智的艺术家，也是一位行为严谨的工程师，他对这座寺庙给予高度重视，这使他能够抵制那些怪诞的重建思路，而尽可能按其原有的特点忠实地展开重建工作。

重建工作于1911年竣工。滴水口得到修整，以使古建筑内部的渗水能够排出。底部几层的浮雕、护栏、阶梯和装饰性壁龛获得修复，上部的三层台基得到重建。然而，厄普的工作所做出的长远的贡献却和重建工程无关。他建议把所有的修复过程都拍摄下来，作为照片记录。在后来的数十年里，这种照片记录对察看婆罗浮屠的恶化相当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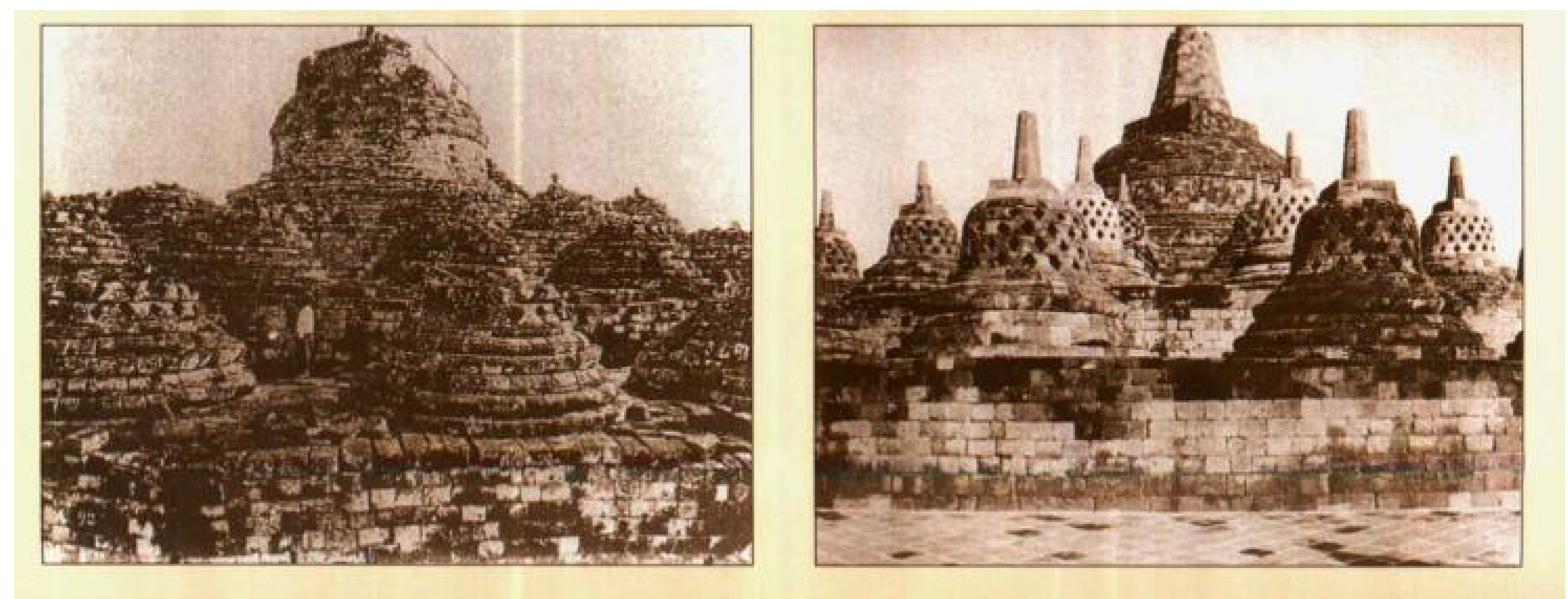


■ 婆罗浮屠的早期景象之一。1850年前后用银板照相法拍摄，显示第一层的回廊已倾斜。尽管无法纠正倾斜，厄普用地面增加混凝土的方法使底部各层得到加固。





■ 厄普站在修复前的婆罗浮屠佛塔中间。1900 年以前，钟形佛塔的某些雕像已被掠去，现急需修缮。圆形台基的重建只能使用原来的材料，尽管如此，因为佛塔石材遗失太多，所以 72 座钟形佛塔有 50% 以上的建材不得不使用新石料。下面二图是修复前和修复后的照片，显示出工程的浩大。



全球合作关系的形成

A GLOBAL PARTNERSHIP IS FORMED

最近一次婆罗浮屠的修复工作历时10年，耗资2500余万美元。工程相当复杂，动用人力多达600余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集的专业人员涉及许多领域，其中包括建筑、考古、工程、土壤、机械、地震学、保护技术、水文学和地质学等。由这些专业人员负责制定一项长期计划，以指导和组织规模庞大的修复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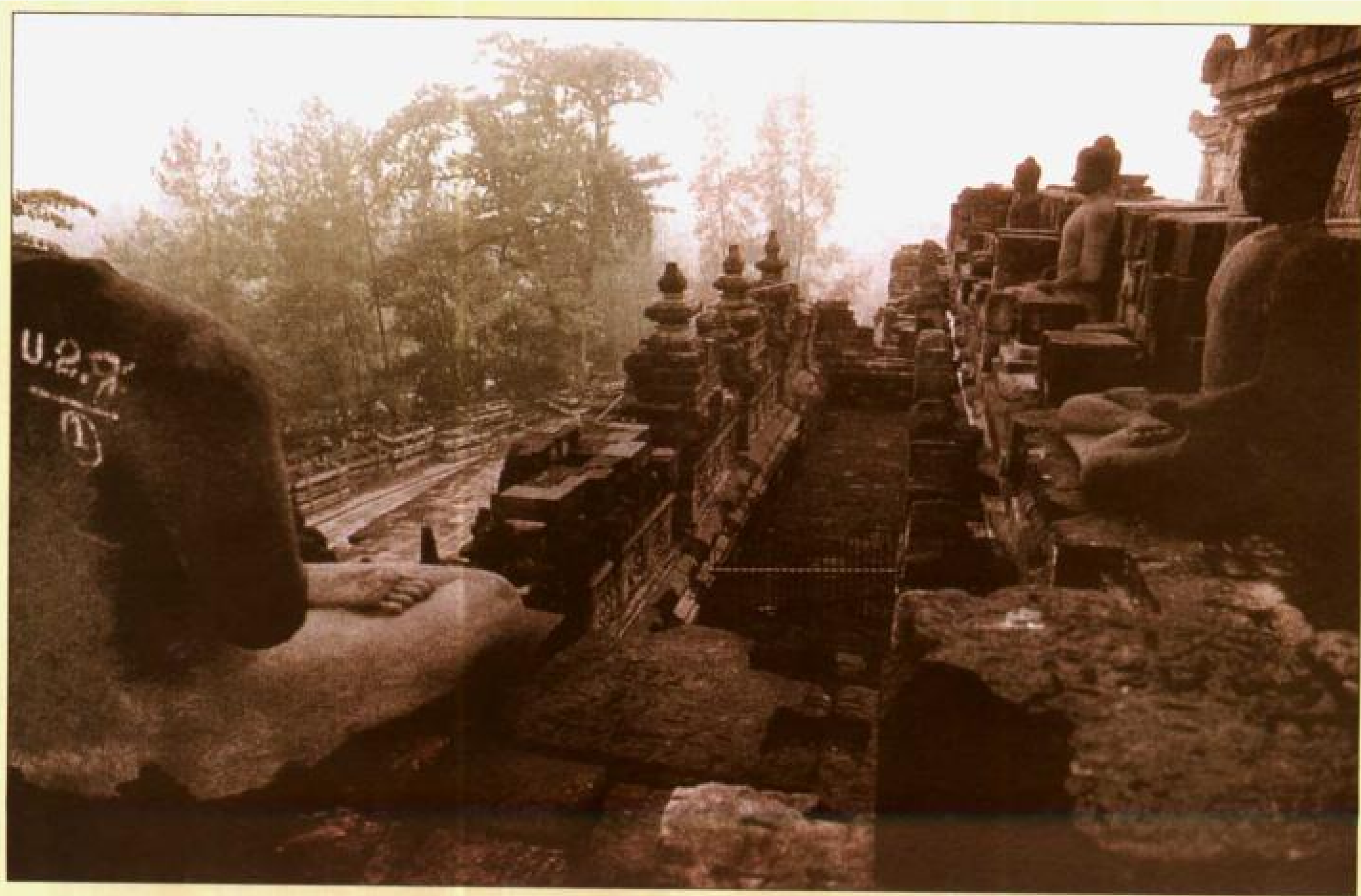
按照重建委员会的建议，工程组织者提出一项计划，该计划分三个部分。一是增加排水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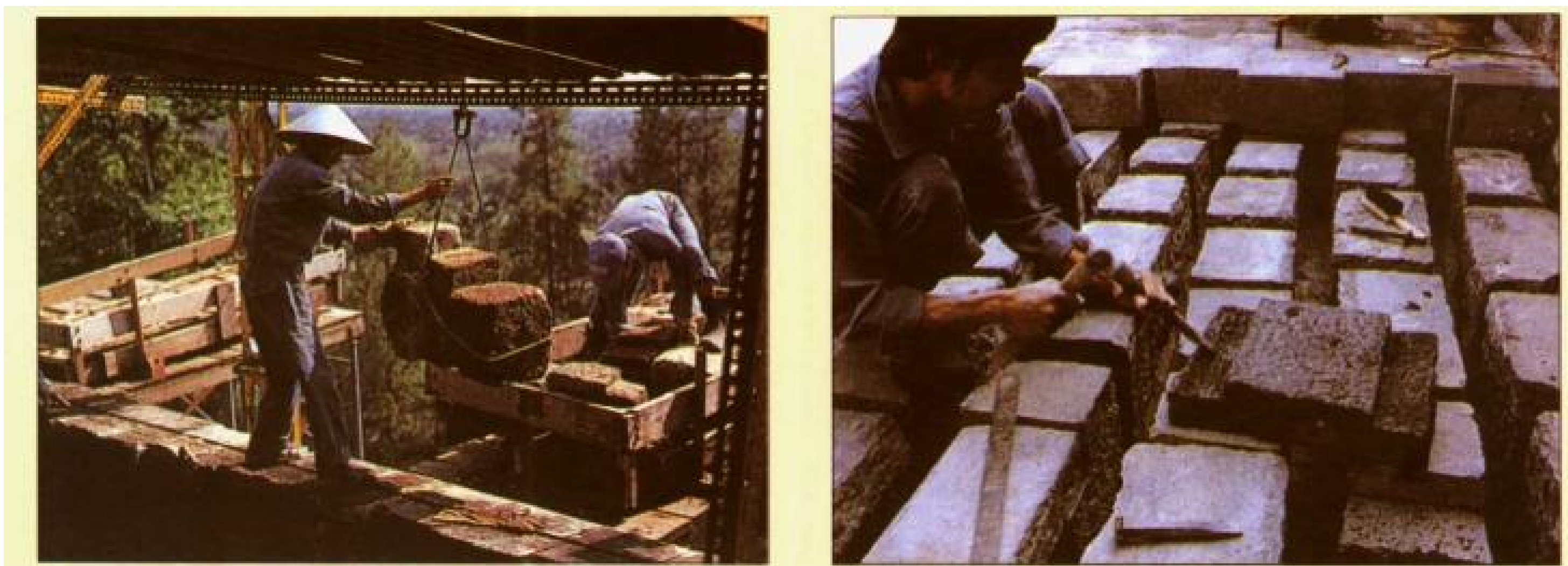
统，使雨水不再流入古佛塔的内部。二是在台基下面铺设混凝土板，使建筑结构更加稳固。三是保存构成古佛塔的所有石材、雕像和浮雕。

为实现这些目标，工人们首先从底部的五层台基将百万余块石材卸下来。因厄普在1907-1911年对上部的修复仍然很牢固，包括72个钟形佛塔，所以佛塔仍留在原处。在石料进行保存期间，混凝土板得以浇注并铺设，而且新的排水系统获得安装，以免古寺遭到雨水破坏。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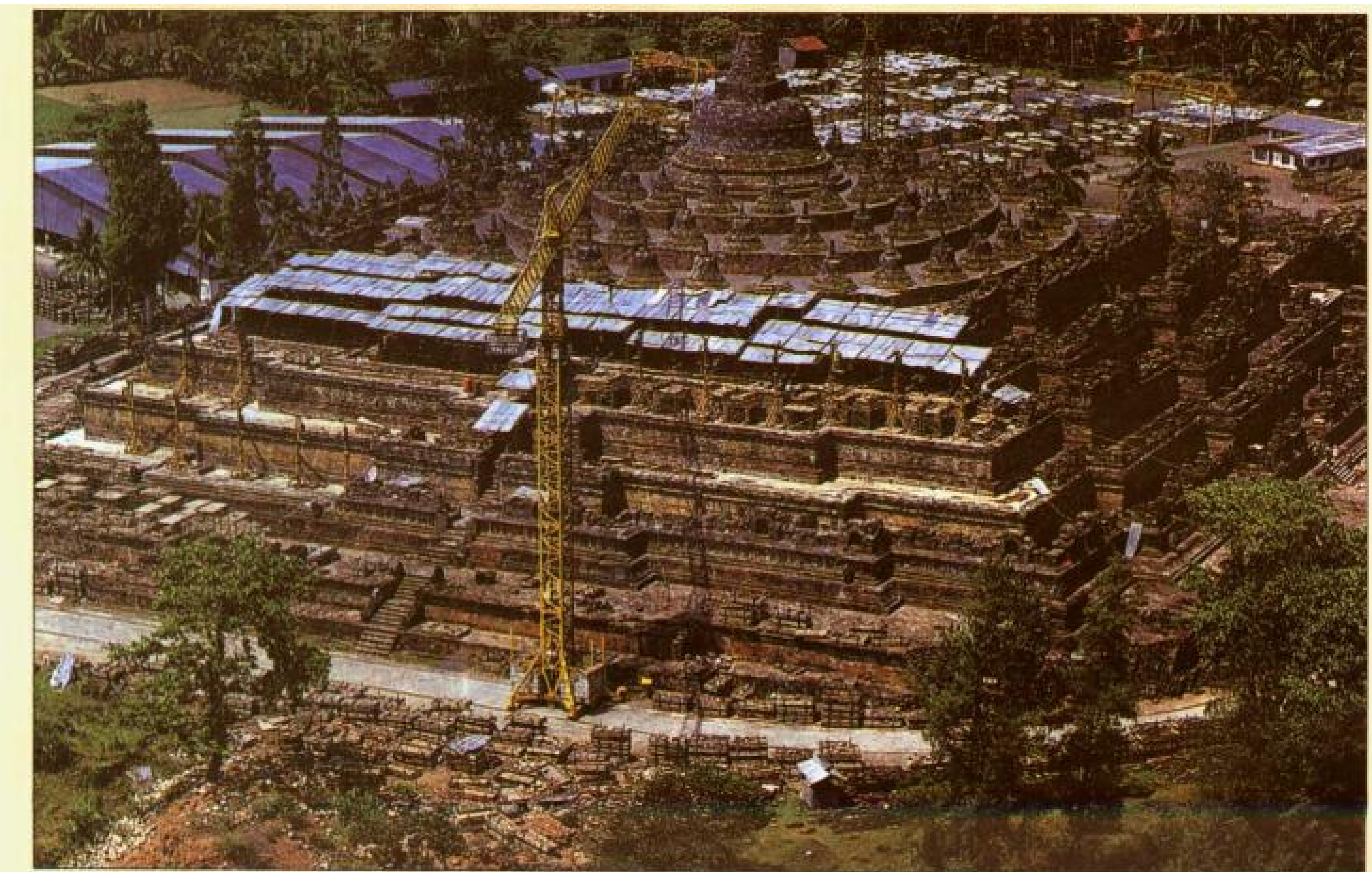
部分计划完工的时候，经过处理的石材和雕像被放回原来的位置，而此时雨水可以安全排出，平台已经变得稳固。

■ 在背部用粉笔做了标记的佛像，正待从婆罗浮屠的台基上拆移下来。每座佛像和石块均做有标记，代码被输入计算机跟踪系统，然后，它们被运送到单独的处理场所内加以处理。





■ 图为工人们正将数块石材放入专门设计的托架上,以便由伸过来的起重机(如左图所示)将石材卸运下去。最初建造婆罗浮屠时,石材之间未用灰泥黏合。每块石料均经过仔细切削,叠放时和相邻的石块正好严密契合,使建筑结构整体相当稳固。所以,每块石材都只能放回其原来的位置。新的排水系统所使用的材料,均由火山岩石材经仔细雕刻而成。右图为当代的一位泥瓦匠正运用古老的技术进行雕刻。



重修婆罗浮屠

BEAUTY TREATMENTS FOR BUDDH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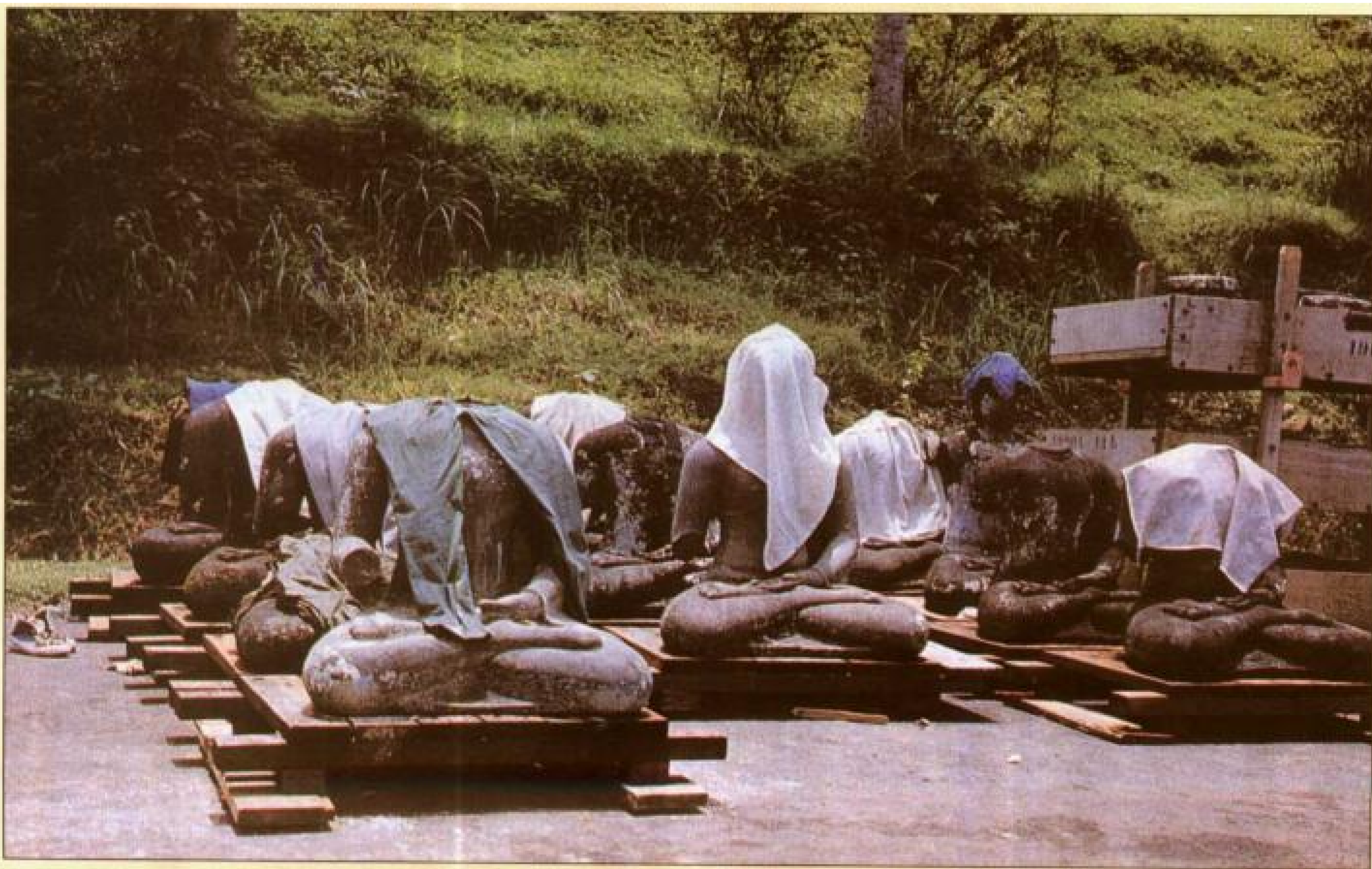
婆罗浮屠具有大量的浮雕和雕像装饰。在婆罗浮屠，游客们可以领略到古代佛教艺术的伟大成就。然而，不幸的是，颇具破坏力的寄生生物也在婆罗浮屠安家落户。由于该地区湿度很大，雨水常常渗透到婆罗浮屠的内部，并存留在多孔的火山岩当中。潮湿的石头为青苔、地衣和藻类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精致的雕刻受到侵蚀，并加快了其石材的解体过程。当水分渗透到石料表面，随着水分的蒸发，矿物质沉积在石材表面，形成明显

的污痕。

经过研究，专家们针对这些问题，总结出婆罗浮屠的保护方案。在石材被卸运下来以后，凡需要处理的，都被放在仓库里，以免遭受到恶劣气候的影响。用干燥的刷子，将石材表面清理干净，有时也用水进行清洗。如果石材上的污痕和滋生的生物有些顽固不化，还要使用中性的化学溶液。然后再将潮湿的石头晒干，必要时用机器烘干。最后，在重新放回原处以前，石材还需要再用除草剂进行处理。

有证据显示，婆罗浮屠在建成之初，其表面曾经被灰泥覆盖着。建筑表面上的装饰性绘画，颜色非常亮丽。然而因为缺少文献的具体记载，所以重建人员无法复制原来的装饰性绘画，以反映婆罗浮屠的最初面貌。但是，游客也能够看得到，经过现在修复的婆罗浮屠，其石刻和雕像已经能够基本再现婆罗浮屠原有的瑰丽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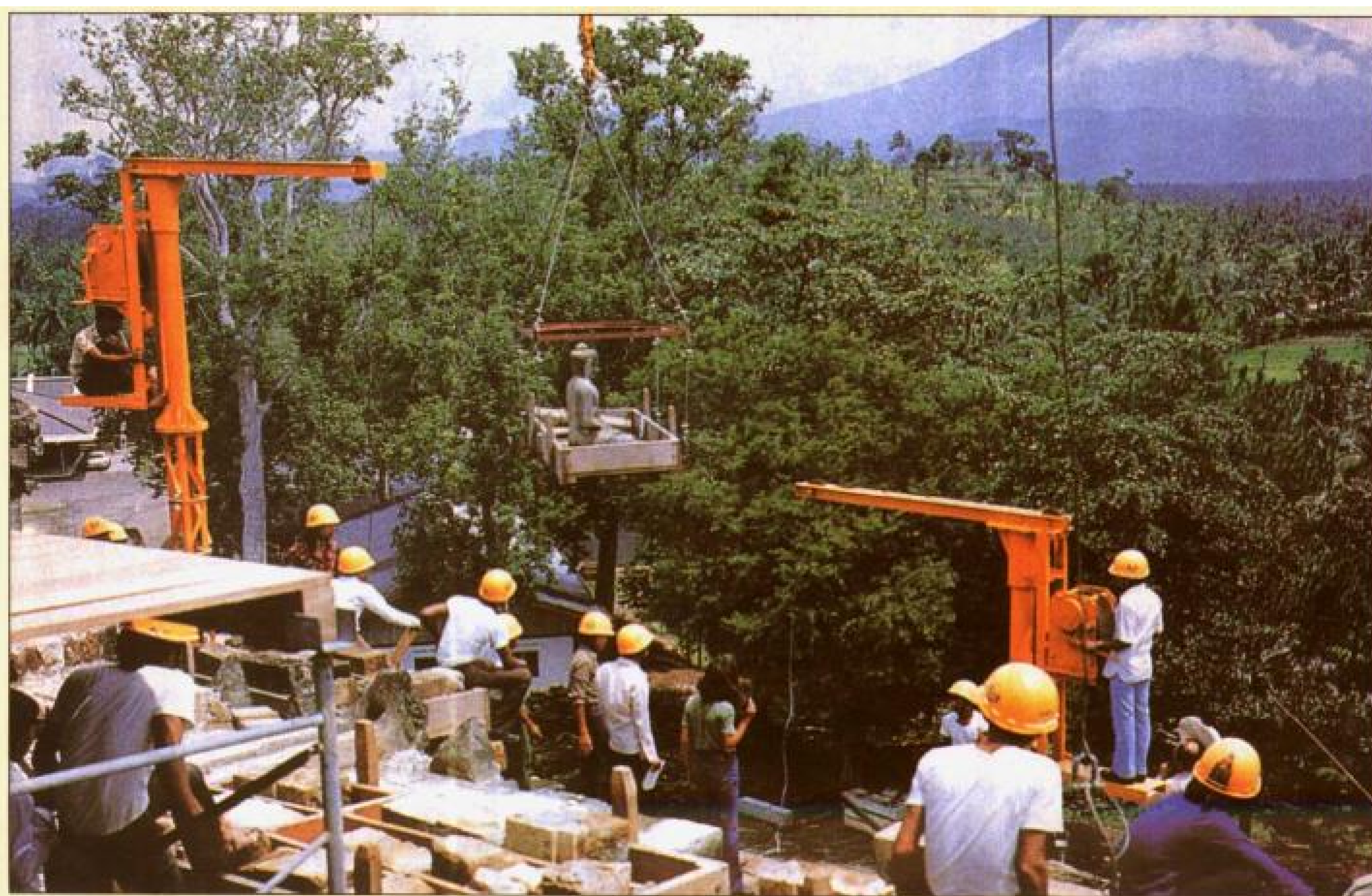
■ 工人们顺手把佛像当成晾衣架。佛像正等着加以保存。婆罗浮屠的佛头有些已被盗贼窃去，卖给了私人收藏家。



■ 工人正在仔细地给佛像进行“包装”，其所用材料由黏土和化学成分构成。许多印度尼西亚人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培训以后，现在已成为保护和修缮婆罗浮屠这座古建筑的固定工作人员。



■ 如图所示，婆罗浮屠巨大的石块以及和真人同样大小的雕像，需要使用起重机之类的重型设备，才能将它们卸下来。在重建工作结束之后，剩余的建筑材料和其他设施均被卸除运走，并修建了一座考古公园。







■ 每年的游客达百万之多，他们来到婆罗浮屠，登临经过重建的佛塔台基。印度尼西亚政府对这座佛教古建筑加强了监督和管理，以防止恶劣的气候使佛塔遭到进一步破坏，并确保提供安全有效的预防措施，以制止故意的破坏活动。现在，印度尼西亚政府所面临的挑战是，既要使婆罗浮屠向其国人全面开放，又要保证这座古建筑得到连续不断的保护。

年表：繁荣的东南亚历史文明

THE FLOWERING OF SOUTHEAST ASIA

东南亚地区位于印度和中国的十字交会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东南亚地区的文明是印度和中国这两大古国的文化在这里蓄积的结果。中国和印度尤其是印度的影响确实相当重要而且深远。印度教的魔鬼卡拉在这里获得更多的表现(如图)，比其在印度国内还要多。然而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在东南亚地区所出现的文明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移植现象。这里的文明从史前时期就按照其独有的方式获得了发展。

大约1万年以前，在最后一纪冰川时期结束的时候，上升的海水在东南亚沿海地区泛滥。大陆开始收缩，联系着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大陆的陆地开始消失。使用由和平人开创的石器技术的民族在这里出现，他们从新生成的海岸线、河流的支脉以及内陆茂密的丛林中获取食物。泰国西北部的斯皮里特岩洞是石器时代重要的遗址，在这里发掘出土的作物遗迹显示，这些作物最早在东南亚获得栽培。



史前时期 公元前8000年 - 公元100年

PREHISTORIC 8000BC-AD100

农业开始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随着社区规模的增大，他们开始利用野生稻进行栽培，起初在河流的沿岸，继而在蓄水的稻田里。湿水稻适应亚洲的季风气候，而且精心安排的灌溉计划得到实施，这样，可以年产三季的栽培稻便成了这个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然而，水稻栽培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需要建造堤坝和河道，以进行灌溉和排水。在较干燥的地区定居生活带动了社区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更大规模更有组织的定居生活。

在东南亚大陆上，许多种植水稻的社区能够获得锡和红铜。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泰国东北部的班奇昂，或者其他地区，拥有文化传统的民族利用这两种金属制造出青铜工具和装饰物品。公元前700年前后，铁器亦得到发展。在现代纪元开始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金属冶炼与加工技术传播到东南亚海岛。铜鼓是在仪式上使用的一种青铜制礼器，在越南东山发现并命名(如图)为东山铜鼓。其传播地区之广，揭示出东南亚大陆和海岛之间存在着贸易往来。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结束的时候，马莱的航海者其建立的商业联系甚至已经远达非洲东海岸。



东山铜鼓

原始时期 公元 100 年 - 公元 800 年

PROTOHISTORIC AD100-AD800

基督纪元开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标志着东南亚的重要变化时期。向南伸出的东南亚大陆,将孟加拉湾和中国南海分隔开来,使东南亚半岛地处印度和中国两大文化古国之间。寻找黄金、香料和其他珍贵物品的印度商人开始在东南亚沿海地区建立定居点。他们把印度教和佛教以及他们信仰的众神带到这里,其中包括创造之神湿婆和守护之神毗瑟(如图)。他们还把文字、货币的使用以及国家和君王的概念也带到这里,这些对东南亚的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扶南公国是一个小国,曾在公元1000年前半叶期间统治着湄公河三角洲,印度人的思想从这里开始向周围地区广泛传播。向北传播到真腊,而真腊最终取代了扶南公国,向西北传播到泰国和缅甸,并到达越南中部和南部海岸。到公元600年的时候,次大陆的宗教和许多文化属性都深深植根于东南亚大陆和海岛。印度的文化和当地的生活方式相结合,开始形成新式的文明。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这些所谓的“印度化”的王国走向繁荣,并形成了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泰国的毗瑟神像

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时期 公元800年 - 公元1400年

HISTORIC AD800-AD1400

公元800年到公元1000年期间，古神庙建筑在东南亚广泛兴建。随着新兴王国的迅速成长，印度教和佛教石构神庙建筑与日俱增。诸多曼荼罗或曰城邦，其疆域以最高统治者的宫廷为中心，不断扩张和收缩。他们的地位吸引来支持者，使行使权力成为可能。君王可以把自己和印度的神灵联系起来，以加强其统治地位。

高棉是其中最著名的曼荼罗，曾统治今柬埔寨大部分地区。其统治者在都城吴哥广泛兴建宗教神庙，多见于吴哥古城中。此图即为吴哥古都的城门。吴哥西北有泰国的历代王国，更远的地方还有缅甸的蒲甘帝国。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婆罗浮屠附近亦有数个古代王朝。

东南亚大陆上建立的王国于公元11世纪到13世纪达到发展的顶峰。新兴王国也在此时期建立。到公元15世纪时，随着吴哥的灭亡，东南亚历史的古典时期宣告结束。



吴哥古城门

失
落
的
文
明

- 1 辉煌、瑰丽的玛雅
- 2 波斯人——帝国的主人
- 3 古印度——神秘的土地
- 4 罗马——帝国荣耀的回声
- 5 希腊——庙宇、陵墓和珍宝
- 6 拉美西斯二世——尼罗河上的辉煌
- 7 圣地——耶路撒冷
- 8 北欧海盗——来自北方的入侵者
- 9 东南亚——重新找回的历史
- 10 埃及——法老的领地
- 11 伊特鲁里亚人——意大利一支热爱生活的民族
- 12 凯尔特人——铁器时代的欧洲人
- 13 非洲——辉煌的历史遗产
- 14 安第斯之谜——寻找黄金国
- 15 早期欧洲——凝固在巨石中的神秘
- 16 古代中国——尘封的王朝
- 17 安纳托利亚——文化繁盛之地
- 18 美索不达米亚——强有力的国王
- 19 印加人——黄金和荣耀的主人
- 20 北美洲——筑丘人和崖居者
- 21 苏美尔——伊甸园的城市
- 22 庞贝——倏然消失了的都市
- 23 灿烂而血腥的阿兹特克文明
- 24 爱琴海沿岸的奇异王国

ISBN 7-219-04449-6



9 787219 044490 >

ISBN 7-219-04449-6/K · 914 定价: 65.00 元